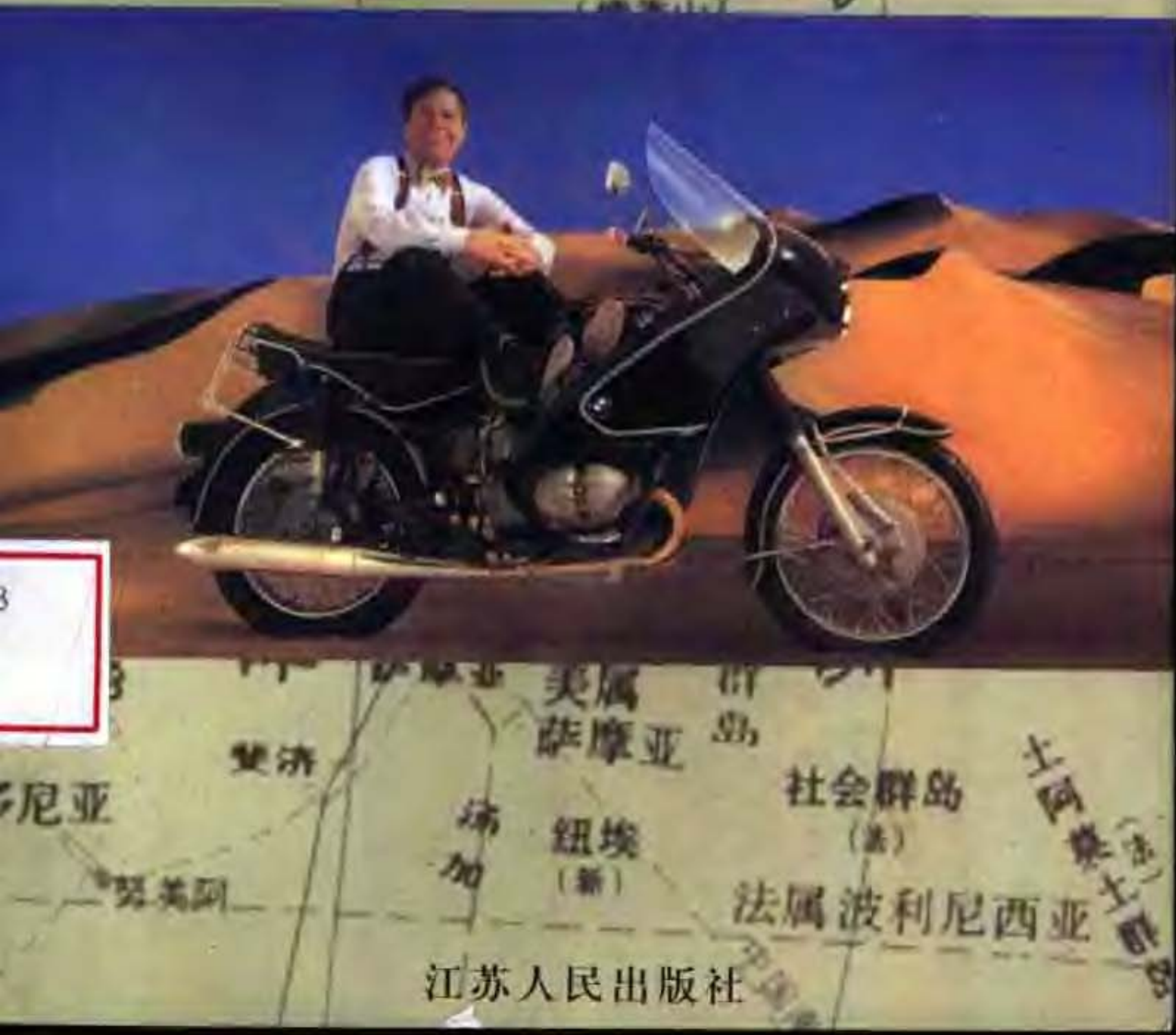
ON THE ROAD WITH JIM ROGERS INVESTMENT BIKER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美〕吉姆·罗杰斯著　刘昕 胡凝　李绮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ON THE ROAD WITH JIM ROGERS
INVESTMENT BIKER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美）吉姆·罗杰斯著　刘昕 胡凝　李绮译

00929873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书号：F837.124.8
L76
4

江苏人民出版社

I would like to thank Donald Porter,
without whose insight and editorial guidance
this book could not have been written.
Thanks also to Marshall Loeb
at *Fortune*.

在此谨向唐纳德·波特深致谢意，
没有他的深刻见解和编辑指导，
这本书就不会问世。
同时感谢马歇尔·洛伯。

For those of you
consumed by the passion
to see it all and
fathom the world
as it really is.
And for C. Rider,
of course.

此书献给那些渴望了解一切，
渴望洞察世界之真面目的人们。
当然也献给 C. 骑手们。

目　录

第一部　从当昆到东京

1. 飞往俄罗斯　3
2. 纽约　11
3. 横穿欧洲　18
4. 林茨　29
5. 中欧　34
6. 前往伊斯坦布尔　42
7. 古老的土耳其　50
8. 中国　69
9. 西安　84
10. 从西安到北京　98

目　录

第二部　从东京到当昆

11. 第一过界的第一流　115
12. 在世界的边缘　131
13. 穿越塔嘎扩野　143
14. 西伯利亚　160
15. 乌兰--乌德,津巴布韦和勘斯克　178
16. 新西伯利亚和西方　190
17. 莫斯科　202
18. 前往爱尔兰　214

第三部　从当昆到好望角

19. 非洲:撒哈拉沙漠　229
20. 撒哈拉周边的非洲　251
21. 顺流而下——一条慵懒的河流　267
22. 战无不胜的战士的故乡　279
23. 逃亡　302
24. 赞比亚和大津巴布韦　317
25. 博茨瓦纳　330
26. 南非　341

第四部　绕过合恩角

27. 横越澳洲大陆　361
28. 世界的最极端　380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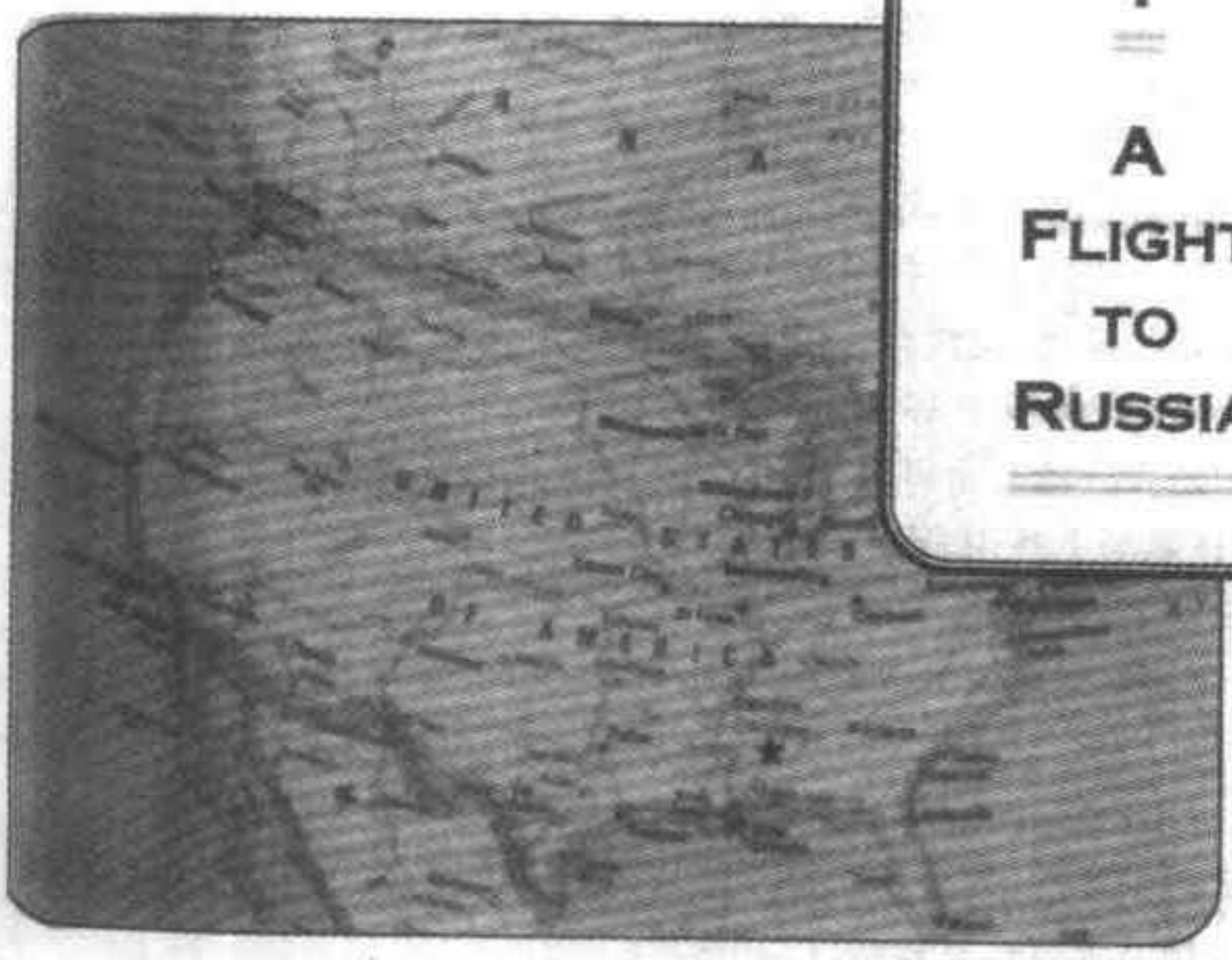
29. 布宜诺斯艾利斯　392
30. 智利和复活节岛　411
31. 在光辉道路上　430
32. 沿着达尔文的足迹　451
33. 达连断层之路段　460
34. 通往里奥格兰德的运河　466
35. 归家,再次启程　487

后记

PART I

DUNQUIN TO TOKYO





1

A FLIGHT TO RUSSIA

1. 飞往俄罗斯

A FLIGHT TO RUSSIA

我出生于1942年，是五个兄弟中的老大。我的父母于30年代在俄克拉荷马大学相识，当时他们两个都是学院荣誉学会的会员。二战期间，我父亲在德国任炮兵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亚拉巴马州的德摩保利斯，经营他兄弟开的一家工厂，而从19世纪初以来，我们家族成员

就一直生活在这儿。

我妈妈是个独生女，她生了那么多的男孩子，很快就感到应接不暇了。我们五个男孩子很好斗，整天闹个不停。我们继承了父亲的干劲，他教育我们不管想要做出什么，都要付出努力去实现它。从父亲那儿，我们学会了拼命工作。

我的经商生涯开始得很早。5岁那年我得到了第一个工作，在棒球赛场上拣空瓶。1948年，我获得了在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比赛中出售饮料和花生的特许权。在那个钱很值钱的年代，我父亲郑重地借给了他6岁的儿子100美元，用来购置一台花生烘烤机，这笔贷款是我步入生意场的启动资金。5年之后，我用所得的利润还清了贷款，并在银行存了100美元。我觉得很富有（我至今还留着那台花生烘烤机，说不定哪一天这么棒的赚钱机器会派得上用场）。

罗杰斯父子投资队伍就用这100美元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们到乡下去做投机冒险生意，把这些钱全买了价格正日益飞涨的牛犊。我们出钱让农民来饲养这些牛犊，希望到次年出售时能卖个大价钱。我们掏钱的时候毫不知晓价钱已涨到了顶点。实际上，一直到20年后，我读到第一本商品曲线图本时才明白当时是怎么回事。我父亲和我被卷入了朝鲜战争引发的商品涨价的狂潮中。我们在牛犊上的投资被战后价格的回落吞噬得一干二净。

我是在镇上那所封闭隔绝的小学校里读的高中，成绩很不错，是班里的尖子。后来我获得了去读耶鲁大学的奖学金，这使我受宠若惊，但同时我也担心，我怎么能竞争得过那些西北预备学校的高材生呢？

我去上耶鲁的时候，父母没能送我去纽黑文。那儿离家

太远了。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所有学生都给家里打电话。我拿起电话对接线员说我想给亚拉巴马的德摩保利斯挂电话。她说："好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说："5，"

她说："5多少？"

"就是5。"

她说："你是说555-5555？"

"不是，"我礼貌地答道，"就是5。"

她说："小伙子，你是在读大学吗？"

"是的，夫人。"

她火了："我可不想听你胡扯，大学生！"

我再三解释自己并没有不敬的意思，最后总算说服了她一试。在当时，接这样一个长途要由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先接通亚特兰大的接线员，再由她接通伯明翰的接线员，最后才能接通德摩保利斯的接线员。

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先讲话："我这儿有一个男孩说他想接通他在亚拉巴马州德摩保利斯的家里的电话，号码是5。"

德摩保利斯的接线员气都没喘一下就说："嗬，他们现在不在家。他们去教堂了。"这令纽黑文的接线员惊得一时无言，目瞪口呆。

光阴似箭，大学生活一晃而过。我曾考虑过去上医学院、法学院和经济学院。我热爱学习，过去一直都是这样，自然也想继续我的学业。1964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多米尼克公司工作，就是在那儿，我爱上了华尔街。我一向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时事，我也很吃惊地看到，在这条街上，有人会因为我估算出智利爆发的革命会使铜价上涨而付给我钱。我很

穷，急需钱用，而华尔街显然是座金山。

在耶鲁，我是赛艇队的舵手。就在四年学业快完成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取得了去牛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在那儿我上的是巴利奥学院，学习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我成为从亚拉巴马的德摩保利斯出来的第一位曾在泰晤士河上参加过牛津—剑桥赛艇比赛的舵手。

我在把我的奖学金上交给巴利奥的财务主管之前，运用夏天在华尔街的工作中学到的一些东西，用这笔钱炒了一回股。

从牛津毕业之后我在军队待了一两年，在此期间我用指挥官的钱购买了股票。由于赶上了牛市，回报相当可观。我回到纽约，来到华尔街工作。

我最终成为一家有限合伙公司的海外投机投资集团的初级合伙人，这是一家专为购买和出售一些即将到期的证券、货物、货币及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地的公债的海外投资者管理基金的机构。我不停地埋头工作，使自己尽可能多地掌握世界范围内的资金、货物、原材料和信息的流通。1968 年，我揣着 600 美元初入这个市场，到 1980 年我退出时已拥有几百万。不过，我为此也付出了代价。我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婚姻，她们无法理解我拼命工作的热情，这是我和我的兄弟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当我可以把一笔钱投入市场运转的时候，我是看不到家中对新沙发的需要的。我至今坚信，一个年轻人节省下的每一块钱，投资有方的话，将会在日后回报给他 20 块钱。

1980 年，我 37 岁，决定退出股市，我想在这个成熟的年龄去尝试另一种事业，同时也为了得到一些思考的时间。在华尔街工作时，我太投入，没有时间进行自我反省。另外，我

还有一个梦想。除了想在另一个领域中求发展，我还想骑着心爱的摩托周游全世界。

自从意识到亚拉巴马的德摩保利斯并非西方世界的中心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梦想着去看世界。我长久以来对历险的渴望也许源自同一种情结。不过我将这次旅行不仅仅视作是一次历险，也作为一种继续始终贯穿于我生活中的所受教育的方式——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看清它的真面目。我要站在它的地面上去看，去真实地了解踏在我脚下的这个星球。

要做大的旅行，想用3个月的时间横穿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最好的方式是骑摩托车。你可以边骑边看风景，呼吸乡村的气息，而坐在汽车的铁壳子里是无法享受到这些的。你好像就在自然界里，与那风景融为一体。你可以触摸它，感觉它，去看，去听，去品尝，去呼吸。你是放松的、自由的。对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旅途是达到目的地的中介。而当你骑车旅行时，旅途本身就是目的。你骑车走过从未到过的那些地方，经历这一切，遇见新的人，作一次历险，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

我想经历一次长长的旅行，长到可以把我的过去远远地抛在脑后。我仍订阅《华尔街日报》和《财经时报》，但我想将自己从投资生意中彻底脱离出来。我想换个活法儿，想寻求一个人生的分水岭，给我今后的生活划出一个崭新的界定，我不知道旅行回来会做什么，但我想做些不一样的事。我寻思着一次65 000英里的环球旅行该是足以算作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了。

在1980年要想环绕地球还是很困难的——你不是哪儿都去得了的。有25～30处地方燃烧着战火，有些国家的某些

地区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假如我打算环球旅行的话，那就会像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样：要么过火，要么干脆不做。我的梦想是将足迹踏遍六个大陆——从西到东穿过中国，从东到西穿过西伯利亚，从非洲的北端到好望角，穿过澳大利亚的大片沙漠，再从阿根廷的最南端向北直到阿拉斯加。

我曾于 1984 年和 1986 年两次前往中国，为这次跨国旅行接近官方。我甚至租了一辆摩托车，一辆排气量为 250cc 的小本田，还骑着它绕了福建省一圈，看看能学到些什么。福建并不太大，可能跟路易斯安那州差不多，但她那 2600 万人口却几乎相当于路易斯安那州的 7 倍。我骑车间或着坐飞机去了几个省会，用那辆摩托跑了 2000 英里算是探探路。然后，在 1988 年，我终于骑着自己的摩托穿越了整个中国。

俄罗斯是环球旅行的一大障碍。我给俄罗斯方面写了信，并让别人给我写了介绍信证明信什么的。但全都石沉大海。我打算去一趟苏联国际旅行社，他们的社长伊万·卡列宁告诉我说连想都不用想。他总说，除了狗熊和老虎、丛林和森林，西伯利亚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去那儿，没有人想去那儿。

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遇见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去过西伯利亚，也不知道有谁去过。苏联的公民似乎对于那块相当于 19 世纪美国西部的地方一点概念都没有，就像现在多数纽约人也都不知道阿拉斯加是什么样一样。这些俄罗斯人告诉我要么坐火车——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要么坐飞机，只有傻瓜或疯子会驾车去。

我通过耍花招，好不容易才经人介绍见到了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大使，但就连他也帮不上忙。我慢慢开始认识到这一点。驾车穿越西伯利亚不像穿越美国，是一段接一段单调的

高速公路，西伯利亚完全不同。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那儿没有什么路。但是若不穿越西伯利亚就无法环球旅行，如果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得找出一条路来。从地图上看，西伯利亚宽7000英里，差不多是美国宽度的2倍。大家都知道，那儿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跟纽约州差不多，但确切的数字却无人知晓。我想那儿不会比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更荒凉，而那些地方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万般无奈之际，我把中国之行的录像带拿到苏联国旅，希望他们的社长伊万看后会感到我是认真的。他接过去的时候露出了不耐烦的笑容，不过他还是看了。我第二次去时，他说："有一个组织你可以写信试试。"他不知道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不过在他的工作手册中可以查到。结果他还是翻译不出，于是索性用俄语写下了它的名称、地址和其他情况。看起来，这像是一个隐秘的、仅在内行的小范围中知晓的组织，叫苏运盟。我把这张纸拿回家，复印了一下，把它贴到信封上，里边是我用英文写的信，讲了一下我想骑摩托车从大西洋到莫斯科再到波兰的计划。我说我愿意接收这个组织向我提出的一切条件——沿途他们让我住在哪儿我就住在哪儿，如果需要派人随行我都接受，士兵也行——我不介意。我必须要去。每当我转动地球仪，俄罗斯的大片领土就凸现在我的眼前。假如我不穿越俄罗斯，就无法说服自己真的完成了环球旅行；而假如不去环球旅行，那么就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旅行。但对这封信，我并没抱多大希望。这几年来，我已发出不下20封这样的信了。

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把发过这封信的事忘了——我收到了回信。信上说："亲爱的罗杰斯先生：是的，您可以驾车穿

越俄罗斯。您打算什么时候来?"只有三四行字,总共两段话,是一位叫瓦勒里·桑革洛夫先生回的信。我简直不敢相信,就好像是我一直站在一扇门的外面,每天敲门,敲了整整9年但从未敲开过,然后有一天这扇门终于开了,有人出来说:"噢,进来吧。"他怎么会知道我在那儿已经站了9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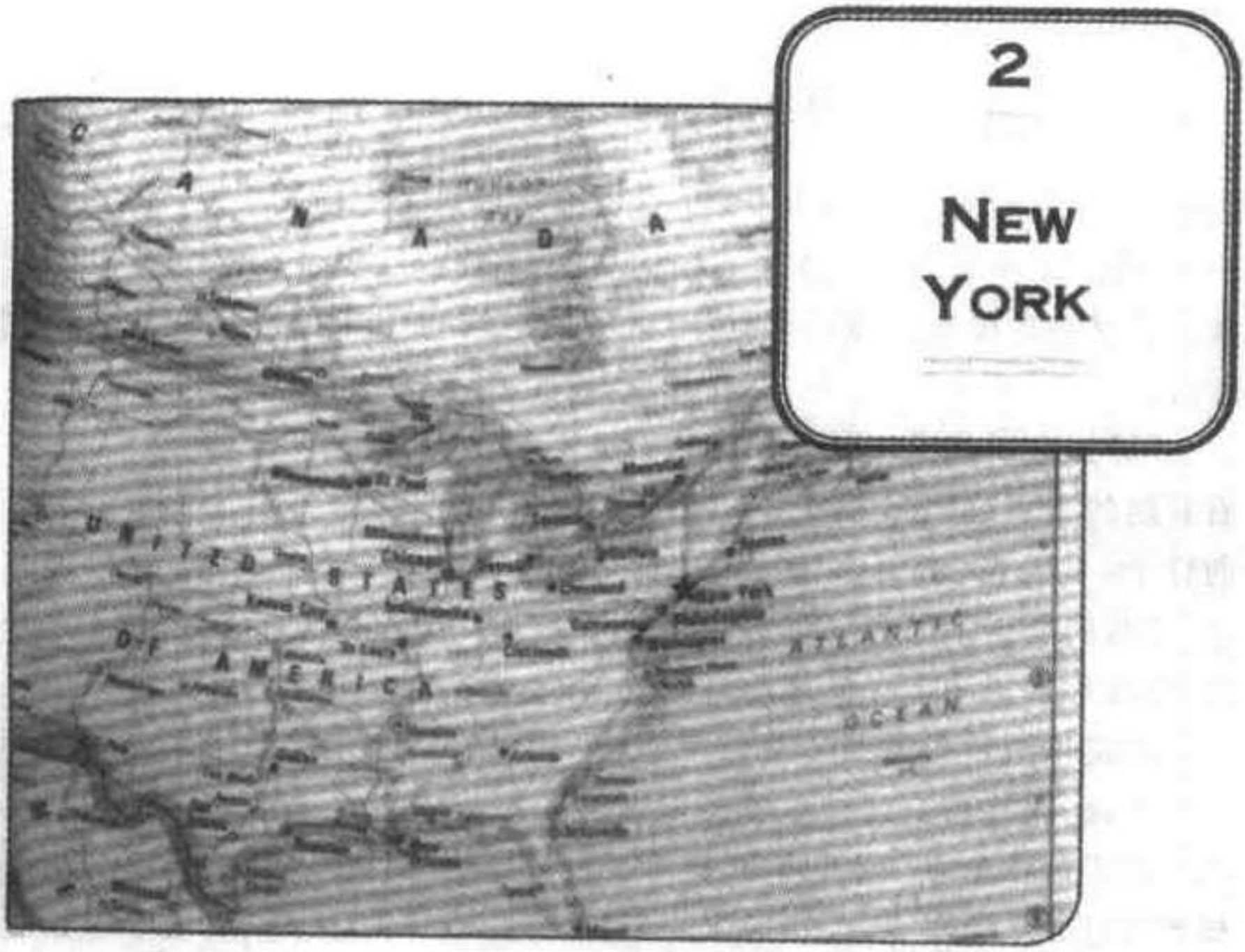
我立即飞往莫斯科去见那位向我打开大门的人。我不停地问翻译奥克萨纳:"他们是这样说的吗?"她都回答说:"是的,你怎么了?"

"这真的就要实现了吗?"

"是的,就要实现了,你为什么这么疑惑,这么感到奇怪、感到怀疑,问个不停呢?"

苏运盟是一个苏联的体育运动组织,他们资助国际上的各种运动项目和活动。我试图通过外交和旅游渠道来实施环球旅行的计划已屡遭挫折,现在碰上的这群俄罗斯人则把长距离摩托车驾驶看作是一种运动项目。这是环球旅行的第一课:要充分了解你所去国家的文化,从中找出机动灵活的调整余地,否则就会被拒之门外。

我喜出望外,但还有些心存疑虑——真能信任这些俄国人吗?也许到了边境又会被赶回来。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次旅行是我心仪已久的。我要环球旅行!1989年12月,我满怀兴奋地飞回纽约,盘算着次年3月启程上路。



2. 纽　　约

NEW YORK

贝莎是我已相处了几年的伴侣。我问她："你觉得去环球旅行怎么样？"

"他们说行了？"她问我。一年前，她随我去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辆摩托，两个行囊，5000英里路，她很喜欢。

"我想3月出发，还有4个月，"我说，"你敢去吗？非洲、

撒哈拉、西伯利亚、翻越安第斯山，这次你还可以去中国。”

“我的工作怎么办?”她说。她喜欢这个工作，在一个小的基金会里管理拨款，刚踏出校门不久的她对这些工作是很合意的。

“辞掉它，”我说，“这样的旅行一生只会有一次。”我喜欢看着她的手穿过那棕色的头发，把头侧向一边，一副蹙眉思考的样子。

“我们驮得了那么多东西吗？这些地方有的需要带上零件、汽油和备用胎。”

她说得对。我骑宝马摩托车已经20年了。由于对机修一窍不通，我才选了这种返修率最低的品牌。但我发现宝马在全世界的维修点中不包括扎伊尔、西伯利亚和中国，但那儿却要经过数千英里全球最糟糕的路段。

“最理想的方法是骑两辆摩托车。”我说。

“可我不会骑摩托车。”她说。

“你可以学。在昆斯区有一个摩托驾校。”

她本能地皱了皱眉，没说话。她喜欢坐在我的车后面一起兜风。摩托车协会说驾驶摩托的90%为男性，不过这一比率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已经有了一两本专为女性驾驶摩托创办的杂志。塔贝莎那年23岁，比我所认识的其他女孩都爱冒险，我当时已40开外，有20年的驾龄。塔贝莎有的则是她的年轻。

“假如一辆车出了毛病，”我接着说，“旅行并不会就此结束。你去驾校学车，然后我们两个都去报名学习宝马的机修课程，这样假如我们在丛林中抛了锚，就可以把车修好。”

我第一次遇见塔贝莎是在我家里，是由她的妈妈贝菲，我

的一位老朋友，硬把她拖来的，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财经。结合我以前对塔贝莎的成长背景的零星的了解，我发现她最适合去读经济学院。她是一位身材高挑、双腿修长的棕发女孩，在曼哈顿西区长大，上的是东区那所南丁格尔—班穆福特女中，接受的是她那个时代及地域时髦的政治思想：在文明社会，国家会处理好社会出现的一切问题。共和党是端庄正派的大敌，崇尚贪婪，或许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她父亲大学毕业后做过海军领航员，现在从事法律工作。读中学的时候，父母婚姻破裂，她夹在中间深受其苦，有一段时间南丁格尔—班穆福特女中成为她情感上的支柱，她至今仍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在阿默斯特，她为自己选了一个专业，是以研究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跨学科的课程。

我们初次见面便相互吸引。虽然我在经济学院教书，但我总是对所有学生说，不应该来读经济学院，这是浪费时间，我把这话也告诉了她。因为算上机会成本，要花掉她或她的父母 10 万美金，这笔钱与其用来上学，不如用来投资做生意，虽然可能赚也可能赔，但无论赚赔与否都会比在教室里坐上两三年，听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资深教授"对此大放厥词地空谈要学到的东西多。

我开始约她出来，一次一次地，彼此间慢慢有了很多了解。

此后的几天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次旅行，她也开始计划这次旅行，好像已经打算去一样。对我来说带她去是很自然的。我要做许多长途旅行——横穿欧洲、美国、印度、中国，还要沿着埃肯高速路去阿拉斯加——通常我都带着她。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虽说她的热情丝毫未减，我却开始怀疑她能

否自己骑车旅行。不错，她曾坐在我的后座上从旧金山到纽约，但即使在高速公路上一天行驶500英里也不能算是为此次旅行所作的准备。巴基斯坦的路况也的确够糟糕的，但在那时她只是一个乘客。“我改主意，”一天晚上我在吃晚饭时宣布，“我觉得让你自己开车不是个好主意。这对一个新手来说太困难了。还记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路有多糟糕吗？中国、西伯利亚和非洲的路会更难走的。”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你觉得我不坚强吗？”

“不是，我没这么说。这是一次很长很长的旅行，并且将是最长、也是最艰难的一次。”

“我能行。”

我叹了口气，说：“一个骑手要有几千英里到几万英里的驾驶经验才能做这样的旅行。我们得保持进度，糟糕的路况，几周几月的连续作战会把你累垮的。你需要经验。我记得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是怎样的情景。有一次，我从一条州际公路上摔下来，上帝保佑，我撞进了玉米地，因为我没有经验，再加上注意不够。我第一次走砂砾的路面时，轮胎打滑，把我扔了出去，摔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而现在我们要去的许多地方，都得在心里祈祷但愿能够赶上像沙砾那么好的路面。”

“我们还有3个月才走呢。我会练习的。”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准备发起另一轮攻势。“听着，我刚才解释得不够。在中国旅行时，我从吐鲁番到哈密，有一车摄制组的人员为我殿后。这段行程是250英里，不到一天的路程。我们没带很多吃的和喝的，因为确知路况很好，我们在天黑前就能到达哈密。结果，那天在路上一直跑了17个小时，简直像场恶梦。我们没法停下来，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停——

没有地方卖吃的。我们在沙漠里，所以也没有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想要是停下来大家都得死，既然走到那儿了，就只有继续往前。但只走到三分之二路程时，摄制组就打算放弃了，而他们是坐在汽车里的。”

她定定地望着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继续讲：“这次旅行中，我们有时还会需要炸裂沟岔才能继续前行，这非常危险，也是你从未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半个世界——一半以上的地方——还是荒野的、没有铺路的原始状态，根本无路可走。”

她在思考时眼睛仿佛要看穿我，“你觉得我不够坚强。”

“我觉得你够坚强的，但你也许没有足够的经验，即便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不足以应付这样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我会努力作好准备的，吉姆。我们在你的摩托车上已经旅行了几千英里了，我很清楚情况会是什么样。”

“但别忘了速度。我每天跑步锻炼6英里。你很清楚，这会把你累垮的。仅仅3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练就足够的耐力。”

“我想我能。”

“你也知道有时候我是个拼命三郎。我必须这样　就像那次的哈密之旅，其实第三天从哈密返回吐鲁番的250英里，又整整颠簸了17个小时。”

“吉姆，我会跟上你的进度的。”

我仍不能确信她是否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况且我也不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想要环球旅行，一天只开三四个小时可不行。”现在她转过头来直视着我。“吉姆，如果你不想让我去，就直说。你自己走吧。”“我可没这么说，我很希望

你去。有你作伴是再好不过的。但我们要走世界上最难走的路，经历一些最难受的天气，穿过撒哈拉，翻越安第斯，还要经过疾病流行的地方，那儿没有医院、没有电话、没有机场，甚至没法拍电报，那儿还有强盗和恐怖主义者——天知道会有什么。”

再往后的几天我们开始往坏处想。我们谈到了被杀的可能性。塔贝莎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她在纽约照样有被杀的可能性。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够成行，否则就不会作此筹划。

我得想好在离开纽约的这段时间里如何处理我的债券。证券市场是变化无常的，必须时刻紧盯着。这些变化始终令我着迷。它们时起时落，我还记得当我学会用空头方式从跌价中像靠涨价一样获取到利润时的兴奋劲。我们要去的那些地方不会有电话、电传或传真，报纸也少得很。好在我的大多数债券都是长期的，所以不用采取什么大的动作。我卖掉了一部分短期债券，期货的则一张没留。

1990 年初的时候，我的大部分钱都买了公用事业公司发行的股票、美国政府的公债以及外汇，我没怎么挪动这些钱。我拥有公用事业公司发行的股票，多数是核电站低价售出的，像伊利诺依核电站和尼亚加拉莫霍克核电站的股票，因为我坚信他们会把价钱降到最低点。我认为美国的利率正在向南倾斜，所以我对买债券持乐观态度，对存美元持悲观态度，也就是说，我认为债券会升值而美元会贬值。我想政治家们会尽一切努力来保持经济发展的，但他们并不精于此道，采取的方法无非是降低利率。我买的外汇主要是面值为荷兰盾或德国马克的存款证明，出此举就是考虑到美元会随着利率的降

低而贬值。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作为一个将要启程去周游世界的债券投资者，我只能冒此风险，因为我将不可能每天追踪这些股市的行情。假如我押对了，就会赚钱，假如错了，也不会输个精光，因为政府的公债和公用事业公司发行的股票也许会跌，但基本上属于长期稳定的，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的货币也是这样。

由于我是干这行的，所以每当我在外旅行，总能发现前景看好的投资机会。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投资旅行，但我猜想还是会去参观一些可以有所作为的证券交易所。除了骑在摩托车上，可以生动地经历而且接近这个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我还会了解到非洲、中国和南美的市场，我感到这些地方在90年代兴许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市场也很感兴趣。通过投资一些沉睡的市场，使它们爆发出活力，我既为自己赚取了大笔利润，同时也造福了他人。其实，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奥地利，我将在那儿对奥伯银行的投资委托人作一次演讲。几年前我对奥地利证券市场的投资，三年内涨至5倍。我不知道会不会找到更多这样的地方去投资。全世界正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我想，对于投资而言，这不仅正是时候，而且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3. 横穿欧洲

CROSSING EUROPE

几周的时间一晃而过，塔贝莎仍不改初衷。她坚持要与我同行。我还是担心这次旅行不适合她，我想她在最后时刻会改变主意的。3月份正一天天地近了，我们也紧锣密鼓地作着准备，我们买了备用的缆绳、反光镜、化油器，还有米奇林轮胎。我们在背包里塞满了一卷一卷的3M神奇建筑胶带，

就是宽两英寸、透明的那种，看上去很结实，是我最喜欢用于紧急维修的材料。我们带了睡袋、雨衣和一个备用的头盔。塔贝莎找出了结婚戒指，在我们以前的旅行中她都戴着。我们发现如果她戴上戒指会省却旅途中的好多麻烦。我们还买了地图和标绘好的平面路线图，因为美国汽车协会没有通过中亚、西伯利亚和撒哈拉的旅行许可证明。我们想方设法把钱放到那些不使用美国运通信用卡的地方，以及那些使用旅行支票会使人生疑的地方。我封了办公室，找好了人替我照看房子。最后只剩下去打预防针和办签证了。

不过我不打算去弄什么介绍信了。我们决定来一次不作事先安排的即兴旅行。我们这次不打算去找老朋友，私人朋友和生意朋友都不找，不打算让他们来为我们作安排，因为我们觉得在旅途上去结识自己的新朋友更有探险的意味。这样我们往往会有不同的经历，也许更好，也许更糟，但一切只有这样去走一遭才会知道。

我还是捏着一把汗，既巴望着塔贝莎改变主意，又希望她与我同行。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1990 年 3 月 25 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我们即将踏上周游世界的旅程。我们计划的第一步是从爱尔兰的西海岸出发，骑车穿越欧洲和中国，然后到日本，成为第一对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陆地骑手。第二步是经西伯利亚、俄罗斯和中欧回到爱尔兰，再创一个第一——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骑手。这个往返行程为 2 万英里。

塔贝莎把我们的摩托车装了箱，带到阿尔灵格斯的货运码头。我不知道是否已把一切安排妥当。我向烧锅炉的人交

代清楚明年冬天该做的事了吗？如果屋顶漏水，看房子的人会怎么办呢？现在想这些太晚了。我们已在空中了。刹那间，一种恍如梦中的不真实感袭上心头，我陷入冥想之中：我是谁？是怎么鬼使神差般地飞在大西洋上空的？



终于好了！塔贝莎的摩托车披挂上阵，整装待发：准备开往阿尔灵格斯，在那儿乘飞机至爱尔兰。

我们专心致志地查看了地图，找出了爱尔兰的最西端当昆，这是一个不足 100 人口的小地方。这儿将是我们的出发点。到了爱尔兰，我们将摩托车拆箱，从香侬机场开过欣欣向荣的乡村来到当昆，到了那儿我们就去找邮局。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到达了这个小村落，呈现在眼前的是茅草屋顶的石头房子和旁边的干草垛，还有歪斜的灰色礁石上那茂密葱翠的山坡。邮局已经关门了。可我们还

是试着敲了敲，门开了，原来女邮递员就住在这儿——就像我小时候在亚拉巴马，有时候那儿的邮局人员也住在那儿——我们告诉她我们正在作环球旅行，想证明一下现在来到了起点当昆。凯宾太太60多岁，面色红润，身材丰满，让我想起很多亚拉巴马女教徒的形象，她们是社区中的栋梁，我在爱彼斯科教堂作教士助手的时候得到了她们热情的支持。凯宾太太会卖给我们一些明信片，并用邮戳打上日期吗？她以爱尔兰式的大笑接待了我们，并邀请我们进屋喝杯茶。她在明信片上签了名，还有一个待在那儿的盖尔族学生也签了名，然后我们两个签了名，凯宾太太给我们贴上了邮票，简直像个隆重的晚会，这就算是官方认可的开端了！

在爱尔兰的这一带骑摩托车真是一大乐事。这儿的道路蜿蜒曲折，葱翠美丽。我的整个一生，从在耶鲁到哈佛以及后来到华尔街，先后学习了地理、政治、经济，并钻研了历史，我相信这些学科是相互关联的，我把所学到的知识都用到了全球证券市场的投资上。我一直在等待时机，密切注意着一些国家及其投资市场，随时准备着行动，寻求那些可以把我的投入翻两番、三番、四番的地方。

爱尔兰不会是这样的地方。说实话，这绿油油的乡间令我感到悲哀。几个世纪以来，爱尔兰一直处在或战争或叛乱或镇压的状态。在这景色秀美、处处流动着爱尔兰人的奔放和热情的地方，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动荡不定。这儿有的只是旅行业和畜牧业，虽然我觉得依靠这儿的大批半技术工人，也许可以成为英国或德国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经纪业设立营业所的大后方。爱尔兰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牺牲品。在我看来，中央集权即意味着经济的控制权和计划权都掌握在政

府手中，往深里说还是一种认为政府是最适合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机制的观念，像自然灾害、贫困、职业培训等等。



大西洋上的当昆邮局——爱尔兰国土的最西端。这是我们起点的见证。我们就是从这儿出发，首次尝试骑摩托车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当一个国家由政府来管理时，当政府不仅拥有邮局、电话系统、铁路及公用事业，而且还掌握服务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气氛就会像 90 年代的美国邮政服务一样，同 50 年代相比已相去甚远。几代人过后，这个社会的一切活力都会被耗光了。

在爱尔兰海的那一边，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第一位扭转这种潮流的领导人的典范。她在 1979 年当选首相时，英国经济正因为政府插手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面临崩溃。她开始出售已被工党国有化了的财产和企业，使经济重新注入了活力。

爱尔兰则迟迟没有开始这一进程。

我上一次来爱尔兰是1964年，那时我还在哈佛读书。此番旧地重游，我惊讶于乡村的空旷。令我震惊的是爱尔兰的人才大量外流，并且已持续了几代人。我并不是说这儿就没有聪明能干的人了，但人才外流确实是个大问题。

第二天出门，塔贝莎的摩托车就在科克附近抛了锚。我实在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塔贝莎虽说接受了机修培训，但这时也无能为力。我们俩在纽约时都报名参加了宝马摩托车的机修课程，我虽然决心挺大，但终究一节课也没上，总有其他更紧迫的事。另外，我们俩都很清楚，塔贝莎更有机械方面的天赋。我拉那种软百叶帘带，没有一次不把绳子绞住的。而塔贝莎不仅有机械方面的天赋，而且她的父亲也教过她许多机械常识，告诉她机器是如何运作的。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又一个方面。在我们出发之前，曾聘请了宝马摩托车的技师斯科特·约翰逊，他对于这些摩托车有一种迷恋，我们雇他来给塔贝莎开小灶，做她的私人指导老师。一连几个星期，塔贝莎都跟他认真地学着。在最后几个寒冷的冬日里，他们有时还在晚上借着台灯昏黄的灯光，反复地拆装车件。

在斯科特向她讲授着每一个神奇的零件都有什么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我正忙于千头万绪的其他事情。当时我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金融课，还兼作电视台一个经济节目的主持人。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如何分配我的证券投资，以及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如何把纽约的生活"放入冰柜冷藏起来"。

遗憾的是，塔贝莎接受的所有培训都是在课堂里，而不是在路上的。她能够把发动机拆下后再照原样组装起来，但当

发动机出故障时却找不出毛病在哪儿。而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街头行家，而不是理论专家。

这时沿路驶来一群当地的飞车族，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所有的飞车手都一个味。巴瑞·欧可夫和凯文·萨利文是他们的头儿，对我们很热情，但跟我们一样，对摩托机修一窍不通。他们把塔贝莎的摩托车装到卡车上，运到他们的修理厂，不出5分钟就修好了。这辆车看上去棒极了，黑色的流线型车身上镶着白色的赛车条纹，镀铬的金属排气管熠熠发光。他们还邀请我们到一个叫做"漠沼"的酒吧去开了一个聚会。

我们穿过了爱尔兰，兴致勃勃地向英格兰挺进。

在英国待了一周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欧洲大陆。我要去林茨，去对奥伯银行的投资委托人作一次有关中欧发展情况的讲话。

由于我们已来过欧洲多次，因此能在这片熟悉的大地上飞驰而过，几天就走了1000英里。在从巴黎到慕尼黑的527英里的旅途中，我们在密密的雨点中疾行，在这样春寒料峭的雨天骑车可不是什么乐趣。我在前面带路，塔贝莎在后面跟着，她不时抱怨一天要赶这么远的路，但是我肯定她会习惯这种进度的。

奥地利及其股票市场曾给我留下很美好的回忆，我在那儿完成过成功而惊人的一举。六年前，我抱定信念，认为在维也纳投资股票的大好时机来临了。为了了解这座死气沉沉的奥匈帝国的前首都的情况，我来到了他们国家最大的银行——信贷银行的纽约分理处。我向那儿的经理打听如何去

他们国家的股票市场投资。

“我们没有股票市场。”他说。

我笑了。这在我听来太可笑了。作为一个国家最大的银行,他的纽约代表竟然不知道他们国家有一个股票市场!我知道那儿有一个,并且将会发生巨变。这位经理的无知当然也显示了这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多么默默无闻,而我作为一名投资者也同样不为人知。我让他确信他们国家是有一个股票市场的,并请他帮我打听打听如何购买其股票。同他打交道令我很沮丧,不过这更吊起了我的胃口。在奥地利最大的银行里竟然没人知道如何在他们国家的股市上购买股票!

我知道德国的情形——她正在成为一个工业强国,而奥地利同德国一样,正在解开某些束缚。

1984 年 11 月,我来到了奥地利。我去了股票交易市场。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死一般的静寂,一周只开放几个小时。

后来我终于在信贷银行的总部找到了交易市场的负责人奥托·布鲁尔。在国家最大的银行中,他一个人操纵股票,连秘书都没有。我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暴发户。

奥地利只有不到 30 种股票上市,成员还不到 20 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匈帝国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有 4000 人,当时是中欧最大的,占头份,就像今天的纽约和东京一样。

我让奥托带我去见主管股票市场的政府官员沃纳·梅尔伯格,他向我保证,国家的法律将会有所变动,以鼓励人们投资股票市场,因为政府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资本市场。

我掩饰住自己的兴奋,问道:“什么样的变动?”

“降低红利的税金。”他回答说。如果你将红利重新投入到股市中,将享受免税待遇。相当于税金可以赊欠,如果用于

投资股市的话。政府为福利基金和保险公司在股市中入股作了特殊规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其他国家已经这样做过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措施是一味地抄袭，奥地利人目睹了德国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德国的有价证券资产的经营者们。他们讲德语，而美国人不一定会讲，而且就地理位置而言，奥地利实际上就是德国的一个郊区。假如这里的市场开始启动，德国人会蜂拥而至，把这儿炒得火热。

但是谨慎——投资的第一条就是不要损失资金——促使我跑去见奥地利的工会主席，询问他有关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一切怎么看。他说他们不喜欢股票市场，但是他们深知必须让国家的经济运转起来。情况就是这样——反对党没有反对意见。我决定分一杯羹。

我的态度是，如果你对一个国家有信心，就应该购买交易市场中的所有像样的股票。假如你再经营有方，这些都会升值的。凡是资产负债表显示状况良好的公司我都入了股——一家家庭装修公司，一些金融和产业公司，银行，还有其他建筑公司和一家大的机械公司。

几星期之后，我坐到了《伯龙》报社的圆桌旁，这是一个每年一度讨论投资意向的论坛。我向其他成员讲起一年前我在德国投资，而今年应该投资的国家是奥地利。我陈述了我的理由。这些在星期六早晨见了报。星期六和星期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星期一上午，信贷银行的奥托·布鲁尔打来了电话。他的桌上堆满了电话留言，股市涨破了天。四面八方的电话从伦敦、慕尼黑和纽约纷纷打来："给我买奥地利的股票。"奥托对发生的一切感到莫名其妙。人们不断从各地打来

电话——《伯龙》报是全世界发行的——要求购买这个已死去的交易市场上的股票。最后，终于有人问他："嘿，难道你没看《伯龙》报吗？"他当然没看过，因为他的工作如死水一潭。这个市场开始苏醒、萌动，自然又吸引了更多的资金。

如今我已不能再撼动一个股票市场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指明形势。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看法，但一旦你看到了，就会发现这是明摆着的，于是大家蜂拥而至。

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人们说是我亲吻了这个睡美人，是我唤醒了她。这是明白人说的话，不明白的还以为我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但大家都说，当公主苏醒时是多么美好，因为大家都赚了一大笔钱。那一年的股票市场上涨了125%，此后上涨得越来越多。

当奥地利人认识到我是那位王子时，信贷银行邀请我去他们的一个季度论坛演讲——不久前基辛格在这儿发表过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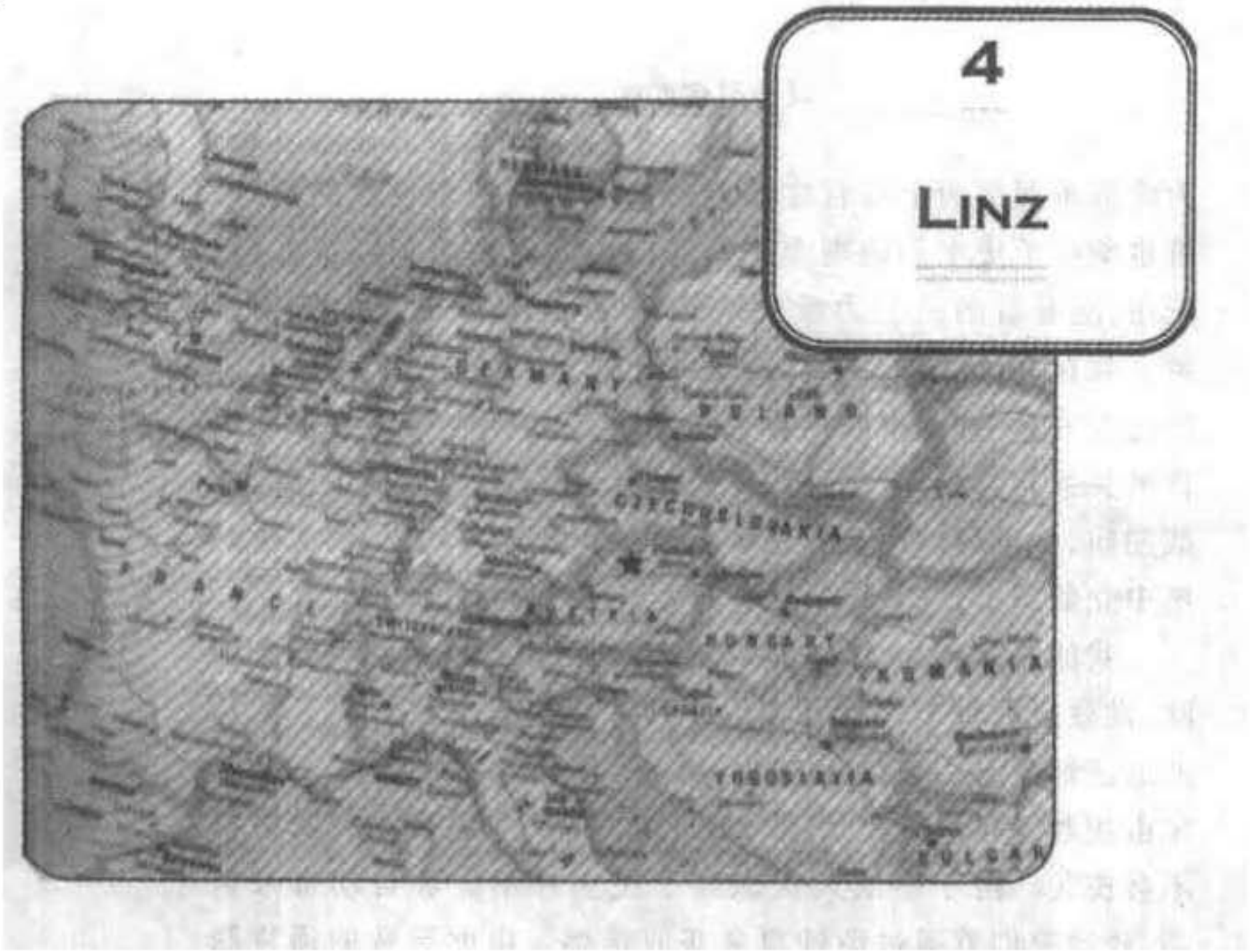
于是，我欣然应邀前往，我说："这还没有结束。等着瞧吧。你们都会在奥地利的股票市场上大展鸿图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你们正从一种失衡的估价走向正常的估价，你们的经济在增长。现在翻了一番并不意味着就赚不到更多的钱了。"报纸对这次讲话作了大量的报道。信贷银行的人给我租了一辆摩托车，我，这个报纸上称作"怪才吉姆·罗杰斯"的，驾车又到了布拉格。最后在1987年的春天，我将在奥地利的股份全部出售——到那时股市已上涨了400%或500%——我担心这会影响到全球的股票市场。我担心会出现财政危机，不过奥地利的股票是我最后出售的股票之一。

现在奥地利人又请我回来再作一次演说。我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林茨——我的工作习惯是鼓足劲开，到达预期的地方再休息——然而，离林茨越近，对这次演说的热情就越低。

“奥地利股市之父”的美誉固然很令我激动，但是此次走的这一遭却使我在奥地利和整个中欧赶上了熊市。

如今奥地利的股市已到了暴跌的时候，那些持有股份的人听到这个坏消息定会很沮丧的。



4. 林　　茨

LINZ

1990 年初，柏林墙业已倒塌，全球市场中的所有人都确信中欧——按照历史上的划分是指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西的中部欧洲——会成为下一个经济奇迹，成为另一个东南亚。

对呈牛市的一致论调是这样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股市同中欧有历史的渊源，他们的公司在中欧都有业务。奥地利作

为欧洲东西部两个阵营之间唯一的中立国是个自然的路口。维也纳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是通向中欧的政治和经济大门，现在，随着新的民主力量的增长，她定会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就在20世纪的早期，维也纳还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中欧占据着统治地位。奥地利跟中东欧保持的关系始终比德国要近，德国一向是他们的敌人。另外，冷战期间，全世界的间谍往往都通过奥地利进入别国，因为这是座中立的城市，并且恰巧处在那个位置。

我的视角则与此大相径庭。我认为谁把钱投到苏联和中欧，谁就会因将至的动乱和纷争而蒙受损失。整个那一大片的地区都没有一条法定的边界。所有的边境线都是在1945年由战胜国作出的奖惩而确定下来的，其中很多在我看来都不会长久。由于中欧人认识到了民主并不能够自动带来繁荣，政治家们就通过印钞票来获取选票。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只会加深种族间的仇视，并带来不断的纷争。过度的通货膨胀会把中欧先变成南美式的经济状况，且成不了下一个东南亚。

我的这些看法散布了出去。一家奥地利杂志撰文说，睡美人的王子认为中欧处在崩溃的边缘。突然间，这家邀请我去演讲的、在奥地利排行第九的小银行一下子遇到了麻烦：奥地利的所有人都想来林茨听演说。原先是安排给银行自己的客户的，但现在不得不租下镇里最大的会堂。票一售而空，会堂外还架设了录像监视器以用来满足那些无法进来观看的人们。

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林茨，我穿着黑皮夹克，打着领结，向他们讲述了我的看法。中欧将面临一场灾难。我说奥地利

的股市已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利润丰厚的7年——现在已走到了歇斯底里的时候。我描述了它的症状：所有的大学生想做的都是进入股市；人们纷纷辞去原来的工作去炒股，因为这是一条既容易又见效快的生财之道；从所有的传统方法来看——低红利产出，高价格收益比率，大得惊人的贸易额——一切都预示着顶点的到来。这个气球是投机者吹起来的杰作——只需要一根小小的别针就可以把它扎破。

"它正在走向尾声，"我说，"你们最好开始抛，因为一跌起来至少就是50%的幅度。我不知道它会发生在下个星期还是下个月，但几个月之内定会发生。"听众中有几个人提出了质疑："你这样说是不是因为你刚刚卖空而希望它下跌呢？"在此之前，我曾公开说明我卖空了奥地利基金，这是可以卖空奥地利股市的唯一途径。假如股市下跌，我就会获利。

我解释说："我试图向你们说明一点，你们的股市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同我是死是活、是赔是赚，或是否来过这里都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下面还提了更有敌意的问题，因为谁也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他们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不怎么中听。"为什么你要毁了我们的国家？"他们说，"我们请你来只因以为你会说一些好话的。"他们不想正视事实，而只想听到那些说什么新的大市场正在开放，自由正在到来的说法。他们忘了民主并不等于繁荣的道理，他们也看不到如果期望的繁荣没有到来，新的民主领袖就会被指责。所有这些国家——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都背着大笔外债，按人均计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的。他们的工业在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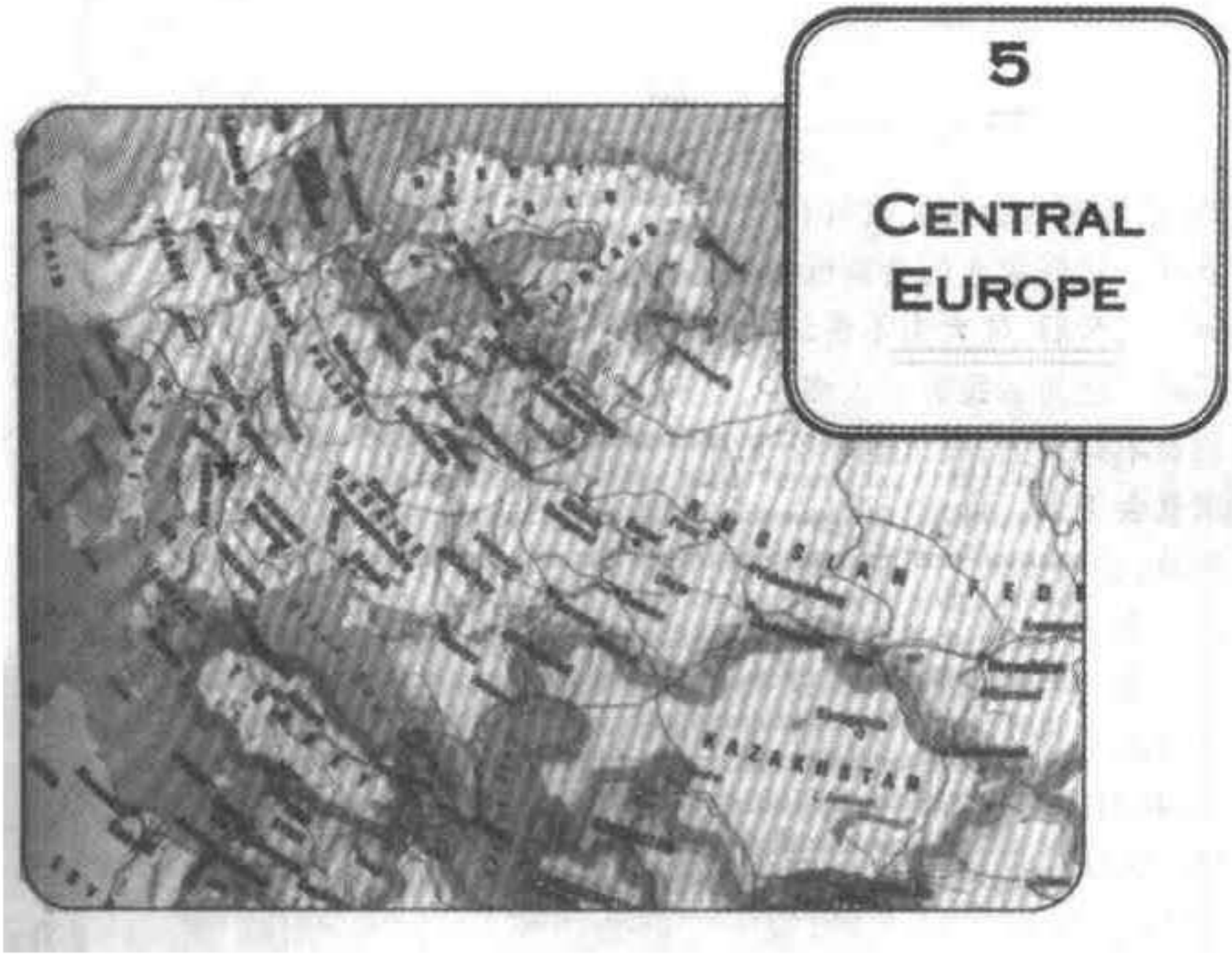
40年里只在被经互会垄断的市场里出售一些劣制品。除了旅游即将带来的短暂景气，西方没有人会在这些国家购物——连块手表也不会买，更不要说汽车了。

人们的心中将会激起希望，历史告诉我们，真正受暴政统治，被压迫、被践踏的人是不反抗的，但是没有比已被激起了希望又被压制了的人更愤怒的了。现在他们被激怒了，这种怒气就要寻找一个发泄的目标。困扰了这些地区几百年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冲突会再度复发。中欧没有一条边境的划分是合理的——无论从历史上、语言上、宗教上还是种族上。有谁可以解释为什么摩尔达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不属于罗马尼亚吗？摩尔达维亚人想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那些被放逐到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则拼命想离开，并且我认为是合理的。南斯拉夫这个由六个国家人为捏合的聚合体，除了在20世纪中叶被迫作为一个国家持续了几十年之外，从未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当然现在也不是了。

历史在前进，而没有人想倾听它的脚步。

第二天我和塔贝莎就离开了。演讲的结果是奥地利的股市跌了一两个点——没有什么惊人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就走不了了。但是，媒介对此还是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谁也不允许卖空奥地利的股票，谁也不想让它下跌，在奥地利的股市上没有熊市。这又是一个先兆。人们从来不想听坏消息——从来不想听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受挫的话。在当年那段石油很火的年代，华尔街上的人们告诉我石油会涨到每桶100美元，而我告诉他们这不可能，当价格高到一定的程度，总是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不管这是什么东西，有人会发现更多

的，或者有人会制造出替代品，这样，对这种东西的消费就会下降。就好像人们会调低恒温器的温度穿上毛衣。华尔街的那些人听后，便大为不快，说我是个疯子。他们总会说："这次不同。"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但从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树再长长不到天上，股市也不会无休止地涨下去，价格上去了，需求就会下来。价格一高，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盘算着怎么赚这笔钱，这就带来了供应，最终使价格降低。从来没有人拒绝承认供求关系，也没有人会拒绝——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非产主义者还是资本家，这是一条自然规律，许多政府似乎不懂或不信这一规律，不会正确地用它来处理事情。所以在美国，我们得容忍石油业，因为政府以为可以用法律来规定价格。但法律规定长不了，至少这种方法长不了。



5. 中　　欧

CENTRAL EUROPE

我们起程驶往匈牙利的那一天，虽阳光明媚，但由于是4月，我们又从山中而来，所以还感到有几分凉意。接近边界时，映入眼帘的那片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令我的心为之一动——这么多农场，这么多农舍，这么宽广而平坦的田野。从这儿一直到乌克兰，在历史上就是欧洲的粮仓，是维也纳和柏林的堪萨斯

和内布拉斯加。

当我们从山中走到平原，经常注意到边界多是按照地理特征来划分，随着河流、山川、湖泊和沙漠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段的边境就是沿着山脉和沃野的边际而划分的。

过了第一个边境检查点，我一直在前面开路向第二站驶去。我们小心地驶过了一段被油迹覆盖的大"S"型弯路——所有东欧国家生产的车辆都漏油。我从后视镜中查看塔贝莎，她正向右边倾斜着身子加油，一副弯道行驶的标准姿势，当我再次查看后视镜时，发现她的车正驶离地面，先是右边的护腿栏着地，然后弹向左边的护腿栏，紧接着又弹回到右边——而塔贝莎不在车上！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急忙靠边停车向后看去。只见她的车托着挡，现在是左边着地，但还是看不到塔贝莎。车的手油门固定着，陀螺仪的指针倾斜着，后轮在飞速转动，每着一次地都使车弹向空中，摔下来，然后又弹起来，又摔下来。

塔贝莎在哪儿？她的摩托车撞到了逆行道上，还在不停地动着。迎面驶来的车辆都避让而过。

我跳下车，拼命向后跑去。她正在路旁的土地上，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我吓坏了。想象着看到自己所爱的漂亮姑娘血流满面、痛苦不堪、衣服被撕破了的样子。我做了些什么呀？我以前很少跟别的车手同行，更没有跟没有经验的人一起骑车旅行过。是不是我这样做太勉为其难了？出门还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受了伤，可能还会残废。

但她站了起来，说没伤着。我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摘下头盔，并没有流血，甚至没有擦伤。她的皮衣、靴子、手

套、头盔，还有护腿栏都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再加上她很幸运。

几码之外的地方，她的车还挂着挡，后轮也还在转着。我和塔贝莎走过去，关掉了紧急警示灯，拧紧了油箱的旋塞，把车立起来以防止漏油。过路的匈牙利人都下了车，惊得张大了嘴巴。等弄明白我们没事时，才挥挥手，回到各自的车里继续赶路。

我很为塔贝莎担心。她则更担心她的车，但我想也许她得了脑震荡自己却不知。有时候，这样的病症要在一两天后才表现出来。也许她的父母是对的。她妈妈说这样做简直是发疯；他爸爸也坚决反对，虽然他在17岁时也曾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买了一辆摩托车，在暑假里跑到欧洲四处旅行。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军人同行，也许我本该一个人来。

塔贝莎再三向我保证她没事，我只能听信她的话。我们用肉眼检查了一下车，车子看起来也没问题，我们很高兴。我又上下打量了一遍塔贝莎，看她身上的皮衣有没有洞，是否伤到了哪儿。我想我们刚才的时速是每小时二三十脉，并不高，但她没有在有油路面上行驶的经验。

这儿离边境很近，没有什么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或小憩一下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别的可做，只有一门心思直奔布达佩斯。如果塔贝莎受了什么内伤的话，最好离大城市近一点，而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对我们很不利。于是我们又上路了。我以为摔了这一跤，她开起车来会害怕或有所不一样，但从镜子中看去，她却一切如故。她依旧保持着像以前一样稳定的进度。过了一会快到边境时，车子排起了队，我们得以借机稍作休整，可只一会，就又开足马力，向布达佩斯飞奔了。

她的这种勇气告诉了我，我选对了人。不管怎么样，像这样的旅行，刚刚起步时出现问题是难免的，但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仍然折磨着我。这儿的路况跟中亚的国家和中国相比根本不算坏。也许出发前1000英里的练习对于环球之旅来说还不够。是不是我的倔脑袋和过于乐观把塔贝莎推向了这个她没有充分准备的旅行？我把这些想法都抛到一边，我已别无选择了。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更多的农场，更多的平原。谁都能够看出，匈牙利虽有着作为帝国中心的辉煌的过去，它的未来将是农业。在这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市场上要想建立一个制造业的基地会有很大难度，更难的是培训那些习惯于计划经济的商业模式的匈牙利人如何制造出优质的产品。而他们的邻国德国生产的产品是优良品质的典范。另一方面，那些发达国家，像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无意在农业方面同匈牙利竞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条件。放着匈牙利大片肥沃的平原不去利用，而不断给英国的农夫发放补贴岂不太荒唐了。

天色渐暗的时候，我们驶入了布达佩斯。以前这儿是两座城市——布达和佩斯，分别在多瑙河的两岸，现在合为一个城市了。它曾经是奥匈帝国中一个重要的省会，一战之前非常繁荣富有。我在黄昏的暮色中穿驶这座城市，觉得自己就像是穿着褴褛的皮衣，将铁蹄踏入罗马的西哥特人，眼前那一座座漂亮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古典石制建筑令我叹为观止。我想它们会一直留在这儿的，因为匈牙利人没有足够的钱来拆掉它们而另盖新的。布达佩斯将成为一座博物馆。这是他们在挥金如土的岁月建成的，但后来这个国家就突然变得贫穷了。等匈牙利再发展起来，富裕到足以拆旧建新时，

这些老建筑都会成为历史古迹，人们是不会允许毁掉它们的。布拉格也处于同样的情形，它将是一座几十年不变的博物馆，时间在那儿仿佛凝固了。

第二天，我们起程前往贝尔格莱德。那天早晨，我主持了财经新闻电视网的一个关于匈牙利开放的特别节目。节目本来预计上午就结束的，但一直拖到下午，这一向是中欧的典型做法，所以弄得塔贝莎和我很晚才出发。我们都为此深感不快，于是匆匆上路以弥补失去的时间。

我还是走在前面。路面比以前颠簸多了，坑坑洼洼的。路途更加曲折，斜坡很多，路肩少了，而且没有以前平坦。我一路疾驰飞奔，超过一辆辆汽车和卡车。塔贝莎落在了后面。我又超过了一辆卡车，加着油向后视镜望去——塔贝莎不见了！我又看了几分钟——还是没有！我靠到路边停了下来。身后一辆车也没有，而我刚才一路超过来，有许多汽车和卡车。我马上意识到后边出事了。

塔贝莎！是我非拉上她来的，而她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摔了那一跤，现在我又催着她赶路——

我急忙掉头往回猛开。我看见塔贝莎正在路边拣着什么东西。她的工具、地图、毛衣和鞋子——她包里的所有东西撒了一地。几个南斯拉夫人正帮她收拾。但是又是一个奇迹——她没伤着！我沿着这些东西散落的方向找去，一直延续到路边的沟里，大约有 10 英尺～12 英尺深。摩托车躺在沟底，零件、牛仔裤、衬衫和毛衣掉得到处都是，左一件右一条的。

塔贝莎看来安然无恙，因为在我返回之前她已经四处走动了 10 分钟～20 分钟了。可她只有 24 岁，不知道自己在做

什么。也许我也不知道这样带上她我又在做什么。我是否该在她出一次致命的事故之前取消整个旅行呢？从我第一天跟她提这次旅行时就很担心带上她。那时我本打算骑那辆排气量为1000cc的摩托车，我已在上面装了一个副座、收音机、备用油箱和保暖车把。塔贝莎想骑我那辆1976年产的老R69US宝马，那是辆很棒的车，但太古典了，没有电子点火装置，只有一个老式的启动踏板。我当时也同意她用这辆车，只是需要重新整修一下，包括在车的两边安上保险杠以起保护作用。在全美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好，那就是俄亥俄。所以在上完了驾驶课，又在纽约的大街上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她一个人在寒冷的冬季，为把这辆古典宝马整修为一级战备状态的车，竟独自驾车跑到了俄亥俄。

那里的1月雨雪交加，寒风刺骨，高速路上的寒风像刀子一样，牵引式的车轮在带有冰凌的路面上极易滑倒。我很为她担心。我觉得这太危险了，但就像她临行前对我说的那样，假如她连在平坦的高速路上都开不到俄亥俄的话，就可以绝对肯定她是不可能做什么环球旅行的，因为她根本无法应付扎伊尔和西伯利亚的路况。那些天我度日如年，每晚焦急地等待她的电话。对所有驾驶摩托车的人来说，最危险的都是前6个月，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其实并不然。

她成功了，她向我证明了她完全具备对付这样的艰苦旅程的一切素质。回来的路上她在匹兹堡的一个姨妈那儿停留了一下。她的姨妈和所有邻居都对这位年轻姑娘能骑着摩托车从俄亥俄回纽约惊叹不已。她没告诉他们自己的宏伟计划，因为她不愿意听到他们对此小题大做地唠叨个没完。

现在那辆摩托车躺在了南斯拉夫的一条沟下——全撞坏

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爬了下去。车已经不成样子了。尾灯撞裂了，行李架歪七扭八，就连一个火花塞也撞歪了。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招呼他们下来帮我一起把车推回到路上。前轮已经不能动了，因为挡泥板瘪了进去，所以我们得把车子抬起来，沿着沟边推上来。

塔贝莎以为旅行要就此中断了，因为车子报废了。但当我仔细地查看每个部件时，我发现还是可以让它跑起来的，虽然有点有碍观瞻。在俄亥俄精心制作的细条纹的减阻装置已面目全非了，不过发动机和车架子都看不到什么大的裂纹。但塔贝莎还是受了惊吓。自从昨天摔了那一跤后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仿佛一生那么漫长——穿越边境、布达佩斯、观光游览，然后是马不停蹄地奔向另一个边境。她责怪我太赶进度了，我当然接受了批评。

这时已是六七点钟了，暮色苍茫。警察赶来了，我们问他们是否知道有人可以带我们去贝尔格莱德。他们从旁边的小镇上请到一个能给我们带路的小伙子，还找到了一辆很小的拖车。我向他们说“万能的上帝”。但我仍心有顾虑，因我们是在这样的地方——没有零件，没有机修工，也没有宝马摩托车的经销商，什么也没有。我只知道以前南斯拉夫的警察开过宝马摩托车，所以，也许我还能找到一个记得怎么维修的人。

塔贝莎坐到我的后座上，我跟在拉着她的摩托的拖车后面。她把脸靠在我的肩膀上，告诉我她是因为试图超过一辆卡车而出事的。她刚超过来，另一辆卡车迎面飞驰而来，她赶紧猛地并回原车道，但此时车子开始摇摆，然后失去控制，冲向了沟边，幸运的是她此时已被扔到了一边。否则她可能会

被压在500磅重的车下。这是一件想来很后怕的事，不过她总算安然无恙。假如车子摔到了路当中，她就会被后面来的车轧死。她很难过，也很苦恼，几乎休克过去。她问自己是否该回家去，但不知该怎么做。我恨自己不该赶进度，不该让她受这些苦。我发誓要痛改前非。



6. 前往伊斯坦布尔

ON TO ISTANBUL

第二天，在一条古老的像我儿时在亚拉巴马常见的那种土路上，我们找到了一个曾在警察开宝马摩托车的年代修过车的机修工。在他家后面搭起的临时棚里，我向他比划着说明哪些地方需要修理。他甚至在杂物箱里找到了一个本田摩托车的尾灯，我们同意把它换上，现在只能委曲求全，作个杂牌军了。

他得把断了的行李架再焊接起来。我们本来带了备用的火花塞，但现在找遍了也没找到，我想肯定是出事时丢了。损坏最严重的部位是减阻装置，整个都碎了。

“5点钟来取吧”机修工说。

我先带塔贝莎去医生那儿作了检查，剩下的半天干了些杂事，置齐了丢失的物件，并游览了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破败、肮脏、沉闷、阴郁。这儿从来没有富饶过，但有一些醒目的老建筑。贝尔格莱德在历史上的各个帝国中一直都是个省城，但更像是美国的查塔努加，而不是亚特兰大或匹兹堡。仅有的几座新建筑像单调灰暗的方盒子，没有线条，没有亮色，没有想象力。

我们好好地睡了一觉，然后5点起来向土耳其出发。这一两晚我们休息得很好，又放松了一天，塔贝莎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准备再踏上征程。我向她保证这次一定悠着点。

骑车兜风本身是其乐无穷的。骑在车上，任凭风抚摸着你的面颊，置身于乡间的小路上，确实是惬意无比。路上并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停下来留连忘返的，但是我们看到了，感觉了，经历了，我们就在这路上，这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些是坐飞机、坐火车或是坐汽车无法享受到的。

这一次我让塔贝莎打头阵，由她决定快慢。我很高兴我们只损失了一天的时间，因为我已在头脑中安排好这次旅行，尽量预测到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空运制度以及冬季，相当于给我们的旅行规定了最后期限。我曾经把这次旅行设想为两年完成的夏季旅行，打算按时令在南北半球间来回穿行，我想我们可以

在外待足一个夏天，或至少可以把晚春和早秋也算在内。可是，假如我们错过了从中国到日本的第一次轮渡，我们就很可能错过西伯利亚的轮渡。在美国，轮渡是天天有的，你错过了这一趟，只消等几个小时就可以赶上下一趟。而从中国到日本，以及从日本到西伯利亚的轮渡一个月才有一班，而且还不是时间固定的班轮。假如我们在那儿错过一班，就会被搁在俄罗斯的冬天里1个月，还可能是2个月，这对我们这次旅行将是灾难性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扬言要征服俄罗斯的冬季，而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根本无计可施。而且，假如我们耽搁得太久，就意味着会在欧洲、非洲和澳洲赶上冬季，这样就会从原先的夏季旅行安排变为冬季旅行，这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所以赶上轮渡的期限是当务之急。

我们到达了保加利亚的边境。我们给过境留出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你很难预料会碰上什么麻烦——但世界变化了，过境手续异常简单快捷。

没过多久，塔贝莎的引擎就开始发出异响，好像油路堵了一样。引擎右路化油器的塞子掉了，开始漏油。我们沿原路回头去找，但没找到。塔贝莎从路边的垃圾堆里找到一个替代品暂时对付着。

我有一个预感，还得找一辆卡车把我们拖到某个可修理宝马摩托车的地方，这儿是不会有那种化油器塞子的。总这么不顺怕是赶不上日本的轮渡了。是不是该怪我考虑不周，对机修一知半解，对问题又没有充分的预见性就仓促启程了呢？可我又认为问题在于塔贝莎没有接受我的英明建议。我本想给她买一辆像我的R100RT一样的宝马摩托车：排气量为1000cc，带电子点火装置，带磁带收音机和保暖车把

的——跟在家里一样舒服。更重要的是，买辆新车就不会出那么多问题，而且两辆车用的配件也一样。但她拒绝骑这么大的摩托车，嫌它太笨重，还是决定用那辆宝马古典车。

塔贝莎手里举着一个像条黑蛇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呀？”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她说，“一段旧的内胎。”

“得了吧，这根本不行。”

“把你带的 3M 胶带拿出来，”她说，“我有办法。”

她切下一截轮胎擦擦干净，然后用胶带把它捆扎在化油器的底部。我们用曲柄将车启动。机器声听起来正常，也不漏油了。

她得意地向我抛来灿烂的一笑，我虽然回报以微笑，但很担心。下一个镇子是索菲亚，书上说这儿没有宝马摩托车的经销商。再下一站是伊斯坦布尔，离这儿有 400 英里，我估摸着恐怕每走几英里就得停下来重新粘一块轮胎上去。但我还是把那一段脏乎乎的内胎全带上了。“咱们抓紧点，看今天晚上能不能到伊斯坦布尔，把这个修了。”我说。我们确实赶得很紧，令我惊喜的是这个凑合的塞子竟然一路未再松动。塔贝莎对自己的这一高招如此奏效感到欣喜若狂。

在土耳其的经销商那儿我们找到了对口的化油器塞子和火花塞。塔贝莎跟维修工人一起检查了一遍她的车。从这儿到东京的 6000 英里中，仅有一个宝马摩托车专营点，而且在安卡拉，离这儿只有 300 英里的路。

我们到处走走看看。我以前曾来过伊斯坦布尔，塔贝莎没有来过。她在大学里曾修过伊斯兰文化的专业，所以这儿对她来讲很有吸引力。她花了一天的时间去逛一个一个的清

真寺，我则用这一天的时间补齐了日记，也就是说，给我父母写了一摞明信片，把去过的地方写了个遍，因为他们收藏我的明信片，所以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我完成了每日 6 英里的长跑锻炼，还去把我们的衣服洗了，这些事使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旅行在支配我，而不是我支配旅行了。

在我思想深处始终有一个想法，我早晚会在土耳其投资的。尽管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土耳其一直是个“欧洲病夫”，但在历史上它却始终是联接欧洲和中东的政治和经济纽带。现在既然它重又归附了欧洲，我想它一定会像当年在东西方贸易繁荣的时期那样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是现在欧共体也开放了。于是我试图找出一个投资的契机，但却苦于找不到。不光是因为它还处在中央集权的铁掌之下，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便宜的东西，政府似乎也没有进行大的经济改革的意向。不错，这儿的市场价格高得离谱，我可以卖空以便在价格回落时赢利，但作空头意味着比作多头要多搭进去很多精力，而在近一两年中，我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多的精力。

塔贝莎和我坐下来讨论了一下到目前为止旅行的进展。她说都怪在赶进度时出的那两次事故，我表示同意。我们都认识到她的确经验不足，所以我建议还是由她打头阵。其实，我从一开始就让她打头阵来着，但她想让我在前面，好决定什么样的速度，走哪条路以及应避开的沟沟坎坎。而且我也很担心她被人追尾，因为她好像从来不看后视镜。有车从后面超过她时，她还会向右并过来，就好像根本没看见一样。我会不停地嘟囔：“看后视镜。”

让塔贝莎尽情享受了一番伊斯兰风情之后，我们又上路

了。我们到了卡波多西亚地区，饱览了很像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以及大峡谷附近的摄人心魄的景色。

现在我们正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最后一段分岔上，2000年来，这条著名的贯通东西方的商路把中国的丝绸、粟米、茴香、姜、蔷薇花和桑树一直运到欧洲。波斯人通过这条路线也把他们的枣、阿月浑子果仁、桃、染料、松香、乳香和药品运到中国和欧洲。印度人通过这条路把菠菜、荷花、檀香木、辣椒，还有最最重要的棉花运出去。也是通过这条路，17岁的马可·波罗在13世纪首次游历至中国。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当年那些商贾队伍，有些还带着上千头骆驼和上百名士兵。这些有生命的运货车几个月一次地走过那些地球上最艰难的地方，穿过灼热而干枯的沙漠和大雪封山的关口。在这些地方，风暴一来，会把人的嘴巴、眼睛和耳朵里全灌满沙子，他们就被迫停下来，往往几天后才会风平沙静。走过崎岖的山路时还会染上瘴气和血盲症。当然，这些对于前来打劫的强盗也是一大危险。

我们经过了上千座溶岩和沙岩凿出的民居，远远望去就是嵌在峭壁上的一个个人类加工的山洞。基督徒们曾在这儿建了一座座大型的地下城堡，有100多英尺深，以防备他们的敌人。我们仔细查看了土耳其的地图方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里北临黑海，南接地中海，所以是连接这一半地球的唯一通道。几个世纪以来，任何向东或向西去的部队都要经过这个走廊。土耳其的基督徒们因而建造了这些地下城堡作藏身之用。这些城堡在5年前被旅游者发现，继而掀起了一次旅游热潮。

我不小心骑到了一个坑里，前轮上颠出一个很大的凹痕，这令我很担心，还有1万英里的路要走呢。我在安卡拉刚把原来的凹痕敲平，现在又撞坏了。

现在看出来我们的计划太不严密了。从这儿到日本不仅没有宝马摩托车的专营店，而且连能买到西方车辆上的备用胎或火花塞的商店都不会有了——汽车和摩托车都算在内。到东京有6000英里路，要穿山还要过沙漠，我们只能靠后备箱里的这点存货！我们在行李架上绑了四个备用胎，但一旦这些用完就没辙了。

我们的视野来了个大转弯，从沙漠来到了海平面，但黑海污染得非常厉害，现实中的脏使它在人们想象中所具有的浪漫荡然无存。附近的居民把什么都往里面倒，各种垃圾和工业排放物，他们和土耳其人全都没有什么环境保护意识。

塔贝隆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从我们激起的反响——当地人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兴奋地大声议论——可以看出这儿近期没有什么“老外”来过。夜里，一声炮响标志着斋月里禁食的结束，人们的祷告声从清晨4点便开始传出，在微薄的晨光中显得特别清晰，不绝于耳。

在这样的旅途中是不可能有多少吃的东西可带的。饭馆里的菜单当然是用土耳其文字写的。像以往碰到这样的情形一样，我们就连比划带说，用洋泾浜英语问他们是否是能让我们到厨房去看一看。他们每次都欣然应允。他们的厨房很大，像是以前更兴旺的时候造的。通常只有一个灶在用着，空间很大，但食物很少。按我妈妈的标准，这些厨房都不够干

净，不过对于饥肠辘辘的旅行者来说还算卫生。我们看看锅里，再用手指给他们。到哪都会有这三样东西——鸡肉、牛肉和鸭子。我们不吃生的。在冰箱的冷饮格里，我们就指指瓶装水、软饮料或冰镇啤酒，然后我们就到光线昏暗、脏兮兮的餐厅里等着，招来许多乡下人投过来的好奇的目光。我们两个穿着用来抵御风雨和摔跤的皮夹克，像是一对从火星上掉到村里来的外星人。

7

OLD TURKISTAN



7. 古老的土耳其

OLD TURKISTAN

我在由我带路，向着苏联那一块曾经叫作土耳其的地盘出发。我们先是沿着黑海顺畅地开了一段，然后就赶上了自欧洲以来的第一个倒霉的雨天。

当我们接近格鲁吉亚边界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假如我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的话，就到土耳其这边来买下所有的土

地。从地图上能看出一切：现在边境开放了，交通运输回到了这条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路上，而且会车水马龙，这儿的土地滥贱，1英亩可能只卖20美元。这个地方迟早会成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前往欧洲的大门，这些人在苏联一直算最富有的。

我自己一寸土地也没买，因为我只把钱投在那些我相信能够很快出手的东西上，不管实际上能不能那么快地卖出去。而且，投资就意味着工作，而我不想再工作了。

在格鲁吉亚的边境，汽车都要开到地沟上经过对车底的检查，不过我们没费什么劲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径直前往黑市。没走两步就找到了，一般是他们找到我们。在所有那些强制控制外汇兑换的国家里，都存在着可赚取暴利的黑市买卖。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少了，因为政府慢慢认识到这样的控制根本没用。

以前苏联对旅游者的官价是6个卢布兑1个美元。在黑市上我可以换到12～18个卢布，今天再去可能会换到这个数的400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拿了一小部分旅行支票，但却带足了可兑换各国硬通货的现金：黑市上不要旅行支票。我宁愿去冒遭贼抢劫的风险，也不愿意伸着脖子实实在在地去挨国家银行的宰。

我们穿过了格鲁吉亚，接着往中亚共和国挺进——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是些多么浪漫的名字！——然后再去中国。沿途我可以隐约看见一长列的双峰骆驼队，它们可以驮着四五百磅的货物不停歇地走上几千英里。我还能隐约听见骆驼蹄子发出的笃笃声和丁当的驼铃

声。

这一段路很不好走，狭窄的柏油路面时断时续，间或是沙砾铺就的，路肩很小，甚至比土耳其的还要糟糕，其实那儿的路就够受的了。骑摩托车就得留意每一寸路段，因为一点小的补钉都会引起轮子打滑和摔倒。这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比坐在汽车里离路面更近。我们还得驶过许多路况不好的国家呢，所以我又跑到了前面，因为塔贝莎害怕出事，可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又开快起来。当我们到达第比利斯的时候，塔贝莎再次抱怨我开得太快了。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拖延总让我心烦意乱。我想我们还在适应期，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很少有过同别人一起驾车旅行的经历。当然，跟别人一起旅行很容易感到相互厌烦的。对于某一个人来说是很基本的歇息停留，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不可容忍的拖沓。我以前已习惯于保持一种进程、一种速度，对我来说，如果没有什么耽搁的原因，一天开上 8 小时～10 个小时是很正常的，尽可能地抓紧时间赶路，这样等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能赢得更多的时间流连一下当地的风光。

我们好好商议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她打头阵，由她来确定时速。假如碰上不好走的路段，就慢一点。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苏联的第一站就发现许多国营的酒店摆满了伏特加、葡萄酒、香槟和白兰地。我于是想起了路过的那些葡萄园。要想阻止富庶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享用他们自己园中的果实是很困难的。这些酒的质量也很好，当年丘吉尔喝的就是亚美尼亚的白兰地。

苏联国旅是苏联旅游业的龙头霸主，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索要高价。在他们的饭店里，一瓶半升装的斯多雷琪纳酒卖到9美元，比大街上贵4倍。

在这里到处都是为格鲁吉亚英雄新建的纪念碑。我们见到了一些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一些当地的大学生。我们听说格鲁吉亚向来是孕育分裂主义的温床，他们骄傲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说世界史上共有14种字母表，格鲁吉亚是其中之一，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日历。格鲁吉亚还一直是个发达的贸易中心。他们有不属于俄国东正教的格鲁吉亚基督教。这些格鲁吉亚人感到俄罗斯人偷走了他们的国家，拿去拼接到了苏联的版图上，此话一点不假。

我发现美国也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了拼接从墨西哥偷来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随着这些地方变得越来越拉丁美洲化，随着美国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我担心我们目前虽没有看到但将来说不定也面临着发生同样的事情：种族摩擦和分裂的倾向，要么重新归入墨西哥、要么要求独立出来。世界史告诉我们，没有长期稳定的边境。美国一直与世隔离，所以把这一点都忘了，假如历史是面明镜的话，百年之后，美国的边境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格鲁吉亚人正在寻根。他们被迫投入这个熔炉里改造，现在这些学生一想到革命就抑制不住地兴奋异常。各种教堂，伊斯兰教的和基督教的都多了起来，教士一时成为热门行当。我亲眼证实了我一贯的看法，即大多数人都是从宗教或民族主义中寻找同一性的。

苏联发生的许多事情在西方传媒中都没有报道，也不会

有,因为没有几个西方人来过这些地方。《时代》杂志在苏联有一两个分社,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可能在列宁格勒。就算他们想派一些人过来,在这儿外出采访也非易事,可能驻莫斯科的记者都不会到第比利斯来。再说,这儿的地域如此辽阔,几个记者也跑不过来。当然,有些事俄罗斯人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当地学生给了我们一盘翻录的录像带,让我们偷带出去,集权国家的独裁者们日后该有麻烦了。100 年前,甚至 25 年前,人们还只能把抗议写成大字报或标语贴到墙上,如今一个摄影爱好者,只要有一台摄像机就可以造成视觉上的轰动效应。

第二天早上我出去晨跑,来到了镇上的广场,那儿耸立着一座列宁像。我绕着它转了一圈。警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不加警告就用枪指着制止了我。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俄语。他们用手势指了指列宁像又指了指我,一副指责的眼神。他们害怕我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企图毁掉镇上最后一座纪念列宁的塑像。我用手语比划着,用俄语说"饭店",向我住的饭店的方向指着,接着,赶紧跑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整个镇子还在军事管制之下,这儿显然是个敏感地区。俄罗斯的部队官兵告诉我们不要走大路去巴库,因为可能不安全,他们建议我们走一条景色更别致的路,而我敢肯定那就意味着是一条更难走的路。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听他们的奉劝而走大路。我们路过了一队排成一列的坦克,大约有 20 辆,它们是东去协助占领巴库的,坦克的履带碾过已经被毁的柏油路面。

第二天我们又开了400英里，到达了生产石油的主要基地——巴库。我们看到路边堆满了生锈的管子和钻井架，闲置在那儿，无人看管维修，整个像一大堆垃圾。难怪苏联的石油产量下降了。这是公有制的弊端，谁也不拥有这些，所以谁也不关心。经理只要完成了定额就万事大吉了。假如完成定额只需要用掉6台钻井架，而不是60台，他也会这样去做，他才不管呢。这个油田看起来像个废料场。在私有制社会里，所有者对自己的生意都要精心看管的，否则受损失的是自己，而这里的情形就大大不同了。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资本基地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过任何资本。途经里海时，我们看到上百台废弃的钻井架，全都用坏了，没有人负责保持油井的压力，而在美国有专人负责，因为这样可以多钻出50%的油。在这儿，他们把顶层的油抽完就扬长而去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控诉的资本家的作法：捞足好赚的钱就跑了。资本家要把这些井抽干才会罢休，否则他们都会破产的。

我们到达了巴库，三个月前，也就是1月，这儿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屠杀。遇害的有三四百人，不过这一次是阿塞拜疆的伊斯兰教徒屠杀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巴库现在仍处在军管下——有很多苏联的兵员运输车招摇过市——虽然所有的亚美尼亚人屠杀后都离开了巴库。我就苏联种族冲突问题所写的论文现在就像一副画卷在我眼前展开了。

尽管巴库是苏联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是主要产油区的中心，但是听说过这次屠杀的美国人却寥寥无几。就因为它发生在里海，这个西方记者鲜有涉足的地方。

这儿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是亚美尼亚人，但是在我们到来

前的两个月，他们都回到了亚美尼亚。他们不会再待在这儿坐以待毙。暴徒们甚至毁掉了立在图书馆前的亚美尼亚人最为之骄傲的诗人的塑像，这是他们的莎士比亚，如今只留下一空地。一个种族不希望看到另一个种族的英雄立在他们的地盘上。当宏观经济层上发生问题时，人们就会作出这样的反应，他们要找出一个指责的对象，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回教徒——谁都可以——特别是如果有一个成功的少数民族的话，就像30年代在德国的犹太人」

巴库的军管非常严格，晚上到处戒严，甚至找不到一家营业的饭馆。

我们坐轮渡从黑海来到了克拉斯诺伏斯克。这把我们从潮湿肥沃的西部带到了荒芜的东海岸。

这一片地区也在变动之中——乌兹别克人对抗麦什迪土耳其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在奥什开战。1988年，撒马尔汗发生武装冲突，1989年，塔什干、阿什哈巴德、诺威·乌则又燃起战火。有一些小规模冲突是针对俄罗斯人的，但大部分都是部落之间和种族之间相互袭击。开战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生态失衡问题，还有长期以来的种族偏见，再加上经济原因：土地紧缺、低劣的生存环境、就业问题。种植季节性的棉花意味着当地人在一年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工作。

这里是世界上多么迷人的一个地方！在那些“共产主义”的岁月里，这儿被称作是处女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开垦农业，他们用咸海里的水在沙漠里灌溉农作物。赫鲁晓夫就曾经是这批年轻人中的一员。他和他的伙伴灌溉了大

们不打算再往里扔钱了，会破产的。”在美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度，但在这里却没有。他们会把资源损耗一空，因为没有人会说“停下”。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给自足之后，变成了一个纯棉花进口国。到70年代末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他们的方法行不通了。他们放宽了农业政策，把经营权交到农民手中，允许农民长期承包土地，在一些地方甚至允许购买土地。既然靠上面的指令行不通，人民公社也不对路子，索性把权力下放给农民，由他们自己决定做什么。同等重要的另一举措是，政府没有坚持要求农民按照人为压低的官价把大米和棉花卖给国家，而是允许他们按市场价出售。农民们一下子欣喜若狂。这就是中国到今天已变得市场化的原因之一。没过5年，这些农民就开始出口棉花，中国也从一个粮食进口国变为一个出口国。当我于1986年和1988年两次先后游历中国时，我看到所有的土地都耕种着作物，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没有任何浪费。农民们爱惜地使用这些土地，因为这是他们的了，第二年第三年还要继续在上面耕作。但在俄国，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和个人没有切身利益关系。人们会想，明年我就到别的地里去干活了，我们会弄到更多的水，有谁会在乎呢？假如我是负责这里的专员，我就会保持10年完成指标，这样就好被提拔到莫斯科。

当然了，许许多多的农业官员都在撒谎。当地的负责人沙若夫·拉什道夫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个出名的好大喜功者，他总是夸大棉花的丰收，但他决不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一位官员能促进生产、完成定额，但他们都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在

们不打算再往里扔钱了，会破产的。”在美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度，但在这里却没有。他们会把资源损耗一空，因为没有人会说“停下”。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给自足之后，变成了一个纯棉花进口国。到70年代末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他们的方法行不通了。他们放宽了农业政策，把经营权交到农民手中，允许农民长期承包土地，在一些地方甚至允许购买土地。既然靠上面的指令行不通，人民公社也不对路子，索性把权力下放给农民，由他们自己决定做什么。同等重要的另一举措是，政府没有坚持要求农民按照人为压低的官价把玉米和棉花卖给国家，而是允许他们按市场价出售。农民们一下子欣喜若狂。这就是中国到今天已变得市场化的原因之一。没过5年，这些农民就开始出口棉花，中国也从一个粮食进口国变为一个出口国。当我于1986年和1988年两次先后游历中国时，我看到所有的土地都耕种着作物，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没有任何浪费。农民们爱惜地使用这些土地，因为这是他们的了，第二年第三年还要继续在上面耕作。但在俄国，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和个人没有切身利益关系。人们会想，明年我就到别的地里去干活了，我们会弄到更多的水，有谁会在乎呢？假如我是负责这里的专员，我就会保持10年完成指标，这样就好被提拔到莫斯科。

当然了，许许多多的农业官员都在撒谎。当地的负责人沙若夫·拉什道夫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个出名的好大喜功者，他总是夸大棉花的丰收，但他决不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一位官员能促进生产、完成定额，但他们都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在

作假、在撒谎——没有会计，没有人查账，没有银行家，也没有责任制，只要棉花厂里有棉花就行，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不关他们的事。

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弊端——没有责任制，谁的责任也不是，谁也没有积极性。

我们一座镇子一座镇子地走过，这些情形不断地重复，我越来越想到苏联已经解体。想到这儿我不禁感到一惊——现在是1990年，今年不会再有政变了，苏联看起来无异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只是拥有一只庞大的军队和太空计划罢了，一切似乎都瘫痪了。虽然我们看到的很多地方都是新建的，但所有的新东西在建成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变旧变脏。我们住过的大多数饭店看上去都像是炸过的废墟，完全不像苏联国旅专为旅游者准备的个别地方：电梯是坏的，抽水马桶也是坏的，没有肥皂，没有毛巾，没有手纸，甚至没有马桶座。他们只为外国客人准备干净的床单，但你得自己铺床，同志！

我们在中亚共和国的另一大发现是穆斯林的数量。在美国时我们还以为穆斯林都是集中在中东地区的，没有想到他们覆盖了从摩洛哥到菲律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阔领域，世界上的回教徒同基督教徒一样多。世界第四大国家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再往下数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1亿多人。仅印度一国就有差不多9000万穆斯林，这个数目若是单作为一个国家计算的话，就是世界上第11大国。在俄罗斯，穆斯林占其人口的15%，他们不愿意为俄罗斯人所统治。

还是由塔贝莎在前打头，我们动身去穿越广袤的卡拉库姆沙漠。它从里海之滨开始，横跨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延伸至几百英里外的撒马尔汗。我走过别的沙漠，像美国的西南部和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卡拉库姆更平实、更单一，有更多的灌木丛。我们在这儿还走入了农田，这也是我在其他沙漠中少有遇到的。

塔贝莎的摩托车时不时地出点故障，这使我们在修车和观光上花去了一样多的功夫。我希望这不会太影响她的情绪，但她还是对于能否坚持到底感到忧心忡忡。

这一地区的油价是40戈比1升，1加仑约合黑市价15美分，官价30美分。

我们时不时地得跨过卡拉库姆运河——宽50码，全是泥汤水——是俄罗斯人所建的灌溉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水里是不会有那么多泥的，因为这意味着土壤在流失，没有哪个资本家会坐视土地就这么被侵蚀。我们也碰到了成群成群的野骆驼，还有立在路旁的“注意野骆驼”的牌子，就像在美国经常有提醒人们“有鹿出没”的路牌一样。

我们终于抵达了布哈拉，我们在那儿病倒了，被食物中毒折磨得死去活来。

在医院，大夫问有没有药。

“没有，所以我们才来这儿的。”我说。

“我们这儿也没药，也许你应该叫救护车。”他说。

我感到头晕，人也被他搞糊涂了。“可是我已经到医院来了，”我说，“为什么还需要救护车？”

“可能他们有药。”他说。

我们简直瞠目结舌，只好离开了医院，用随身带的药品自行医治了一番。

一天以后，我们俩感觉好多了、病愈了，但感觉很疲劳。塔贝莎对参观布哈拉热情很高。她告诉我大学里学过，这儿是中亚最伟大的古城之一。这儿有许多清真建筑和光塔，算是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首次见到的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了。

我们跑去观看了苏联的“五·一”游行，先是政界领袖人物长篇大论的讲话，然后一两个小时是游行者通过检阅台。成千上万的红旗到处飘扬着。要是苏联人把他们作红旗的材料用于织布的话，那他们都可以出口服装了。



里海东边的阿什哈巴德。当时是苏联一个边远的城市；现在是土库曼斯坦的主要中心城市。在这儿，摩托车总是吸引着众多的好奇者。

我们继续往前开，来到了撒马尔汗，这是中亚最老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虽然从外表来看，这座往

日优雅的古老世界的中心，已同那些平常的毫无色彩的苏联城市没有什么两样，而且都被污染的空气所笼罩，也都是一样拥挤的交通状况，但对它内部的毁坏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这座城市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成为西方国家同中国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它最辉煌的时期是在14世纪作为铁木儿帝国的首都时，当时的突厥征服者也把它作为中亚的文化中心。它在18世纪时开始衰落，不过后来贯通里海的铁路的建成又使它恢复了活力。

尽管也处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撒马尔汗看起来算是自我们离开巴库后所到过的最繁荣的地方了，其间的距离有1000英里。在这里热闹的集市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好东西，包括塔贝莎喜欢的芳香醉人的新鲜丁香。我们听说这儿极少有旅游者光顾。代表古迹精华的主要建筑群是连为一体的三所穆斯林学院。它们那高贵流畅的线条和色彩瑰丽的钴蓝镶嵌画令我们赞叹不已，这些华丽的学院可以同印度的泰姬陵相媲美。世界上有那么几个地方是无法拍摄的，因为再逼真的色彩也无法传递那种神韵。泰姬陵和撒马尔汗这两个地方就是必须亲眼观赏的。乌拉贝克学院建成于1420年，它的主殿是一个讲经堂，后边是一个清真寺。威虎学院一反不得展示动物形象的伊斯兰禁令，大胆地用花砖堆砌出华丽的老虎形象。位于这两座学院之间的是黄金学院，里面有一个非常别致、宽敞的院落。

陶醉于这些艺术殿堂的辉煌之中，我不禁想起，100年前的泰姬陵还被废弃于荒野之中，没有人去那儿，也没有人注意。一位游侠偶然撞到了这个地方，于是开始大肆宣传，现在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奇观之一。而在100年前，你只消花5美

金便可买下整个那块土包。撒马尔汗在这方面同泰姬陵如出一辙，也许还要不同凡响一点。我相信，谁要在这儿开一家希尔顿酒店，准能赚大钱，因为人们一旦听说这里的美景，便会像蜂拥参观泰姬陵那样踏平这儿的门槛。尘封已久的撒马尔汗就像一件埋在地底下的珍宝，等待人们去挖掘、去发现，就像还没有被王子遇到的灰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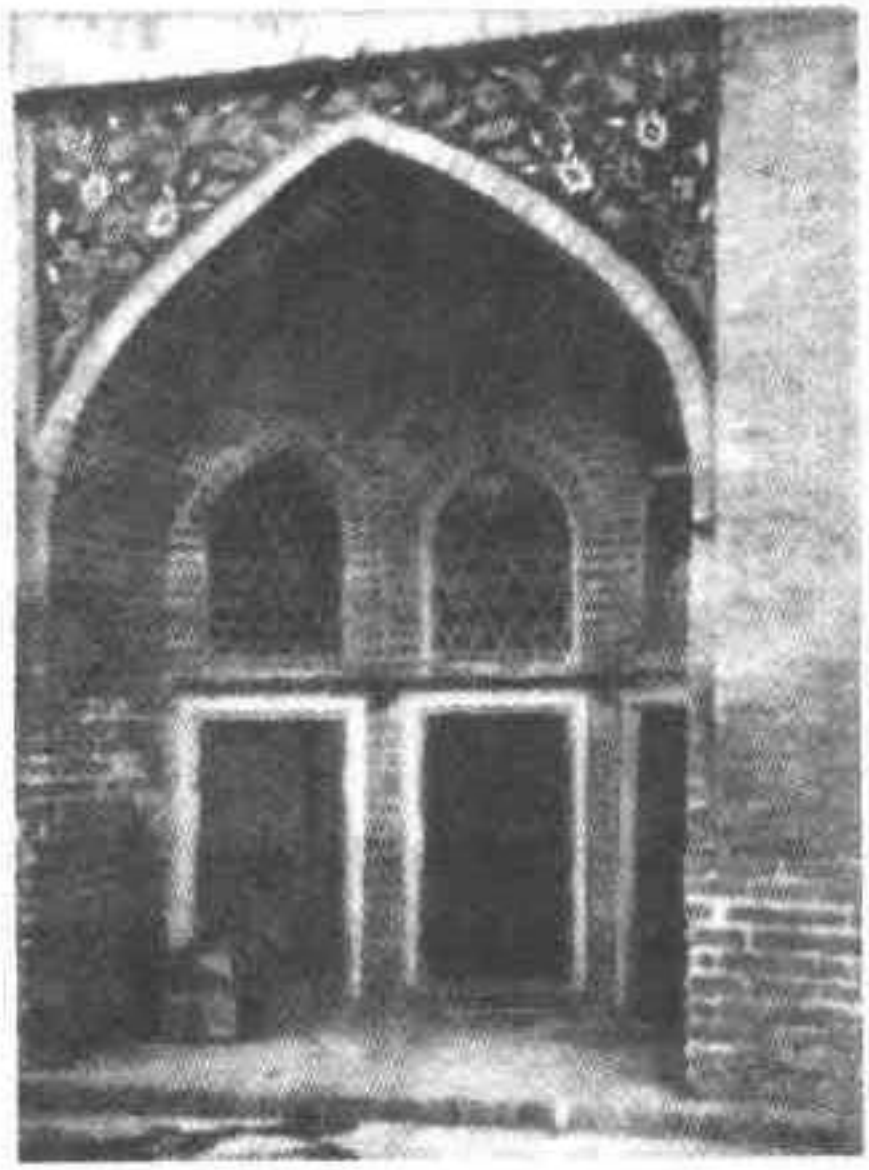
撒马尔汗的首都。旅游者和朝圣者们将会发现这些古老的伊斯兰学院。

广场四周这些复活的伊斯兰学院是整个发展潮流的一部分。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只有一座伊斯兰学院，现在则遍布各地。我们每到一地，像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都看到有新的伊斯兰学校建起。我们发现仅1989年一年，乌兹别克斯坦就开放了40座清真寺，并且我们经过的每个镇子中都至少有一座清真寺正在建筑中——阿什哈巴德、马里、布哈拉。

这里的文化也在变迁。在杜兹哈布尔的一个晚上，我们去一个饭馆吃饭，他们把很多桌子摆到了门外。桌上没有酒

单,我们问店主能不能自带饮料。他耸耸肩:干嘛不能?我们于是回到旅馆买了一瓶酒又回到位子上。我们把酒放到桌上开始吃饭。吃了差不多45分钟的时候,经理来了,冲我们大嚷:"把那破玩艺儿拿走,你们不能在这儿喝酒。"

原来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是个真正的伊斯兰教的中心,这儿是禁酒的,把酒摆在桌上是非常失礼的。这儿住的都是穆斯林,寺庙和学校都是伊斯兰的,习俗当然也是伊斯兰的。



至少在布哈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城市,我们找到了一些不同于灰暗单调的建筑物。

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更具鲜明的穆斯林地区的特征,这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有一个大的国际机场和一流的饭店。在过去的20年中,这座区域性的都市迅速发展起来,其势头比得上美国的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如今已成为苏联的

第四大城市

我们越往阿拉木图开、越接近中国边境，看到的种族纷争的迹象就越多

中亚这一大片是突厥和波斯两大种族融合同化的地区，许多穆斯林同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新疆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目前在一些地方虽然是后来的俄罗斯人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穆斯林的人口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过去一千三四百年的西方历史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回教徒同基督徒之间的斗争史——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之争，西班牙的宗教裁判。穆斯林一直试图通过奥地利、匈牙利和西班牙进入欧洲，但几次都被基督徒赶了回去。在中世纪的欧洲，回教徒比基督徒要活跃得多，他们通过扩张地盘，把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从大西洋传播到了太平洋。实际上，假如欧洲人没有来到新大陆，没有在还没人在意西半球之前就早早把基督教带到那儿的话，今天世界上的基督徒也许根本无法同穆斯林的人数相抗衡。然而，这些全球战还没有结束。下一场对抗也许不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间的抗争，未来的一个趋向很可能是复兴的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之间的较量。所有的穆斯林地区都在复苏，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想成为回教徒，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媒介来帮助他们获取更多。如果人们变得富足了，往往也就不愿作战了。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把伊斯兰教作为一条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去帮助他们实现繁荣，实现种族的同一性。

苏联拥有 128 个不同的民族，处处潜伏着内战的危机。经济在不断滑坡，所有这些团体之间都将发生激烈的争执，而

整个联盟会日益支离破碎，分裂为越来越小的碎片。或许它会一直分裂下去，最后变为50个国家，也可能会继续分裂为100个国家。苏联无论是从面积上还是人口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它是靠武力强行聚合在一起的，至今仍有许多人不服。当一个如此庞大的政治独立体分化开来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的记者和官僚们还以为苏联会用一两年的时间解体，然后经过一段短暂的过渡期后一切就会安定下来了。历史的脚步不是这样的。看看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还有英王朝吧，它们覆灭后的余震和冲击波都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这些冲突会对美国或我们在西欧的贸易伙伴造成危险吗？我们是否还需要花费1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来保护我们的盟国免受来自苏联的威胁呢？答案是不。首先，许多我们以前感到畏惧的苏制武器从一开始起就都是垃圾。我们沿途经常可以看到废弃在路边的导弹发射器，还有大量废弃的卡车、坦克及其他机动车辆的部件被拆卸下来以作他用。是的，这儿虽还有武器，但相当一部分都已经报废了。其次，剩余的军备将被用于对付内战和与游击队的战斗，这在今后几年中将时有发生，军阀混战的局面将形成。这一地区早在成吉思汗之前的年代就不断有地方战争爆发，至今仍是战乱频发，不过这些对于我们将不会有什么影响，除非有政治家感到必须利用它们制造争端。现有武器的一部分还将在国际军备市场上出售。这倒不是什么大变化，几十年，不，是几百年来全球一直都在进行着大宗的军火交易。

萨达姆·侯赛因在科威特的战败也将在一段时间内起到威慑作用。即便这些地区有这个军事力量也都不会激起发达国家的共同兴趣，何况它们没有，而且也不会有。

实际上，苏联正在向一种类似于封建制的方向发展：就像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形成了无数个不断变化的封建采邑，趋向于那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欧洲胜利日在阿拉木图仍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有游行、阅兵，处处红旗招展，还有很多关于二战的宣传画——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树立共产党和国家的形象。苏联时期建了许多新楼和英雄纪念碑，当然包括那些随处可见的"战死难者纪念碑"。苏联人口的六分之一——大约2500万人——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牺牲了。仅仅斯大林格勒一场战役中就有100万名战士献出了生命，这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假如美国在今天要蒙受同样损失的话，我们当中就要有4500万人为国捐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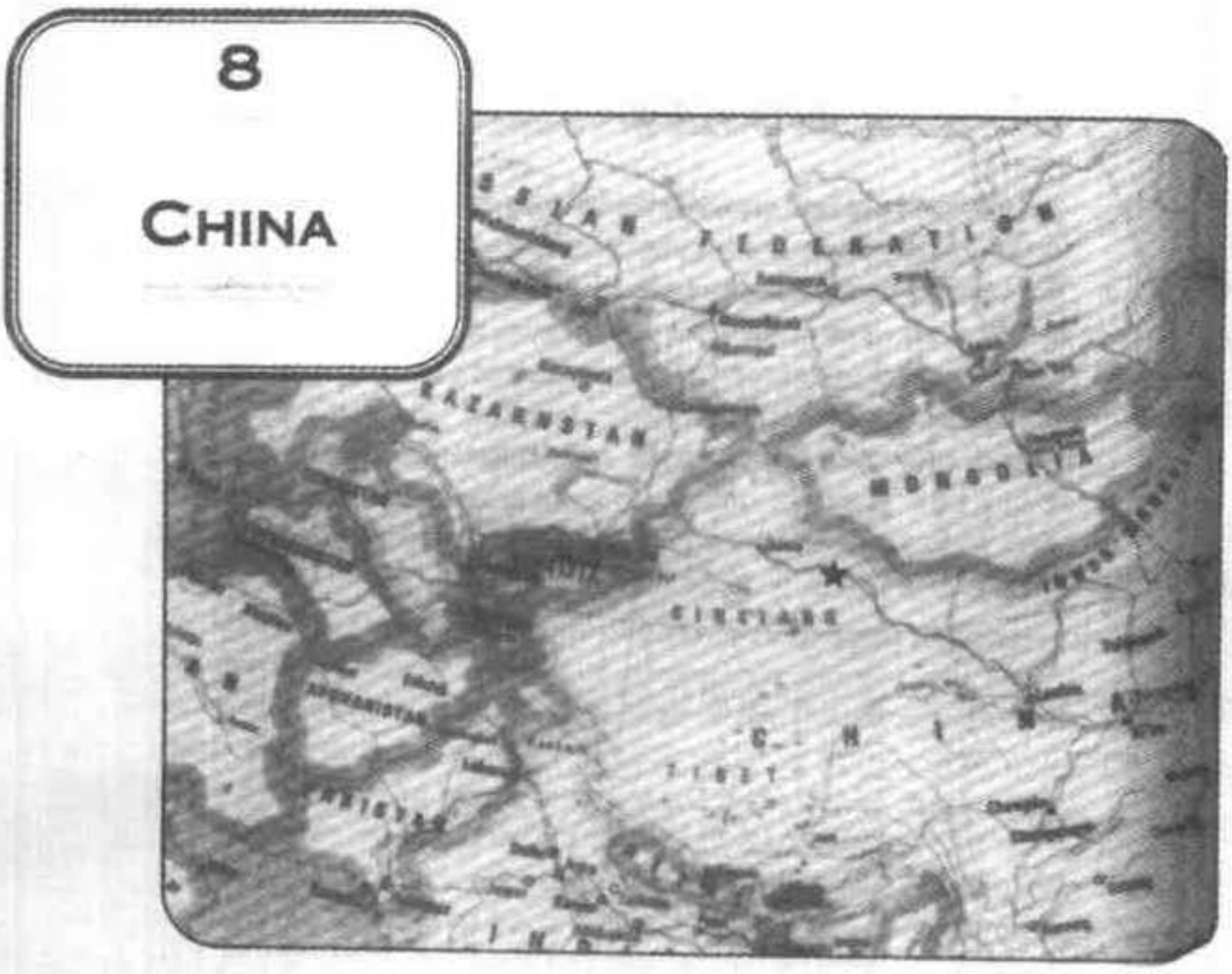
苏联人打了胜仗，但从此后便毫无建树。要不是二战，苏联解体也许会更快。他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作为不断深入开展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每一座城镇都立起了英雄纪念碑，一般是一个高和宽为20码的花岗岩立碑，旁边是大理石雕成的反法西斯的战士和工人。新娘结婚前要手捧鲜花到这儿来缅怀死难烈士。在华盛顿或莫斯科这样的首都城市，你觉得当然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但在这儿的每个小镇上都有一个，这些差不多是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假如他们把这些钱花到修路上，而不是到处建这些列宁和二战的纪念碑，那他们到今天早就会有宽阔的道路了。这令我想起了美国的南北战争。直到1914年，美国游人参观最多的地方是格

兰特总统的墓地。老兵和他们的家人不时地去那儿祭奠、缅怀过去、重温他们年轻的岁月，沉浸在往日的荣耀中，虽然战争已经过去 50 年了。

塔贝莎和我曾在一些地方看到几个佩带勋章的老人，在这个盛大的庆祝日，人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我们碰到几个喝得醉倒在地的人，我们试图帮助他们，甚至叫来了警察，他们只是因为我们这两个美国“老外”叫才会来的。走到哪儿都有一些苏联老大妈做着扫地、洗衣、卖菜卖肉的活儿。她们是战争留下的寡妇，整整一代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

8

CHINA



8. 中　　国

CHINA

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已累计6000英里，并且一直稳步前进。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们开始一步步地接近中国边境。

两年前，我曾骑车穿越过中国，那是一次极为愉快的旅行。我很想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从美国报纸

上读到了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我知道他们看得并不真切。记者们通常对历史或经济并不在行，对于地理更是一无所知，他们只作表面文章，很少真正明白在别国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以往的旅行，我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自己不同于西方媒介鹦鹉学舌般一味宣传的看法。我知道，也可以理解，中国现在对外国舆论，特别是对外国来访者普遍感到紧张，所以对于此次旅行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我心里很没底。

80年代初的中国曾经一度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在建房，城市里的居民在抱怨物价上涨，于是政府向城市居民发放奖金，而这笔钱是通过印钞票来支付的。不用说，这种作法导致了可怕的通货膨胀，迅速吹起的气球很快胀爆了。最后政府决定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

马克思说对了一句话：钱是万恶之源。假如你把钱的问题看明白，也就差不多能看透一切政治形势了。不信就来看看波士顿惨案的缘由。18世纪70年代的早期，波士顿的失业率已达30%，经济面临崩溃。美国的革命者们把人们就失业问题提出的抗议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政治高度："没有代表制就不纳税。"我不仅发现上次旅行中结识的几个下海的朋友生意都还很不错，而且发现这儿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在放宽，经济在慢慢复苏。

我在中国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迹象表明：这条沉睡的巨龙已经苏醒了。这个国家正挣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没有什么人再相信解决经济问题应该单纯依靠计划、统配了。同世界上所有地方成功的企业家一样，中国的企业家也把能够聚集起的每一份能量、金钱和技术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再过20年，他们将跻身于世界上最棒的企业家的行列。我敢肯定他

们将超过我们中的许多人　在南方，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每次通过一个少有旅游者过往的边境时，都会被搞糊涂，这段边境就是新近开放的，这儿的官员从来没见过签证或过境驾驶执照之类的东西，没人想把美元换成中国货币。尽管我们两个都持有国际驾照，但中国官员还是不能肯定该不该予以承认，甚至对我们的国际免疫证明也表示怀疑。我们总算入境了。一踏入中国国土，马上就是一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景象，比我想象的人要多得多。

我们开进一个大的边境城市伊宁，下榻在一个刚刚完工的号称豪华的酒店，看起来这儿因靠着边境生意不错，酒店里有很多啤酒，只是没有伏特加酒。

两年前我就注意到，所有中国的城市都在建旅游饭店，常常花费巨资搞得很豪华，我都怀疑有谁去住。现在中央政府勒令各地立即停建这些饭店，并声明将不再拨款。中国各地的干部就像苏联人在各个城市大建二战英雄纪念碑一样地狂盖豪华饭店和写字楼——作为他们身份的象征，以及政绩显赫的纪念碑，而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我很担心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那条路，因为我1988年在这儿的经历简直像场恶梦，不堪回首。我跟塔贝莎说，从吐鲁番东边开始的500英里路是我有生以来骑车走过的最可怕的路，要不停地同沙丘、岩石和山坡作斗争——一摔倒，深陷沙地不能自拔，挖沙前行。我们要通过哈密，这是在沙漠正中央的一个镇子。我希望塔贝莎不会出什么事。老天，我希望我也别出什么事。

我们沿山路而行，一路上看到很多奇怪的黑乎乎的东西——看上去像是由羊皮和熊皮做的账篷或是蒙古包。我们停下来，打算定睛看个仔细。这儿万籁俱寂，只有羊群发出咩咩的叫声。一个长着大眼睛、穿着长裙的小姑娘害羞地望着我们。蒙古包很适合这些游牧部落的维吾尔人，因为拆卸起来很方便，打成包用骆驼一驮就可以走了。这个小姑娘看上去有五六岁，她还有一个姐姐，8岁左右的样子。我们给了她们一些面包，她们转过头去看抱着婴儿的妈妈，用默默的目光征求她的同意。妈妈点了点头，她们就拿了面包，扭头又跑回到妈妈那儿了。

我们走了过去，用简单的英语夹着手语问她我们可否进帐篷里看一看，她一点也不介意。

第一眼我觉得里面很空，不过只有我们这些以为会看到一大堆家具的西方人才会这么觉得。靠墙有一张小桌子，用布盖着的桌面上摆着干净的茶壶和陶器，顶棚上挂着一块有刺绣花色装饰的白布，可以放下来把屋里分成两个空间。在一块暗紫色地毯旁边露出的空地上放着一把烧水壶。几块木板靠在墙上算是座位的靠背，墙边还放着一摞皮子，现在毕竟是一年中很冷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些皮子。

我很奇怪为什么两次旅行中见到的游牧民族那么少，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就像爱斯基摩人一样，随着技术进步和20世纪的脚步慢慢隐退了。

中国正在赶修一条从乌鲁木齐往南到巴基斯坦和另一条往北通到俄罗斯的路。许多修路的民工都是维吾尔人，或者有养路护路的固定工作。新的路也使这些维吾尔人有可能在城里找到固定工作，所以游牧人口越来越少，克什米尔山羊也

就越来越少，因此导致纽约的羊绒价格昂贵得令人咋舌。因为有了这些路，一种文化有可能慢慢地消失了。

这就是人类世界，她在不停地变化，为一些人制造出新的机会，同时也为一些人关掉了机会的大门，就像大自然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知道那些主张停止前进脚步的人的理论根据，他们会说我们必须保持过去那些美好日子中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人——不是我——会看着这位妇女说，"这样做太可怕了，我们不应该用修路的工作来诱惑他们，破坏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有人已经说过我们不应该毁掉爱斯基摩人一样。

我不知道爱斯基摩人和维吾尔人会怎么说，他们当然不必因为城里的工作就不再过游牧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位妇女在这景色绮丽却风沙迷漫又与世隔绝的山里生活时，我对塔贝莎说："反正修了路我会很高兴的，可以进城去做其他事情了。"我还记得我的家乡德摩保利斯终于铺上柏油路的时候人们有多高兴。很显然，大多数的维吾尔人跟我感觉一样。

我对修路导致了羊绒价格上涨这两者间的关联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投资者应该如何去考虑问题。假如他们在巴基斯坦和中国投资修路，这一举措必将对某个地方产生影响。每当投资者看到有大的变化发生，他就要开始思考，这将意味着什么？它会产生什么连锁反应？它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修到俄罗斯的新铁路会不会进一步加深这些影响？再过30年，大多数的蒙古包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剩下的将用来收费参观，一次40美元，他们会在里面置上床和室内马桶，把价码定得高高的，让你来真正体验一下游牧生活，要买羊绒还需另付高价（我给

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他们为我买下两三件羊绒衫存着，等我回去）。不过这些还仅仅是开始——仅仅是表面上的变化。

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从西宁翻山来到了新疆的石河子，一路上风景很美，但有几段路相当难走。这个西部边疆省份的面积有美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那么大，但人口只有1500万，同中国的12亿人口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乌鲁木齐，这是一个还在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的大城市。通往俄罗斯的铁路即将竣工，通车后将会有助于这一地区的繁荣。我们在这儿大吃烤全羊、羊肉串、手抓饭和羊肉蒸饺。街上的小贩让我们品尝了烤包子、羊肉和清蒸羊汤，还有洋葱馅的、羊肉茴香馅的饺子，以及配有杏干、羊肉、洋葱和胡萝卜的手抓饭。用羊肉、洋葱、西红柿和青椒做的炒面在当地很受欢迎，味道确实好极了！

我学会了用汉语说“啤酒”。实际上，这次旅行归来，我已经会用40种不同的语言说啤酒了。

听说从敦煌到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已经修好了，这令我大为欣喜，上一次在那条老路上恶梦般的旅行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对照着地图，发现在世界上这个远离喧嚣的角落新近建起了许多高速公路和铁路，真是旧貌换新颜，地图也应该重新测绘了。这条过去只适合骆驼行走的古老的丝绸之路，如今已可以任由“铁马”驰骋了。

这片广袤无垠的区域——东临里海，西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靠喜马拉雅山，北边是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即将繁

荣起来。贸易、旅游业以及由此产生的机遇会为那些独具慧眼的企业家们开辟出无数发财致富的捷径。

为什么以前没有这样做呢？早在50年代，中国就称苏联为老大哥，并勘察了这一地区的地形，他们建立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的一部分就是开发一个将两国连接在一起的基础设施。他们打算把中国的铁路从新疆一直延伸出去，同现在的土耳其斯坦相接，再一直修到欧洲。后来两国关系破裂，这条铁路也就只筑到乌鲁木齐了。

60年代初，印度同中国开战的时候已经是作为苏联的盟友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了。为了保持势力均衡，中国同巴基斯坦结了盟，这样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很自然地就需要有公路交通，以便有情况时一方可以出兵力和物资来抵御来自另一个联盟的侵略行为。中巴合建的长达700英里的卡拉库莱姆高速路连接了乌鲁木齐、喀什和伊斯兰堡，虽说也曾因几次政治分歧而中断，但最终还是竣工通车了。这些工程不仅在当年为当地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如今又为旅游业和商业创造了条件。这些少数民族以前过着浪漫的游牧生活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现在他们则面临选择了。

没有这条路之前在这儿开车简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经历，与其说是路，还不如说是蜿蜒于山间的一条磕磕绊绊的碎鹅卵石河道。这条路的修竣应归功于人类的勇气和智慧。其中一部分是从印度河两岸的峡谷上那些坚硬的岩石中炸出来的路。许多路段都需要用绳子把工人们悬吊在半空，以便在岩石上钻取放置炸药的洞。400多人在筑路中丧生，有许多小小的锥形石堆象征着他们的墓碑。

这条路在修筑时危险重重，如今在上面行驶仍是险象环

生，岩石滑坡以及山洪暴发时有发生。巴基斯坦在他们边境的那一边派驻了10000名士兵，专门负责修路护路和紧急情况的排除。

现在中俄双方正在赶修这条铁路，它的竣工将把这一地区同阿拉木图和哈萨克斯坦连接起来，从那儿便可连通西方的任何地方——伊斯坦布尔、莫斯科、伦敦。土耳其斯坦将全方位地向世界开放——东西南北路路畅通——从而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由于落后的交通和运输状况带来的闭塞。这条铁路和那两条中国新修的公路看似平淡无奇，但它们将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未来衍生出巨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行驶的路段是不折不扣的沙漠地带，只有沙丘和远山，我们来到了吐鲁番和世界上陆地的最低点吐鲁番盆地。吐鲁番是一个维吾尔镇子，有许多圆顶的建筑和清真寺，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风格迥然不同。虽然这儿的气候炎热而干燥，但所幸现在是5月而不是8月。这儿的风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凶，特别是骑在摩托车上。上一次骑过这儿时我得拼命地把住摩托车，这样才能不被吹翻。有一次我把车停在路边，一阵狂风过来，就把我那500磅重的车给掀翻了。我还记得看见一位妇女把门锁打开后一次一次地试图把门拉开，殊不知，狂风把门吹得严严实实。

在两次离开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几千英里的旅行中，我非常惊讶于这里人烟的稀少。在中国东部的任何一个地方，不出一百码就必定见到人，而在这儿，我们沿着西部边境开

了八九十英里的路，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我还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沙漠上的绿洲比俄罗斯那边的要绿，不过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中国人不仅很有条理，而且还发明了一种很聪明的灌溉系统，他们在沙漠下面修建了水渠以便抽取山里的水来扩大绿洲的面积，并依此建起他们的城市。这些使用了几百年的水渠把蒸发带来的失水量降到了最低点。我简直目瞪口呆，不仅惊讶于中国人能把这些水渠修了长达几百英里，而且这是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发明了的。不论何时，也不论何地，需要用水时，只消在镇子里拧开水闸门，水就可以通过各个灌溉渠和复杂精细的阀门随时随处地送到。他们甚至还在每天清晨沿路洒水以净化空气。古老的中国人就是靠着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着的灌溉系统，将散落的沙漠绿洲变成了良田环绕的繁荣的城镇。



在中国西部寻找加油站总是一种历险。当我们找到时，对“用泵加油”就有了新的理解。

中国人的精明同苏联过去几十年中对咸海的使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人把乡野变成了花园，而苏联人则给同样的乡野带来了生态失衡的灾难。听说中国人是最先通过一排一排的播种而不是四处乱撒种子来提高作物产量的，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许多中国人的成功经验同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系，俄罗斯人实行的是无责任制，很快就吃到了苦头。中国人踏踏实实地改造身边现有的环境。他们让我想到狩猎者的社会，就像爱斯基摩人或其他的美国土著，他们同自然和睦相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把动物杀光，一切就都完了。中国一些地方的农民很善耕作，一年可以种三季稻，他们将庄稼一直种到路边，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他们给土地施肥，进行作物间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单位面积的土地利用率。

在吐鲁番的时候，为了给塔贝莎的车配一个垫圈，我们来到了一个露天集市。这里各种各样色泽鲜艳的瓜果，是你在这样一个大沙漠中央根本不会指望见到的，这又是中国人高明的灌溉技术的功劳。

我们需要换些当地的货币，所以我得先找到换汇的黑市。在任何控制货币兑换的地方，像中国这儿，都可以在黑市上换到钱。我找到了这样的市场，这太有趣了，因为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如果说有什么方式能够让他既迅速又准确地掌握一个国家的脉搏的话，那就是通过换汇了。货币的价格在一个精明的投资者眼中就像一位有经验的放射学家看 X 光一样，一目了然。银行的汇价，或者说官价，是我借以了解政府已到了什么程度的最重要的线索。假如在银行 1 个美元可以买 5

个兹罗提，但在黑市上可以换 8 个，那就说明政府正在努力把它的货币强加给自己的人民，而不敢让它在国际市场上流通，问都不用问，我就能知道一个国家是否控制货币，是否有进口税和出口限制。政府以为控制兑换就可以把货币留在他们的国家里，但其实却是把钱关在了外面。假如货币是自由兑换的，外来的人就会把钱带进来，国内的人也就不用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外偷运了，而如果货币不能兑换，他们总会这样做的。当然，谁都不想把钱放到一个取不出来的地方，许多其他的投资者也会这样想，所以没有人会跟我们一起，或是步我们的后尘来强使行情上涨。这个简单的测试总能告诉我是否值得再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可行性上下功夫。假如黑市上的价格是 5.5 个兹罗提兑 1 美元，而官价是 5 的话，那情况或许还不太糟。但如果黑市价到了 10 或 15 的话，那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危机四伏，政府可能会垮台，通货膨胀可能会爆发。那谁都能看出来这意味着大麻烦，局势极度不稳定。

大多数旅游者对货币价格的涨落看得不透彻，他们认为这就像股价的起伏揭示了一个公司的力量盛衰一样，货币的涨落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晴雨表。而他们却没有看到，就像公司的总裁和财务主管会想方设法抬高它们的股价一样，一个国家的财政和金融部长也在彻夜不眠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聪明的财政部长会知道靠耍花招，横加限制和规定，绝非长远之计，是吸引不来外资的。他们通过创造出稳固的货币价值来增强人们的信心。而那些死脑筋的部长只会没完没了地限制这个，限制那个，而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想要他们的货币。

"我想出点美元。"我对一个跑腿的小男孩说，他看上去也

就16岁，还在学徒呢。他最多只能换10美元，于是我让他带我去见他的老板。

我提高了警惕。如果你四处旅行，就会听说许多在黑市上换汇被宰的事。不过，同往常一样，我宁可在他们这儿撞运气也不愿意去国家的银行，他们给的比率无异于明抢。要是我机灵点儿，至少在黑市上还有获得公平交易的机会。

黑市上最普遍的一个花招是在换手时偷换。有个游客告诉我他接钱时很仔细地点过了，并且一直攥在手里不放，但当他回到饭店时还是发现他换来的是一叠切得很整齐的报纸。另一个花招是故弄玄虚。他们大喊一声“警察！”就迅速消失在人群里，匆忙之中递给你一叠里面差不多全是白纸的钱。因此换汇时始终要按照这样的步骤来：先谈好价钱，然后清点拿到手里的钱，确保它不再离开你的手，然后这时才不情愿地交出你该付的钱。不管怎么说，虽然是钱，你也是在购买商品，在接受之前就理应检查购买的东西，这是无论走到哪儿都合情合理的习俗。其实，为了防止被人用假钞糊弄，我们一般都是先去国家银行用几个美金换出点钱来当作样板，然后才去黑市上进行大笔的交易。如果有人喊“警察”，那么就要么缩回手里拿着的钱，要么沉着冷静地走开。黑市上的人准会再次找到你的。

这位老板站在集市的入口处，监视着他的跑腿伙计。他是哈萨克人，24岁左右。从我历来碰到的做黑市生意的人来看，这是个年轻人的战场。不过据我所知，楼上有个中年人已在瑞士银行开了户。这个哈萨克老板的口袋里塞满了大叠大叠的日元、人民币和美钞。他抽出这些钱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好像这是非法的。所有这些鬼鬼祟祟的样子都让我想起在亚

拉巴马买走私酒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需要小贩们巧妙地不让政府从他们的收入中分得一杯羹的交易。

"1美元换多少人民币？"我比划着用简单的英语问。人口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会说一点英语，从我们在此次旅行的经历来看，他们说的还真对，这个哈萨克人毫不费力地听懂了我的意思。

他出价5块，我说不行，因为我听说能换到8块。现在的比价没有两年前那么高了，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很厉害，我换到的价钱是6块，而官价是4块，多得50%的优惠，这说明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在掏钱买外汇，他们想换掉自己的钱，因为人民币贬值太快了，就像后来的英镑和里拉贬值一样。这一次我只多得了30%的好处。

这个老板只对购买美金和日元感兴趣，他不要先令或德国马克。这儿毕竟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央，距任何一个交易中心都有几千英里之遥。我猜想他要这两种货币是因为美元长期以来一直是贮备货币，而日本同中国有大宗的贸易往来。

转了一圈之后，我们最后以1美元换7块钱达成交易。其实同日元相比，1美元的比价他给得太高了，所以我感到良机莫失，我把美元都换成了日元。凭着我对国际货币市场行情的追踪了解，我可以从套汇中发笔小财，因为我知道行情而他不了解，道—琼斯股指的自动收录器还没传到吐鲁番。

在我们去哈密的路上，塔贝莎发现她的摩托车活塞上有一个洞。这辆破车能出的毛病都出了，就剩下躺倒不干了，而我有个预感，怕是离那一步也不远了，那个洞有一角钢锄那

么大，而我们是在一个像美国一样幅员辽阔，但却连一个宝马摩托车经销点都没有的国家。

我们招手叫了一辆卡车，把她的车扔到了后面的拖斗上，拖到了哈密后我们开始不停地打听，最后，还算幸运，找到了一位会焊接的机修工。为了这个洞，他一直焊到凌晨四点半。这活儿必须做得很仔细，由塔贝莎在一旁指导着，一薄层一薄层地来，这样才不会在关键时刻爆裂。要是我们带来一位训练有素的机修工，一个能够理解塔贝莎意图的人，在这儿才是最能体现其价值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修补行不行，不过在这沙漠的中央是没有办法搞到宝马摩托车配件的。这是那种在中国、非洲和南美的边远地区瞎凑合的修补。要是被工厂里正式的机修工看见准会感到害怕的。上帝知道这对机器的长期寿命会有什么损害，但要离开这儿别无他法，只有一试了。

我们随便四处逛了逛。哈密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闭塞的沙漠小镇，虽然看上去繁荣了一点。我对去敦煌的路途还有点心有余悸，因为上一次250英里路竟走了17个小时。

我们带着对临时装配的活塞的担心出发了。塔贝莎还在前面，她得留心路面上的凹坑和车辆，我们的耳朵还得随时倾听从她的发动机里发出的声响。我们不停地向前开着，1英里，5英里，……工作正常！也许我们能坚持到日本。

当我们在沙漠中穿行的时候，我一边担心发动机再闹毛病，一边感慨于中国西部的广袤无垠，这儿看上去多么陌生，多么不像中国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在这儿，人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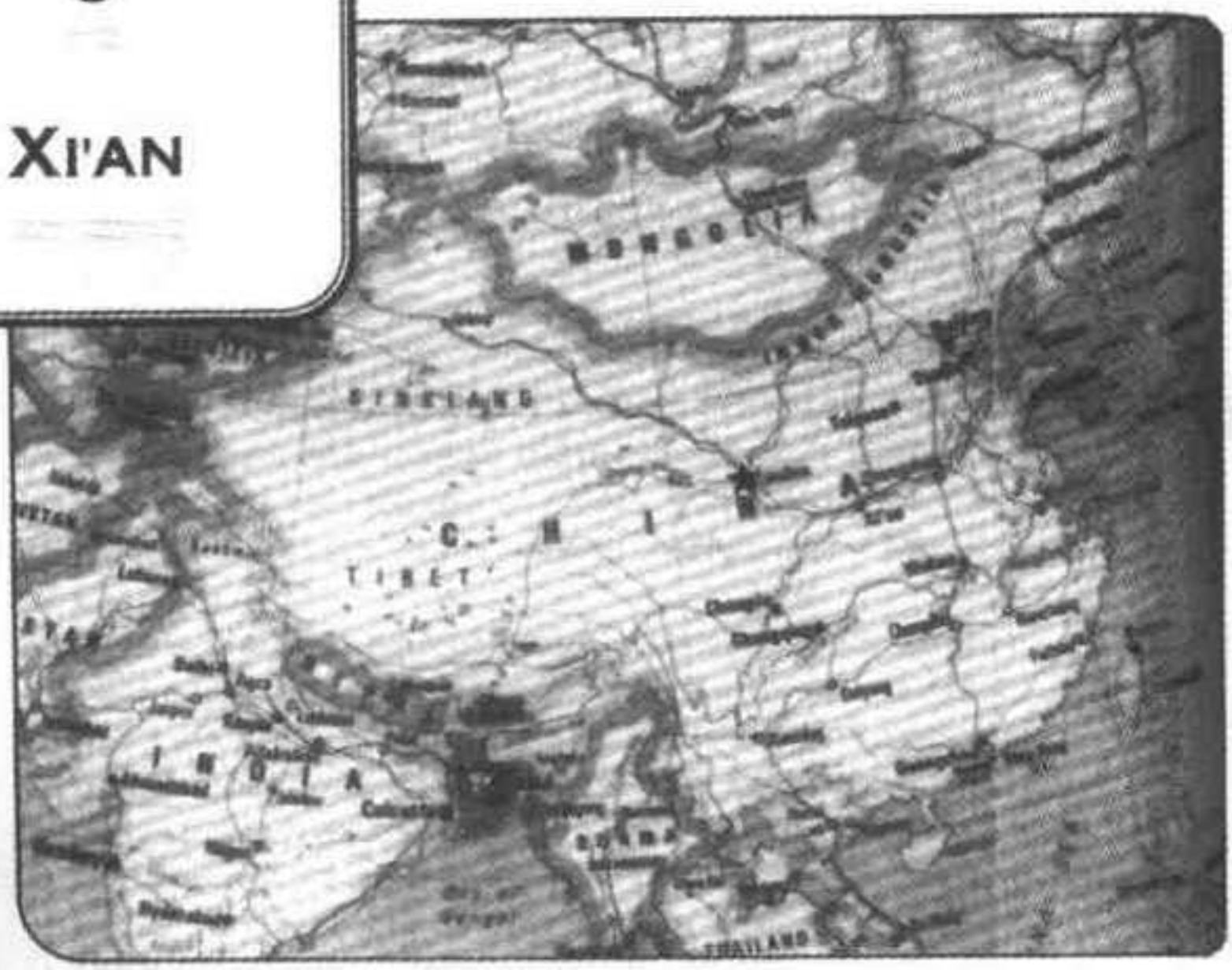
设想一下美国的人口比现在多上5倍，而且我们都住在

密西西比河以东。中国的反差就是这么巨大。设想一下假如人口是现在的8倍，美国的东半部将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那时的生活条件、社会条件、市场状况，以及人们对金钱、食物和空间的争夺。

这就是中国。拥挤不堪的东方，荒无人烟的西部。

9

XI'AN



9. 西　　安

XI'AN

敦煌的佛洞里有1000个人工修建的地下佛窟，里面都是些极不寻常的与佛有关的壁画、古图样、雕刻和塑像。它是由一个牧羊人于1900年偶然发现的，当他追逐一只绵羊来到一个洞中时，发现了这些尘封了900年的佛窟，所以它们没有像那些更早发现的古迹一样被破坏掉。

西　安

我上一次路过这儿的时候，曾在一家季先生开的饭馆里吃过饭。他待我特别热情，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很想再次找到他。季先生性格开朗，45岁，带着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永不显老的劲头。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以前是个农民，然后开了一家早点铺向别的农民卖早点。后来羽翼丰满了，就扩建为一家带旅店的饭馆。他很乐观开朗，手下的人也很乐意为他效力，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比在国营企业干挣的钱多。

他这地方让我想起300多年前美国西部或是英格兰的小旅馆。他有6间屋，每间有4张床，基本上都是行军床，厕所在走廊的尽头，这是哪儿都可以找到的标准的中国旅馆。我们没打算住这样的旅馆，想找一家更新更舒适的，为外国游客准备的友谊宾馆。

我想看看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他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上一次我见到他正是物价飞涨最严重的时候，人们使劲花钱，什么都抢购，政府被迫印制大量钞票，后来又不得不紧缩银根。

他还记得我，并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很高兴我又回来了。塔贝莎和我是来过他的旅馆的唯一的外国人。我们作为来自异国的旅游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就像50年代在亚拉巴马时，我们也把中国人或巴基斯坦人看成是星外来客。

我们在一张大桌子旁落座，他坚持要招待我们吃饭。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宴席，有鸡肉、羊肉和一些叫不出英文名字的蔬菜，因为这些菜在英语国家都没有，主食是以洋葱和葱蒜为配菜的凉面，味道十分鲜美。在这个沙漠的中央，他甚至还能弄到鱼来款待我们。鉴于中国人一向不把肉类和农产品送到很远的地方，这鱼肯定也是当地养殖的，这又得益于中国

人的聪明才智。他告诉我一年以前生意不太景气，不过现在又好转起来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在慢慢地复苏。

同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一样，季先生工作起来也是连轴转——一天 12 个小时，一个星期 7 天——经营他的饭馆，赚着辛苦钱。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负担，因为他有乐趣，像他这样的人往往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他用生活证明着怎样能使世界变样。不管美国人可能会猜测政府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反正在这个离北京 1200 英里的地方，有这么一位中央政府的计划者管不着的季先生，悠哉游哉地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他看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长城的西部关口嘉裕关。以前从这儿往西就意味着离开了文明世界，进入蛮荒之地。

西　安

我们刚到嘉裕关，这个将荒凉的西部同热闹的东部隔离开的历史分界线，就又出了一次事故。

塔贝莎几周来一直在前面领路，在两条车道的沥青路面上以35～40英里的时速前进着。路的两边都挤满了人。在中国，卡车、自行车、行人，旁若无人地自行其是的做法实在令人愤慨。我差不多习惯了，但塔贝莎不行。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在她前面急转弯，她突然被别在了里面——她肯定要撞着什么人，路两边都有这么多人，而这辆自行车又跑到了她的前面。她踩了刹车，摁了喇叭，但那个老头像个聋子似的充耳不闻，因为在中国，大车总要给小车让路的。在减了速但还没停下来的情况下，她撞了他，他骑自行车的时速差不多是5～10英里。

一大群人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警察也来了。塔贝莎吓坏了，说不出话来。我替她跟警察讲。老人看来伤得不重，但晕了过去。根据当地的法律，塔贝莎无疑成为责任方，尽管在我看来这次事故不是她的错。老人被送进了医院。

人群聚集了起来，向我们投来仇恨的目光。警长怕我们会引起另一场骚乱，坚持要我们赶紧出城。要在美国，他也许会带我们去警察局，以便在需要我们的时候随时可以找到我们，不过他不担心我们会跑掉。我们在这儿是稀有“动物”。两个外国人骑着外国车在这一地区唯一的一条公路上，这连傻子都能找得到。

我们忧心忡忡地发动起车，按他指点的方向开过去，等待他的报告。当我们走到长城在沙漠中坍塌消失的最西端时，警察追了上来

“你知道，”他说，“我们得为这位老人和他的家属表示点

什么。”他不是来逮捕我们的，我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好吧，多少钱？”

“200美元。”

美元！在这儿的黑市上，200美元相当于当地一年的工资，甚至还要多。

每当我认为被官方人员索要了高价时，就要求对方出具收据。十有八九他们会嘴软，因为他不知道我会把这个给谁看。他会动动脑子，假设我把收据给他的老板看了，而他扣了这笔钱……但这位警察很痛快地给了我一张收据。

我还留着这张收据，当然是中文的，潦草地写在一张毛边的小纸片上。



汽油是个经常令我们担心的问题，因为加油站之间往往隔着几百英里。我们开车的时候总要盯着里程表，算计着什么时候能再加上油。

有一次，我们的油箱已快见底了，但离镇子还远着呢，只好时不时地空挡滑行以节省每一滴油。我们路过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军事哨所基地时，径直把车开到了队部。我们用手指着油箱，像演哑剧一般比划着说油箱空了——我们用手语说服了士兵带我们去他们基地的油泵加油。油站的士兵没权卖给我们汽油，于是我们荣幸地被带去见基地首长。

我们在陆司令的办公室里给他看了护照、地图和介绍信。他皱起了眉头。我们走到哪儿都是靠简单的英语夹着几句当地话再加上比划来表达意思的，这次我们照旧用这些来解释汽油用完了。

陆司令不仅对于我们这两个西方人跑到他的国家来感到

大为困惑，而且对我们能够突破他的军事防御更是惊诧不已。

最后，我们告诉他："要么把我们当间谍抓起来，要么卖给我们点汽油。"

他听了大笑起来，令他的手下给了我们汽油，而且谁也不肯收钱。

过了嘉裕关几百英里，我们的油又面临危机了，正发愁的时候，我们欣喜地发现沿路两侧的防空洞或简易棚里，有几十个人摆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塑料桶或铁皮桶，里面是 10、15 或 20 升装的汽油。我们再次在黑市上得了救。

我们在周游世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条就是不必过多地为没油担心　在很多地方，黑市上的人都会知道旅行的人走到哪儿就快没油了，然后就会在那儿等着把油卖给你。因此，这些精明的生意人就在相距几百英里的城市之间算出那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静候着你的光顾。

我们翻山越岭，经过的山口最高有 10500 英尺，终于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兰州——这儿有层层梯田，还有远方"咔嚓，咔嚓"哼叫的燃煤机车。

我们去集市上逛了逛。这儿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扩大了规模，东西的质量也好一些，不过价钱也贵了。由于还没到西瓜收获季节，加之中国人不习惯于用卡车把货运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在这儿买一个小西瓜要花 2.7 美元。

在文化宫的茶馆里，阳光透过茅草屋顶，斑驳地照着几位悠闲地玩着纸牌和麻将的老人。旁边立着的一个牌子上说，不许酗酒，不许打架，不许使用不文明的语言。一个瘦骨嶙峋

的中年男子在三弦的伴奏下正用凄婉的歌声哀叹生活和爱情，而过往的人群并不愿驻足倾听。这些闲散慵懒的人们，无所事事地吐着烟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又好像在沉思默想，似乎看破了红尘，在潜心默祷。

他们见到我们很高兴，把小杯的茅台推到我们眼前，让我没法拒绝。中国人说起茅台就像美国南部的人说起波旁威士忌，或是苏格兰人说起他们的威士忌酒那样啧啧地赞不绝口。这是一种酒精含量很高的烈性酒，产地在贵州省，是用高粱和酵母酿制而成的，存放五六年才可以喝，但是味道太难喝了，只有中国人才受得了，我一盅过后便告求饶了。



我从服务员那儿买了一副中国扑克，还有两件绣着英文的时髦夹克，其实这些字母只是些古里古怪的音节而已。尽管这儿有一两个喝得醉醺醺的酒鬼，但我还是被那宁静安详的气氛所感染。这让我想起了老家亚拉巴马那些围坐在小店铺、理发室或是台球桌旁聊天喝酒发牢骚的男人，那些地方是可以摆脱女人的去处，就像许多原始部落中就有的同样用途的男子旅店。在这儿人们一杯一杯地喝着茶，来上几杯啤酒和几口茅台，再赌上两把，碎嘴唠叨地说上一通，一派亲密无间、情谊融洽的气氛。没有牌子上写着“妇女禁止入内”，但却一个女人也见不到。我在俄克拉荷马的祖父布鲁尔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每到黄昏，我的祖母就会跑到所有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室里去找他，这常令她发火。当她终于找到祖父时总会说：“见鬼，我告诉你不要玩这破牌了！”那时俄克拉荷马是禁酒的，不过柜台后面的纸袋子里都放着酒贩子偷偷运进来的酒。不管怎么说，我的祖父布鲁尔在镇上是个人物。他不仅拥有一个广播电台，还在银行里持有股份，他读法律学校的

时候同州里未来的参议员住在一起，并且是他那一拨人里最为人追求的年轻律师之一。我猜想祖母大概要他在家里帮忙做点家务，但他同许多男人一样，更喜欢跟老伙计泡在一起。



中国西部的一个砖瓦厂。待黏土的胚体干后，它们一裂为四，成为瓦片，用作盖房顶。

当地领导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想关掉茶馆，但就像我们的政府在禁酒期间试图关掉酒馆一样，只是徒劳一场。历史上一直都有男人们可以聚在一起做他们喜欢一起做的事情的地方，且这样的地方会一直存在下去，不管政治上有何不妥当。英国的男子汉俱乐部、非洲和美洲部落的男子旅店、美国西部的沙龙和南部的理发馆和台球厅，还有中国的茶馆，都显然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些只有女子聚会的地方。

在兰州，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是如何污染空气的。第三

世界国家对烟囱的污染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控制。不过中国对河流的保护比多数国家做得都好，或许是因为他们需要吃鱼，而在人口稀少的俄罗斯，大量的内河在不停地遭到破坏。

中国人只喝开水。我们住进中国旅店的时候总有人送来大个儿的设计精巧的暖壶，里面的水可以 24 小时或 48 小时地保温，用来沏茶或洗漱。这是典型的中国发明，几个暖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必要把燃料浪费在把水加热再用管子送到各处呢？

从兰州到平凉的旅途极不寻常。我们爬上了一个 7000 英尺高的高峰，沿着山脊骑行。人们在山脊顶上种了几千棵树作为防风沙带。山脊的两旁是一排排等距的小树苗。

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道路两旁出现了十几位养蜂人和他们的蜂箱——紧接着是上百个蜂箱和几十个养蜂人。我们把头盔上的护面拉下并戴上了手套，把浑身上下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以防被蜇。后来我们得知，这些人是从游牧部落移民而来的养蜂人，每人有 5～50 个蜂箱。养蜂人把蜂王带到什么地方，工蜂们自然就跟着来到什么地方。从春到秋，这些养蜂人追随着花的足迹，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天，等蜜蜂把那儿的花蜜都喝光了，再继续寻找新的地方。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只蜜蜂遮天蔽日，嗡嗡嗡地无处不在。这种非凡的景象延续了 15 英里，路边有上百家养蜂人宿营在帐篷里。他们大多都不戴任何防护面具，同他们的蜜蜂和平共处。

这又是一个中国超高产领域的典范。他们有意把蜜蜂带到盛开的花朵处，而不是任由蜜蜂飞到哪儿算哪儿，碰上几朵算几朵。当然，这儿的蜜蜂也像养它们的中国人一样，要比它

们的外国同胞工作辛苦5～6倍，因为主人把它们的采蜜期从几个星期延长到了半年。

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奇妙的见闻，不过很少能同那十几英里的蜜蜂和养蜂人相比的。正是那种生产能力，那种有意识的计划性和勤奋，使我相信中国人在下个世纪将创造出更辉煌的成就。

西安在两三千年之前就被称作是世界的文明古都，它的繁荣在罗马之前，而且很可能超过罗马，它很久以前就衰落了，如今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省会。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成就——特别是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之中，也包含着衰落，或许是灭亡的种子。这是当你走过历史时所能看到的，在现实世界中时有发生的憾事。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明、玛雅文化、阿兹特克人（墨西哥印地安人）、中国人、罗马人、希腊人和波斯人建立的文明——这只是举出的几个例子——如今都已成为废墟，光彩不再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是幸运的，它从自己的过去中找到了新的生机。多年来，北京作为长城的发端，一直是中国的旅游中心，而如今西安则异军突起，成为主要的观光城市。

几千年前的中国，皇帝死时有盛大的陪葬仪规，他的全体宫室、侍臣、卫兵、御厨，所有人都要殉葬。有一位大臣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要面临此命运，就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做一些像真人一样大小的陶俑作替身呢？他想办法说服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宫中的每一个人都被灌了模子，塑成了陶俑，目前，在西安发现了8000个这种按实际尺寸大小

做成的随葬品：士兵俑、马车、战马、将军还有武器，全副武装的军队面朝各个方向，护驾死去的皇帝免受袭击。

我以前见过这些兵马俑的照片，但当你亲眼看到它们的时候，就像第一次见到泰姬陵或是大峡谷一样——简直令人倾倒。你得愣会儿神才能回到现实中，这些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的军队和宫室不是梦境，而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确实是塑造了这么多的陶俑，而且是在那么久以前完成的，然后每隔几分钟你就又会有这种恍如梦中的感觉，醒过来又再度惊叹不已。

这些兵马俑有一小部分曾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巡回展览过，但要真正见识他们，感受他们的震撼，就必须来西安这座地下博物馆。这一切是在1974年才被发现的，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挖掘。天晓得还会发现什么。到现在为止，他们刚挖完一个皇帝的宫殿，谁知道还有多少呢？

同平常一样，我们下榻在镇上最好的饭店金花饭店——在很多城镇，最好的饭店是座五层楼而不是五星级。我们见到了饭店经理，是一位名叫约翰·布朗的单身英国男子，他42岁，操着浓重的英格兰中部口音，显得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他领导着手下500名中国雇员，基本上都是些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为那些前来看兵马俑的外国人提供服务。饭店有自己的美容学校，教这些姑娘如何穿着打扮，如何服务，一切都从头教起。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份很荣耀的工作，颇有点像35年前做空姐那样。我们就是在这儿听说中国姑娘被告之同外国人接吻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得病。尽管如此，我得说我还是怀疑约翰个人的私生活如何。

旅游业的空前繁荣使得连教授都辞职到饭店里来作客房

调配员。他们不觉得这是降低身份，而是从报酬和体面上往上迈了一个台阶。物质生活的诱惑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向。

我们在这儿偶尔见到几个乞丐，不过一星期里见到的也不如在印度一个小时能见到的那么多。有一些乞丐在饭馆里逛悠、等着吃一些残羹剩饭。他们好像不怎么纠缠外国人。

我早就听说在西安有一个神话般的鸟市。在镇上走过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十几位老人坐在公园里，一人一只鸟笼。在美国，人们去公园里遛狗，在中国，人们则遛鸟。鸟是完美的中式宠物：它们占不了多大地方，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乒乓球和台球是很适合中国国情的运动，而板球、棒球和足球永远不会流行，因为它们占的地方太大。

不管怎么样，我想去看看这个鸟市，但当我打听它在哪儿时，人们都告诉我没有这个地方。前两次来西安时，我都没有找到。在金花饭店我见谁问谁，弄得大家都讨厌我了，又问了十几个出租司机，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带我们去的司机。

他带我们去了一个很小的市场，只有一间美式客厅那么大，有十几只猫和几条狗。这些在中国都不是大众化的宠物，它们占的地方也太大了，而且政府也不鼓励人们养猫狗之类的动物。因此塔贝莎和我又开始打手语，嘴里学着鸟叫，模仿着拍打翅膀。在停错了一两处之后，他终于让我们下了车，用手指着前面，告诉我们剩下的路得自己走过去了，车子不能再往前开了。

他说得一点不错。前面的路太拥挤了，简直人山人海。我们拐过弯来，哇，就是这儿！几百米长的鸟市！街的两旁是上千只鸟笼，有放在地上的，有挂在自行车上的，有架在树上的，还有吊在两条杆子之间的绳上的，悠悠荡荡地摆满了路边。什么鸟都有——鸽子、八哥、大小鹦鹉、百灵、金丝雀、燕

子、歌鸽、山雀、鸭子，还有长着漂亮头冠的叫不出名来的奇鸟异雀。这里光鸟就有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另外还有小鸡、蛇和金鱼，都是作为宠物来卖的。



西安的鸟市将是你在中国最惊人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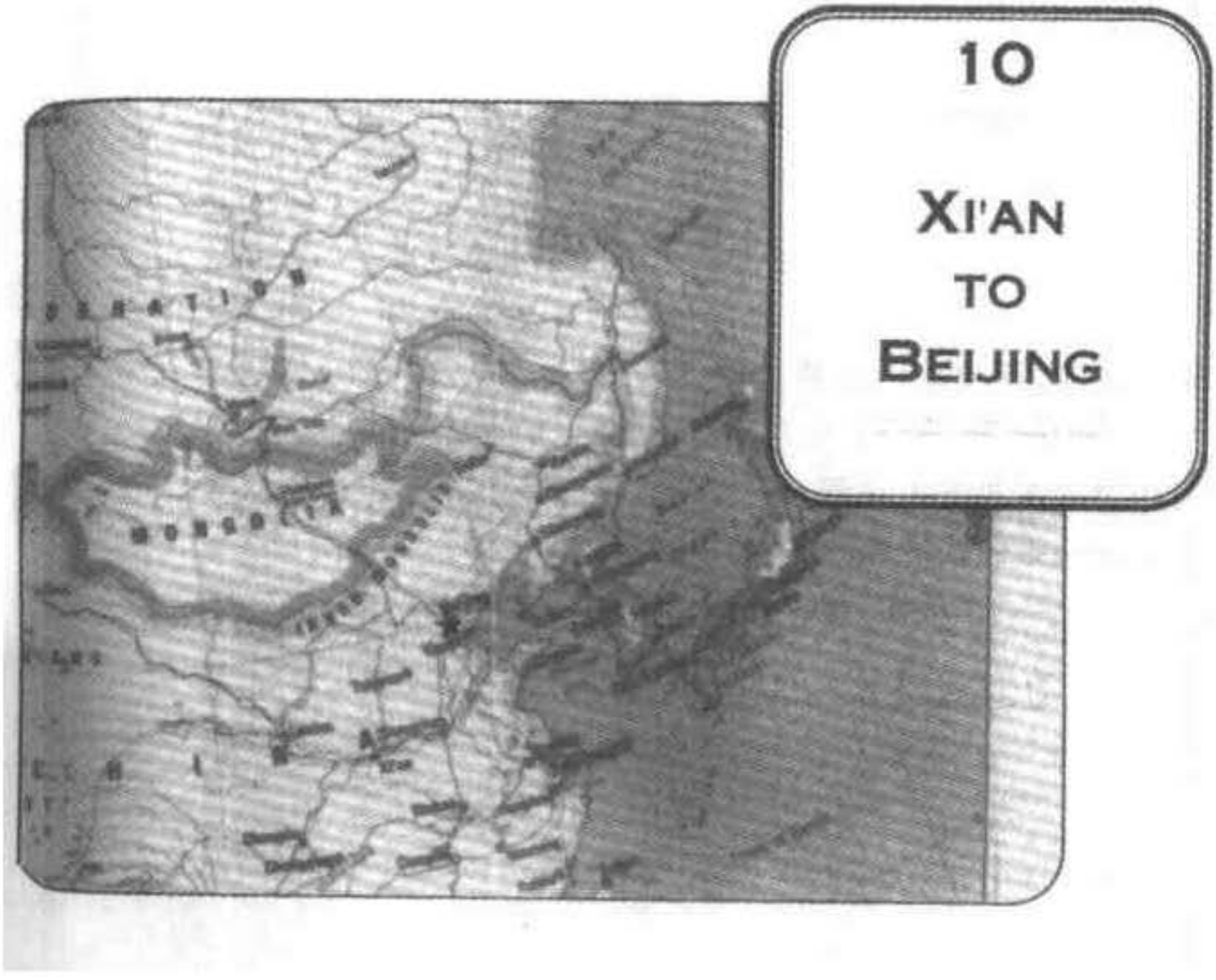
到处是同卖主砍价的顾客。我们正同一位卖主说话的时候，一只鸟飞脱了笼子，从我们的头顶急速掠过，向上飞去，但见卖鸟人一伸手就把它从空中捏了回来，那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就像我伸手去摘一只苹果。我不知道谁更惊讶——是鸟还是我。我们又看见了两次卖鸟人从空中捉鸟的镜头，简直不知道该往前看还是往后瞧了，生怕会错过什么。在这儿买鸟不算贵，同在美国买一只猫差不多。西安的鸟市带有典型的

西　安

中国气息——紧凑、拥挤、水泄不通。在磕头碰脸的人群中，再加上我们的好奇心，这条街像是永远也走不到头。

我回到美国之后就对朋友讲："如果你去西安玩，当然要看兵马俑，不过也一定要去看鸟市。"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说："那儿没有鸟市，"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带他们去，也许中国人认为如果西方人看到一些中国人游手好闲，还有一些中国人食用八哥的话，就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10

XI'AN TO BEIJING

10. 从西安到北京

XI'AN TO BEIJING

我们翻山越岭，开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到了洛阳，行程500英里。

我的一个后胎瘪了，这是第二次，也许整个行程下来我们俩的胎会瘪上20次。我们一起换上备用胎，我给塔贝莎当下手。现在离上海还有1000英里，而我们的备用胎只剩下两

个了，因为按照生产厂家的说明，没有内胎的真空胎扎了以后最好就扔掉。

我们多数时间是在两条车道的沥青路面上骑行。有个别地方的路面很糟糕，虽然尚没碰到被冲毁的路，但比我上次走的还糟糕。当然，没有任何牌子上写着“小心，路被冲毁，请绕行。”要是在美国，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主干路出了问题，定会成为头条新闻。但是中国人对灾难从不声张。

我们此打算离开洛阳前往上海，并且已预订了从那儿开往日本的一月一次的轮渡，没想这令旅行社一个官僚紧张万分，他威胁我们说如果开车去那儿，就叫军队。我们再三恳求，并给这位朱先生看了我们的介绍信，但他是个死脑筋，就是不肯承认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可。我甚至试图贿赂他：“我知道这有点破例，我们多付钱总是可以的吧。”可朱先生不肯上钩，很清楚，我们去不了上海了。

这位当官的把我们整个的行程安排全打乱了。现在已是5月中旬，由于要考虑气候以及往返于日本的轮渡，我们的时间已很紧张了。我们拼命想避开冬天，这不光是因为西伯利亚，那里9月就进入冬季，离现在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而且也因为南非、澳大利亚和阿根廷。我们在日本只有13天的时间，还得赶上从横滨开往西伯利亚的船。要是错过了，就得等整整1个月才能赶上下一班。因此我们被迫改变计划，朝北京开去。这样走并不绕远，只是我们不知道到了北京后怎么才能去日本。这样的旅行中无法预料的变化如此之多，时间被一拖再拖，根本不可能预先取得签证或是订船票和机票，我们只能随机应变，边走边计划。

我们很快打听到从北京到日本的轮渡夏天停运，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从中国坐飞机飞到东京了。不过航空公司通常对空运摩托车不太通融，因为不喜欢把带有汽油和电池的东西放到他们的货舱中。他们的理由是，就算油箱是空的，里面也有可燃气体，电瓶里的酸液也会对飞机造成天知道什么样的破坏。像新加坡航空公司，除非是刚出厂的新车，否则不管你装箱或包装得多么严实，都一概拒载。我知道我们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航空公司碰钉了，但不知道他们是不容商量还是态度缓和。

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的狂热早就成为过去了，大字报已很罕见，所以新贴出的白纸黑字的告示吸引了我的视线。写在光秃秃的白纸上的那些笔划有力的方块汉字给人的感觉很正式，像是很重要的内容。

在中国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只要稍作停留，差不多马上就会有学校老师出现在面前同我们练习说英语。我有收集政治海报的嗜好，现在又正巧站到了我们已多次见过的新贴的一张大字报下面，于是，我向一位瘦瘦的、手指被烟熏黄了的老师请教上面写的是什么。

他向四处警觉地张望了一下，然后凑上前来低声说道：

“这张告示宣判了对两名罪犯的判决。”“他们做了什么？”我问道。

他告诉我说：“这两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手持长长的杀猪刀，闯入一个寡妇家，抢劫并伤害了她。他们被抓住，被判有罪，并判了死刑。”

“为什么贴告示？”我问，“会公开处决吗？”

“不会。”

“怎么处决?”

“枪决。除非这两个抢劫犯要求更残忍的死法,否则他们或他们的家属将买下两颗子弹,由警察来执行枪决。接受此任务的警察会开车带他们找到一个适合埋葬的地点,然后让他们自己在那儿挖一个坟坑。没有棺材。坟墓一挖好,他们自己给自己买的子弹就会很快结束他们的生命。”

同白纸黑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告示的右下角上盖着的一个红印。

“那是干什么的?”我问。

“那个的意思是处决已被执行。”他小声说。

听完这些,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地继续踏上旅途。

从兰州开始,我们发现人越来越多了起来。一过西安,翻过了秦岭,我们就被淹没在人海中了。从这儿往北京的路上就没断过人群,不管在哪儿,乡村、城市、镇子还是村子,从来就没有“日中无人”的时候。公路上总是出奇地拥挤,因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要在上面占个位置——猪、羊、行人、自行车、马车和卡车。“拥挤的亚洲”在这儿是眼见为实了。

走得慢的靠路边,为数不多的车辆占据了道路中间。运气好的时候一小时可以跑到30英里~40英里。

有一次在去洛阳的路上我们碰到了很严重的一次塞车。我骑上前去看个究竟,发现一节加挂的货车拖斗堵在路中间,挡了大家的道。司机把它解了挂丢在那儿,开着车头去取零件了。每当车出了毛病,司机就会下来把车扔下去找人帮忙。没人担心他的财产被盗。在这种情况下也没人会下车来把这

该死的拖斗推走。我是说，如果人们想到这么办的话，八个人是可以把它推到路边的。

当我回去找塔贝莎的时候，我大致测量了一下，车队已排了3英里长。我们时不时地轧过堆在路面上的粮食，那是专门铺在路上让车来脱粒的。我们还轧过成堆的坚果，也是放在路上特意让车轧碎的。

我们从来没见过男女在公共场合有什么亲昵的表示。但我想，他们一定会有表示的，人们搂着脖子亲嘴已经几千年了。我们看见路上走着的女孩子们手拉着手，男孩同男孩手拉手——他们并非同性恋，那是违法的——只是朋友，就像你在法国或中东会看到的那样。

我上一次旅行时曾参加过一个露天舞会，是下午场的迪斯科。我发现小伙子只跟小伙子跳，姑娘只跟姑娘跳。后来一个小伙子走过来邀请我跳舞，把我吓了一跳。以前我可从来没被男的请过跳舞。我坚决不去，但这是在中国……可我并不喜欢跳舞，也不太会跳。

在我们去石家庄的途中，跑到一座带武术学校的大庙里看了看。石家庄是一座近几年来新兴起来的大型工业城市。在当今的中国有许多人口三四百万的城市，跟洛杉矶差不多大，而在40年前还只是一些村子。这样的发展要是发生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定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发生在中国却悄无声息地不为外界所知。

这次来中国，我注意到加油站比以前多了。当然，除了那些黑市买卖，加油站都是国营的。石家庄也有不少80年代一

窝蜂盖起的饭店,不过同别处一样,基本上都是空的。

接近北京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很兴奋。一个路标上居然用英文标着:"北京,49公里!"仅仅看见路标就够令我们震惊的了。这是新兴的国际化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走回到那个世界,那个7000英里前驶出的伊斯坦布尔。



行驶了数千英里后出现的第一个路标——自离开中欧以来一路上没见过任何路标。

塔贝莎和我相视而笑。我们已骑车穿越了欧亚大陆。从爱尔兰到北京,9400英里的路程,几乎全是在两条车道的沥青路面上开过来的,坑坑洼洼的尽是不平的地方,经常还不如南方的土路,挤满了牲畜、破车和不闻不看的行人。我们走过了3月、4月和5月,庆幸的是天气还不错,只有几天下了点雨。我们睡在简陋不堪的"五星级饭店"里。我们既在豪华饭

店里用过最考究的瓷制餐具，也在露天集市上用过脏兮兮的铝盘子。在那一刻，我感到假如我们一起能够做到这个，就能够做到一切。

我们开上了通往北京的四车道康庄大道，感觉到一种奢侈，因为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以六七十英里的时速尽情驰骋了。

我们穿过了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偌大的广场都是用圆石铺就的。这里在以前是政府办公的地方。毛泽东曾在这儿戴着红卫兵的袖章，俯视百万人民的游行。1976 年，又是百万的人民在这儿向他作了最后的致敬与告别。

我 1988 年来这儿时，巨大的广场上人们悠闲地放着风筝，或是在夏天的夜晚漫步于此，是个莫斯科红场和纽约市政公园两者特色兼具的地方。置身于此，你的四周都被历史包围了——通往紫禁城的天安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前门楼，毛主席纪念堂，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假如你起个大早，还可以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升旗仪式，他们经过严格精确的操练，每天都迈着 108 步一分不差地准时到达。

住进饭店之后，我们只去故宫游览了一下。虽然我们很想在北京多留几天，但还是在第二天就赶往北京国际机场，看看能否通过那儿把我们自己，还有摩托车弄到东京。虽然那里的候机楼一片繁忙，但货运处却冷冷清清，非常萧条。没有车来车往，也没有什么国际贸易在此出入。没有什么产品急于打开中国的市场：反正这个国家没有那样东西也已经几个

世纪了，现在有什么可着急的？

没有一本旅行指南可以告诉骑车旅行者如何从伊斯坦布尔到达北京，更没有书指导我们如何从北京到达东京。我很为此担心，因为我有过把车从纽约通过海运运到香侬的经历。我们不仅得把车装箱，还要把电瓶拆下来，把汽油抽干，再填上天知道多少张表格，见过无数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每个人都身肩重任般的惟恐因为给我们放行就丢了饭碗。

5月29日，我们把车开到了机场，在那儿耽误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虽然我们是唯一要把货物运出港的顾客。我们从来都留出一整天的时间来办过境手续，这一次实际上花掉了整整10个小时才把一切办妥。我们一连跑了保险业务处、主管办公室、货运办公室，还有好几个收款处，还要给摩托车称重。然而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没有人索要黑钱，也没有人吵着要抽干汽油、拆下电瓶什么的。

实际上，我们沾了是第一对从北京机场飞往日本的摩托车手的光。假如我们是第10个或第100个，他们就会制定出一套申请程序来，要花去10天的时间，而不是几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了，但我们可谓趁其不备、出奇制胜。

我从多年的旅行经验中总结出这样一条：一旦你开始申请过境，就必须一鼓作气地做到底，永远不要停下来，不要说我明天再来或是一个小时后再来。要不间断地一口气做下去，否则永远也没完。漫游世界听起来也许很不错，但完成这样的旅行却需要相当的韧性。要是屈从于自己一时软弱的意志，或者开始游山玩水，乐不思蜀，或是办过境手续时被那些官僚气十足的章盖得丧失了信心——这样的情况可能会遇上100次——都有可能意味着完不成这样长的旅行，或是一拖

就是几年。

好在办手续的过程中会生出它自己的生命力，因为你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半途而废。一个人告诉你说："好吧，现在去见张三。"或者他会嚷上一句："张三，你给他们办吧。"假如你就此止步，那旅行计划就算搁浅了。任何停顿都会给这些公务员造成一个思考的机会，而这些官僚一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准会想出一个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的理由。甚至在已经过了境之后，停顿也是很危险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在边境的那一边作少许逗留，以防边关的卫兵往细处一想：他的上司吃完饭回来会对他这样做说些什么呢？你要想离开那个鬼地方，就应能溜赶紧溜。因此，我们一旦问好了程序，他们也答应给办了的话，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拖着不走，先去玩上一个礼拜。我敢向你保证，一个星期之后，申请程序就会有变动，变得更长，更繁琐了——也许还会变得不可能了。因此我们马上宣布打算搭乘第二天的班机，这样有助于加快没完没了的公文旅行。

我们担心会出岔子，于是就跟着去看他们怎么把车捆绑在货板上。由于那一天没有别的货发往东京，机场上所有的货运服务人员都跑来干这个了。12个强壮的小伙子这样绑了那样绑，怎么都不行。有一次他们把塔贝莎的车绑得太紧了，把下面的金属货架都勒弯了。最后塔贝莎爬上了货架说："好吧，小伙子们，我来告诉你们怎么办。"所有的货运服务员都退到一旁，眼看着这位高个子、留着棕色长发的女孩麻利地把车捆扎完毕，而他们忙活了两个小时都没弄好。她绑完的时候，我跟在场的人一起发出了欢呼声。

塔贝莎还想尽量挤出点时间观光一下，所以我们又叫了

出租返回城里过夜。

北京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最沉闷、最保守的一个地方，一点也不具代表性，虽然这里什么都是最好的——最好的饭店、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街道。然而，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却遍及中国各地，在我们走过的300英里的路途中，甚至远到乌鲁木齐，中国各地都按照北京时间对表，尽管这也许有些难以置信。因此我们在中国西部早上7时30分醒来的时候还是黑漆漆的一片，因为按照地理时区实际的时间只有4时30分。塔贝莎想去颐和园看看，但有人告诉我们那儿正进行内部修理，关门了，那儿死了一个人。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对于没有时间去游历南部的两个主要省份感到很失望——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以及广东省。我对这两个地方都很感兴趣，因为它们的自由市场和经商热都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湾和香港繁荣的影响，是外资投资的主要地区。偷渡到台湾的人中大多数是福建人，原因很简单：他们只有一海之隔。在19和20世纪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中也有许多来自这两个省，因为他们离港口近，出来方便。另外那儿还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金钱是全世界强有力的动力，哪儿的人都想致富。

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落后于西方，虽然我们对此的看法也许并不总是一致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已衰落了很久了。甚至在18世纪时，中国还是很强盛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慈禧还没有失去保持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需的力量、目光和雄心，统治阶级仍然在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做着中国人在过去

的500年中一直在做的事情。

从一次大战前到二次大战后的近40年时间里，中国像苏联一样，历经动乱和沉浮。这个大国的衰落就是苏联重蹈覆辙的样板：军阀们发动的三四十年的内战，军事领袖用武力来统治平民。不过苏联的解体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中国人口更集中一些，其中有10亿人都属同一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4%，主要居住在东部），密集地分布在像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那么大的地盘上。苏联不仅领土横跨欧亚两个大陆，而且有100多种不同的宗教、语言、种族和民族。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走出了晚清官府的衰败，但并未能挽救中国的命运。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把美国人赶出了北朝鲜。毛泽东是一个卓越的革命家及战略家，他发动游击队的力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不过，就像卡斯特罗、列宁、斯大林、克伦威尔、玻利瓦尔以及加纳的恩克鲁玛等等其他那些成功的革命家一样，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以后，也未能以另一套全然不同的才能和胆略来治理好他的国家和经济。一些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场灾难。

十年动乱除了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毁灭性重创，中国各地的历史古迹均遭到严重破坏，至今仍有许多未被修复，也许永远也不会被修复了。

中国有可能形成北、南、西三种经济模式。南方的模式是广东，那儿讲的粤语跟北京的普通话不一样，他们的头脑中塞满了生意经。然后是西部，遍布穆斯林的沙漠地带，没几个待在东部的中国人特别想占据这块地方的，不过也许其价值体

现在作为一个抵御西边力量的缓冲带上，而且还有可能富含矿产，如石油、黄金、铜或是钻石。用它作什么缓冲带的想法让我觉得太落伍了。当然，成吉思汗或泰摩兰的时代只能靠行军穿过沙漠才能到达北京，但如今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则完全可以从天而降、展翅即到。

整个中国南方还有北方农村的思维方式都同北京有很大差异，在我前二次的旅行中——其中两次是分别于 1986 年和 1988 年的骑摩托旅行——我都发现中国人对于说教式的思想灌输感到越来越腻烦了。

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在世界排名第二，虽然这指的当然不是人均水平。到 21 世纪早期的某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还会跃居世界第一。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人们总是想多要些孩子好在地里多几个帮手，老了以后也有个指望，而孩子就是他们的养老保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尝试过这一政策。

我不觉自问：这些独生子女会不会被惯得个个都很自私从而改变中国人的特性呢？但有许多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和长子大多具有成功的倾向。那么，全部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民族会不会比现在这些勤劳的中国人更加努力工作呢？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中国人有着相当悠久的经商传统，这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时代。21 世纪的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别老想着日本，我们的孩子会学中文的。这儿有 10 多亿人口，香港的发展已在这块大地

上生根，它的影响正飞快地向北延伸。这些南部的省份迟早会影响到北方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正如雨后春笋，会迅速覆盖整个人口密集的东部。

我们别忘了那些海外的华人。没有人知道华侨到底有多少，但他们遍布全球——泰国、新加坡、旧金山和纽约、澳大利亚——很多富商，很多成功人士。马来西亚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华人。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不断从中国南方的省份移居而来。

即便你是第三代的华裔，是一个居住在贝佛利山的啦啦队长，从来不知道筷子和棒子有什么区别，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一句广东话，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你还是一个中国人。他们随时欢迎你回来，并且很痛快地给你一本护照。许多海外的华人有技能、有资金，想回来做点事情，支援一下大陆，或是投资赚钱，中国人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也许世界上有5～10亿的华侨——是香港人口的7～20倍——遍布全球，一个巨大的数字，一笔巨大的财富。中国甚至开始建三种层次的饭店——一种是给内宾的，一种是给外宾的，还有一种是给华侨的。

我们不妨将中国跟俄罗斯做个比较。他们就没有这样一大批成功的海外人士来援助他们处于困境中的经济。为什么呢？首先，他们没有很多海外“俄人”。其次，他们的海外“俄人”也没有海外华人那么成功。第三，他们没有中国人这种由来已久的经商传统。甚至在沙皇统治时期，俄国人也没有几个资本家。第四，海外“俄人”没有几个想回到祖国的，但中国人想。离开的俄国人已经被别的文化同化了。住在布鲁克林的俄国人没有想回去的，他们只惦记着搬到美丽的郊区去，

俄罗斯有不少想要自治的各个种族，而这只会导致动乱，会分崩离析，变成50个，或者100个交战国。这对于我们，或者对于欧洲来说会造成任何危险吗？不会的，因为这些交战国太小了，在军事力量上成不了气候，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互相打了几百年了，他们所拥有的武器，包括核武器，都已经内耗得差不多了。

那么，一个谨慎的西方投资者应该如何开发中国的经济呢？

你若是想在中国做生意，就应该找个中国公司为你在中国经营。比如说，假设某公司宣布打算直接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那我很可能想卖空它的股票；但是假设它同一个已经在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一个海外华人的公司挂上钩，比如说是一个在泰国或新加坡的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那我可能很乐意购买这家公司或是那家海外华人公司的股票。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机场的时候，很担心摩托车没上得了飞机。我们问能否到货舱里看一下。回答是：当然可以，没问题。

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肯尼迪机场，进货舱里看一眼会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得花上17位官员17个小时的时间来解决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求。两辆车都在那儿，原封未动，跟塔贝莎绑完之后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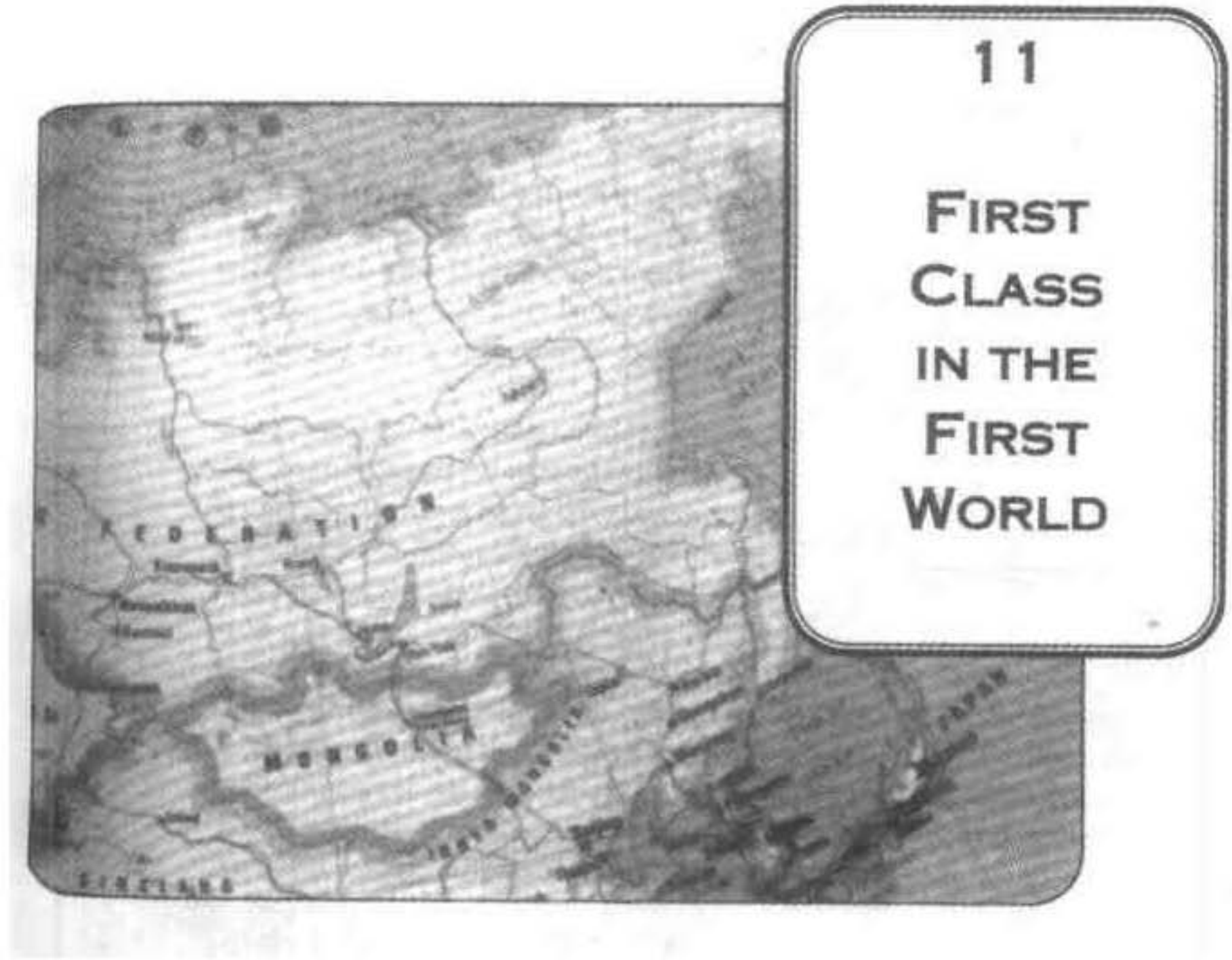
飞机起飞了，我们离开了人口最多的中国，飞往金钱最多的日本。


Visas
Departures/Sorties
Entries/Entrées
T.C. EDİRNE
GİRİŞ
14 IV 90 08
KAPIKULE
KAPISI
T.C. EDİRNE
ÇIKIŞ
14 IV 90 08
KAPIKULE
KAPISI
TÜRKİYE
CUMHURİYETİ
2 1 SEP 1990
30 MAR 1990

PART II

TOKYO TO DUNQUIN





11. 第一世界的第一流

FIRST CLASS IN THE FIRST WORLD

我们在成田机场把海关折腾得不轻。两个美国公民，骑着德国摩托车，从北京飞抵东京。这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一点。

我们在这儿可以多用些英文、少加点比划地把意思讲清楚了，不过，海关官员没有处理过境驾照这种文本的经验。这

相当于我们在英国的一个保险公司交的保证金，保证我们不会在中途经过的国家中把车卖掉。幸好我们在伦敦时就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防备，特意索要了日本汽车协会一位熟悉这种文本的官员的名字。海关的官员同他通了话，这才填好了表。

这儿同中国是多么不同！在那儿大多数请求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没有的意思可能是说“今天没有”，或者是“没有给外国人的”，也可能是说“以后可能会有”，或者“不行，因为是休息时间”，还可能是说“我不知道，别问我”。而日本人满足一切要求，不管他们能否做到，都会给你一句似是而非的“嗨”。

当时的时间是下午5点。我肯定海关的官员会说要下班了，明天又是周末，星期二再来吧。然而，这些工作人员一直工作到把我们的手续办完，尽管他们为此加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班。他们给我们开具了一张加班费的账单，我很乐意地付了钱，问题就此顺利解决了。要是哪儿的边境工作人员都能有他们这种“可以做到”的态度就好了！这是日本之所以发达的原因之一。

我跟塔贝莎高兴得合不拢嘴，径直驶往位于东京闹市区内皇宫对面的皇家大饭店。我们一直把车开到了门前——泥迹斑斑的，后面挂着备用胎，前面的减阻罩也裂了——并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推开房门，我俩顿时心花怒放，对眼前的豪华设施既感到欣喜若狂，又恍如梦中。

一路上需要我们对付的问题层出不穷：怎么过下一个边境？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的？在哪儿过夜？下个镇子能不能加上油？能不能买到轮胎？以及种种此类的后勤事务。尽管

那些偏远的小地方提供的栖身之地常常令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不过还不至于每天早晨醒来对于自己置身的新地方感到毛骨悚然。然而现在场景转换到了这样一个第一世界的一流饭店里，我们松弛了下来，开始回味我们已做了些什么。

“上帝，”我说，“我们骑着摩托穿越了中国的沙漠。”

“中国的全部，”塔贝莎面带微笑，很得意地说，“从大西洋一直骑到太平洋。”

《吉尼斯世界大全》上还没有过这样的陆路旅行的记载。

“你是世界上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女士，”我说，“这令我们俩都深感自豪。”

我希望成功的喜悦和未知世界的刺激能够重新激起她继续旅行下去的热情，因为几天前她还在嘟囔着不知道是否还想走下去，也许打算从东京飞回纽约了。她的车还是毛病不断，赶路也赶得身心疲惫了。不过我什么也没说，我想最好还是先休息几天再讨论这件事。

我们两个都惊讶于日本的不同凡响，不仅跟中国相比，而且跟世界上差不多任何地方相比，它都是鹤立鸡群的——这里的路是这么漂亮，一切都这么井然有序，公园和建筑都是这么一尘不染。不像在纽约、罗马或是伦敦的街头骑车，总有一些地方让你感觉是在第三世界。日本就像是由一位很坚强，一丝不苟的船长驾驭着的一艘船。

我们把车子送到了当地的宝马维修点，让他们把我们的旧轮胎都换成新的。他们还会给我换一个化油器，并给塔贝莎的车大修一下

早在1990年1月，我就曾在《伯龙》上预言过日本的股市至少会下跌50%　一位当地的财经记者在日本碰到我，想要知道我对当前情形的看法。那时的上市指数已经从40000跌到了29000　还会再往下跌吗？是不是该大笔买入了？

一两天前，我曾在当地报纸的头版上读到东京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平均价格的指数，这跟美国报纸上刊登的道—琼斯指数是一样的意思。它已经涨到了100万美金。100万美金人一个高尔夫俱乐部！这在我听来纯属投机者搞的把戏，是没有真实价值在内的财经过热，而且是过热到了极点。

当你看到像这么不正常的价值时，就应该站到一边，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要再做了，好好想想。也许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失去了理智。在1929年的股市上你可能看到了同样亢进的反常现象。在现实中，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不可能值100万美元。

我认为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都得往下跌，因为很显然入市的人对下跌都感到不疼不痒。除了高尔夫会员的天文数字，日本的房地产价也高得惊人。据说皇宫所在的那块地皮比整个一个佛罗里达州还要贵。另外，我还听说日本银行正在紧缩银根。它已宣布打算制止投机生意过热。日本中央银行的发话就像德国的联邦银行一样是掷地有声、毫不含糊的。它说到做到、不兜圈子。然而日本股市上的人只知道牛市，他们不知道行情会变，他们对股票的所有理解就是它会上涨。然而现实世界并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可他们听不进我的话。

这让我联想到他们到时该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日本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主要得益于他们过去多年来积累下的大数额贸易顺差。战后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

国，都是靠挣像美元这样的硬通货发展起来的。就像当今的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中，你拥有的美元、马克或是日元越多，就越富有。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人提出“怎样才能搞来硬通货呢？”这一问题，答案是靠出口。你给那些有硬通货的人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就会付一些硬通货给你。他们认识到外国人需要的是品质优良的东西。于是他们逼着工人提高质量，因为他们急需得到硬通货。他们的国家处于困顿之中，拿本国的货币什么也买不到，因为这些钱没有什么价值，在他们的国家以外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外汇储备。

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像每当有人发现了金矿，随后即会掀起一阵淘金的狂潮一样。是在加利福尼亚吗？咱们快去淘吧，这种机遇可能真是一座金矿，但也可能是华尔街的牛市，可能是得克萨斯的油田，也可能是西安的旅游业，或许是一大笔硬通货，只要被勤劳的人发现了契机，就会一拥而上。

日本的出口狂潮就是这样开始的。并非有一位什么人物居心叵测地说：“好吧，同志们，让我们开始大量出口，挤掉美国的生意，重新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说小日本谁的东西都仿造。不是的，他们只是看准市场上需求什么。他们发现人人都在买电视，于是就要求自己制造出的电视机更物美价廉，否则就没有人会买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呢？在他们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准的 1957—1970 年间，他们的经济每年以 10% 的速度递增，是我们的好几倍。到 1980 年，他们的汽车产量已超过我国，到 1986 年则已占我国进口车的 1/4。

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态度是多么地截然不同！我们的政府说：“让美元贬值好了，我们生产的成本会降低，会薄利多销，

因为我们的汽车会比他们便宜。”这种政策只能产生短期效益，在历史上，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成为过长久之计，靠价格优势只能维持少量市场。

为什么这招不行呢？比如雪佛莱和丰田车吧，差不多都卖1万美金，车的性能也差不多。假如美元贬值了30%，雪佛莱还卖1万美金，而丰田卖到了1.3万。乍一看，是件好事，美国汽车工人的工作最终会有所保障。要是让日本车在我们的市场上卖不动，怎么会对我们有害处呢？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况却是，在贬值的保护伞下，雪佛莱、福特和普利茅斯都会涨价，比如涨到1.15万美金，因为现在很容易以比外国竞争者低的价位来销售。

有人说只要这样做能保证我们的工人不失业就是值得的，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街角上的那个干洗商为他的雪佛莱多付了15%——他的每一位顾客也都一样——所以他感到必须抬高价钱来显示这一涨价。他和他的顾客们都必须对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多付30%，钯也好，钛也好，钴也好，铬或是锡，咖啡或是可可——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把这些都加到由贬值带来的国内涨价上，这种表面看来不需任何代价的收益要不了一两年也就不存在了。

另外，靠低价位销售时就会疏于创新，不重视提高质量了。你的产品同竞争对手相比就会变得相对劣质。你还会变胖、变懒、变得马虎。然后通货膨胀就开始了。雪佛莱的价钱直线上升，直涨到1.3万甚至1.4万美金。丰田卖的价钱要低一些，于是雪佛莱失去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当这种状况不断重复时，这个国家的财政喉管就被套上了绞索，而且从此很难摆脱。成本一上去，只能再贬值。贬值造成了一种无休无

止的恶性循环。要是这个方法灵验的话，那意大利的经济就不会停滞不前，政治就不会那么腐败，通货膨胀就不会那么频繁。而扎伊尔这个世界上经济最瘫痪的国家，就会成为一个效率最高的生产国。从购买力来讲，扎伊尔的货币贬值得一塌糊涂，因为没人想要。

因此，正当我国政府反复在讲"我们靠低价位销售"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没人赞同这是什么长久的良策。英国人为他们的贬值寻找的借口是他们需要靠这个赢得时间，而如今他们争取时间已经几十年了。30 年前，1 英镑可以兑换 11 个德国马克，而如今连两个半都买不到了。假如英国人就此执迷不悟下去，再过 30 年，1 马克该换 11 个英镑了。

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把花销控制在税收所得之内；二是借贷以抵赤字；三是印制钞票。国际市场拒绝向扎伊尔借款，迫使它通过贬值其货币来支付，因此他们的货币变得一文不值。假如我们不采取措施，预算赤字居高不下，一味只知高筑债台的话，国际市场也会这样地对待美国的。对于联邦政府制造的财政混乱，治理得越晚，乱子就越大。

目前我们以 7 倍的系数高居世界债务国之首。不错，如果我们现在采取措施拨乱反正，会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那些在政府里占据清闲的高薪职位者会受到损失。然而，假如此时不采取行动，等到我们的欠债赶上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之和的时候——也许这会发生在 1999 年——将会比现在还要痛苦百倍，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就在于此。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制定极其严厉的规章制度，那种只有真正敢对世界发号施令的人才有胆略做出的规章。

何为规章？一个国家必须学会竞争，学会创新。必须降低成本。录音机的生产商要勇于把别国的产品拿过来说："好吧，我们再作些新的改进和点缀。要让它像德国产的一样好用，而且还更便宜。"

政府该如何进行管理呢？英国政府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不印那么多钱，也许可以维持收支平衡。这样做本来会使英镑保值，使国家更有竞争力，制造出更好的产品，更加勇于创新。政府和人民应该面对痛苦去承受它。是的，价格也许会很高；也许会导致失业，甚至导致大批人员失业。也许会制造一些贫困，但它能够使英国人民走上正轨，就像法国和智利所做的那样。

70年代，考拉汉任英国首相的时候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英国若想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立稳脚跟，亟需发展半导体工业。同一任政府又否决了在英国建立硅谷的建议，因为这样会产生太多的百万富翁，而他们的哲学是反对人民致富的。就像70年代的英国，以及当前的意大利所认识到的那样，国际货币和证券市场最后会说："好吧，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一切都结束了。"有朝一日，国际市场也会拒绝购买美元和美国的债券的。你能责怪它吗？你会购买定价过高的债券和货币吗？

不幸的是，往往要通过战争、极度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或其他一些严重的灾难把老百姓弄得一贫如洗之后，才能使人们置于死地而后生。不管怎么说，德国和日本都是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才走上这条路的。南美是由于长达70年的经营不善。一般来说，政治家们都不能，也不会贯穿始终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奇怪的是，法国却始终遵循了这一路线。在战后长达30～35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在降低货币的价值、抬高物价。他们把银行及许多大型企业国有化，他们实施物价管制来限制牟取暴利，并对百万富翁大征税赋，不仅针对他们的收入，还有他们的财产。“我们还打算放松银根”，他们说，“这会给我们带来繁荣和好时光。”当然，这条路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效果。当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得到恢复时，法国仍停滞不前。不仅失业率上升了，而且法郎不断贬值。

1983年，密特朗领导下的社会党率先宣布：“我们要改变这一政策，因为它行之无效。我们要做的是同联邦银行建立联系。”这指的是德国的中央银行，其以货币制度和要求保持货币坚挺的章程而著名。“我们将削减税收，鼓励投资，降低通货膨胀率，使我们的产品具有高品质和竞争力。我们将着眼于长远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令我吃惊的是，法国做到了需要做的一切。他们不为所付出的代价所动摇，坚守着这条路线。虽然总是收缩银根会令法国商人对资金成本忍无可忍，会提高失业率，而这意味着选民们就不会都那么高兴了，但这会迫使法国人提高其竞争意识，使他们愿意为挣到合理的工资而努力工作，这是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他们的经济会更有成效。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将倒闭、合并或转业。法国人学会了创新，学会了开拓国外市场。

法国政府从50年代开始不断有人员变更。人民最终认为他们只有吞下这枚苦果，面对痛苦，重新开始——清醒过来——如果他们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的话。对于一个陷于经济困境的政府来说，印制钞票和膨胀经济的方法就像喝了半天酒以后再续上第五杯威士忌一样具有吸引力，但却永远是

于事无补。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渡过困境、使它的货币重新坚挺起来时，后悔当年没多印些钞票，而一个酒鬼在戒酒10年后却可能还后悔当初没喝个烂醉。

其实，目前法国的经济比德国的状态要好一些：通货膨胀率低一点，贸易顺逆差额更平衡一些，什么情况都略胜一筹。他们走出困境已很长时间了，但市场还是不信任他们，因为人们的脑海中还留有这样的记忆："这是谁在想欺骗我们？我们了解法国人已经100年了，他们总是屈从，很虚弱，脂粉气十足。"希特勒这样认为，凯撒·威廉也这样认为。法郎在货币市场上要承受阶段性的压力，直到法国让大家信服，他们是真心实意，确实打算做交易的，就像德国人、荷兰人和智利人一样。

把金本位作为一种加强货币秩序的手段好不好呢？我们能不能、应不应该回到金本位？根据它的规定，你可以用一定数量的纸币换取一盎司黄金。这是一种令政府诚实的方法，要求他们保持一套资金殷实的国库账目。反对金本位做法的人有几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其中一条是世界各国不应当讨好两个最大的产金国——俄罗斯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有潜在的波动性。即便它们是平稳的，又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么大的优越性呢？

我对金本位的看法是双重性的：第一，它也许有一定作用。回到金本位会加重对政治家的约束，最终会导致经济困难。当这种困难太大时，政治家们就会归罪于黄金并废除金本位，就像他们一向做的那样。早在1973年，当遵守金本位的规则带来的困难超出了政治家们的承受能力时，尼克松就

把濒于崩溃的金本位根本废除了；第二，它也许并不管用，也就是说，政治家们能够找到篡改、捏造、避免或降低它的规则的方法来自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罗马帝国后期制造的金币，其含金量就小于它经济强大的早期。任何一种由政治家采纳的金本位制度都很有可能是不健全的，而我们大家却都被愚弄了，还以为它很可靠呢。等骗局败露，真相大白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都已太晚了。

有一种简单易行、成本很低的方法可以解决金本位以及它在制约金钱方面存在的所有问题——取消对黄金的资本收益税。由于黄金一经使用就要追加巨额的资本收益税，现在已不可能用黄金进行交易，或者把它与交易指数挂钩了（除了纸币，任何别的指数都不能同黄金挂钩了）。取消资本收益税，就会以财源赢得人们的选票，这其实也正是金本位的全部意义所在。也就是说，每当政治家使货币贬值时，越来越多的人会转用黄金。随着黄金使用的增加，政府政策的破产就会暴露无遗，甚至连大街上的老百姓对此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他们就会坚持要求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进行交易了。

不用说，对一切可兑换黄金的财产免征资本收益税会是一个更好的方法。那样，每当政府使货币贬值时，市场就会转用金、银、钻石、金币、木材，或是他们认为合适的各种媒介来完成交易。而现在我们被排除在一切选择之外，因为除了政府垄断的纸币，什么都要征资本收益税。

这位日本记者没有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那儿哪一种金融资产被低估了价值。当时的答案是——现在仍然是——日本期货交易所的会员资格。

正如大家所知，日本的商品市场多年来始终是封闭于外界的，因此，他们的商品交易量较小，很不发达。他们基本上只做本地丝绸和稻米买卖，只相当于美国 50 年前的水平。我把这种政府的干预归为中央集权的表现。也就是说，政治家保护了本国的农业部门，迫使他们的公民以高于世界 6 倍的价格购买稻米。农民种稻对土地的占用，使所有土地每亩的价格都高得离谱。惊人的地价把大家都拒之城外，只能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

不过，现在日本正被迫向国外的工业产品和商品开放其市场。他们已仿效了国外的一些交易模式，为他们的股市和日元证券市场订立了一个指数期货契约。开放财政市场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外国人购买他们证券交易所的席位。

投资者如何赚到钱呢？聪明的话就该买日本商品交易市场的会员资格。第一，这非常之便宜；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易在日本进行，其价格会猛涨。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已卖到了 600 万美元，而商品交易市场的会员价只抵其一小部分。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价格在美国的情况：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卖到 50 万美元以上，期货交易市场的价钱也与此不相上下。购买这样一个席位，是一条进入这些市场的廉价途径。地区性的商品市场会继续发展，并会进一步并入全球市场。再过一两年，每一种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小时都在进行着买卖，到那个时候，这些席位的价格就会直线上升。

购买这些席位符合我投资的两大基本原则。第一，我们已找到了某种廉价的东西；第二，强有力的涨势即将发生。这些原则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了，但却是成功投资的诀窍，是对准

确判断的报答。低价出现的时候大多数的投资者都能看到机会，困难的是看到它在不久的将来将呈涨势。在这一点上就体现出分析市场及其历史的重要性。在我教金融课的时候，总是训练学生们通过研习他们所能了解到的有关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所有情况，去做出他们自己的预测。从哪些情况中可以看出 1929 年的纽约市场会崩溃？你怎么能够判断出美国南北战争后，曼哈顿的房地产价格会直线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蒙哥马利·沃德作出的预测是经济会衰退，于是偃旗息鼓，撤出了资金，而西尔斯·罗巴克正确地预测出经济会飞速发展，因此在股市上大发利市。投资者靠什么判断押哪个公司的宝？

不错，也许我的时机掌握得不好。我通常出击过早。由于我从来不是个出色的贸易商，不是那种会不失时机地大进大出的主儿，我总是放长线钓大鱼。

日本的期货市场席位就是这样的投资机会，投资者可以把它握在手上 5 年、10 年、15 年，赚取其首期投入的 10 倍、20 倍甚至 40 倍的利润。

这项投资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东京又是座如此生机勃勃、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投资机会的城市，令我和塔贝莎都很动心在旅行结束后搬到这儿来居住。

这并不是说日本就完美无缺，不存在问题了。

虽然在美国报纸上总能读到对他们大吹大擂的宣传，但年轻一代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努力工作了。当今这代像蚂蚁或蜜蜂一样辛勤劳作的日本人，他们的子女已不会有像父母一样大的牺牲精神了。已创造出的财富到了第二代人手里

从来都是这样，再传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继承下来的传统就所剩无几了。

直到近些年来，迅速膨胀的人口增长对日本还是有好处的。到80年代中期，年增长率就降到了0.6%的历史最低水平，而今天才抵那个数字的一半。与此相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是日本的2倍；韩国是他们的3倍。日本大批劳动力老龄化，到本世纪末，将有相当一大批人到达退休年龄。到那个时候，劳动力和退休者的比例将呈负增长，这将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

除此之外，日本人还缺少自然资源，这对一个依靠工业生产的国家来说是个相当大的问题。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足够大的能源基地，除非他们能买到一个，否则要么占领一个，而这个方法他们在30年代已经试过了，不太可行；要么就是最终衰落，看起来这个似乎更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或许还有一个21世纪的战略对他们可行，中国因人口众多也需要资源，他们劳动力富裕而资金匮乏。西伯利亚拥有土地和资源，但缺乏劳动力和金钱，而日本有的是资金，缺的是资源和劳动力。我能想象出把日本的资金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去开发西伯利亚广袤的资源，从而创造出惊人的财富。

我们在日本行驶时感到过一次地震；后来知道是里氏4.5级的。我很吃惊。我还以为什么样的地震都会是日本的末日，但发现其实地震在这儿时有发生。每50～100年才会有一次毁灭一切的大地震。

在日本逗留的时间渐近尾声。我不得不同塔贝莎讨论一

下她的计划了。

“你还想去吗?”我问她。

“我走够了,”她说,“西伯利亚会比中国更难走的。”

我得说她说得没错。没有任何人对骑车穿行西伯利亚说过一句好话。

“可没有你就不一样了,”我说,“我想让你跟我在一起。”

她笑了,说:“吉姆,你不需要任何人。”

“我需要你,”我说,然后用开玩笑的口吻缓和一下气氛:“那谁给我修车呢?谁陪我呢?过边境时谁用北欧人的漂亮脸蛋儿对付那些大兵呢?他们可能会把我投进监狱的。”

“我讨厌我的车,”她说,“整天得听着它的机器声,生怕它突然又出毛病。”我也记得在那些寒冷的早晨,她要踹上一二十次才能打着火。

“你的车?”我说,心中燃起一线希望。“就因为这个?走,我们去宝马经销店,去买一辆你喜欢的新车。”

“买辆新车?”

“喜欢哪辆就买哪辆。”什么都行。的确,没有她我也能奋然前行,但我会想念她,想念她的沉稳还有修车技术。我们是一对好搭档。每当我对边境那帮人的官僚气忍无可忍、想大发脾气来硬的时,她总会跟他们来软的,说些好话就过去了。不过,这招也许我还能学得来」我学不来的,并且会很想念的是她的智慧,她的兴奋,我们在一起的欢笑,还有我们默契的配合。她是我认识的所有女人中最适合探险的,最能同逆境作斗争的。比这一切更难能可贵的是,我是一个很难一起相处的人,而她能理解我、宽容我。我发现她在各方面都是我最理想的伴侣。

她犹豫了。她已经开始爱上了骑摩托车，能有一辆新车对哪个车手来说都是个激动人心的诱惑。“我可以去看看，”她并不松口地说，“但是我不保证。”就在给我的车大修的那个店，她看上了一辆宝马 R-80。

跨在新的座骑上，手握车把，呼吸着新车那种令人沉醉的气味，对电子打火爱不释手的她终于向我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天哪，你说服我了。”

我也向她报以微笑。没过一会儿，她同意留下了 我们把她的旧车运回了美国。

这辆新车一下子把她的情绪提了起来。我们兴奋之下，一气买了许多旅行用品，都是在中国看不到的，而且在西伯利亚怕也不会见到：刹车油、牙膏、针织衣、剃须刀、缆绳、刹车片，还有一大堆螺丝、螺母、螺栓。在世界上荒僻的地方旅行，必须要有预见性。我们还买了新的头盔，以及为骑手们准备的小帐篷和睡袋。

在这个第一世界作了短暂的逗留之后，我们又踏上了征程，这一次是前往地球上最荒远的西伯利亚。

到现在为止，日本海对岸的那些西伯利亚城市还只是地图上的一些名字：纳霍德卡，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我们两个都很兴奋，当然也感到有些担心。我们将住在什么地方呢？会不会经常需要露营在外呢？没油的时候还会找到黑市吗？那儿的俄罗斯人会对美国人有什么看法呢？还有在纽约的俄罗斯人谈到的老虎，它们会袭击我们吗？我们会有生命危险吗？

12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12. 在世界的边缘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redacted]们降落在距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东几英里的新城纳霍德卡，这里是俄罗斯的海军基地，因此对外国人是不开放的。纳霍德卡在二战前还是个小村庄，如今已是一个重要的捕鱼港，整座城市很暗淡，海湾处在一片灰蒙蒙的公寓楼群的包围中。在这儿很容易让人感到是待在月球上或是世界的边缘，

说不准走到哪儿就会掉进一个无底的深渊。

西伯利亚海关的官员搞不清过境驾照是什么东西，于是干脆递给我们一张盖了章的纸，根本没在护照上做任何标记。我很吃惊他们管得这么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免税的摩托车在这儿卖掉，赚一大笔钱，我们并无意这样做，但这是多数其他边关有意提防禁止的。当然这也说明了经过这儿的车辆有多么的少。

到了饭店，我们问可以把车放哪儿，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停车场或是车棚什么的。警察局的人告诉我们可以停在隔壁。于是我们把车锁在一个木栅栏后面，并且像往常一样在轮子上加了链子锁，还盖上了防雨布。遮盖着的摩托车不会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容易激起旁人的好奇心，看着就非要上来摆弄摆弄不可。

除了锁着的车上带有两个备用胎之外，我们另外还有两个备用胎和一个轮辋。饭店的管理人员建议我们，为安全起见，把这些存放在大堂有挂锁的脚柜里。

一切停当，我们步行出发，满怀激动地去探索这个新世界。

纳霍德克之所以给人留下另一个世界的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街道上缺少人流和商店。我以前也到过这种隐秘的处于停滞状态的港口（包括远在亚拉巴马的）。莫比尔港早就过了昔日鼎盛繁忙的时期，但跟这儿的那些生锈破旧的设备相比，可以算是状态良好的典范了。这儿的码头上没有保安人员，货物堆放得乱七八糟，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顺手拿走什么东西。死气沉沉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甚至市中心也见不到几

个人。令我们吃惊的是，这座有着17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只有不到20个商店，都是分门别类的专业商店，而多数像这么大的城市里各种各样的小商店怎么也有几百个。这里只有一个童装店、一个杂货店、一个汽配商店、一个五金店。话又说回来了，干嘛需要两个呢，同志？那就是浪费。只有烤面包店除外，天天有刚出炉的又便宜又好吃的面包，其他商店则令我们目瞪口呆——空空如也，既没有货物也没有顾客。

五金商店的货架上只有几个螺母螺帽、螺栓和铰链。小卖部里炫耀地摆着100桶4升装的桦树汁，这是一种味道类似苹果汁和葡萄汁掺在一起的一种饮料，还有几罐国产炼乳、几袋面粉，再就没什么别的了。把那个卖汽车零件的叫做汽配商店就更是徒有虚名了，里面只摆着一两个轮胎，一个摩托车喇叭和几个后视镜。

人们到哪儿买他们需要的东西呢？我们不禁自问。

我们路过了一个小银行，不过看起来门庭冷落，生意清淡。我按自己的老规矩换了几块美金，为的是弄到卢布的真钞作样本，还有银行的收据，好给官方看我们是守规矩的，但同时却在睁大眼睛寻找换汇的黑市——那个真正的市场。

由于我一直通过寄明信片同家人保持联系，随时通报我的行踪，因此在饭店和那些黑洞一样的商店里，我到处打听有没有明信片卖。结果，不仅明信片不存在，而且也压根没有文具店，甚至连能买一支笔或一叠纸的地方都没有。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才得知也许邮局里能买到。虽然我实在觉得莫名其妙，但也庆幸自己有远见，多带了几支圆珠笔，于是我开始找邮局。

这里的邮局不像爱尔兰邮局或是老家亚拉巴马的乡村邮

局那么让人愿意接近。它看起来跟所有的政府建筑都一个样，水泥地，光线很暗，三四个职员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屋里灰暗的墙壁上挂着一两幅列宁和戈尔巴乔夫表情严肃的肖像。好在还摆着出售的几样东西，而且有一样确实是明信片。明信片上面什么图画也没有，纸本身看起来也像是又薄又脆的标签纸，不过这总算是张明信片。

顾客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很纳闷。不过马上就明白了，这儿没有多少人需要来邮局。他们的账单不通过邮寄，付账也不通过邮寄，当然也没有那些免费的广告宣传品。来邮局的唯一原因是给什么人寄信或是接到来信，不过这儿的纸不富裕，俄罗斯人通常发电报联系，又快又可靠。电报通讯和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是连接老百姓生活的唯一可以运作的系统，而且都是在沙皇时期修建的

摆在柜台上的商品除了明信片还有邮票和信封。我相信在俄罗斯，邮局是唯一能够买到信封的地方。

我站在柜台边微笑着，指了指摆着的明信片，然后竖起三个手指头。女售货员茫然地看着我。我又向她笑了笑，把一张 10 卢布的钞票放在柜台上。我把手指头又往高处举了举，另一只手敲了敲柜台玻璃，点着下面的明信片。“三个。”我说得很慢，希望能把数字这种空洞的概念灌输给她。她皱着眉，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又用手势加上形体比划，这下她干脆退后一步，好像我比划的是一种令人羞耻的性行为。我反反复复把这哑谜打了足有十遍，她还是不懂我要什么。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就是理解不了，最后我找到了经理弗德罗夫先生，他微笑着点点头，说我是想给澳大利亚发一封信。

“不，是—美—国。”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她最后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不过为买三张明信片竟花了15分钟的时间，我想我最好多买几张。纳霍德卡并不是外国人通行的港口中最边远的，要是在这儿搞到张明信片都这么难，再往深里走会是什么样呢？

于是我买了一打。出来的时候我开始明白聪明的俄国消费者是怎么做的了。当他们有机会买到一样东西时，他们就尽可能地多买，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买到。苏联可以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开发出宏伟的太空计划，但却在制造和销售明信片和牙膏上败下阵来。

我开始明白了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这一打明信片一共花了我6分钱，还包括寄往国内任何地方的邮资，有可能是在7000英里以外的什么地方。面包店里有充足的供应，价钱是如此之低，3个戈比——相当于还不到1美分的十分之一——农民拿它喂猪，孩子们把面包当球踢着玩。

苏联的面包50年都没有涨过价！

听起来很好，对消费者来说太棒了——房租很低，几个戈比就可以买到明信片，面包那么便宜，还有桦树汁和铰链。但另一方面，他们除了面包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消费品。就算他们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就算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帝国，国家的法令也无法推翻供求的法则。也就是说，这种压低价格的做法，使每一个人，包括国家和政党，都失去了生产和销售每一种产品的动机。当每制造出一副铰链或一双袜子都赔钱的时候，还可能有什么动机去做这些呢？

这个社会用立法规定了一种叫做"投机"的罪行，即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以高于其支付的价钱出售任何东西的行为。我想即便是一所西方大学中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教授也不会

相信，任何一个经济单位能够在不为费用、也不为利润而改变方针策略的情况下生存下来。不，这里真正存在的罪行是对人性的歪曲，是贫穷，是困顿，是劣质的商品和机会的匮乏。这里进行的是20世纪中央集权制所做的最大的一次试验——一次拿2.9亿人民的生活所做的试验——而结果是何等的失败！

走到现在，我们手里的地图已经小有所集，德语的、法语的和俄语的都有。当我们坐下来筹划去莫斯科的路线时——离这儿有6000英里的路程——我才发现签证上列着的那些城市名虽然都用那种通用的小圆圈标识着，地图上却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

少的是连接这些城市间的道路。

在西边，莫斯科周围，有许多红色的、棕色的和黄色的线标识着道路。从这儿到俄木斯克的4000英里路途中，却没有连接的道路，没有红的、黄的、白的公路线，连断断续续的也没有。铁路线标得很清楚，但没有公路。

“也许那儿根本就没有路。”塔贝莎说，向我投来一丝怀疑的目光。

“得了吧，”我说，“他们只不过没去那儿勘测罢了。你忘了西伯利亚有多么大。要跑遍西伯利亚测绘地图得花多少钱。再说，德国和法国的测绘者可能也进不来。”

“那俄国的测绘者呢？他们也进不来吗？”她说。

我没理会她的幽默，开始四处打听。问到的人们托着下巴，眼睛投向远方，一副茫然的神色。有的很肯定去伯力有路，这是往西走的下一个重镇，但是过了那儿，再往赤塔和乌兰—乌德有没有路就连他们也不知道了。

“这些城市间总得有路的。”我对塔贝莎说。她狐疑的眼光更加深了。“你怎么能这么肯定?”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理由,只是觉得,有谁听说过一个国家里相距几百英里的大城市之间没有道路相连的?这不合逻辑。我在旅行中早就发现,当地人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旅行不比外国旅游者知道得多。纽约人能告诉你去堪萨斯怎么走,去那儿的路又是什么样的吗?蒙大拿州又有谁能告诉你怎么去亚拉巴马的伯明翰呢?在俄国,当地人对这些知道得就更少了,因为俄国人不旅游。假如你的亲戚从不搬走,买东西最远也就去一两百英里外的地方,干嘛要出远门呢?

但是,尽管我打听的人对路线都不清楚,有一件事却确定无疑:不管路线怎么走,反正不会有柏油路存在。这倒没关系。我是在亚拉巴马的土路上长大的,而且从那以后,走过的土路也很多。我们在纳霍德卡碰到的一些码头工人通过其中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一年前才知道,外国人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合法的,而且可以随时回国,不必经过什么特殊许可。在苏联,政府一直告诉他们,倘若出了国就不能回来了,除非有特殊情况,他们还以为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呢。

当工人们发现世界跟政府告诉他们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一直被谎言蒙蔽了的时候异常愤怒。即便如此,苏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他们被先前遭受侵略的记忆所折磨,从700年前的蒙古人入侵,一直到拿破仑和希特勒。几十年来,他们的领袖一直处心积虑于捍卫那漫长又危机四伏的边境线,这促使他们不断地扩张越来越多的领土。就像几代俄国作家向我们描述的那样,俄国人从内心深处想要与众不同,想表现俄

罗斯人和斯拉夫人特有的那种野性、自由和忧郁。然而，它也渴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去拥有欧洲式的逻辑、秩序和文明。俄罗斯人在灵魂上是渴望自由和独创性的，但恰恰又害怕新的思想观念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因为俄罗斯和苏联都是靠很虚弱的纽带维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脑子中带着这一切去见码头的领导，这里所有人的头儿，他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官员，端坐在一幅列宁像下面，说一口漂亮的英语。

我问他为什么向码头工人说谎，告诉他工人的愤怒情绪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你干吗问我这些问题？”他反诘道，“我也像大家一样愤怒。不要以为是我们跟他们作对。我也受够了。从戈尔巴乔夫往下，我们都很愤怒。我跟码头上的那些工人一样。这儿的生活简直像场恶梦。”

这是1991年政变的前一年，军队也受够了，那个时候甚至都不愿接管这个破产的国家，有一点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根本不知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

“你是澳大利亚人吗？”在一个饭馆里一大群友好的俄罗斯人操着很重的口音问我们。

“不，美国人。”我说。

“没有好啤酒，是吗？”

“不，啤酒挺不错的。”我回答说，一边寻思着是不是翻译的时候漏掉了什么。我们在喝伏特加。

“对，附近不好。澳大利亚的好。别在附近待着。”

他有点含糊其辞。我问塔贝莎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澳大利亚的啤酒好但这儿的不好，”她说，“他想去别的地方。”

“他喝多了吗？”

“没有，只是想练练英语。”

等到第五个人跟我提到澳大利亚时，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一打听，我们才惊讶地得知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农场主和他的家人住在离这儿只有几英里的地方。

我们开车前去造访，果真有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农场主。罗伯特·索库原先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农场上做工，那儿条件很艰苦，他到这儿已经几个月了。他对在家乡发展感到前途暗淡，同所有地方的移民一样，离乡背井地跑到这里来想赚更多的钱。

他和他的妻子莱娜的祖父母都是从俄罗斯移民走的，他们是白俄罗斯人。他们双方的祖父母在二十年代移民到了中国，以逃脱斯大林的统治。当共产主义又席卷了中国大地时，他们又跑到了澳大利亚。尽管他们是俄国血统，但罗伯特和莱娜，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皮特和保罗，以及两个女儿安娜和亚历山大，讲起话来都是一口地道的澳大利亚味。

罗伯特大约40岁，莱娜比他小几岁。他们两人都说，虽然隔了两代人，但他们还是可以在俄国生活的。他们一个月的房租只有5个半卢布，差不多相当于1个美金，电费只要一半就够了。他们说很想念家乡的好路、好朋友和好啤酒。

俄国人分给罗伯特100公顷地，差不多相当于250亩。他打算用这些地养牛。他在这儿一下获得的财产比他一辈子在澳大利亚能挣到的还要多。他说俄罗斯驻澳大利亚使馆的人

试图打消他们这个念头，说他们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但他们坚持要来。有机会获得自己的土地总比挣一点微薄的薪水要好。他打算冒险一试，像所有的移民一样赌上一把。

有几家俄罗斯杂志不远千里地跑来采访他。不管怎么说，他是近50年来唯一一个移民到苏联的澳大利亚普通百姓。

他们给了他一套房子，但就跟这儿所有的房子一样，没有室内的抽水马桶，电力不发达，厨房也很简陋，只有自来水和烧木头和煤炭的炉子。差不多所有亚拉巴马靠收益分成生活的佃农过得都比这儿富足。莱娜有一点拘谨怕羞，沉默寡言，看起来她对于这次搬迁和他们新家园的粗陋还有些茫然失措。

他们19岁的儿子皮特不想同这个计划有任何瓜葛，于是报名参加了苏联海军。14岁的女儿安娜对此更无热情。当然，14岁是个对什么都不满的年纪，但这里的生活没有音乐，没有摇滚，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没有明星的照片，没有苏打水，什么也没有。

8岁的亚历山大对此事态度不明朗，5岁的保罗很高兴有一辆自行车，其他的孩子都跑过来玩，因为他们没有。莱娜每天陪安娜和亚历山大去上学，因为课程都是用俄语教授，他们还听不太懂。

莱娜用桦树汁和蔬菜来招待我们，这是她能拿得出来的所有东西。罗伯特说他想盖一个像样的房子，但又想到没有一个贮木场，这几乎办不到。“我到处去搞材料——木材，水泥，钉子。”他说。俄罗斯人要是有什么东西一般都送给他用，他们愿意能给这个外来户帮上点忙。“我忙活了几个星期想

搞点沙子给那条破土路铺上，”他说，“我把话放出去，于是隔三差五地就会有卡车出现，卸下一车沙子。我买不起，他们也不要钱。”

苏联人答应再给他100公顷地，但规定得很明确，不管他耕作得多么辛苦，两块地都不允许卖给别人。他可以把农场传给孩子。当然，谁也不知道30年以后他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下。我记得在苏联曾有过一场很大的争论。“是的，我们想私有化，”他们会说，“但这就是给人民土地吗？那样他们不就变成投机者了吗？”多数农民会说：“我们对你说的那个承租30年不感兴趣。我提高了土地的产量，你再把它收回去？不，谢谢。”

我觉得在这儿养牛是个荒唐之极的念头，不过也许他会成功的。假如他能熬上20年或30年，也许会成为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养牛大王。但愿如此，看在他家人的份上。

当我们准备离开纳霍德克，打开饭店大堂的脚柜门时，发现我们的轮辋和备胎都被人偷了。我断定是大堂接待保瑞斯拿走了它们，可他只是耸耸肩。

“他们要宝马的轮胎干什么？”我问塔贝莎。

“你去商店看过了，”她说，“他们干嘛不要？”

她说得对。如果我仔细找的话，也许会发现我的宝马轮胎正在某人自制的手推车上，或是正摆在什么人的客厅里，当作一样很有异国情调的身份的象征呢。感谢上帝！我们幸好把车放在了警察局的院子里，我决定在去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时继续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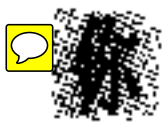
幸好在日本时，我在给我的车大修的那个宝马专营店里

开了一个账户，打了不知多少个电话才联系上。买明信片要跟这份着急幼儿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总算定上了备用的轮辋和轮胎，从日本直接运到伯力，我们预计几天后到达那儿。

我们就这样开始踏上了穿过"塔戈"前往莫斯科的6000英里的路途。现在我知道"塔戈"是俄语的西伯利亚荒野的意思。这么早就把这么重要的配件弄丢了——我们还没离开港口城市呢——意味着一旦在塔戈的中央再出什么问题，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13. 穿越塔嘎旷野

ACROSS THE WILD TAYGA

 可以把整个美国大陆的版块放进西伯利亚而不会碰到它的一边一角，你还可以把阿拉斯加和欧洲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统统填充进那些边边角角，完了还可以有足够的地方再放进一个得克萨斯。

没有特殊情况，外国人是不许进入俄罗斯的某些战略城

市的。去伯力的最佳途径是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而那儿正是这样的不开放城市之一，因为那是海军基地。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大摇大摆地长驱直入，并未遭到任何军事警察的拦截。我猜想我们准是离莫斯科太远了，当地的警察部队才这么不警惕的。

那些人告诉我们的一点不假，通往伯力的柏油路很快就变成了沙砾当道，布满了棒球一样大小的石头，几乎无法骑行。为了避免摔下来，我们只好放慢速度。在这么慢的速度下，轮子只要碰到一颗葡萄大小的卵石就会打滑，很容易脱把。驾车的过程就是不停地同道路作斗争的过程。每 50 或 75 英里塔贝莎就会摔下来一次，我也要停下来去扶她。我一路上倒没磕着碰着，但塔贝莎又想放弃了。

现在她大概已骑了 1 万英里的行程，但很少有骑手走过这么难走的路。那辆新车的诱惑使她改变了原本英明的决断，从日本跑到了这儿，而她的初衷并非如此。路况简直太糟糕了，剩下的几千英里路也太遥远了。摔了十几跤之后，塔贝莎一边用曲柄启动发动机，一边说，“真见鬼，我要回家了。”

“家！”

“等我们到了伯力，我就坐飞机回纽约。”

“会好起来的，”我说。

“你现在怎么能知道，吉姆·罗杰斯先生？”她愤愤地问。

“我们会习惯的。绝对不可能一路到莫斯科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可能？”

“嗳，就是不可能。这就像 19 世纪的美国西部。他们还没把路从莫斯科铺到这么远。”

“瞎说。”她把手一挥，指着我们身前和身后的石子路，说：“地图上就没有路，你瞧，真怪了，这就是没有路。地图上根本就没有去俄木斯克的路，而且我敢打赌，那儿也没有路。”

我知道一路上她吃尽了苦头，但没有她作伴我很不开心。

“你看，你说了要来的，”我说，“我需要你。我们在一起长了这么多见识。我们是搭档，我们会携手战胜困难的。”

“你说过这儿有路，可根本没有，这就像乘木筏走激流一样。我要回家了。”

“那好吧，”我说不过她了。“到了下一个机场我就送你坐飞机走。”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在棒球大小的石子路上继续一滑一扭地前行。

我们花了5天漫长的时间才从纳霍德克到达伯力，这5天里摔倒了爬起来，同车子较了5天劲。不过也不全是那么坏，远远不是，我们也没有整天开车。这里是开阔的旷野，空气纯净，鲜花盛开，纷飞的蒲公英时不时地飘过我们身边，就像一团团温暖的白雪去播种大地。在一个村子里，人们把塔贝莎当成了一个巡游的电影明星，人们盯着她的黄头发，崇拜地触摸着。他们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我们在西伯利亚就像第一位来到美国土著中的欧洲人一样被人视为异类。

塔贝莎在伯力没有改变主意。几天以后才有飞机走，因此她该做什么就成了问题。我同她辩论了一场，很生气，因为我想让她跟我一起走，而她想回家。像这样的旅行，令人激动的一部分就是有人分享。

“不，这儿的路太难走了，根本不是人走的。这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你要喜欢绕地球六圈我也不管。我要回家

了。”她在饭店里开了一个单间，表明她不是说着玩的。

我心烦意乱，于是决定出去走走，反省反省。

伯力是依山而建的，像是一个悬崖俯瞰着一条宽1英里左右的大河。我开始到处蹓跶。我开始理解要求自己作这样的一次旅行是在向什么进行挑战，我一开始估计得不足。不错，我知道有许多路段将很艰难，然而尽管我是一个有经验的骑手，并且去过许多落后的国家，但还是没有料到难走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会是这样。我仍然很有斗志，但也很能理解要战胜这些困难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恐怕就不行了。

我回想起了在华尔街的岁月，还有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日子。我教的不是那种贸易学校里通常所学的金融课，那种由教授们空想出来的理论，而他们跟真正的金钱发生的唯一关系就是每月的工资单。我教他们我所知道的东西，教他们按我投资的方法去投资，按我的思路去看市场和机会。这不是正宗的传统的理论，讲什么复杂的经济数学模式、股市和指数的导数。然而，我用我的这一套思维方式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保住了钱不会被赔掉。

假如你问1000个人他们是不是想变得富有，除了诗人和神秘主义者谁都会说是的。当你向他们解释致富需要什么时，可能这起先的998个人里有600个人会说：“没问题，我可以做到。”但当需要破釜沉舟时，需要他们牺牲生活中的一切时——妻子和孩子、社交生活，可能也包括精神生活和所有的乐趣——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几乎所有的人就会退缩了，最先的1000人里可能只有6个人会继续艰难的历程。大多数人都没有毅力专注于一个目标，5年，10年，……放弃一切事

情去实现这一目标，但这正是要成为一名奥林匹克冠军，一个世界一流的外科医生，或者是一个基洛夫的芭蕾舞女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当然，即便坚持了这么多年，还是有可能徒劳无功。也许你犯的一个错误就可以使这一切功亏一篑。它也许会毁掉17岁时那个甜美纯洁的你。有句老话说得对，你一辈子可以做任何事，就是不能做所有的事。培根所说的"妻儿是随时可能失去的"也是这个意思。假如你把他们放在第一位，也许就不会用3分半钟跑完1英里，就不会赚到第一笔1000万美金，就写不出轰动的小说，或是做不到骑摩托车周游世界。这些举动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

当然，不是我们中的所有人都相信这些人为之着迷、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好事。亚伯上校追赶莫比·迪克是明智之举吗？罗杰·班内斯特有必要打破1英里跑的4分大关吗？埃德蒙希勒瑞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有那么重要吗？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意献身的目标。亚伯驱使手下的人达到了他的目标，结果除一人生还，其他人都牺牲了。尽管在打赢战争之后，也许人们会满怀激情地缅怀他，但在战役中这位上校却因把他的人拿去送死而遭到仇恨。

也许听上去有些陈辞滥调，但我在华尔街工作时确实是全身心投入的，我对于这次旅行也是如此。我把自己置于一个过度的境地，我这一生做事的方式都是如此。我下定决心去做，而且要跟时间赛跑。什么也不能阻止我，或让我放慢脚步。

然而，塔贝莎是女朋友中我最钟爱的一个，而且有她的陪伴已经变得跟旅行本身一样重要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在乎过旅伴。

假如她愿意继续，我会更加尽力去适应她，给她以方便，但我不打算因为她不开心而放弃这次旅行。假如她受不了了，我可以理解。我会把她和她的新车送上回纽约的飞机，然后独自一个人继续我的旅程。那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有意思了——我会很孤单——但我要完成它。

黑市又发现了我这个目标，一个名叫阿历克斯的高大魁梧的"歹徒"想卖给我一些苏联军队的腰带扣、军帽和一些小玩艺，好换一点硬通货。阿历克斯很开朗，乐呵呵的，又很谨慎很警觉，具有典型的俄国人的特性。后来我们得知他曾蹲过监狱，听起来是个比美国监狱还要可怕的地方。在监狱里，所有的犯人睡在一间大棚屋里面，伙食少得可怜，只有稀粥，一天要在铁路上干 12 个小时的活。他犯的罪，据他自己说，是在工人中散布资本主义制度比共产主义制度好，这在我听来只是他为了取悦我这个西方客户而编的一派胡言。在我的再三盘问下，他说是因为伪造打工证明和考勤卡进的监狱。我想他一定是把在黑市上捞外快的时间登记在工作考勤上了。

他说我要什么他都能弄来——姑娘、烈性酒、各种违禁品——只要我付给他硬通货。我一向是个大无畏的旅者，一向渴望历险，于是就买了几个美金的小玩艺，并让他把非法制造伏特加的经营者介绍给我。

第二天我们在公园里撞上了阿历克斯，他碰巧带着几位应召女郎，都是些丰满壮实的 18 岁姑娘，除了年轻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人之处。尽管西方的宗教都对不加控制的自由恋爱和性放纵心有余悸，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似乎很轻易

地经历了70年的科学实用主义而继续存在了下来。

阿历克斯的眼睛放着光，把我拉到一边，劝我再买几枚俄国徽章。他现在向我透露了他的远大目标，就是在日本花50000日元或不超过300美金的价钱买一辆车、一辆旧车。“在日本这样的车没人要，是被人扔掉的东西。”他说。俄国允许他把这样的车免税带进来，然后他就可以把300美元变成6000卢布，或是说3500美元——这是条发财之路。

他需要硬通货来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卢布不行，因为日本人不要，唯一算数的金钱就是硬通货。阿历克斯说他做成一笔后还会再做。

塔贝莎偶然发现了一个妇女诊所，结识了那儿的医生娜塔莎·佐罗托夫，她向我们讲述了苏联人生活中更为隐秘的一些细节。

没有宗教加以的限制，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电视要比美国的还没看头，因此性生活成为苏联人的一项主要消遣。佐罗托夫大夫说人流手术和宫内避孕器就是这个国家仅有的两种避孕方式。诊所中常常缺少宫内避孕器，即便来了货，质量也不过关。主要靠做人流，俄罗斯妇女平均一生要做10～15次人流。因此，30%的妇女在做手术时需要做紧急子宫切除术，很显然，假如艾滋病侵入苏联的话，极有可能对其人口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我和塔贝莎又睡回到一间屋里，等待着从日本运来的轮胎和飞往纽约的班机。

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商店外聚着一大群纷纷攘

攘的人群，像是有什么大甩卖似的。

这是一家珠宝店，我们进去看了看。人们争着抢着，那架势比平时更拼命、更厉害。店里刚进了一批金首饰，因为金子能保值，所以这些西伯利亚人正拼命出手他们的卢布购买黄金。

在这种情景的感染下，我们为了弄清黄金对苏联有多重要，跑去见了当地金矿开采组织的头目伊果·索斯宁。他是负责整个太平洋远东地区金矿开采的官员。我记得以前黄金和石油在苏联有多重要，在美国区区一个矿产组织的头算不了什么，可在苏联就不一样了。伊果是个大人物，就像美国的IBM和通用公司的一把手一样。

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同伊果谈谈黄金和其他商品，因为我想了解他们的原材料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将来会怎么样。20世纪的苏联赖以生存的是什么是很有趣的研究课题。

20年代，苏联的发展靠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红色革命中得胜而来的高涨热情，但到了30年代，国家的经济就衰落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斯大林通过肃反运动维持了其政权，其间处决的敌人不下几万人，其他人被送进内务部劳改局的集中营，人数从1928年的3万增长到1938年的800万。整个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斯大林得以重振士气，我们在二战中也通过了租借法案，对他提供了援助。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欧的附庸——波兰、东德、保加利亚，等等——开始制造新的财富。60年代末到70年代，俄国得益于国际商品的繁荣，以及对中亚共和国处女地的开发。虽然苏联没有什么服务业务和产品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所需，但铜、大麦、棉花、钯

和铝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几十年来，苏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及第二大产金国，他们当然会把最棒的人安插在这两大重要的工业领域的位置上。

不过苏联的运气到了80年代就结束了，他们不再在最合适的时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了。西方的中央银行，包括美国的，开始控制通货膨胀，这些举措结束了商品繁荣的美景，而这对于苏联的经济无异于釜底抽薪，因为他们连一种世界上其他国家需求的工业品或消费品都没有。不仅商品繁荣结束了，而且苏联商人对于他们的土地和矿产的经营方式正同他们的政治领袖对西方的谴责一模一样：他们只顾眼前，把容易开采到的搜刮一空，而不考虑以后的10年会需要什么。

我的一条理论是苏联会变得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购进西方的必需品，电脑也好，大麦也好。他们会大量倾销黄金以赚取西方的硬通货，这就会压低黄金的价格。说到底，他们没有多少别的东西可以倾销。

我直言不讳地问伊果他们是否在倾销黄金。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但我们泛泛地进行了一次很长的讨论。

“我们现在开始同私人合作了，”他说，“他们是效率很高的生产者。”他甚至在一次排场的乡村午宴上介绍我们认识了几位合作人。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吃到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们的头儿，乔治亚·阿巴罗莫夫大摆阔气：俄式大汤、鱼、新鲜的蔬菜和沙拉、伏特加、葡萄酒，还有茶。

我们得知合作才开始一年，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我猜想合作是俄国人对于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的一种避讳的说法。我问他们地盘有多大，乔治亚在地图上划出一片看来有几千平方英里的地方

“合作”这个词很能粉饰现实，使得从事私营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在政治上更正确，而在以前的苏联，社会上对私营的看法相当于美国的黑社会。“合作”的人们已经取得了开采金矿、集资购进机械设备，以及雇用1000名工人开矿的特许权。当然他们被迫把新开采出的黄金卖给国家，俄国人不会不给自己留出一份就允许他们把金子运到日本的——不过要是他们能产出低于官价的黄金，合伙人就可以分享这笔利润。

乔治亚给我们讲了他们的生意方式。他们给工人付高薪，因此要求他们工作得要更辛苦。他们没有国营开矿机构的负担和官僚作风。他们把工人用飞机运到荒芜的旷野中，一次干一个月，工人们很高兴去赚这笔外快。

我问伊果他为什么不加入合作。他说：“我是个做官的人。我喜欢我的位置，我的权力很大，我好不容易爬到当头儿的位置。这就够了。我给我自己赚的钱够多了。”

黄金作为金融领域里极具神秘的因素之一，就是没有几千年也有几百年了。70年代时其价格已撑破了天。投资者们都断定一切纸币都将失去其价值。然而，假如他们回过头去查看一下几百年来黄金价格的涨落，就会发现有很长一段时间金价呈跌势并停滞不涨，或未随其他价格的上涨而上涨。过一段之后，金价会追上来，但那个时候大麦和木材的价格也会涨上来。

虔诚信奉黄金的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讲只有黄金能保值，而在另一方面，很多东西，包括大麦、木材和铁矿，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也一直未曾贬值。

早在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对付经济和货币危机

时，曾把黄金的价格定在 1 盎司 35 美元。以前是 1 盎司 21 美元。这样，哪国政府都可以把持有的美元按 1 盎司 35 美元的定价折合成黄金。当然，握有黄金的人都很乐意地表示赞成。他们获得了 67% 的升值。大家也都很高兴握有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规范了所有国家间的对外秩序。当然 30 年代的对外秩序是全球范围的经济崩溃，人们不买卖黄金，也不用货币换取黄金。需求微乎其微，因为经贸已趋停滞。

1 盎司 35 美元的黄金价格保持了 37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价位变得偏低了。因此黄金的生产持续减退了很多年，直至 1970 年。这是另一种同西伯利亚类似的情形，政府对一样财产定价过低，因而导致其供应减退。把金价维持在 1 盎司 35 美元就如同在俄罗斯把汽油的价格定在一毛一加仑然后不再涨了一样。

在这 37 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去淘金，很少开金矿，所有的矿区都挖光了他们的贮备，产量低的小矿场都关闭了。世界市场上的大多数黄金来自南非和俄罗斯，在那儿，把金子从地底下挖掘出来成本很低。

到了 70 年代，金价开始上涨。由于价格如此低廉，金子在生产中的应用日益广泛，黄金被用于牙齿和电子。每出现一种新的应用，生产商就会说："用金子吧。这是能弄到的最便宜的东西。"这种需求的增长一部分归因于其低廉的价格，因此价格不涨不行了。不光供应在持续下降，而且还造成了美国的货币危机，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不再健全。很多人，特别是法国人，跑来对我们说："我们要按你们说的那样用美元换黄金。"当时福特·诺克斯的银行排起了长队，人们争相提取

存款。

黄金涨价的压力始自五六十年代，因为美国政府开始出现经济问题：贸易赤字，大肆印制钞票，该出的问题全出现了。于是政府试图人为抬高美元的价值。1962年，美国政府施行利息均摊税来控制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政府非但没有处理货币贬值问题，反而又是采纳了一次权宜之计。结果压力越发加大了，尼克松于1971年被迫宣布："好吧，我不打算再这样下去了 我要改变游戏规则了。"



当然，美国在30、40和50年代没有出现这些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政府明文规定美国人持有黄金是非法的，这一点道理都没有。法国人可以、英国人可以，日本人也可以、惟独美国人不可以，为什么？政府说："这是为你们好。"虽然没人能够解释出为什么。我们在自我保护，而其他国家在沾我们的便宜。

政府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很少想到改变游戏规则。你和我这样的老百姓如果像政府一样做事，会立即被投入监狱。比如说，先同投资者达成了协议而后又改变规则，这将被称作诈骗。

还记得那场储蓄和借贷危机吗？储蓄和借贷协会跑去找到政府说："瞧，我们真是有困难了。我们的收益支持不下去了。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问题。我们筹不来款。"政府说："好吧，我们将专为你们改变财会制度。你不必说真正发生了什么。"现在要是你和我对一个我们经营的公立公司做出这样的事，我们一定会因诈骗罪进监狱。但是，我们的政府张口就说储蓄和借贷工业可以改变规则，以便欺骗性地报账。正如我们所知，储蓄和借贷的局面更糟了，我们都在为此付出代

价。政府因此责怪自己了吗？当然没有。政府说："这是由个别贪婪分子的欺诈行为造成的。"

其实，政府也参与了这种行为。它发了话："改变你们的财会制度，以便于欺诈地报账，我们会把它合法化的。"这又是一个权宜之计，结果只能拖延危机的到来。政府没有直接说"允许你这样做"，而是令储蓄和借贷协会改变规则。推迟危机只能使它最终爆发时情况变得更糟。现在南斯拉夫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苏联也会证明这一点。即将到来的美元危机将会更糟，因为我们现在不愿去吃苦头。所以尼克松对这些"可恶"的欧洲人不客气地摔了门："你们不能来这儿拿走我们的黄金，尽管是我们自己毁了我们的货币。"

对于黄金的需求持续上涨，政府竭力把价钱维持在35美金，但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大伙都跑来出掉美元，换成黄金。

在我多年的投资生涯中，有一条高于一切的原则，那就是：押什么赌都要永远跟中央银行相反，永远跟现实世界一致。70年代，中央银行在维护对黄金人为定低的价位，中央银行和政府总是尽力维护人为的标准，不管过高还是过低，也不管是货币、金属、羊毛还是什么别的。这些价格往往是很荒唐的，市场也知道它们是荒唐的。每当中央银行在维护某样东西时——维护35美元的黄金价位也好，或是800里拉对美元的比价也好——聪明的投资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也许不会立刻见效。但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脱颖而出的。这是一条投资的黄金法则。市场在其集体的智慧中总能知道要是有人执著于35美元这个人为的低价时，你就应该在那个价位上不断买入

当35年后，黄金的价格终于放开时，它上涨的幅度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因为它被限定在低价的时间太久了。每当价格被控制在过高或过低的水准上时，就会发生这种剧烈的变动。

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某种东西，证券、土地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会沿着一个稳定的价格波动。最终某样东西打破了供求平衡，价格开始上涨，因为人们认识到："嘿，他们有了一种新产品。"或者"铁路修到史密斯镇了。"价格上涨有其合法和合理的原因。

不过，也有时候人们购买史密斯镇的土地仅仅是因为它的地价在上涨。我妈妈会给我打电话说："我想买几亩地。"或者"我想买这个股票。"

"为什么，妈妈？"

"去年它翻了两倍呢，吉姆。"她说这话的语调让我想起塔贝莎叫我笨脑瓜时总爱用的那副腔调。

"这种方法不对头，"我说，"不是因为它翻倍了才买，而是应该在它翻倍前买。"

不过实际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看到价钱上涨了就知道可以从中大捞一笔。报纸上会报道张三和李四，他们是如何因为买了这块地或是某个煤矿的股票而暴富的。价钱会上涨因为价钱正在上涨。

这些股票或是这些土地的价值被大大标高了价码。那些买得早的聪明人，那些因为他们的家人已经在史密斯镇住了100年而买这些地的人，现在则开始往外卖了。他们发觉这个价钱已经不合理了。可以看出再在这儿建一个通用汽车厂

是不经济的，因此没有新人购买土地了，需求开始减少。

价格由于正常的经济原因开始回落，高峰已经过去了，现在生产商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台湾设厂而不是史密斯镇了。地价跌了又跌——都是合理的经济原因造成的。现在到了人们卖的时候了，因为价格在跌落。人们再回顾时会说："谁都知道不应该买史密斯镇的土地。那里的地价已经连续五年下跌了。"这时大家都在出手，因为只能这样做。以前是一窝蜂急急忙忙地买，现在又是一窝蜂慌慌张张地出。人们叫嚷着："我不管史密斯镇的地价有多便宜，别跟我说在那儿买幢房子跟白捡的一样。谁都知道那儿不是个投资的好地方。我要把我的款撤出来！"

地价跌得一塌糊涂，一泻千里。当大家争先恐后，越炒越热的时候，你开始买，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且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呢，不过终究会缓过来的。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购买黄金上——还有世界历史上差不多所有其他的商品买卖上。

像我先前说过的那样，1980 年时，那些书本知识很渊博的学者可以向任何一个傻瓜大讲特讲为什么油价会涨到 100 美元 1 桶。因为不可能不涨。无论从数学上、科学上还是历史上来看，它都一定会发生。不过，他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世界石油产量多年来第一次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许多年以来，世界的石油储备好像一直呈下降趋势，因为我们消耗的石油超过了新发现的石油。然而在 1978 年和 1979 年初，警觉的投资者们却发现石油的产量和储备正呈强劲的上升趋势——这恰恰是顺应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价格一高，供应就来了，当供应重新归于同需求的平衡


Visas
Entries / Entrées
Departures / Sorties
T.C. EDIRNE
GIRIS
14 IV 90
KAPIKULE KARA HUDUT
30 MAR 1990

不是闹着玩的。”

“往西去的路肯定会好起来的。”

“往西还远着呢——4000英里。”

“求你了，”我说，“我会想死你的。”

“让我考虑考虑。”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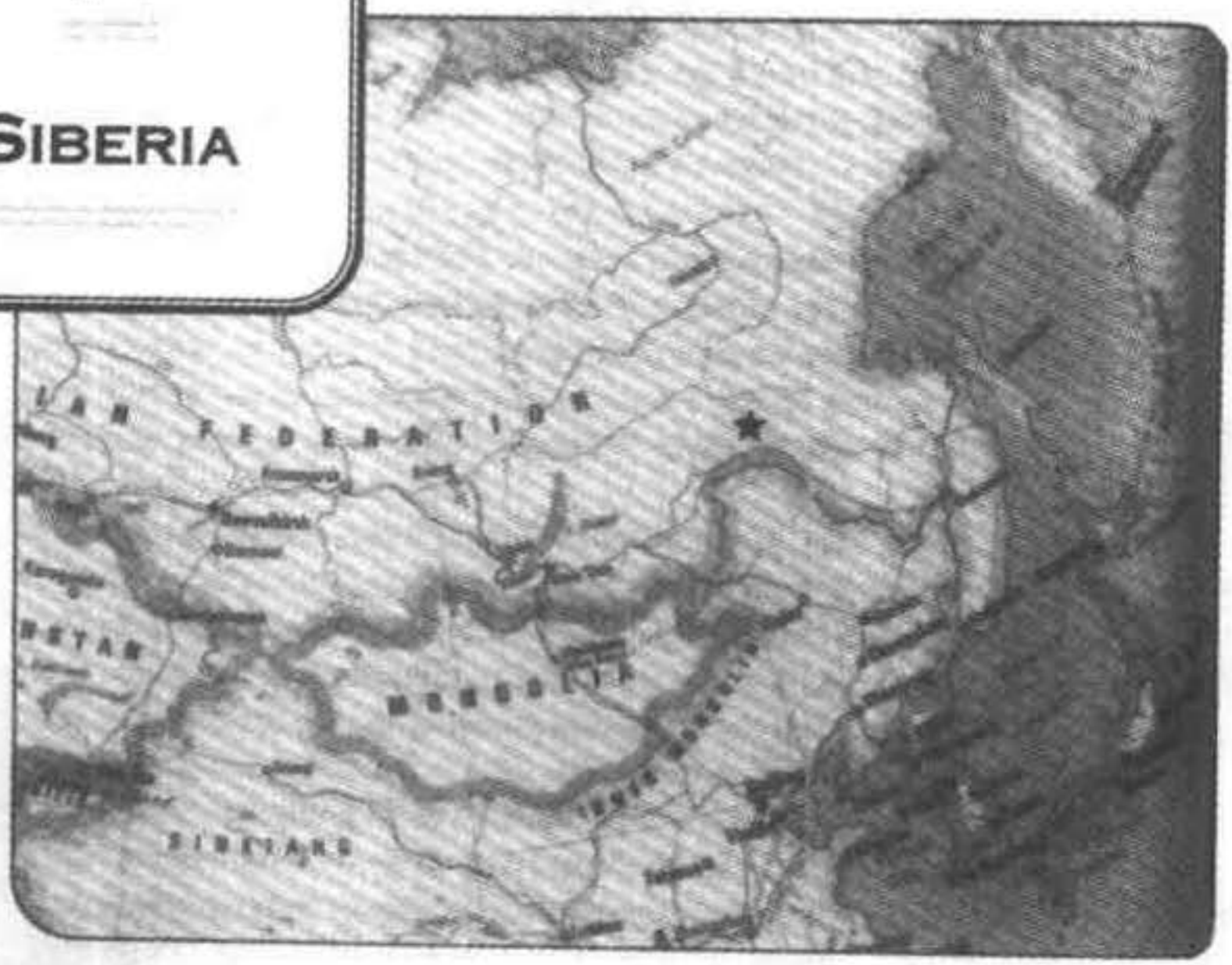
我们一起去取了轮辋和备胎。我很高兴，我感到我还有希望说服她。

“这么着吧，我会继续再走一段，”她说，“但这不意味着我会走完全程。我还有可能在什么地方飞回美国。还是那句话，整个这次旅行主要是你的梦想而不是我的。”

“太棒了，”我说，“不过记住，要是我没看错的话，从这儿往后2000英里以内没有机场。”这让她迟疑了一下，虽然对我的话表示赞同，不过她已下定决心了，还是跟我去。我感到又完整了，舒了一口气，再次踏上了征程。

14

SIBERIA



14. 西伯利亚

SIBERIA

去比罗彼得占的一路上，我从车上摔下来三次，塔贝莎摔了一次。她现在开得好多了，甚至可能比我还好。我们凭着力气、韧性和专业水平的驾驶技术在这泥泞、坑坑洼洼、布满了沙砾和卵石的路面上骑行着。啊哈，我心里寻思着，是不是年轻人的力量和适应性要比老年人的经

验和智慧更胜一筹呢?

当我们得知比罗彼得占竟是犹太自治区的首府时,不禁吃了一惊。20年代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贫困不堪,很多都想移民到别的地方。

斯大林为了解决这个及其他几个政治问题,宣布在这儿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一个自治区。要实现这个古老的梦想自然令全世界的犹太人群情振奋,热情高涨。这将成为他们这个民族在近2000年中的第一个家园。

俄国领导人已为开发西伯利亚努力了100多年。斯大林打算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来建立这座家园,以防止过多的地方抗议。他选中了西伯利亚的这块远东地区、比拉河和比得赞河流域3.6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就像中国政府鼓励汉人西迁至中亚共和国附近的道理一样,把犹太人迁到这儿有利于为斯大林提供一个抵御他的老对头日本人的"人和"缓冲带。

当时全球的犹太人兴高采烈地从世界各地赶来。斯大林一时威信大增,当肃反运动被西方新闻媒介曝光时,这将正是他们急需的。

我们去见了一名当地的民族议会成员里昂尼德·斯哥尼克,他的位置相当于一名美国国会议员,他是一名犹太人。

里昂尼德认同说,犹太人的确从世界各地移民而来,包括从法国和意大利来的,但留下来的寥寥无几。西伯利亚的这片地区到处是沼泽和虫子,土地贫瘠,冬季气温可达华氏-10甚至-20度。对于这些新移民来说,在这片边疆开辟生活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据他说,这一地区留下来的1.1万犹太人

约占总人口的5%。

出乎我意料的是，当年苏联的反犹太主义那么厉害，而如今我们在这儿碰到的所有掌权的人都是犹太人，看来多年前的到来已使他们在这儿很有根基了。

也许在苏联存在着反犹太主义，但是里昂尼德显然并不避讳他是个犹太人，他的公寓里就挂着一面作为犹太人标记的"大卫之盾"的旗子。

同我们经过的穆斯林地区一样，这儿也正在发生着一场宗教复兴，越来越多的人们去犹太教堂。他们开设了一个教育学院、一个希伯莱语语言学校和一个以希伯莱语为主要教学用语的学校，还有希伯莱夏令营。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些艰苦的时期，莫斯科竟拨出几百万卢布的巨款来建那所教育学院，援助犹太文化的复兴。

我分析苏联人花这么多钱主要出于这么几个动机：防止人才向西方外流；为他们自己赢得舆论界好评；扩展这儿的人口。里昂尼德说，尽管如此，尽管他们还有意增加了住房储备，但还是有许多犹太人去了以色列。

我们于半夜抵达乌布罗奇，这地方没有听到的那么糟糕，因为在南西伯利亚的夏季，直到11点天还亮着。

饭店有12间客房，我们那间房付了2美金，这是给外国旅游者的价钱，是当地人的10倍。按照黑市的比价我们只花了1美元。我还是为俄罗斯人从不涨价感到惊讶。

这个地方像个贫民窟。房子其实是20年前建的，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破得不成样子，好像是100年的老房子。我们有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小卧室，卫生间里有西方标准的设施，但却

没有水。同在中亚共和国一样，这里像其他的西伯利亚饭店一样都是不收拾床的，床单叠在床脚。由于没有其他的旅游者，很自然也没有饭馆和吃的。今天晚上我们在楼下的厨房自己做饭，有菜、面包和我们自己带的肉罐头。

不管走到哪儿，我总是很喜欢去体验一下当地的夜生活，但这儿的夜生活就是看星星。

第二天所行走的路坎坷泥泞——沙砾、尘土、稀泥，使得骑行艰难之极，我们花了8个小时才走了130英里。虽然塔贝莎还是对脚下的路恨之入骨，但她的骑车技术可大有长进。"我现在对路从恐惧和害怕到感到气愤，"她面带微笑地说，"我把泥沼和沙石当作是有人对我的冒犯，于是就怀着报仇的欲望去对付它。"

我为她感到骄傲，还有一丝崇敬。这是成为世界级摩托车手的"岗上"培训。我看到了精神的力量，看到了一个人如何凭借意志力和磨炼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地图上标得果然没错，在东西伯利亚没有多少铺就的道路。这让我想起了加拿大的育空地区，我多年前经过时，这片面积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州之和的地区，只有2.1万人。我心里想，这里是俄罗斯的边疆，尚未被征服的荒野之地。

记得小时候，亚拉巴马非常熟悉的乡村之路的特色是用铲土机来维修土路。要是有一段路泥巴太多，或是车辙的凹痕累累，你就给地方长官打电话，大家互相都认识，他就会派一辆铲土机来。而在这儿，公路无人管理。冬天他们在冰面上铺上沙砾，春天冰雪溶化的时候，沙砾就积到路面上，有四五英尺厚。这些松散的沙砾在我们的轮子下打滑，把我们不

轻不重地摔下来。有时候我们走弯道的外侧，但这样就会走人逆行。好在没有多少车，一天或许有个 30 辆短途运输的卡车，几乎没有小轿车。

我们路过的镇子越多，就越容易看出为什么没有人旅行。斯巴斯克—达尼什么商品都没有，乌苏里斯克的东西也多不了哪儿去，也没有人离开斯沃勃德尼到施马诺维斯克找到更好的工作。另外，要为车子着想，也没有人会开车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只有像我们这样脑筋有问题的人才会在这样的路上驱车前行。要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俄国人要到 1000 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他会乘跨西伯利亚的铁路。

不过身边的景致总能提起我们的精神。这里的天空和云彩令人心旷神怡，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比蒙大拿和育空地区开阔乡村的天空还要宽广。为什么一片天空会显得比另一片大对我来说是个无法解释的谜，但是这儿的天空的确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宽广。我们常常置身于一大片开阔的花的原野，蝴蝶花，百合，雏菊和福禄考——紫的，黄的，红的，白的，蓝的——五彩缤纷的花朵覆盖着大地。谁也不拥有它，它是野生的。

日落的时候暮霭弥漫，山间的溪流蜿蜒流过，在暮色中被罩上了一层暖色。我们的左右都是一两千英尺高的小山，山上长满了桦树和鲜花。

有时候我们会有幸见到闪电把天幕“嚓”地撕开，给整个天穹画满精致参差的狂乱无序的触须，在我们的头顶演绎着一场霹雳无边、雷霆万钧的景象。

西伯利亚

这儿仅有的几家饭店饭馆里——一个镇子里从不多于一家，否则的话就要竞争而且浪费——差不多都有现场演奏的乐队，但声音很大，吵得人根本无法交谈。当地人为庆祝生日和纪念日，要提前数周预定地方，所以我们每每会碰到没有位子的难题。舞池里大多数是女人，没有人看上去玩得兴高采烈。那首"兰巴达"早在西方过时两三年了，但在今夏的西伯利亚却正流行。每家饭店的饭馆里都放这首歌和其他三四首一样的歌——没有别的可听。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同样的乐曲，就好像莫斯科的某个中央音乐委员会下了文件，规定好今年夏天饭馆的演奏曲目必须一样。

要是饭馆里有酒，十有八九是伏特加。令我们大为惊喜的是，有一晚我们竟受到了匈牙利干红葡萄酒的款待。我们还是到厨房里自己看着原料点菜，一般有西红柿、黄瓜、圆白菜、土豆、米饭和汤上面漂着一层面包皮的煮饺子，还有一种肉。

到哪儿厨房都是那么大，花样却这么少！

当我们沿着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界河阿穆尔河(黑龙江)行驶时，经常看到两边的铁丝网，荷枪实弹的士兵隔着几百码远的地方对峙着。这儿紧邻着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由于当年沙皇愚蠢地把它建得靠中国太近了，使它的安全陷于冒险的境地。

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和地区首府，我们在那儿听说每天都有商人从中国乘船而来，俄国人也过中国那边去做买卖。中国商人带来化妆品、服装和纺织品。在我看来，俄国人能拿去交易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木材和伏特加，这儿

就有一家伏特加酒厂。当然，哪个有头脑的中国人也不想要贬值得一塌糊涂的卢布。后来我们得知，这家伏特加酒厂的产品是出口的。俄国公民只能从国营商店里买到伏特加，一个月只有两张票，限购两瓶，也就是说供应严重不足。我们则不允许在国营商店里买酒。

我发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历史很有意思，因为这座城市在其长期的历史中曾先后属于过中俄两国（在中国叫海兰泡）。它于1644年由哥萨克人建为一个军事基地，1689年被满洲人攻陷，1856年哥萨克人又夺回了这座城市。后来在1900年，为了替在中国的义和团起义中死去的欧洲人报仇，哥萨克人将城里所有的中国人斩尽杀绝，共几千余人。然而，虽然有这样一段血腥的历史，两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却兴盛繁荣。

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家伏特加酒厂中有来自朝鲜的工人，在一个国营农场里还有中国劳工，他们住在条件简陋的工棚里。在另一个工厂里还有20岁上下的越南姑娘在纺棉花织布。其实用心一想，就会发现很合情理。这里人手奇缺，所以他们就引进劳动力。

我们见到了纺织厂的头，是一位被称为常先生的越南人。我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越战这个话题，不想他压根没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他说，这些女人都是从越南提着大包而来——带来很多男女衬衫、火柴、香烟和水果罐头，到这边一卖，跑这一趟赚的钱就更多了。

这条横贯大陆的公路到穆齐诺就变成草地间两条细细的小径了。我们顽强地沿着这条路骑行，但后来就连小路也断

了，前方是一大片沼泽。往西去没有路了，当地人肯定地说这里从来就没有过路。穿过大沼泽的唯一途径是乘坐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得往回开50英里到上一站，找站长帮忙。

我们花了相当于25美元的价钱，得到了乘坐一节9×44英尺的敞篷货车西行的权利。

"吃的怎么办？"塔贝莎问，"还有喝的？"

"他说我们只要坐几个小时。"

车场的调度员帮我们把摩托车装上绑好。列车共有70节车厢，我们这个是最后一节。我们很高兴没路可走了。搭乘一段铁路上的货车就像开摩托车的搭乘汽车一样：先对付一段，我们路过的各个道口上的工作人员见到敞车上有两个西方人和摩托车都惊得目瞪口呆。

塔贝莎很高兴可以稍作喘息，我也一样兴高采烈。风吹过我们的头发，迷人的西伯利亚森林、田野和群山在我们身边掠过，白云在空中飘着。这种搭车在美国无论花多少钱也享受不到。所有跟卫生、食品和工会有关的人都会发疯的。保险公司会把我们投入监狱。但是在西伯利亚的这一片地区因没路可走，所以我们才坐上了车。

车上也没有列车员报下一站的站名，或者说在某一站停20分钟之类的。到站的时候我们得赶紧奔到灌木丛后上厕所，好在火车开车前再爬上来。我们通常要等2小时才发车，货车每15分钟过一趟，对面过来的车上载的货物往往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到整车的原木运往东边，也看到同样的木材运往西边。

我们在敞车上待的时间可比站长所说的"几个小时"要长。夜幕降临了，我们被迫从苏联老大妈那儿买一些土豆、蔬

浆果、洋葱和面包，他们是车站上唯一卖货的小贩，等车进站时好赚几个戈比。我们有一瓶伏特加下饭。偶尔会下点雨，不过我们的油布雨衣完全可以应付。到了夜里，我们就把自己裹在日本小睡袋里睡觉。待天破晓，我们就用酒精炉做茶。

又过了一天一夜。有人告诉我们在切内斯彻维斯克附近基本上有路可走了，于是我们在货车上待了两天多一点的时间之后终于下了车。



在西伯利亚的这一片地区，我们经常在公路上看到移动式火箭发射装置，我猜想是飞毛腿导弹，还有上百辆坦克。发射器一般有五六十英尺高，往往是坏的。这些东西运往北京以北，因此若是同中国爆发战争的话，这个地方就将有军事行动。

在一个大的坦克训练基地，一个年轻士兵为巩固美苏间的国际关系，送给我们一张素描的复制品，画面是以英雄主义的笔触勾勒出的勃列日涅夫年轻时作为一名勇敢的坦克军官的画像。这是他在一次自行车比赛中得的。他并不把它当作是奖品，但是我很高兴得到它。现在这幅素描就挂在我的台球桌上方。

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就是依照有关苏联军费开支的巨大数目来调整他们自己的开支的——而在这儿，我们路过的这些锈在路边的导弹、发射器及军备被蹩脚的技师胡乱地摆弄着。这些设备中许多都被卸走了零件。扫一眼就能看出相当一部分已经不能用了。

在看过了中国和苏联两方面的军队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没有很多真家伙，而且有的也不是很有用。不过我

承认在中国那边没有看到这么多。

这儿的每一座桥上——别忘了，这是备战区——都建着一个哨所并有几个武装的战士。中国人真正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多的士兵，一旦打起来，中国会先毁掉跨西伯利亚铁路，把偌大苏联切碎成无数个无能为力的部分。

那天下午我们踏上了前往赤塔的路，这是一座大城市，我们希望能在饱受颠簸之后在那里停留一下，休整休整。

一辆警车拦住了我们，问我们到底是何许人，来此地有何贵干，就像亚拉巴马的巡逻警会拦住陌生人检查一样。我们给他看了证明信之后，他指了指天，用蹩脚的英语对我们说最好找个地方避避雨，因为要有"风包"了。

我们表示了感谢，他们就走了。

"什么是风包？"塔贝莎问。

"我猜他是说风暴吧。"

"也许我们该找个地方停下来，等它过去再说。"

尽管这儿已经下了六天雨，今天却很干燥。

"我以前遇到过风暴，"我说，"我们在货车上待的时间太长了。我想在赤塔过夜，在那儿我们有希望找到一家像样的饭店，不用再在刮着穿堂风的空荡荡的大车店里睡觉了。"

5点钟的时候，我们开车穿过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可村里连个人影都没见到。这太不正常，太怪异了，我感到不寒而栗，汗毛都竖起来了。村子外面昏暗寂静，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我们继续前行。我想过停下来，但是又想，在赤塔能享受到的文明生活会补偿一场风暴带来的小小的不快的。要是在西伯利亚，每下一次雨都停下来的话，那你怕是永

远也走不到头。

一阵风从侧面吹过来，险些把我掀翻。风很快变得狂野，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还没容我调整方向应对，风向又变了，前后左右地抽打着我的车。在我前面的塔贝莎也举步维艰。

开始下雨了，名副其实的倾盆大雨，后来又变成了冰雹。像橡脑球和高尔夫球一样大小的冰雹噼里叭啦地打在我们的头盔、面罩和保险杠上，穿在身上的皮夹克、厚毛衣和衬衫都不足以抵挡。我们的背被砸得生疼生疼的，就好像天上往下扔石子一样。我们掉进了风、雨和冰雹交加的漩涡中。

几分钟之内，光滑的路面上变成了淌着冰雹的小河，要想保持车子不倒越发困难了。道路的两边都是开阔的田野，没有遮拦可以用来避雨。大风旋转着，嚎叫着，好像要把我们吹上天刮走一样。我们俯身趴在车把上，使劲保持着500磅重的车子的平衡。我们骑过在路中间走着的20只黑白花奶牛——但是天那么黑，冰雹又下得那么大，我们几乎看不到它们。车轮在下面打滑，只有靠用靴子点地才不至于倒下。我们就这样以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爬行了1个小时，这时一只被风暴迷了眼的奶牛向我的车子走来。我的车被撞翻了，我四脚朝天地摔倒在地上。塔贝莎用脚撑子把车支上，一步一滑地踩着脚下的泥浆和冰雹跑过来扶我，她帮我把车扶起来。

我真该听那个警察的劝，或者应该在那个村子停下来。现在由于我缺乏耐心，只知赶路，让我们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这儿一切都有可能发生，道路可能会被冲垮，洪水可能把我们

卷走，视线不清的卡车可能会把我们轧死。

她吓坏了，流着泪说："冰雹砸得疼死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想怎么办？"我大声喊着，"你想停在哪儿？"

她也不知道。她大声说她担心她的车，冰雹不会把车砸坏吗？我也大声说我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干站在这儿，等着挨冰雹打。

我从来不是那种站着干等的人。要是我们把车扔在路中间去别的什么地方，天晓得车子和我们会出什么事。我们启动车，挂上最低挡，沿着路边，继续在茫茫一片中摸索着向前蹭。就算这样也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得透过昏暗的迷雾看清我们没有偏离道路。脚下的冰雹使得我们车子很难站稳。我们推着走了好长一段时间。

风暴终于过去了，天空重又放晴，冰雹在暑热下融化了。我们还从来没有机会穿过雨衣。我们浑身早已湿透，还有车上的行囊及里面所有的物品。塔贝莎在路中央把衣服层层脱掉，只剩下内衣，然后穿上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件干衣服——雨衣。四周的景致全是被风摧折过的，大量的水从山旁和路边流下。像足球和葡萄一样大小的石头被冲到了没有铺柏油的路面上，树枝、树叶和小树横七竖八地扔在路上。有些地方的路段已被冲毁。

"也许'风包'在俄语里是飓风的意思。"塔贝莎说。

"一定是没翻译出它的意思。"我说。

"下一次警察再说'风包'的时候我们就停下。"对此我只能说："好。"

我们在一个小镇想加点油，那里被水淹了有一英尺深，电也断了，也就是说汽油泵不能用了。

一个当地人把他存的那种5加仑扁平容器中的备用汽油卖给了我们。现在是晴空万里，于是我们又踏上了前往赤塔的路途。

这次有了几个开车的当地小伙子作伴，因为我们总令那些同我们邂逅的俄国人很兴奋。他们带领我们出城。一个打头阵的回来说暴雨把桥冲断了。我想今天看来是走不了了。

"不，不，"他们说，"我们带你们走别的路。"

我们又掉过头来跟镇上的那几个人走上了另一条路。走了约两英里之后，我们开上了柏油马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条路上竟然没有路标，没有车辆，没有人造的建筑，只有平坦的柏油路和发光的沥青。

我们一路撒欢般地飞驰。那些新朋友跟我们一起，挥着手高喊着，像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我太高兴了。这时已是黄昏，我们一路朝着落日飞奔而去，我的身上还是湿的，不过我们赶了很多时间。我穿上了背心，用车把的加热装置给自己烘干。我的录音机开始大鸣大放，先是维利的"再上路"，然后是莫扎特的曲子。我们又赶上了一场西伯利亚奇妙绝伦的闪电表演，左边是霹雳当空，右边是我从未见过的火烧日落。我想不出来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此时更想去的，或是有什么别的事情我此时更想做的。

我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不过我一直在自问，这条路在这儿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哪张地图都没有标出来呢？那些俄国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用于运输导弹的军用秘路。当然又平又快。当然地图上不会有！

那些俄国人想回去了，我们跟他们道了别，有些战战兢兢地继续往赤塔走。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见到人，到赤塔的时候已近半夜，我们找到一家好一点的饭店，进了房间便扑倒在床上。一开始塔贝莎由于过度的紧张、劳累和疼痛睡不着觉，不过最后睡着了。这是我们多日来睡得最美的一觉。

彼得罗夫斯克—扎巴卡斯基的西伯利亚饭店同任何一个镇子上的任何饭店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是坏的。灯不亮，电梯也不能用了，卫生间尚可使用，这已经算我们很有运气了，因为这儿的很多都是坏的。浴缸和水池通常都是共用一个开关，可以朝两边掰，这是很经济的一种设计。长长的走廊黑乎乎的，破旧而肮脏。要不是前台坐着个人，我还以为这鬼地方是个废弃的贫民窟呢，像是个垃圾饭店，然而它其实才建了11年，我不明白俄国人是怎么把它搞成这个样子的。不过我们经常走进这样的公共场所，几乎还是新的就被糟蹋成了贫民窟。

一连在街上遇到四五个醉鬼跟我们搭讪之后，我们才发现镇上的人都喝醉了。让我们存放车子的那个警察局的官员解释说："两个星期以前镇上的伏特加酒脱销了。今天货车刚把货运到，所以大家争相抢购，喝个一醉方休。"

回到饭店，有一个看上去70多岁，满面红光、兴冲冲的俄国老头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叫尼古拉。他一般都是10点就关饭店的锅炉，不过他说今天会开到11点，好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他把我们拉到一边。"我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被派驻在你们的部队里，"尼古拉用一种秘谋似的语气小声

说。他流利的英语同我们以前听到的蹩脚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比利时，你知道赫尔希牌巧克力吗？福特？"他一边紧抓着我的手，一边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着。"我没告诉过他们中的任何人，替我保密。如果我说美国人的好话他们会把我送进集中营的。"

"现在没关系了，"我说，"一切都变了。"

他沉下脸来，用一根手指堵住嘴说："嘘，以前变过。"

尼古拉眼中含着泪花，给我们讲起了他战时在美国军队中的经历，他对美国兵充满了崇敬之情。他把这些回忆珍藏了40年，由于害怕被抓进集中营，他从未敢将这段回忆同他的同乡分享。

第二天早上，我们问能否给他拍张照片，他拒绝了，说他们也许会从我们手中把照片拿走，在法庭上作为反对他的证据。

曾经被禁止了几十年的集贸市场，如今已在我们路过的许多村落里繁荣了起来。不过西伯利亚还是没有路边的饭馆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像霍华德约翰逊、皇后乳品店、麦当劳汉堡包之类的快餐店一概没有。旅行者只有自带食物，要么就饿着。我们在烤面包店里买了面包，在这些新兴的集市上弄点蔬菜和水果带着。经常所能买到的就是土豆、洋葱、西红柿、韭菜、黄瓜、酸奶，以及腌制加工而成的美味果干。

同那些破旧不堪的公共建筑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驶过的那些村庄，个个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井，每座房子都漆成鲜艳的颜色，堆满了维多利亚式花哨的装饰。从刻着花的百叶窗和精致繁复的格条结构中可以看出

房子的主人有多么讲究。房前有花坛，屋后是菜园，很多人家都有暖房。每座房子都有其独特的风格，每家都想比邻居胜出一筹。差不多家家都有蓝白或绿白相间、图案别致的百叶窗，通往院子和墓地的大门上也都有装饰图案。一些墓碑上刻着双十字以示俄国历史上的阶层，上面的一横是斜的，这是老式宗教的一个标志。还有一些上面刻着的十字代表后来的俄国正教；其他的刻着红五星，象征着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在西伯利亚的公墓，碑上刻有红星的表明死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

看着这些自给自足的村庄，我认识到西伯利亚人是永远不会挨饿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俄国人也许会挨饿，但这儿不会。这里的人已这样生活了几百年，从来没有靠谁给他们带来食物。这些村子中都是一个商店也没有，除了偶尔需要借助一下电报所和火车站，这些村子完全是自给自足的。

我们在一两个村子里作了些停留，来了解了解这些人是谁，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的房子同城里灰暗的公寓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城里人住在那些似乎随时会倒塌的大公寓里。

村民们总是硬要送些蔬菜给我们，偶尔也会给我们肉，往往都像10岁老牛的肉一样硬，可能就是那么老的牛肉。



西伯利亚的公寓住房并不都是清一色的。一些村落里分布着许多像这样色彩艳丽明快，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木刻装饰的木屋。

这些房子的里面都粉刷一新，干净整洁。家具不多，但家家有电视。没有多少节目可看，我注意到有墨西哥的肥皂剧和新闻——但我搞不懂他们是如何收到信号的。后来我反应

过来，俄国人一向精通于军用卫星技术。这是一个除了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电报系统再加上电视以外什么东西都玩不转的国家！我想，这有利于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让人民的头脑单一，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让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15. 乌兰—乌德，津巴布韦和勘斯克

ULAN-UDE, ZIMA, AND KANSK

布里亚特蒙古人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是这个民族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个盛大的节日聚会，如今已被禁止了70年了。这些成吉思汗的后代，这些骄傲的山民们，在这个宗教和民族的盛会上狂欢作乐。今年他们没有征求莫斯科的意见，就擅自举行了节日的庆祝活动。我和塔贝莎注意到，越来

越多的迹象表明政府正在失去对老百姓的控制。

开幕式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布里亚特自治区的首府乌兰—乌德举行。巨大的会场四角燃起了四堆篝火，象征着地球的四个角及他们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在喇叭声中，在人们注视的目光下，被众多蒙古人围起的场子的中央又燃起了另一堆篝火。

鼓点敲了起来，来自四面八方的蒙古人，包括来自蒙古国的，穿着红、黄、绿、紫各色服装步入会场。西边的姑娘们跳着舞着过来，接着是南边的。鼓声喧闹，笛声悠扬，跳舞的人们穿着束腰外衣和紧身裤随着音乐旋转着——没有人穿着共产党的灰衣服。篝火晚会一直持续到12点，不过在这儿日落后一小时即是子夜。

星期天的节目是各种展示和竞赛，有射箭、掷链球、摔跤、举重，还有赛马，一整天都有活动。还有一些消费品的抽奖活动，像电冰箱、洗衣机什么的。节目的高潮是一项1000卢布的奖金，约合160美元，谁能把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绕场骑上一圈，谁就是奖金的得主。有人开始清场，很严肃地把场上的观众都赶到栏杆后面。第一位出场的蒙古驯马仔脱掉上衣，在野马旁舞蹈起来。警察拉上了枪栓，因为这个畜生对骑手和观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干得出来。这匹烈马已经被拴在一个桩子上一整天了。它被绳子缠住了身子，但谁也不敢给它解开，害怕会被一脚踢死。不过，这匹蒙古马毫无情绪合作。没有大家期望看到的激烈场面，这匹疲惫的倦马只是驮着这位光着膀子的骑士蹓跶了一圈。人们失望地缩回伸着的脖子，嘴里嘟囔着这算什么蒙古勇士。

在乌兰—乌德的城外，我们游览了一座美丽的佛教寺院，原来的那座被烧毁了，这是1975年重建的。这是我们在整个苏联见到的唯一一座佛教寺庙。

这里别具一格的祈祷轮和鼓使苏联在业已四起的危机中陷得越发深了。犹太教在比罗彼得占的复苏，伊斯兰教在中亚共和国的兴盛，以及基督教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各地的重新兴起，都很清楚地昭示了另一种信仰的危机。在整个苏联的大地上，人们在精神上备感失落，感到想要抓住点什么，于是人们苦苦寻求一种可以寄托信仰的东西。迫切需要一种群体的同一性——这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一种东西——要么是他们的宗教，要么是他们的种族，有时还往往是两者的融合。

假如政府实行了成功的经济政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真正的富裕，这些寻种族之根的精神驱动力就不会存在。制造出真正的繁荣，每个人就都愿意跟你走了。

那些在二三四十年代移民到美国的人一心想成为美国人。他们坚持让孩子学英语，学得越快越好。到了90年代这些移民开始寻根，因而双语教育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多重文化性在美国同在苏联一样是一种力量，因为移民们不再感到那么容易步入上层生活圈子。美元货币的衰退和真正收入的停滞已使美国变得不那么富有诱惑力了。

波兹南是一个相反的例证，它曾经是普鲁士国王的避暑之地，两次世界大战后均被割让给波兰。在共产主义政策之下，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要求或者说被允许成为德国人。然而现在，我们听说出于想沾德国繁荣的光，这些波兰人中占40%的人证明自己是德国人，因此必须允许他们进入德国。

我开始相信，大的多民族国家，所谓大熔炉的概念正在这

个地球上消失。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已在我们的身边分崩离析。我怀疑美利坚合众国是否会不胜联邦政府极其高额债务的重负也会失去国家的一些部分。自1932年以来，农业部的官职人员相对农民数量的比例已经翻了16倍。这样的例子成千上万，不胜枚举。随着我们步入21世纪，有两大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作用：全球化国际主义和部落控制。这两大逆反的力量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将是新世纪中上演的大型历史剧。事实是人们在心理上需要深植于内心的信仰来将自己同他人维系在一起。我们都喝可口可乐，都吃麦当劳的汉堡包，这在精神上还不够。我们对于地区的同一性有一种强烈的需求，这种同一性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控制的，让我们感到我们可以伸手便触摸得到的。我们不愿让它被全球化和大国主义毁掉。

我们在伊尔库次克的一个大公园里第一次看到政治抗议者，两个绝食者。他们坐在一张长凳上，四周贴满了关于他们的遭遇的大字报。一个丢了在戏剧研究院工作的饭碗，另一个是位人权主义倡导者，要求释放一个因指控他的老板贪污而被投入监狱的电器工程师。他已在公园里待了6天。政府对他们两个的行为采取听之任之的作法，这是对人民又让了一大步。要在一年前，他们亮相的第一天就会被抓走的。

我们在表面是薄薄一层稀泥的土路上艰难地向兹玛镇进发。雨天加上路滑把我们两个弄得疲惫不堪。尽管我开得很小心，可还是滑了一跤。人没伤着，但一个行李包掉了下来，里面的东西在我身后的泥泞中撒了一地。

我拣起沾满了泥巴的地图、衬衫、牙刷和袜子。到了我们

下榻的运动村，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卫生间里清洗这些泥巴。中国和西伯利亚的许多城市中都有这样的举办体育比赛的中心，总有为参赛队预备的客房和更衣室。

我们听说兹玛的意思是“寒冷”。我想象不出来这个西伯利亚中部叫做“寒冷”的镇子冬天会冷到什么样。我们在这儿碰到了一个名叫瑞密斯·宇库斯的立陶宛人，他大约25岁，带着他的表弟。

瑞密斯的舅舅曾于1948年因拒绝把他的农场变为合作社而被斯大林流放至西伯利亚，在一个立陶宛人社区作了一名伐木工。他的舅舅来这之后的第三年，在一次伐木时被一棵倒下来的树砸死了。他埋在当地的一个公墓里已经39年了。

瑞密斯的父母早就给他讲了舅舅的悲惨命运，最后被葬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后来终于有一天瑞密斯的妈妈跟他说：“你去一趟兹玛，把我的哥哥接回来。”于是，瑞密斯就这样带着他的表弟不远千里地来到了西伯利亚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带着一个嵌着铅条、盖着铜盖的小箱子，来寻他舅舅的墓，替母亲把舅舅的遗骨带回立陶宛。他们在一个立陶宛人居住区旁的公墓中找到了一个刻有他名字的墓地，在一个传统的大十字架上只刻着三个字“瑞密斯”。老看墓人说他认识他的舅舅，可以证实这确实是他的墓。

然而同官僚打交道很快挫伤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兴奋劲。没有官员愿意给他们签发转移遗骨的许可，一个个都说不行，换一个部门就让他们填一堆新表，然后说还要请示上级，同意后他们这个部门才能发许可令。

瑞密斯感到结局会是他空手回到立陶宛，让他的妈妈失

望了。他们两个在这个小镇上已经奔波了一个多星期,疲惫地从一个政府部门跑到另一个政府部门,不断地出具文件证明他们是谁,埋在墓地的是谁,里面埋的确实是他们的亲戚,而且他的舅舅并非死于疾病,不必害怕掘墓。

不过瑞密斯终于把一切手续都办下来了。这两个年轻人对于即将掘开一个39年之久的墓既感到兴奋又有些恐惧。

他们正挖着的时候,天开始下雨。在墓的底部,铁锹触到了木头。一个松木棺盒和一套衣服暴露在湿漉漉的光线中。他们把遗骨一根根地扔出来,把它们放入铅条盒子里,准备带他舅舅的遗骨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走之前,他们用一根生锈的铁钉在那个大十字架上用立陶宛语刻出了三个字:"回家了"。

苏联大多数镇上的加油站里只供应两种汽油,74号的和93号的。大多数司机为了省钱,都把汽车上的压缩机换成用74号的,虽然时间长了对发动机不好。按卢布和美元的官价计算,这里的油价合6美分1升,或者说25美分1加仑。当然要按黑市价就折半了——12美分1加仑。

我们在西伯利亚总是去加油站加油。要是他们没有93号的,我们就去警察局要。他们不是手头就有,就是可以从军队搞到。

在一个加油站,一个叫奥尔嘎的女服务员用蹩脚的英语说:"你看,我卖93号只能给警察和救护车。""是的,但是我们只能用93号的。"我说。把我的两根食指叉在一起指了指74号的牌子。这个手势在俄罗斯的意思是说不——"我办不到"、"没门儿"或是"坏了"。我继续用打手势和简单的英语同

她沟通，用世界地图指给她看我们的行程。我还说我们有合法的签证，我们的车必须用那样的汽油，否则哪儿都去不了，我真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意思。

奥尔嘎不为所动。“我告诉你，这是法律。我不给人好油，除了警察和救护车。”“我知道我们给您带来了不便，”我说，“但是我们的车必须用93号。顺便问你一下儿，你喜欢外烟吗？这条万宝路我们不需要了。”这下奥尔嘎让步了。“你听了没有？”她大声嚷嚷着，仰直了身子。“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告诉你两遍了。我不给人好油，除了警察、救护车。骑摩托车的美国游客！”

不好的路段又开始了——几乎没有柏油路，基本上都是松散的沙砾、很深的车辙印和大坑。我们每天精神抖擞地出发，一路上，身边的景色和路过的村庄里的生活使我们激动不已，但骑上8个或10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肩膀开始酸痛，两腿抽筋，真盼着洗一个热水澡。屁股疼吗？已经有1000个人问过我了，不，不疼。骑马也许会疼，但骑摩托车很少疼，不管旅途有多长，路面有多颠簸。

尽管老天还算开恩没下雨，但保持精力集中很难。我们在里程表上数着走过的每一英里，巴望着坏路段快要到头了。开上好路段的时候——干硬的土路——能把时速提到30迈真是一大快事。每走过一英里都有一种成就感，尽管这也提醒我们上一个英里数是多久以前，我们跑得有多慢。

虽然条件这么艰苦，但夏天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们在尽量赶路的同时，也穿插了很多休息的间隙，来充分感受我们的新环境。我们会花上几天时间四处转转，访问人家，

寻觅、观赏自然，这是在汽车、飞机和轮船诞生之前的时代人们旅行的方式。我喜欢这种散漫的步幅和这种去留无所、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好像我们骑在一匹马上漫游世界，身临其境地看着、听着、呼吸着。

我醉心于扑面的微风和一望无际的景色，田野、山川、溪流，美得令人心动。成群的蜜蜂"嗡嗡"地追逐着怡人的花香。在这样一个美国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同从未见过外国人但很高兴认识我们的村民在一起是件很好玩的事。我喜欢他们粗糙的面孔，这些面孔同西伯利亚的气候一样，没有沾染上过多文明的痕迹

我们从来不知道山那边有谁，又有什么样的历险。这么近地亲眼看到世界是什么样的，在发生着些什么，是很激动人心的。在我看来，我们就像几百年前初遇北美土著的欧洲人一样，就同在美洲大陆上发生过的那样，西伯利亚也将开放、被开发和改造，有朝一日，我们会像我们的先驱一样来到这儿。

我们每次在野外停车，都会遭到千万只黑苍蝇的围攻。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开着的时候它们不怎么打搅我们，但一停下来，它们就蜂拥而至，把我们的休息变成一种折磨。我真想不出它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不在那儿的时候它们一天到晚都干些什么？一年到头呢？镇上的饭馆里也往往盖着一层苍蝇。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经理在做账，她的裙子上和账本上落着几十只苍蝇。西伯利亚人从来没见过苍蝇拍是什么东西。谁要在这儿生产准能赚大钱。

一天早上，我们停下来小憩。我正躲避苍蝇的围攻，塔贝

莎在拨弄着路边的青草地。她手里举着一截绿东西兴奋地冲我叫着。我走了过去。她正站在一片豌豆地里，我们在南方把那种绿豌豆叫做甜豆。塔贝莎很爱吃生豆子，于是我们拔了一把坐在路边，一边拍打着苍蝇，一边剥着豆，吃了一地。我很担心吃这么多生的绿色蔬菜会生病，就跟吃多了绿苹果一样。不过豆很好吃，也很好消化。要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如说中国，我们和当地人都不敢吃从地里直接摘来的东西，因为他们用人的粪便作为肥料。在中国甚至当地人也不直接喝野外的水。但在西伯利亚，人这么少，菜和水都没什么污染。

后来，我们不顾苍蝇的侵扰，美美地吃饱了之后睡了一个午觉。这片豌豆地前后不靠，完全是一片野地。我们装了满满一塑料袋，还拿了几把。

我们对找到豌豆如此兴奋，主要是因为我们不适应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他们早餐吃的尽是些堵塞血管、高胆固醇的东西：一两个煮得硬硬的鸡蛋，面包上抹着一层像面包片一样厚的黄油，一杯差不多 12 盎司的稠稠的酸奶。他们的另两顿饭也一样——肥肉、更多的面包和黄油、炸土豆、少量的青菜，然后就是甜品和蛋糕。这种食谱，加上抽烟酗酒，又普遍缺少锻炼，使他们的寿命大为缩短。俄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仅为 64 岁，而美国的平均寿命是 72 岁，日本则高达 75 岁。

我们沿途又发现了更多的绿豌豆，一路继续用它填着肚皮，还有从镇上的集市买来的蔬菜和水果。

我们在大约十点半的光景来到了堪斯克，令人惊奇的是当时路的一边是闪电大作，而另一边则是一轮辉煌的落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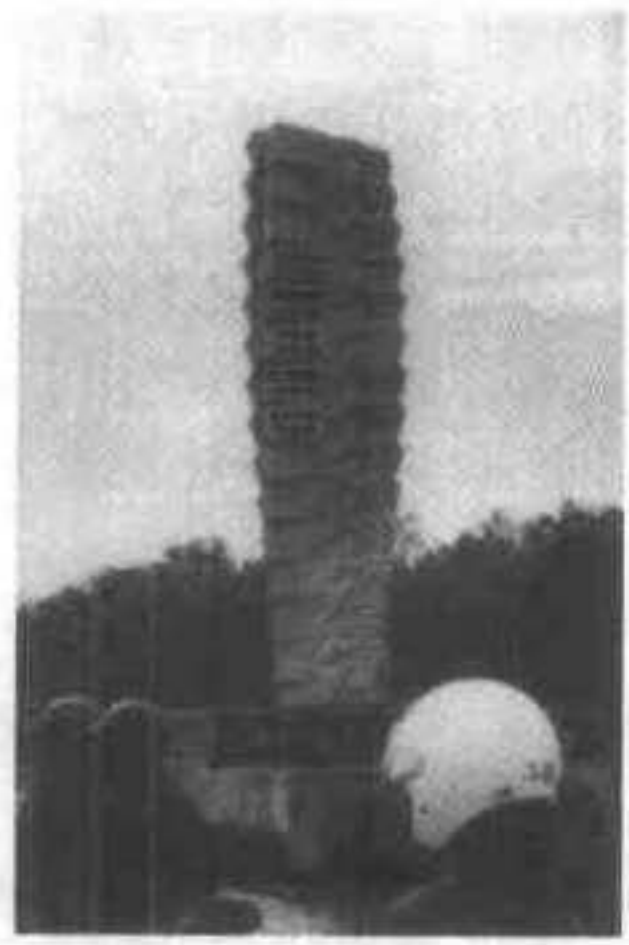
色粉中带黄,这是我此生从未见过的。接着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第一道横跨天穹的双彩虹,我待待地望着,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从这儿又开始了一段难走的路,路面虽干,但有很多松石碎砾。10个小时才走了130英里。我们两个都摔下来几次,因为我们的速度很慢,所以摔的跤都不危险,只是很令人沮丧。我尽量对此泰然处之,毕竟我从未期望过走到世界各地都有人把路给我们修好了,但塔贝莎对这没完没了的破路开始灰心丧气了。我们已在西伯利亚行进了几个星期,走过了3000英里的路程,但至少还有三四千英里同样糟糕的路在等着我们。我们艰难地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实际上实在之大。

我们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越来越近了,这是一座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大型工业城市,这里约有100万人口,是苏联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从中西伯利亚直到北冰洋沿岸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区的首府。据我了解,这是苏联的国防工业中心,出产钚。1989年苏联政府承认并允诺拆除的、违反了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导弹追踪雷达站就建在这儿。有谣传说苏联正在这座城市附近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核废料倾倒基地,其中一部分通到苏联重要的河流叶尼塞河。在我看来这真是愚蠢之至,不过一个已毁掉了咸海的政府很可能做得出来。

我们向一个警察问路时得知,所有这些军事设施意味着我们必须绕城而行。从地图上看,进出城的路都是好的,但是城的外围以北的路同以往一样就没有标识了,也就是说无路可走——这意味着额外多跑出2天约300英里的路程。

我不知道若是我们不遵守规定有谁会来阻拦我们。到目前为止，每座桥上扛枪的士兵只在我们擦肩而过时露出不敢相信的眼神。在走过的3000英里路程中，我们只被拦住过一次。



行至西伯利亚的边缘地带，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路标——距莫斯科2470公里。

"我们当然不能住那儿的饭店。"塔贝莎说。

我同意她的看法。夜里，当我们把车停在警察局的时候，我们只是有时要出示一下签证，但是那些狐疑的饭店经理从来都要求看签证的。

"我们就开过去得了。"我说。

"当然了，"她说，想到可以避过坏的路段她就来了精神。"有好路走，我宁可露营在外。"

我点点头，"别出意外。我可不想因为走了不该走的路被克格勃找上麻烦。"

“别出意外。”她向我投来会心的微笑。

于是我们沿着平展展的柏油路向不开放的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很快便来到了一座重兵把守的桥。这些俄国士兵让我感到很紧张，但我目不斜视，盯着前方，假装是这里的人。我们两个都把速度控制得很稳。他们只是看着我们骑了过去，令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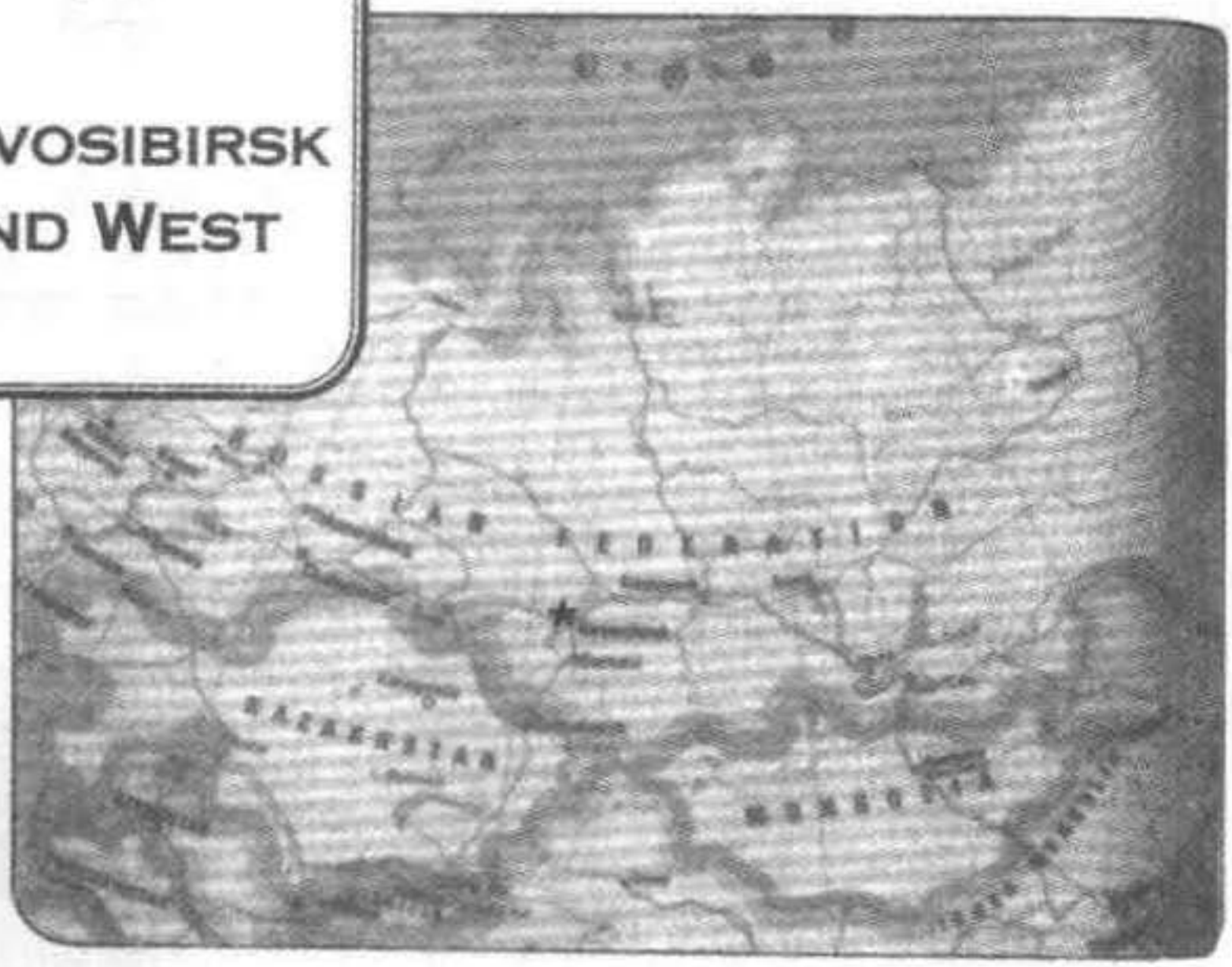
第二座桥到了，又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仍旧目视前方，方寸不乱。我能感到他们的眼睛扫视着我们。我们开到了他们的面前。没有人叫喊。我们开了过去。没有人冲天开枪。我不敢回头看。我们成功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市中心：宽广肃穆的街道，脏兮兮的高楼，大桥下有几十个钓鱼的人。

然后我突然醒过味来。莫斯科的克格勃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号施令，但这儿却没人理会！这个国家正在我们的身边眼看着土崩瓦解。

16

NOVOSIBIRSK AND WEST



16. 新西伯利亚和西方

NOVOSIBIRSK AND WEST

曾于1989年发生过煤矿工人罢工的凯莫若沃，我们见到了那儿的工会主席和一些矿工。

此工会因这次几十年来的首次罢工而使苏联上下为之震惊。他们很激进地告诉我们他们支持叶利钦，想要推翻政府。他们知道要靠罢工来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去见了奥莱格·

格拉祖诺娃。她是一份新近创刊但已面临查封威胁的独立报的头。一位雇员为我们的谈话进行翻译。

在我们会谈期间，一位军官和一位名叫考勒耐尔·索罗夫约夫的人先后走了进来，他们都是从新西伯利亚赶来的，目的是使报纸有所收敛，好自为之。考勒耐尔·索罗夫约夫给奥莱格留下的话是，假如报纸还不停止对军队的谩骂攻击，下个星期恐怕会出现严重的纸张紧缺了。

此报纸针对一张从匈牙利开回来的坦克的照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军队向这个没有地方存放坦克的小镇派来这些铁家伙呢？我们认为这是用来对付煤矿工人的。我们认为他们正在集结军队来镇压我们。"奥莱格把这段图片的文字说明指给考勒耐尔看，他回答说："不对，不是为这个原因我们已接受了第比利斯的教训。今后军队将保持中立。我们进驻军队和坦克是因为我们被从欧洲赶了出来，而这是他们能把我们安置下的唯一地方。"

我很惊讶于他们用如此理性的态度进行讨论，不感情用事，而且允许我们旁听。这样的会晤能够举行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因为如果是在不久以前，克格勃会干脆跑来说："封了这可恶的报纸！"或者他们会枪杀奥莱格。

但是矿工们支持这家报纸。假如军队采用高压手段，矿工们就会罢工。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之一。他们所有的炼钢炉、发电厂和火车都是烧煤的。老百姓自不必说，就连莫斯科的党员住的公寓里暖气烧的都是西伯利亚的煤。尽管他们的石油产量也很高，但维持苏联重工业的还是煤炭。要是军队酿成大错，关闭了西伯利亚的煤矿，那他们可要吃苦头了。

我不知道苏联的工人是否了解他们的雇主。什么价钱都没涨过看起来对工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哪个工人想要涨价呢？

苏联所拥有的资源可真不错。首先，他们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为865万平方英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几乎顶得上整个北美大陆一样大。俄国还是能源和矿产最丰富的国家，尽管开发存在着很大的难度——西伯利亚还没有被很好地勘测过。苏联也许蕴含着至少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石油，40%的铁矿，还有三分之一的磷酸盐，即使今天也没人知道这个国家财富的总含量。要是全力以赴，他们的钢产量会超过日本，化肥产量会超过美国，石油产量会超过沙特阿拉伯。不过这种提高产量的狂热跃进意味着产品质量、环境保护以及生产效率都被忽视了。

从理论上讲，假如俄国的产量上去了，同时把面包、房租、香烟和伏特加的物价保持在低水准的话，那它就永远不用涨工资。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假如拖拉机用的汽油永远不涨价，那么，小麦的价钱当然也就不会涨，因此面包也就永远不用涨价。

在商品繁荣的七八十年代，苏联向外界售出了大量的黄金、钯、煤、银、木材、天然气、铜、铂和石油，他们没给为他们钻井、开矿、播种和收获的老百姓付一分钱。当70年代油价涨到40美元时，莫斯科的财源滚滚而来。所有的钱都跑到统治集团手中，花到太空项目、洲际弹道导弹和世界水平的奥林匹克代表队上了。当权者治国无方，体制又腐朽不堪，致使2.75亿的劳动大军得到的只是勉强糊口的工资和仅够维持

的生活。假如把在帝国保护伞下做苦工的中欧工人也算在内的话，那人数可就更多了。

那为什么没能永远这样下去呢？要是他们没吸收外界的任何东西，要是他们有的是一个封闭的体制，要是他们真那么聪明，那为什么还瓦解了呢？因为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因为谁都没有动力去多做、多卖或赚取更多的利润。这酷似美国的邮电系统，或是国有的教育体系。想象一下，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以美国邮政的方式运转了70年会是副什么样子！

这就是苏联

问题出在真实的世界不断地侵入他们的体制。在那个世界里，价格是控制供应量多少的唯一机制。政府对付紧俏货品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抬高价格。我们在卡特的年代是不需要排队加油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油价上涨，让每个加油站都有油。由于价格涨上去了，人们开车就少了。价格总是调整供求关系的，这正是价格的作用，在两者间协调匹配。

假如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铜出现了紧缺，价格又不能上涨，那除非你派人去干，否则没有人会自发地出去搞铜。"去你妈的吧，"他会说，"我宁可去看场电影或喝上几杯伏特加。"但假如铜价可以上涨了，就会有很多人说："嘿，等等，要是我出去搞来点铜就能赚上一大笔。"于是人们开始开采贫瘠的矿场；那些原先50美分1磅无利可图的东西现在涨到了1.5美元，利润极为可观。废旧的管子和旧车上的散热器都送到了冶炼厂。

假如什么东西都供应充足，没有紧缺也没有错位的话，我猜想一个封闭的体制在理论上是能够运转的。这向来是俄国

人的理论:"我们有充足的一切,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共产主义,我们由中央来计划,我们有勤劳的人民,他们是一个新人类。"这种新人类还是由那种没什么变化的配方制成的,人们一成不变。据我所知,他们在过去的500年中就没变过,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让我相信他们在不久的某个时候会发生变化。

在苏联,低价位的一个后果是经常出现货物紧缺。每次外界的石油涨价,都导致苏联国内市场的供应紧俏。不过,共产党从来不告诉他们的人民,他们买不到汽油是因为把汽油卖到欧洲和非洲去换硬通货了。

在开往新西伯利亚这座西伯利亚的大城市的路上,我们巧遇一对夫妇。他们很兴奋地冲我们打招呼,示意我们停下,他们开着一辆很新的苏联国产拉达。伊果·库里考夫和他的妻子瓦伦蒂娜用蹩脚的英语自我介绍说,他们是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一带,也就是苏联四分之三的地盘上生产摩托车头盔的唯一私人厂商。

不错,早在美国还很穷的20年代,苏联就有很多摩托车了。库里考夫的顾客买头盔不是出于安全起见,而是因为有它看上去很西化。他们把戴头盔看作是一种时尚、帅气加洋气,是新潮的标志。按官价折合,一个头盔32美元,按黑市价是16美元。需求量很多,足以让这对夫妇装备起一辆进口的"加娃"牌摩托,加上配套的雅皮士服装,还有金链子。他们是俄罗斯新一代的企业家,生意做得很火,甚至搞到了两套一居室的公寓——这在苏联几乎是不可能搞到的——被他们拿来做了工厂。

他们坚持请我们去家里坐坐。他们家里铺着黑市上买来

的瓷砖，装备有洗衣机、炉子、立体声收音机和其他一些消费用品。他们拿出黑市上买来的鱼子酱、葡萄酒和肉酱来款待我们。

一两年前，当私人生产和出售商品合法化时，他们辞去了工厂里的工作，操起了生产头盔这一行。他们模仿在外国画报上看到的式样，精心地用玻璃纤维制作出头盔，拿到黑市上去卖。他们两个在厨房的操作台上共同创造出的财富是他们在工厂赚到的10倍，尽管要把利润的一半交给国家。

"这个国家不能往回走，"伊果对我们说，"我们要前进，变成像西方那样。我们不会答应老的领导走回到老路上去。过去已经死了。"

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邻居。这位邻居在阿富汗战争中患了战斗疲劳症，大腹便便，没有工作。我禁不住把伊果和瓦伦蒂娜看作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代表，而他们可悲可怜的邻居代表的是过去。

伊果和瓦伦蒂娜骑着他们的摩托跟随我们旅行了几天，他们愿意跟我们待一段时间，也很喜欢跟美国人一起游历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我们住的那些破饭店里很少有双人床，但他们告诉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总是睡在一张床上，因为一个会在半夜爬到另一个的床上。他们十几岁就结婚了，有一个孩子，结婚10年了，他们还是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相互支持。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关系还是很浪漫的。

从他们的婚姻中我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认识到这样长久的关系其实是可能实现的。我很遗憾他们不能再

跟我们前行，他们要回去了。

新西伯利亚饭店不肯让我们住，因为他们的客房对外国人来说"不够好"。哈！他们应该去看看我们待过的地方。于是我们住进了中央饭店，这儿接待外国人，但也险些把我们拒之门外，因为唯一的那间空房"对于美国人来说不够好"。哈，又来了！最后他们给了我们一间套房，就是那种基本能够达到最低舒适要求的水平。至少冰箱还能用。

一道道横跨马路两旁的彩旗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在这儿，特殊的场合很少，所以好奇心驱使我们停下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原来是一个节日的庆典正在举行。大家都带着自己的手风琴，跑来参加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是的，我们的确很想去看看。

那天下午，拉手风琴的和跳舞的人都聚到一个户外的舞台上。人们介绍我们认识了民间手风琴明星格纳蒂·扎沃罗金和他的夫人斯沃特拉娜。他长着一副宽宽的斯拉夫人的面孔，看上去热情洋溢。他在苏联的斯拉夫地区很有名，有他自己的电视专场演出和唱片。我们听说他的民族音乐和舞蹈是斯拉夫精神复兴的一部分。手风琴演奏出的斯拉夫音符如此摄人心魂，令陶醉的观众把这个节日命名为"拉琴节"。

他把我们介绍给大家。塔贝莎和我同其他参加庆典的人一起在舞台上跳起舞来。这像是一个将教堂的庆祝活动和乡村音乐还有方形舞融为一体的集合。音乐自然把人们带回到了过去曾有的美好的日子。格纳蒂想把他的音乐同政治分离开来，但我发觉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分子竭力想把他的音乐用到他们的事业中。

我请他为我给俄罗斯精神下个定义。“啊哈！火焰！星光！才华！喜悦！”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两眼放着光芒。对他来说这个节日没有政治色彩——然而是有的。他体现了一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东西——人们渴求找到一种仅为他们自己所有的共性。斯拉夫人通过格拿蒂的音乐和舞蹈追寻他们的遗产，这种于传统中寻根的方式同蒙古人和穆斯林都一样。

我们去参观了这位新朋友的乡间别墅，他们有两个孩子，16岁的安娜斯塔琪娅和11岁的扎哈尔。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别墅的位置。这儿离莫斯科还有3000英里，是西伯利亚的正中心，四面望去，除了大片大片未被耕用的土地外空空然别无它物，然而政府却只给全镇5英亩地，并且说：“好啦，你们可以随便在这5英亩地上盖别墅了。”因此，这儿就盖起了四五十座夏季木屋，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很小的院子和花园——全都挤在这块无边荒野中的几英亩地里。

我们在俄毕河里游泳，然后大汗淋漓地蒸俄国浴。格纳蒂拨旺炉火，然后等他把一些岩石烤热之后，再往上面浇水，这样就生出腾腾雾气。他们让我们用一根很特别的、一种有着像桉属植物一样香味的桦树枝抽打自己。妇女和姑娘们在屋子里脱光衣服，裹着浴巾冲进蒸汽里。当她们再也受不了的时候就出来，然后男人们进去，也待到再也受不了为止。

我们吃着、舞着、喝着、蒸着，一直玩到夜里1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在新西伯利亚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游行，几十个人聚集在到处都有的那种列宁像旁边，进行反对政府的示威游

行，一个男人抗议说他是一名战斗英雄，被多次授勋，但却领不到军队的养恤金。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抱怨。大多数的抗议都是要求得到更多的民主、改善经济状况、结束生活用品紧缺的局面。

我们去访问了高若多克学院的智囊团，这是当地一座在赫鲁晓夫时期修建起的学府，为全苏联第二大。我来此造访是希望能对发生的这些巨变有一个更确切的定论。在这儿我见到了一位讲英语的经济学家斯维特拉娜·穆拉多娃，她在这所学校教授资本主义制度的课程。我们就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了探讨。她说，由上至下的计划经济在苏联试图跨入工业时代的早期曾一度很有成效，但现在不行了。这个国家必须过渡到市场经济。虽说听来难以置信，但我记得据说有一位基辅的数学家曾计算过，仅对乌克兰共和国一地一年的工业产值做出足够详细的计划这项工作，就需要把全世界的人口雇用1000万年。计划经济除了效率极低，还退化为官僚拖沓作风严重、产品假冒伪劣，没有购买力，没有竞争意识，没有创新，只有永远的消费品匮缺。

“在共产主义说教了70年，计划经济实行了60年之后，”斯维特拉娜说，“我们的人民都指望国家来管他们。他们习惯了听命于上面，而不是采取主动。我们头脑中改变不了的看法是，富起来的人是投机分子，或者说开始合作经商的人本质上天生就是坏蛋。”她叹了口气，“事实是，市场经济行得通，而计划经济行不通。现在正在发生的有两大震荡。”她继续解释说，“硬通货的大笔收入导致了戈尔巴乔夫双管齐下的改革：透明度和机构改革。我们卖到国外的货品像是第三世界生产的，根本不像一个超级大国的优质产品。随着油价跌落，我们

过去卖1桶油能买到的德国机器，现在要用3桶油才行。”

我知道他们的贸易额只占全世界的2%，这对于一个超级大国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她说苏联从未有过通货膨胀。他们绕过了资本主义的这一弊端，因为他们从不涨价。在一个卢布按官价合16美分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只需花两三个戈比，而100个戈比才是1卢布——车费连一个便士的1/10都不到——买份报纸是2戈比。用我们的钱，走到哪儿都只需花10至80美分就可以住饭店里最好的房间。报纸是如此廉价，人们买了作包东西之用。在国营商店里，一瓶伏特加酒标价10卢布，相当于1.5美元。西红柿5戈比1个，差不多合1/10美分，但在国营店里未必能见到。而在自由市场上一磅西红柿则要50美分。国营商店里唯一富裕的商品是桦树汁。这位经济学家说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研究如何对付通货膨胀。她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和无助，在清楚地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件有多么重大的同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或怎么评说。

“排大队就不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形式吗？”我问，“花费在排队上的时间和精力不就在无形中成为一种使产品价格增高的税吗？”

她耸了耸肩，无力地冲我笑了一下。

就好像是给我自己一个显示他们的定价是何等荒唐的活生生的例子一样，我在新西伯利亚的一家招贴画店里买了100张招贴画——重15磅多——只需24卢布，差不多2.5美元。要是招贴画这么便宜的话，就难怪会纸张紧张了。接着我发现了一本只卖40美分，全部是沙皇图案的1991年日历。沙皇！透明度已如此透明，连原先的“压迫者”都可以这

样公开颂扬了吗？考虑到苏联瓦解后这东西会很有价值，我把它也买下了。这就像到了《爱丽斯漫游奇境》里的兔子洞一样，什么东西都没实价。

我在邮局把这 15 磅的招贴画寄到纽约竟只花了 28 卢布，3 美元都不到。苏联大婶细致周到地把我采购的这些东西包好，但我实在纳闷他们怎么能用这么荒唐的价格寄到世界的另一端。

塔贝莎在给我的车子紧螺丝的时候感觉扳子吃不上劲了，只是不停地转圈，拧不出“咔哒”一声。她发现把发动机的缸固定在曲轴箱里的两根长螺栓的螺纹已经磨损了，这终于解开了引擎里的机器碰撞之谜。她推测说，这可能是由于机器过热加上在那些破路上车子所受的颠簸所致。一是因为我们开得速度这么慢，没能使这个靠空气冷却的引擎得到适度的冷却，另外也因为那个大整流罩把热气整个罩在了里面散不出来。我们在把这些螺栓修好之前不能再往前开了。

我们四处打听，这是在苏联买东西的一贯方式。当然这里没有卖摩托车的。有一个人的孩子的历史老师认识一个汽车厂的人。我们在拐弯抹角的“朋友”介绍下，驱车赶往工厂，但愿那里的汽车技师能帮上忙，但愿他们有工具。

是的，他们愿意帮忙。塔贝莎开始协助工人一起解决问题。我在设想假如在美国去一个汽车厂请他们给你的摩托车帮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他们说，“好吧，首先我们得配零件。”有人想起来一辆捷克卡车的引擎上有差不多一样长的金属螺栓，也是两头刻着螺纹。他们夸口说，捷克货质量好。那个螺栓比我们需要的

大，所以得用车床削成我们要的尺寸。他们用的是在里面攻出螺纹的冲模方法，重新刻螺纹。但愿他们知道怎么能玩得转，因为我可是一窍不通。塔贝莎为了保证螺栓不被扭松，坚持要求使用一点我们带的零件，修完之后，应该说车子像新的一样结实了。不过，那些汽车工人还是给了我们几个备用的卡车螺栓，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17. 莫　斯　科

MOSCOW

我们的摩托车终于开上了通往莫斯科的五号大道。这儿不仅车流明显增多，而且车速也更快了，我们的心情也随着离首都渐近而越发兴奋起来。

现在每个交通岗楼上都有人站着。小卧车也比卡车多多了，这与西伯利亚的情形刚好相反。尽管如此，我们穿过的那

莫斯科

大片大片辽阔而空旷的地区还是令人很难相信苏联是世界上第五大产车国，年产量达 130 万辆。在为 90 年代制定的第 13 个五年计划中，汽车产量计划要翻番，但我对此能否兑现深表怀疑。

美国的道路上来往的车辆五花八门：野营车、大卡车、小卡车、摩托车、客货两用车；欧洲车、日本车、美国车应有尽有。但在这儿，全都是一种卧车和一种卡车。奇怪的是，卧车看起来像是意大利的微型车，没有什么精巧的设计，做工粗糙，硬邦邦的，没有真正的仪表盘——只是一个机件简陋的小盒子。俄国人 20 年来在同样的工厂里制造着同样的车辆，几乎没有任何改进。我们的摩托车比这些汽车马力还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当俄国人说“我们得建一个汽车厂”的时候，当他们四处寻找谁会帮他们建厂、教他们如何造汽车的时候，意大利人夺了标，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意大利共产党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党。菲亚特来到俄国为他们建了厂。实际上，俄国人还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名字把这个镇子重新命名为托尔亚蒂。所以直到今天，俄国人还在生产着 60 年代的菲亚特，只不过牌子叫拉达。

我们离莫斯科越来越近，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整洁。我们在一个集体农场停了下来。从莫斯科来的工厂工人正在那儿收割丰收的庄稼，他们的工资由工厂来付。不过，虽然喜获丰收，其中一半的粮食和蔬菜很有可能到不了消费者的手中，因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卡车都因为缺件少油闲置在路旁呢。在地里干活的工厂办公室的工人都说派他们来这儿是很愚蠢的政策。一位工程师说，让他到这儿来拔胡萝卜是浪

费人才。

农场的负责人说今年他们还要从美国进口小麦。他认为私人农场和足够的机械可以解决俄国的吃饭问题，虽然这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场上的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高产的自留地，而国营农场却从来没有好好挖掘过他们的土地的潜力。

我们越往前走，没有油或按每人10升限量供油的加油站就越多。我每天晚上听BBC的短波，所以知道海湾战争使世界油价上涨。我敢肯定苏联正以高价把它的汽油卖往国外以换取硬通货，而苏联人民还以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奇怪的供应紧缺。他们自然也不知道自己国家的石油产量多年来一直居世界首位。

从梁赞到莫斯科的150英里途中全部是四车道的大路。尽管路上车很多，很多司机开飞车，不管不顾，但我们还是觉得很痛快。当我们两个半月前在西伯利亚落地的时候，莫斯科还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而西伯利亚则敞开地铺盖了一大片。我每天都在地图上画出走过的一段——现在终于画到这儿了！

我们两个都兴奋不已。现在就要见到莫斯科了，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帝国的首都，超过中国，超过罗马帝国和西班牙。作为一个研究过历史和政治的人，我感到很难想象有什么人能够征服这么大的地盘，而我们如今正骑在1000 cc的铁马上朝着它的首都飞奔。

倘若你在鼎盛时期到过西安、罗马或是撒马尔汗，就会见识到无与伦比的富有和奢华。莫斯科原本应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可在这儿赶不上供货的时候连一条香烟都买不到。

莫斯科

买不到伏特加酒，买不到肥皂，买不到马桶，什么都买不到。虽说莫斯科统治着这个几亿人的大帝国，但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又大又穷的第三世界城市。城市非常之大，有的是那种大帝国所应有的高楼阔路，然而缺少的是生气，是神韵和深度。这是一座阴郁而沉闷的城市，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一个已失去信仰的灰色纪念碑。



我们骑车径直来到红场的圣巴西勒，这是游客留影的地方。



更令人纳闷的是，莫斯科自从沙皇时期以来就一直缺吃少用。莫斯科是苏联最富有的城市，然而就连亚拉巴马的伯明翰也比这儿商品丰富。哈莱姆有更多的日用品，随便是谁，

只要走进商店就可以买到。非洲的城市往往有更多的奢侈品——即使一般物品也更丰富，像牙膏、鞋、啤酒、衬衫、袜子。在这儿，就算你有钱，想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塔贝莎喜欢城市。在西伯利亚的旷野待了两个半月之后，她一心准备投入城市的怀抱，大城市的怀抱。在纽约，她喜欢漫步街头，观察市井生活，烤羊肉串的男子、各式各样的商店，在百老汇卖假设计师设计的新款手表的西非人，还有各色人等，一切都使纽约的街头充满朝气。我们每来到一座有魅力的城市，她总要花上很多时间出去走个没完。她会沿着最著名的街道漫步，就像城市学家 W.H. 维特那样走走看看，好像那些街道是可以在里面戏耍游泳的河流一样。她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一口气走了八九个小时，对自己的跋涉兴奋不已。

塔贝莎拿出两天时间在莫斯科漫步，每时每刻都期待着变得有趣起来。假如你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开始走，也许会觉得有点乏味，但离凯旋门越近，就越有看头。当她沿着莫斯科的大街一条一条走过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现在随时随刻都有可能看到有趣的东西。

她一口气在莫斯科走了四五个小时，一直没能提起精神。这座城市里没完没了，千篇一律的灰色令人感到压抑。街道上没有人，没有生气，也没有任何事情在发生。在纽约的百老汇大街上，总有人在送货。那天晚上她告诉我甚至没在莫斯科见着一个送货人。商店倒有那么几个，大约每三四个街区有两个，其中一个十有八九是烤面包店。在莫斯科漫步了一天的塔贝莎感到精疲力竭，而不是兴致勃勃，情绪非但没激起

来，反被压了下去。

我们早就听说过苏德尔，这是一座传说中1000年前比莫斯科还要大的镇子，但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它那无数座古老的教堂。如果说撒马尔汗的泰摩兰清真寺和秦始皇的兵马俑会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给乌兹别克斯坦和西安带来旅游业的财源，那么苏德尔及其周围地带将给俄国带来上千万的旅游者。

我们在苏联大地上走过的7000英里的全程中，看到的有特色的建筑不超过10座。这些位于外围偏僻之地的老教堂多年不用，已摇摇欲坠，许多都已被毁，或改作它用。很多漂亮的清真寺式的圆穹被拆毁改成了平顶。在这儿，离莫斯科几英里远的苏德尔地区，在一片绿色的乡村原野上，精心保留着几十座寺庙、博物馆、修道院及教堂。

苏德尔原先是一片土地肥沃、盛产小麦的地区，它是在1392年归入莫斯科管辖后成为一个寺庙中心的。后来在17和18世纪，富有的莫斯科商人在此建起了一座座小教堂来显示俄罗斯正教的纯洁脱俗——有时一个是给夏天用的，一个是冬天用的——每位商人都用尽心思标新立异以压倒前一座。我很吃惊共产党没把这些都给砸了。也许因为这是一座小镇，从来没有人想到把这些为宗教而建的精美建筑变成给工人住的公寓。也许因为莫斯科到下诺夫戈罗德的铁路就在苏德尔以南20英里的地方经过，所以也从来没让位于工业进步而将教堂拆毁。不管怎么样，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地区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些辉煌的宗教建筑和乡村的野趣，没有空气污染，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也未被丑陋的现代建筑所充斥。

说也奇怪，最漂亮的一座教堂叫“克里姆林”，始建于12世纪，完工于18世纪。它的顶是一个巨大的钴蓝色圆穹，带着金星，顶端为一个十字架，周围由四座同它一样的微缩小教堂环绕着，这五个建筑都矗立在扇形的山墙和粉刷过的石头上。

耶稣圣诞教堂里到处镶嵌着金光闪闪的17世纪末的圣像图画，许多绘画的风格是拜占庭同俄罗斯正教风格的结合。

不过苏德尔并不只有辉煌的建筑。像圣尼古拉的木屋教堂，仅能容纳20名信徒，但却把宗教的重要性带给了18世纪俄罗斯的村民们。

也许富商们建教堂只是为了徒有虚名地展示宗教的价值，然而这些静穆的建筑，长长的拱形走廊，还有这儿一尘不染的天空，都给我们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苏联见到的最迷人的景致。

我们惊讶地发现其中的一个教堂里有一块匾上写着，它属于纽约的俄罗斯正教教会法院。我简直惊呆了。纽约的教会法院是由白俄罗斯人——那些逃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沙皇追随者们建立的。我想，躺在红场上玻璃棺里的列宁一定被搞懵了，他万万想不到一个地区的教堂竟然向他最对立的敌人表示效忠。

为了问个究竟，我们去见了教堂的宗教领袖瓦伦丁神父。他说几个月以前，克格勃和莫斯科的大主教曾要求他监视外国来访者。他拒绝了，并因此被调到一个边远的乡村教堂里。然而他教区里的居民对此事不依不饶，于是他又被调了回来。不过对他的调回附加了一项限制性条款——叛逆者的教堂不

能够作为地方教会法院的成员——作为对他的教区居民和瓦伦丁神父本人的惩罚。

他往纽约写了信，请求加入俄罗斯以外的教会法院，申请得到了批准，就这样曼哈顿第九十三街的教会法院在苏德尔有了一个分支机构。

我们在莫斯科见到了马克西姆·克鲁格鲁，这位年轻的大夫不仅当年是班里的第一名，而且曾在全国医学竞赛中勇夺桂冠。然而，虽然他对医学抱有满腔热情，却被迫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医药业没钱。他说，在莫斯科医学院这所苏联主要的医学院里有一个专门研究保存列宁遗体的特行，每五六年出一个毕业生，不需要太多，挑选出来的尖子被送到红场负责照管列宁的遗体。

马克西姆说，因为有一次列宁的一只耳朵从头上掉了下来，从此就不许人们在瞻仰遗容时说话或发出响声，也不许把手抄在兜里，因为他们可能是阴谋破坏者。

现在时不时地有人在俄国议会上提出："我们干嘛不把他埋葬了呢？这很荒唐，他甚至不再是我们的英雄了。"但是他的墓以前是旅游者的一个主要景点，所以没法埋。马克西姆说，其实列宁当时是要求被埋葬的，他曾经留下过很详细的遗嘱，要求葬在他母亲的教堂的公墓里或是这一类的地方。当时斯大林跑出来说："不，我们要把他作为革命英雄树立起高大形象，所以把他放到红场上去。"他知道人民需要一个偶像，而他没有别的人可树。斯大林也想给自己在那儿留个位置，似乎是想显示他是这场光荣革命的另一位英雄。他起先被放在了列宁墓，但赫鲁晓夫在一天晚上趁着夜色把他搬了出

去。

马克西姆想去美国行医。虽然学到的东西一点不差，但这儿的医生工作起来不得不像造汽车的机械师一样：将就着对付。你也许是医术超群的大夫，但空有一身的本领，没有计算机化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没有盘尼西林，没有解剖刀和疫苗，你怎么开展工作呢？

莫斯科的地铁极为廉价，比纽约的还好。每站都有华丽的枝形吊灯，分别由不同的设计师设计而成。这些是斯大林建的，是他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好惊叹的了。

我们仍旧找不到莫斯科的心脏，找不到它的中心，或是什么闪光点。即便是被誉为莫斯科之中心的红场上也没有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景象。这座城市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没有生气，缺少色彩。

名为GUM的百货商店，空有一个大架子，里面的商品寥寥可数。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表情木然，严肃而冷漠，像是参加哪位远亲的葬礼的吊唁者。我们猜想这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微笑的事情，或是他们不想在公共场合露出笑容，害怕有人会问："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私下里同我们开怀地放声大笑，但在公共场合总是一脸的严肃。

在东京、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你都可以随时走进一家拐角的饭馆、酒吧或是古董店，随处一坐都很有意思。但在这儿，那样的地方一个也没有，也许根本不存在。在莫斯科你不会碰巧走进一家小古董店，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店。人们也

莫斯科

不懂什么叫宠物店。偌大的莫斯科可能只有3家咖啡馆，你可以坐下点一杯咖啡，就连许多非洲和南美城市里最差劲的咖啡馆都比这儿最棒的要好。

我们在莫斯科幼儿园见到了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她叫塔蒂亚娜，是一位身材修长、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她曾在劳动营待过4年，又被流放过4年。

“我们的人民终于觉醒了，”她说，“70年来我们就像这里的孩子一样，等着让我们的父母——共产党来告诉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没有主见，就像5岁的孩子，一切指望着爸爸妈妈替我们去做。打破老的思维模式不容易，不过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必须自谋出路、自己照料自己了，是饥饿和物质的贫乏让我们觉醒的。”

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很大的露天跳蚤市场上，德国的军服、设备和二战的勋章都有卖的，这些都是战败时纳粹仓皇撤退时丢弃的东西。俄国当年的敌人从柏林和慕尼黑作为旅游者回到这里，以惊人的高价买回他们的父辈和祖父50年前丢在这里的设备。

我们启动车子，离开了莫斯科。在古战场波罗蒂诺作了一下停留。我们到那儿的那一天碰巧是当年战役开始的纪念日，8月26日。可怜的拿破仑，他曾于1812年打赢了这场战役，但损失了那么多士兵，他最后的命运已注定。

当我们立在风中朗读拿破仑对士兵所作的讲话时，我听到了“1812序曲”的旋律。“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役，”拿破仑

对他手下的士兵说，“有一天你会自豪地告诉每个人，你参加了波罗蒂诺战役，让我们打赢这场战役，挺进莫斯科，这样我们今冬就都有暖和的公寓可住了。”

这里的冬天9月就开始了。甚至这么早我们已感觉到白天的气温比起几个星期前的7月有了明显的下降。我的脖子感觉到了：空气很清凉，上午和下午都很凉爽。

那些士兵一定也感觉到了凉意，自言自语说：“噢，万能的上帝呀，我们不想在这个地方过冬，我们宁愿回到巴黎。”然而拿破仑说：“别担心，伙计们，我们都会在莫斯科搞到房子住的。”他没有料到的是莫斯科会把这个地方全部烧掉。俄国人说：“好啊，你要这个地方，就拿去吧，但我们会把一切都烧光，把这座城市全拿走吧。”因此拿破仑输掉了这场战争。谁胜谁负在300年之后还真的重要吗？

我可以肯定的是那成千上万名青春被葬送在战场上的双方士兵都更愿继续活下去，而不是死在这场“伟大”的、如今已很少有人记起、更少有人在乎的战役里。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场战役改变了历史。难道真有人相信假如拿破仑赢了这场战役，法国在近200年之后还会控制着俄罗斯吗？

塔贝莎和我很高兴就要离开这儿了，因为冬天很快将至，这是我在中国和西伯利亚时很担心赶上的。

我们终于到达了布列斯特，这是我们在苏联要去的最后一座城市。

严格说来布列斯特其实是波兰的领土，但是斯大林想要，于是二战后就变成了他的，这是战胜国划分边界的又一个例子。现在人们呼吁边境稳定，但如果这段边境不加改变的话，

只会助长世界疯狂和扩张领土的野心。

我们在苏联这段行程中差不多已待了3个月，从6月到8月。我对于这段旅程终于成行备感欣喜，但就要离开又不免有些伤感。欣喜的是道路问题在欧洲将不再是问题，在那儿我们会有好路可走，有好的轮胎、配件和药品可用，还有钱。我将可以同这个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世界进行交流，我甚至还可能读到真正的报纸，自从离开东京我就再也没看过报了。伤感的是这次一生只此一回的旅行结束了。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看到的是一个超级大国在过渡时期的大全景。苏联正从冰封了几十年的冬季走向春天，这将是一个残酷的季节。

在边境我们看到许多人排着长队。波兰已经放开了价格和货币控制。他们的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而且有法定的比价。当然苏联还没这样做。因此虽然在苏联可买的东西不多，所有的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还是蜂拥而入，以滥贱的价格购买着能买到的一切。汽油在波兰是2美元1加仑，在苏联只要12美分，所有其他的东西——汽车、平底锅、壶、炒锅、冰箱、电视——都有同样大的差价。波兰人把这些便宜的苏联货买回去，在波兰以高于原价20～100倍的价格售出。

70年来一直重复着同样错误的苏联人没有去稳定他们的货币或价格，而是对出口加以控制。边境线上规定了大量不能带出国境的东西。有一个人被没收了许多平底锅。我们很担心带着的那些纪念品和苏联勋章，不过那些士兵觉得我们没法用摩托车带出去多少冰箱和平底锅，所以只对我们草草检查了一下。



18

ON TO IRELAND

18. 前往爱尔兰

ON TO IRELAND

我们在波兰的乡间骑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自由自在。货币是可以兑换的，所以不必担心黑市，也不必为到哪能找到吃的和汽油操心了。

波兰于一年前放开了一切控制。在华沙的每个街区都有卖万宝路香烟和百事可乐的小贩售货亭。在苏联售货摊很

少，而且卖的大多是国产烟，还要排上3小时的队才能买上。在波兰，这样的摊位还卖服装、糖果、威士忌酒、苏打水、收音机、电池、手电等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差不多都是进口的，都是些从我们离开东京就没见过的东西。华沙没几个人有正式工作，所以他们都靠上街卖货赚钱养家。由于货币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脑筋灵活的可以跑到柏林采购，然后拿回来卖。



波兹南的一个老广场。虽然现在它是波兰的领土，但几个世纪以来，波兹南时而属于德国，时而属于波兰。

在土耳其、中国和苏联折腾了这几个月之后，我们对这种老地方的魅力已没有情绪了。我们住在华沙的玛瑞托饭店，感觉简直像天堂。有我们想要的热水了！还有摆在洁白的桌布上的可口饭菜！有咖啡喝了！有柔软的被单，还有人给我们铺床！有报纸可看，还可以发传真、打电话。我可以拿起听筒，想给谁拨就给谁拨。甚至还在附近找到了一家体育馆。我都忘了这个世界原本是可以正常运转的。

柏林宝马摩托车专修点的修理工对于我们怎么能把车子毁成这样颇为不解。看起来这两辆车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遍体鳞伤，东拼西凑的零件，密封装置没有了，所有的地方都是泥，电线也松了，晃晃悠悠的刹车，深度磨损的轮胎。他们不得不给我的车装了一个新的曲轴箱，车头上的轴承也磨坏了。我们解释说不应该用这两辆车来做这次旅行，我们应该用那种长途旅行用的 GS 车型，轮子要大一些，挡泥板高一些，减震功能也更强。

按时间我们的两辆车都还在保修期内。宝马从来没有料想到人们会在保修期内骑得那么狠，不过他们的主管面带微笑地说，他们会给我们修好的。于是他们开始了大修的工程，为我们做了几千美元的维修，似乎是在向我们的跨西伯利亚之旅表示敬意。

我们去参观了在科隆—埃森地区举办的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展。

我被这些城市非同一般的整洁、富有、现代化和生机勃勃而感染。骑车去匹兹堡和克利夫兰就不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城市节奏明快，充满着朝气，一切设施都是新的，光

彩四射，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而且这里是鲁尔区，德国的“荒疏地带”，当年同盟军把能炸掉的工厂全炸掉了，他们的军队踏平了这一片地区。我经常被人问及，我们本来可以炸毁德国的工业中心地带从而赢得战争的，结果怎么会在50年之后反落到被人轻视的地步呢？

失败者重建家园时拥有一批好的劳动大军，都是些兢兢业业、有真本事的人。战争结束后，他们急于找出路，对工作抱着感激的态度，而不是傲慢挑剔。那时每个美国人都比德国人挣的工资要高。我们的货币很值钱，而这些人则一无所有，没有财产，没有钱。他们的工人付出的辛劳要多得多，而得到的报酬要少许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战败了，他们感到压抑，他们别无选择。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只有实打实地辛勤工作。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对未来忧心忡忡，因而攒起每一分钱，什么东西都不买。在二战期间，即使他们想花掉手中的积蓄，也找不到什么可买的东西。战后，被禁锢了15年的需求爆发了出来。不管你生产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出去。为了适应猛增的需求，负责生产的副主管被提升为公司总裁。营销人员在那时是不需要的，直到六七十年代，随着其他国家的工厂投产而使需求变得迟滞的时候。40年代末的美国其实靠的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受了战争的重创，而美国制造出的任何产品都不愁销路。另外，新建一个工厂的时候，美国人自然会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要么用在生产过程中，要么体现在开发的产品上。美国人说：瞧，1939年时我们是这样造留声机的。我们做了一点点改进，这是1947年的款式。

德国人没有被他们的成功绑住手脚；他们大步向前，改良

他们的生产进程和产品。

人们只有在逼上梁山时才会改变他们的方式。哪怕有一个预言家坐在那儿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假如这个东西还没有坏，他们就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要一个正从留声机生意中大赚其钱的人将十年不变的设计进行改进翻新，并且使用功能翻了一倍价钱还更低廉的产品来扼杀自己的成功是需要相当的远见卓识的。这有悖于人类的天性，特别是你制造出的产品在目前并不愁卖的时候。不过，这会使你处在那些乐意这样去做的人的威胁之下。在过去的35年中，这样做的人是德国人、日本人，以及仅有少数的美国厂家，比如惠普公司的激光打印机，他们不仅击败了竞争对手的产品，而且超越了他们自身的产品。

人们的思维模式被现有的状况限定住了。即便人们相信今后几年中一些事情将会发生，他们也只会说："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不是现在。"

二战之后的孟斐斯、伯明翰和亚特兰大差不多就像现在这么大，商业机会也像现在这么多。孟斐斯和伯明翰的商界领袖决定重建一个现代化的火车站，而亚特兰大的领导人则决定投资建一个新的大型国际机场。亚特兰大成为一座国际化的都市——甚至得以举办1996年的奥运会。由于缺少适合这种大场合的基础设施和名气，孟斐斯和伯明翰没有提出申请，因为他们很有自知之明，不想成为世人的笑柄。

不过我很怀疑在这个经济伊甸园里的苹果中是否长着危险的蛀虫，一只在欧洲的中心噬咬着、直到把这枚可爱的果实之精华部分消化殆尽的蛀虫。

欧洲统一市场是一个5亿人最终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隔墙的贸易群体，在这把大伞下的每个人都得益于这个新的开放的大市场。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就像弗吉尼亚人可以同加利福尼亚人自由贸易一样。这一巨大的经济进步将欧洲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

然而，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始终没有像人们说的那么大。在这些国家彼此间开放边境的同时，也对外界建起了保护主义的高墙。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保护了一些部门，像汽车业、电子消费品以及办公机械，这样做单看短期效果还不错，但欧洲正在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自1970年来，共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一直集中在一些不太复杂的产品上，比如他们的葡萄酒，但不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改良动力。我相信在5～10年的时间里，他们会为贸易保护主义付出惨重代价的。

保护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地方的生产者一向有此强烈要求。法国生产小麦的农民想受到保护，不为美国小麦所冲击；德国的炼钢者不想受到韩国产钢者的冲击；美国的汽车制造者想避免同日本和墨西哥同行们的竞争；日本的产稻者也想避免同美国的竞争；同样，美国的蔗糖种植者也不想受到拉美的冲击。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且呼声很高，很有组织。这种组织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里都发起政治战，雇用说客，要求实施保护主义。

不管怎么样，要求保护美国汽车工人的饭碗听起来是很爱国的口号，还有保护西北的鞋厂工人和南方的纺织工人等等。我们都需要保护，不是吗？

答案是不，我们不需要。保护主义不仅搜刮了我们的腰

包，还夺走了我们的社会。消费者可没有替他们说话的政治领袖，也没有说客，更不像他们那样能说会道。

假如国会对进口钢材建起保护主义的高墙，锡皮罐头的价格就会上涨，不过1年可能只涨1分的1/8，不足为人察觉。汽车的成本1年可能会上涨4%或5%，而不是2%或3%。不过，还是不足以让你去雇用说客上街抗议。然而，时间一久，产生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了。受保护的工业停滞不前，不思进取，他们的产品变得质劣价高。60年代没有国外竞争的美国汽车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都一度稳占市场，结果很自然地造成了制作不精但价格高昂的局面。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面临着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时不时地发出的要求利益的呼声。而剩下的我们这些消费者则没有组织起来，为我们少付1/8分的罐头钱或是福特车钱而呼吁。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共同市场总是往后看，尽量保持原样不变，而不是向前去接纳新事物。它利用保护主义来避免工业改组，导致了欧洲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落后于美日，同印度和非洲相比还可以，但跟中国的南方、台湾省和韩国相比就不行了。

不过现代经济学有一条铁的规律，世界在变化，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避免机构改组，回避不断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需求来保护自己，而且世界是会变化的，只有死脑筋才会对这一点有所怀疑。它不仅一定会变，而且在新的时期变化的速度还将更快。唯一的问题是一个国家该如何去迎接这些变化，他们是应该改革、创新、竞争，还是把脑袋埋到沙子里，自欺欺人。当日本人把他们设计精良、物美价廉的汽车销往世界上

的其他地方时，难道美国会把他们70年代的破车型永远生产下去吗？美国公司设计不出随身听，美国人就永远都不买吗？

一个政府要做的就是营造出一种环境，迫使它的文化、社会、商业和机构去适应，不适应则灭亡。这听起来很严酷，不过变化的到来是几乎不为人察觉的——而经济停滞、高失业率以及最终灾难性的崩溃这些长期实行保护主义的后果要更为严酷得多。

可有有说服力的例子？苏联、非洲、墨西哥，还有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再次回到文明世界的塔贝莎对于是否继续旅行又动摇了。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穿越欧洲，再把非洲一通到底，从好望角跳到澳洲，再从那儿飞往南美洲的最南端，然后一路开到阿拉斯加。穿越了中国和西伯利亚对她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业绩了。

我们邂逅了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国人，他曾骑着一辆宝马摩托车游遍了非洲。他给我们介绍了那里的情况、道路、护照，以及会遇到的问题。在慕尼黑的泰莱西恩大街，我们逛了一个名叫达尔的商店，这是一家专为穿越非洲的陆地旅行提供全套装备的大商店。

菲利克斯和达尔的出现似乎使塔贝莎有些回心转意，把她推向了这次探险之旅。不管怎么说，这儿有一个叫达尔的大商店，专门卖穿越撒哈拉和非洲丛林的旅行者需要的行头。我们当然从没见过专为去西伯利亚旅行提供装备的商店，但我们也已经做到了，不是吗？达尔这样的商店让人觉得到非

洲旅行好像是许多人都会去做的事情。要是有一个大商店专门经营要用的物品，那非洲之旅还会有多么遥远和困难吗？

非洲！我们真的要去兑现挂在嘴边的环球旅行吗？

骑摩托穿越非洲，穿过撒哈拉大沙漠和扎伊尔的泥沼。我们听说过有人——生还的幸运者们——半身瘫痪了或瞎了，有的瘸了或缺胳膊少腿。还有的瘦得像骷髅，两眼突出，皮肤变色，嘴唇也同牙齿分家了。虽然西伯利亚是一片未知的荒野，但至少那里没有战争和流行病。而非洲则意味着皮肤病、虱子、麻风、伤寒、麦地那龙线虫、甲肝、乙肝、黄热病、雅司病、肺结核，当然还少不了疟疾。非洲意味着瘟疫、布鲁氏菌病、脚气、斑疹伤寒、变形虫、霍乱、天花、小儿麻痹、三种痢疾、鞭毛虫病，流水会让你得盘尾丝虫病盲症，止水会让你得血吸虫病，加上舌蝇和昏睡病。要是我们得了病，先不用说病得多厉害——至少有一个人是难免病倒的——那可没有什么药可吃，更没有多少医院可去。关于非洲的书上尽写着旅游者死于中暑、脱水、神志不清、呕吐、虚脱，还有两种连续持续数日的腹泻。还有一些旅游者要为保全性命而战，或是死于尚未查明的原因。

我们知道要行贿。有人问过我旅行最害怕的是什么，我说是过境。边境的士兵掌握着旅游者的生杀大权，全凭他一句话说了算，没有上诉权。多数非洲的边关都很偏远，与世隔绝，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

然后还有战争——部族间的、内战、游击队——许多是不经宣战也不加报道的，是随时爆发的。非洲没有"文明"的战争，交战者不会乐意帮助两个愚笨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这儿的战争中每个人都拼命要生存，是你死我活式的原始斗争。

更重要的是，我并不是一个比我的车和钱更大的猎物——可塔贝莎呢？她年轻漂亮，是个身材高挑的金发美人。我敢带她去那儿吗？我们住在哪儿呢？会有安全保障吗？西伯利亚只有一种动物，而在非洲我们甚至不知道等待我们的都有什么样的动物，还有非洲过后的南美洲。我们对鳄鱼、河马、犀牛、鼓腹巨蟒、非洲野猎狗、眼镜蛇、土蛇、美洲豹、蝙蝠、野狗、狮子、老虎、猎豹、大象、猩猩、毒蜘蛛、狒狒和蟒蛇的肉食习性一点也不了解。丛林里还有更多的我们说不上名称但很凶猛的动物。我们听说豹子特别厉害，它们会耐心地在帐篷里等你回来。

就算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某些美国人的想象，就算这些都是非洲的老皇历了，我们还是得担心汽油、钱、配件、路况、语言、吃的和喝的——谁知道会怎么样呢？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什么。

塔贝莎和我已经骑着摩托车从爱尔兰穿过中国到了日本，然后又从日本穿过西伯利亚回到了爱尔兰，目前我们在伦敦稍作停留。假如我们真要环球旅行，下一站就是非洲，从突尼斯到好望角。

“我做好继续前行的准备了，”在伦敦休息了一个星期后我对塔贝莎说，“我已经开始环球旅行，并且走了近一半了，我要把它走完。”我们为此又讨论了几天，我又一次不能肯定她是否会跟我一起去。

终于有一天晚饭时她说：“好吧，我去，不过要答应我不再赶路了。”这个要求不难满足。中国和西伯利亚的2万英里路够难走的了，常常是未铺设的土路，尽是泥沼和大坑。非洲的路将更不好走。

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打预防黄热病、霍乱、破伤风、伤寒、小儿麻痹和肝炎的免疫针。办完十几份非洲国家的签证。买帐篷、蚊帐和滤水器。还要备好摩托车的配件：垫圈、火花塞、滤器、保险丝和电缆。得找一把折叠铲、一个罗盘。还得带点药片，抗生素药，补充出汗过多用的盐片和绷带。还有防裂唇膏，这对于日复一日暴露在风和太阳下干裂的嘴唇来说是必备品。还有地图，我们需要地图。购物单上的东西似乎没完没了，而我们若想避开冬天，时间已很紧迫了。

办公部门下班以后，我和塔贝莎就在伦敦的街头闲逛，心情很舒畅。我想不出来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我还更愿意跟谁一起作这次旅行。

为了使这次旅行真正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再从太平洋返回大西洋的环球旅行，我们匆匆踏上了前往爱尔兰的旅途。

趁塔贝莎的母亲贝菲50岁生日之际，我们邀请她同我们过一段时间，希望见到她的女儿能减轻一些她的担心。于是她飞了过来。她的祖先是爱尔兰人，但她从来没有来过。她毕业于韦尔兹利，年轻时像位美丽的皇后，如今正打算在为人妻和为人母之后重新开始一样新的工作——护理。

贝菲抽泣着恳求塔贝莎不要再跟我去了，她求她的女儿在她变成截瘫前回到美国去。然而，塔贝莎决心已定，她很坚决地坚持着自己的安排，不过也尽力宽慰她的母亲。

我们在首都柏林看到了《凯尔之书》，全书340页，于公元806年手工制成，不愧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书。这本书带来了旅游业的发展。因为它的存在，存放它的那个图书馆有了专

门的导游、纪念品店和参观的游客。我在学校的时候，谁都可以走进这所图书馆来看这本书，现在则需要经过一大套繁琐的手续才能看到。

我很想看看为英国杰出的英雄纳尔逊而建的纪念碑，还记得做学生的时候我曾爬过那儿，但是后来被国际读书协会炸掉了。150 年的历史，"砰"的一声就化为乌有了。人们总是做这样的事——美国毁掉了乔治三世的塑像，苏联毁掉了列宁像——好像他们把这些炸掉或捣毁了，就可以改写历史似的。

在当昆，我们前去探望了邮局的凯宾夫人，她为我们一路骑到东京，穿越了中国和俄国，又跑回来看她而喜出望外。我们坐下喝了更多的茶，买了更多的明信片，在地图上指指划划，放声地畅谈我们的经历。

我们在南部海岸找到了凯文和巴瑞，那两位第一次帮助我们的摩托车骑手。在他们的邀请下，我们把贝菲带在后座上一起去了一个摩托车酒吧。这位康涅狄格的家庭主妇坐在摩托车酒吧里，对我们谈论的整个旅行一脸的茫然，不过她不得不承认很喜欢骑摩托车旅行的野趣，同时也对自己对摩托车文化的反应感到不解，惊讶于自己竟然发现这些粗犷的骑手很有魅力，令人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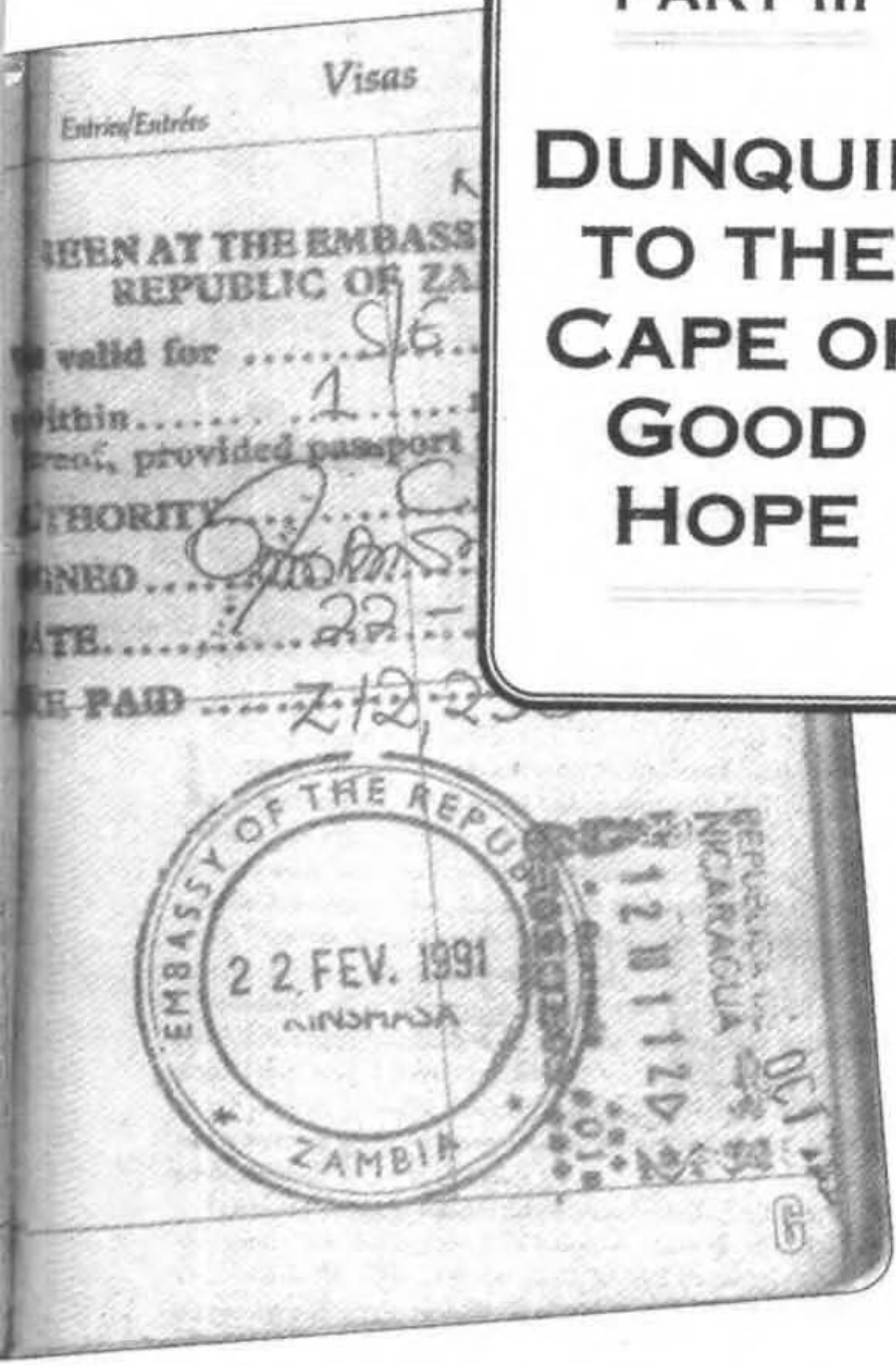
贝菲跟我们旅行了一个星期，又回到了英格兰，临走时同女儿难舍难分，生怕这是她此生最后一次见女儿的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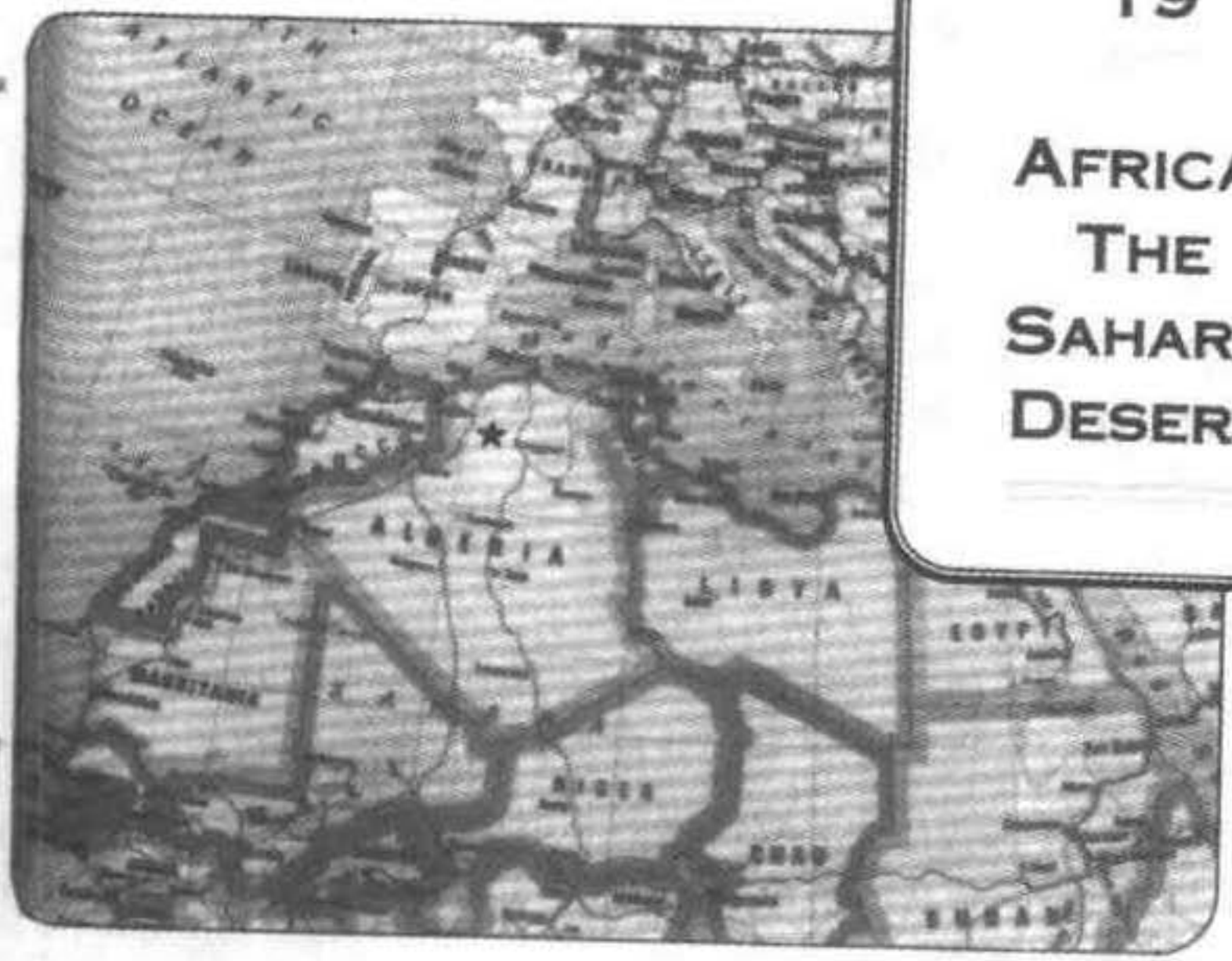
我们在伦敦去了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使馆办签证。塔贝莎已下定决心，做好了去的准备。下一站是北非，然后直插撒哈拉大沙漠，经中非南非到好望角。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环球旅行已完成了三分之一，干嘛不全走下来呢？


Visas
Departure/Sortie
ZAMBIA IMMIGRATION
SUMBALESA BORDER CONTROL
ENTRY KSM
16 MAR 1991
Holder of
Valid to
REPUBLICA DE
NICARAGUA
ZAMBIA IMMIGRATION
VICTORIA FALLS ROAD
BARRIER
22 MAR
EXIT

PART III

DUNQUIN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19

AFRICA: THE SAHARA DESERT

19. 非洲：撒哈拉沙漠

AFRICA: THE SAHARA DESERT

在突尼斯，塔贝莎遭遇了最难缠的大男子主义：这种阿拉伯和意大利精神的混合体像不稳定的炸药一样，似乎随时可能爆炸。男人们不怀好意地对她挤眉弄眼，她一个人上街的时候总有人尾随着她，并朝她发出猥亵的怪声。在街上，她被人故意冲撞。尽管大多数突尼斯妇女都穿西式衣服，但塔

贝莎的黑皮夹克和太阳镜似乎特别显出她是“放荡的西方金发美女”。

我们在1990年11月到达突尼斯，美欧盟军在几个月后轰炸了伊拉克。而这时的突尼斯四处弥漫着政治危机的气氛。突尼斯是阿以冲突中伊斯兰政治活动分子的天堂，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阿拉伯世界的瑞士，还是许多被西方视为罪犯的伊斯兰教徒的集合地。

往东北10英里便是迦太基。3000多年以来，仅仅是这个名字便能激起世人的恐惧、敬畏、嫉妒、崇拜和向往。一想到去见这样一个寓言式的城市，感觉就像要见到戈壁滩、西伯利亚、撒哈拉沙漠、安第斯山脉或是麦哲伦海峡一样令人悚然。所有这些地方我都在书中涉猎过、研究过，也曾梦想过，但从未敢奢望亲眼目睹。

迦太基是蒂多皇后以腓尼基的城市泰尔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个滨海共和国。它对西地中海近千年的统治在三次布匿战争中受到古罗马的威胁。罗马人决心摧毁这座城市。这场斗争在公元前146年以古罗马凯托监察官的宣言《迦太基宣言》结束。在持续3年的围城后，古罗马对迦太基发动了长达17天的猛烈攻击。罗马人铲平了这座城市，把地犁了个遍，然后撒上盐，这样确保他们的敌人被断绝了资源。

在迦太基的废墟上所看到的现实与我从几千年历史中获得的想象相去甚远。尽管迦太基曾经是古代世界的主宰，但罗马人把消灭它的事业做得如此彻底——几百年来他们甚至把城市当作采石场，其遗迹令人深感失望。在那儿能看到的大多是罗马人的东西，而且可看的也不多。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简陋的港口和两个小盆地曾经驻扎

着一支征服世界的海军。想当初，赫尼巴尔的军团就是从这儿进军欧洲，穿越阿尔卑斯山，最终打到了罗马。南部的港口是商业航运的中心，迦太基在这方面也是独领风骚。北部的港口则是海军基地，中心的岛屿是海军总部的所在地。让我惊叹的是，历史学家们说这儿可停泊多达220条的战船。

城市坐落在海湾的最佳位置，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城市里的人口也未超过2万。如同撒马尔汗、莫斯科和西安一样，我无法不被这些地方的古代居民所折服，我想象不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是如何创造出这些奇迹的。我只能发现一点，那就是，大船上的好水手能征服那些仍在小船和木筏上求生的人而成为主宰。

被罗马人攻陷200年后，迦太基再次成为地中海一个繁荣的城市。公元439—533年，它成为汪达尔王国的首都，这个地位甚至保持到它被拜占庭人占领之后，直到公元697年它又被阿拉伯人吞并。

突尼斯的历史则平淡多了。迦太基的要塞泰尼斯先是和迦太基一道被攻陷，之后重新崛起成为突尼斯城。这个兴旺的小城市先属罗马后归拜占庭。公元9世纪，阿赫拉比第四代统治者亚伯拉罕·艾哈迈德一世在这儿安了家。

城市里的现代部分是法国式的，实用性很强，因而平淡无奇，几乎没有什么特色。这儿的伊斯兰教呈现出自由、开放的形态。漫步其间，我们感受不到是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里，更不用说是在非洲了。这个实用而闲适的现代城市和旁边的历史古迹形成一个奇异的混合体，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没有什么可以永恒不变。

由于这里是流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驻在地，我们保持了一种低姿态。为了尽量不显眼，我们换了新的车牌照。新车牌上有合适的牌照号，却没有表明我们注册地的诸如“亚拉巴马”的字样。虽然这是全世界通行的规则，在这儿却没人注意这个。

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跋涉等待着我们，是对我们的摩托车之旅的又一挑战。

撒哈拉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沙漠，面积相当于美国南部48个州的总和。南北长达2000英里，东西两端的距离相当于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在南北边缘有开发出来的道路，而中部则是近500英里的沙丘和岩石，没有生命、没有路。我们正是要穿越这个地带。

我们计划沿着“西部大沙海”的边缘走。这片沙漠本身足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成为一个一流的沙漠。而在撒哈拉，它那7000平方英里的沙石被湮没在了比它大几十倍的荒野之中。

6000年以前的撒哈拉很像今天的东非，是一片大草原。实际上，就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这里还是猎手云集的地方。在罗马时代人们饲养畜禽，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公元前，马匹一直是这里的交通工具，只是在公元后，随着这片土地逐渐沙漠化，骆驼才取而代之。

正如人类今天谴责自己所做的一样，这是自然界在“破坏环境”的又一例子。如果锯齿山脊俱乐部在此，它将收到上新世岩最高法庭的传单，要求它阻止大峡谷把西部一片绝好的地产侵蚀掉。

尽管撒哈拉延伸至北非各个国家，它的大部分却在阿尔

及利亚境内。阿尔及利亚的面积三倍于得克萨斯州，而六分之五的土地都被沙漠侵没。在这片无垠的荒野中居住着阿尔及利亚十分之一的人口。阿尔及利亚总共有2600万人。

涉足并穿越撒哈拉是现代旅行中最富挑战性的一段旅程。这可不是为那些找乐子的旅游者准备的，因为在撒哈拉的版图里，没有路，没有旅店，也没有加油站和饭馆。既然没有铁路和巴士穿行其间，那么任何一种可用的交通工具都不会是舒适的。撒哈拉的气候不是酷热就是严寒。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沙漠里也没有水和食品。在沙漠里，旅行者不是遭遇到可怕的情况，便是行进在一个毫无生机的世界里。

我们买了宽沿帽、水壶、油桶，还有枣，因为它不会坏掉，因而成了沙漠旅行者的必备之物。我还想找一辆有司机的卡车与我们同行到南部，这段旅程中多准备一种交通工具以及充足的水、汽油和食品显然是明智的。

如同我们不想在冬天穿越西伯利亚一样，我们也不想在夏天跋涉撒哈拉，因为这时的气温会把摩托车连同我们一起烤坏的。

我期待着这次旅行，它将是我的摩托车生涯里最刺激的一段体验。塔贝莎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仿佛她已预料到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在等着我们。

我不知道她这种女性的直觉是有的放矢还是无事生非。

我们用曲柄打着了车，驶向阿尔及利亚。

途中经过了欧洲军事公墓。每座墓都保存完好，一色的白十字架绵延数英亩地，收留着很久以前死于各种战争、起义和暴乱的亡灵。闯进他们的世界里令我们吃了一惊，同时又

感到悲哀：这些年轻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永远躺在远离自己绿色家园几千英里的荒漠里，为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他们的后人也未必清楚他们为什么而死，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曾曾祖父皮埃尔是为某种据说是高尚的事业而献身的，尽管这种事业早已被人遗忘。

在今天，谁还会记得拿破仑因出兵欧洲，企图推翻神授的王位，把法国革命的恐怖之风吹遍整个欧洲大陆而遭世人的仇恨呢？多少人还能说出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死于18世纪的波兰—瑞典之战？

追溯到那个时代，波兰和瑞典国王各自统治着自己的王国，其意义对他们来说自然重大。但时至今日，非但这些王朝早已烟消云散，王国的疆界也是一改再改，而那些20来岁的青年曾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今天我们看待这场战争不过如游戏一场。历史会证明，除了它自己，谁也不是最终的赢家。

我们驻足于几十次古代战争的产物前。这其中有几次战争是值得为之捐躯的呢？如果历史的全景就是权力中心不断地转移、国家的边界被改来改去，那么有什么理由让这些20来岁的青年用生命的代价来加快或减缓这本不可逆转的过程呢？

我强烈的反战思想始于牛津大学。那时我常常经过巴利欧石头通道。通道的一头刻着数百名死于一战的英国青年、上尉和中尉的名字。另一头的一小块地方则刻着在巴利欧的德国学生的名字，他们也死于同一场战争。1905年英国和德国以最快的速度结成了同盟，这批送往巴利欧读书的德国学生就是明证。等到了1914年，同盟却互相残杀。这真是太荒唐了。

有一天我和一群西班牙朋友聚在一起，那年我们都22

岁。我们一块儿喝酒唱歌，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子。如果这时我的政府要向西班牙开战的话，我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射杀这群伙伴。我被这个想法吓坏了。那天晚上我的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在那以前我一直都不能像这样看待战争的实质。

阿尔及尔比突尼斯大且更古老。在塔贝莎看来，它没有开罗有意思，尽管这儿也有卡什巴。

我们大都是从40年代的电影里知道卡什巴的。这是一个被老式建筑、高架通道和挂着帘子的阳台包围着的集市。在阿尔及利亚革命时期，叛乱分子飞快地钻进卡什巴里，好像法国人是猫，卡什巴是老鼠洞似的。

签证不好搞，我们作这样的旅行不可能事先拿到所有的签证。在阿尔及尔我们设法取得中非共和国和喀麦隆等国的签证，它们是我们去往目的地开普敦的必经之地。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寻找扎伊尔使馆，最后终于找到了大使官邸，最终却发现使馆就在街对面。

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完全是一团糟。这又是一个被中央集权的政府引入歧途的例子。它的经济实力在非洲国家中并不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170美元。相比之下，撒哈拉外围的国家除南非以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400美元，而发达的工业国家则近12000美元。然而，政府却没管理好这个国家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潜在财富。

对于中央集权制，我当然不想别人误解我的观点。我并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政府必须行使许多立法职能，这些职

能大都跟公共安全有关，诸如国防、警察和消防、航空、房屋验收、食品检查、灾害防治等等。只是经过一个世纪的试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可以对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带来多大的危害。

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六七十年代，它曾被奉为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典范。社会主义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致力于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但今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政府运作的功劳，不过是石油价格上扬之故。那时表面上看来适度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利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在70年代并不鲜见。

今天，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占阿尔及利亚外汇收入的95%，油价的每次跌落都会给这个国家造成重大的打击。它的粮食生产曾一度自给自足，现在却严重依赖进口。阿尔及利亚的失业率达25%，通胀率20%，人民的住房短缺。就在我们到达的两三年前，飞涨的物价和物质匮乏曾导致平民骚乱，军队为此枪杀了数百人。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这种看法至今仍未消弥。

阿尔及利亚的黑市猖獗。最后，外界的东西全都进不来，连西方的报纸杂志也不例外。

这个国家的货币也是我们遇到的最不合理的货币。黑市上我们的1美元可换到30第纳尔，而官方汇率则是1比10。从这么大的差价上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古怪经济政策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已运作到了头。200%的利差足以使人们敢于去黑市换钱。假如利差只有20%，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就不愿冒犯法的风险了。

由于法律禁止进口国外的物品，我们很难在这儿找到外

国货。国家负担着200亿美元的外债，由其外汇收入来填补。如果中央银行有剩余的硬通货，那合法的商人就会用它们来购买索尼电视、意大利皮鞋和新西兰羊腿肉，然后再卖给合法的顾客。但由于这些硬通货都用于偿还外债利息了，银行不名分文，于是商家难做无米之炊，百姓也就什么都买不到。

因石油限价而造成的汽油价格下跌，使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陷入更深的困境。因为便宜，人们用起汽油来毫不吝惜，就像苏联的便宜面包被男孩们当成足球踢一样。为了减少这里的消费，政府必须把价格抬到和全球市场价格一样，并最大限度地将汽油运往国外以换取急需的硬通货。

这些经济问题是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阿尔及利亚人要找出对这些问题负责的对象，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他们必须找出替罪羊，譬如他们的政府或西方人。

但西方人自60年代早期就离开了，世俗的社会主义分子接着统治了这个国家达30年，于是人们说："要怪就怪那些不信神的人。"

由于阿尔及利亚的产业得不到发展，中央集权的政府如今面临选择：要么继续限制进口和控制货币，要么实现货币贬值。后者会导致进口价格和国内物价的飞涨；但另一方面，继续控制货币将使黑市上的汇率差越来越大，最终，硬通货将在国内市场上消失，因为没人会要第纳尔。这意味着没有钱买外国货，而国民经济又生产不出什么东西——当然没有能与日本汽车、意大利皮鞋和新西兰羊腿媲美的东西——人们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差。最后，政府被迫贬低第纳尔的价值，于是，一时间洋货和国货都会变得更昂贵。

于是乎，政府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无论它怎样做，都无异于政治自杀。我知道它现在的唯一希望是实行货币的自由兑换，不过还得设法平息因物价飞涨所带来的政治风暴，至少要让人民能买到东西。

有类似遭遇的波兰政治家们在山穷水尽之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人民跟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几乎不生产什么东西，又买不起外国货。于是他们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居然奏效了，兹罗提的汇率直冲云霄，但问题不大，因为这才是它真正的价值。于是商品涌了进来，政府保住了它的地位，一切平安无事了。

不幸的是，波兰人没有保住江山。政治家和他们那些象牙塔里的西方问题专家们对民主能解救他们抱有十足的信心——只需看看美国和德国就知道民主即意味着巨大的繁荣——以至于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其他的措施。不错，万宝路香烟和丰田车是有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把什么东西卖给外界以换取买这些香烟和车的钱。

几十年来，粗制滥造、管理落后和资金匮乏决定了波兰人很难生产出外界需要的东西。即便是这样，政府仍然感到不能解雇没有生产力的工人以减少开支，害怕这会成为另一种政治自杀。因此，它只有印钞票来支付这些工人的工资，然后像孩子般盼望着有一天民主会突然带来繁荣。

这些钞票使国家又一次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由于政府已不能控制汇率，没有哪个会要愈来愈不值钱的兹罗提，因而波兰货币的购买力再次惨跌。一旦你在没有后盾的情况下印制钞票，那么钞票印出来了也没人要。百姓还没那么笨。就算你把那些纸叫做钱，但没有真正价值的钱是买

不了什么东西的。

我能切身感受到我所在的阿尔及利亚正在沸腾，蛰伏在爆炸的前夕。不错，它现在仍处于严格的控制下，但这能坚持多久呢？这又是一个遭到惨败的国家，就像苏联一样，人民正要求变革。

在驶往撒哈拉的路上，我们经过了更多的罗马遗迹。村镇的集市上堆满了石榴、梨和苹果一类的东西，但别的就没什么了。渐渐地，周围的乡间景象愈来愈像沙漠了。我们越接近撒哈拉，集市上的东西就越贵。倒是政府专控的汽油是便宜的，只有欧洲价格的一小部分，相当于黑市兑换后价格的1/3。

撒哈拉的疆界始于阿尔及利亚南部边境400英里处。塔贝莎仍然惴惴不安，我却开始激动起来。在沙漠中跋涉一直是令我心旷神怡的事。那里蕴含着一种浪漫，一种荒凉的诗意。像撒哈拉这样的沙漠，就如同竞争激烈的市场一般，容不得你犯错，它逼迫你专心致志，时刻保持着清醒——天啊，如此美丽的沙漠！

我们不紧不慢地向南行进，把能带的水、食品和汽油都带上。地域愈来愈干燥和不平；绿色植物少了；加油站越隔越远；情形对动植物越来越不妙了。

两天后我们到了莫赞比，一个长满灌木的山谷。这里居住着伊斯兰的一个清教派别莫赞比人，他们分住在5个村镇，独立于这个国家。

我们在最主要的镇子嘎达亚停下。5个镇子都建在山上，最高处都有一座独特而没有装饰的尖塔。他们不准我们

进入班尼·伊斯艮镇，这是莫赞比的宗教之地，镇名是“虔诚”的意思。

我们从阿尔及尔的城市文明中而来，那里很少有女人戴面纱；在这儿我们进入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领地，女人们用一块布把自己从头到脚地裹起来，只从折叠处露出一只眼睛。

我们住进了山上一个三星级的旅馆。来时走的是不错的双道柏油路，而前面等着我们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沙的海洋，为了再找个人接着替我们运补给品，我们驱车前往当地的宿营地。我们在卡车与罗孚越野之间逡巡，打听谁要往南去，愿意挣几个美元来帮我们带上补给品。

我们遇上了叫皮埃尔的法国学生，他和我们一个方向，正需要点现金。我们便结伴而行。作为回报，他很乐意用廉价买来的破卡车为我们带上帐篷、备用轮胎、水壶和汽油桶。他那长着痘疮的脸上总是笑盈盈的，看起来文质彬彬，招人喜欢。他应该是个很好的旅伴。

在接下来的3天里我们的小型车队行驶了1000英里、沿途大部分是铺过的路，走得很轻松

这是怎样的沙漠呀！沙丘的造型如此优美，构造又如此大胆！我们走了一天又一天、行了一里又一里，沉醉在典雅、美丽和撩人的沙丘里。那始终不渝的美丽改变了我平常对世界的看法。风粗糙的爱抚铸成精妙绝伦的线条，是任何雕塑家或工程师都无法模仿的。沙丘开始令我想到塔贝莎的身体那诱人的曲线和勾人魂魄的弧形。

12月初我们到了塔曼拉塞，这是撒哈拉最艰苦区域的北部出发点，是个寓言式的城市，得名于一位著名的美人，是撒

哈拉的地理中心。

塔曼拉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这里有来来往往的罗孚越野车、七坯房和坚强的沙漠旅行者。我们待了几天休整一下。尽管是新建的城市，干净而有活力，街上却有羊群徜徉。时髦的房子旁拴着驴子和骆驼。集市上大都卖罐头食品、桃和肉类。

大部分当地人模样都很特别，一本正经地戴着头巾、穿着白袍子。穿蓝袍子的撒哈拉游牧民族土阿莱人时不时地骑在骆驼上穿行其间。这些游牧民族在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之间来来去去，无视任何国界，证明了在沙漠的腹地设立国界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塔曼拉塞最初是法国海外军团的一个前哨。1950 年的时候，这儿只有 30 个人，如今却有 3 万人——的确是个新兴的城市。

它是远行的非洲游客的交通枢纽。每一位踏上这块大陆的人不是正在这儿，就是到过这儿，要么就是要来这儿。旅行者们互相指点路线，交流各自的故事，彼此间洋溢着同志般的情意。

“留神尼日利亚的羚羊主。”

“到津巴布韦后住月亮客栈。”

“这条路被冲垮了，走山上的那条路。”

旅店的酒吧是消磨时光的好去处，可以喝到冰啤酒——在沙漠里能喝到的最接近冰啤酒的啤酒。皮埃尔带了一个从宿营地找来的马里女人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和一个叫山本悟的日本人聊天，他用了 11 个月的时间周游非洲。我们碰上的另一个日本人是个学生，在非洲两

年了，能去的地方他都走了一遍。我们还遇上过只身搭顺车的游客和骑脚踏车旅行的，以及穿着特制衣服、开着特制罗孚越野、带着从慕尼黑带来的特制饭菜的巴黎夫妇。

塔曼拉塞的主干道两旁林立着草草搭成的餐馆，里面和外面都放着几张破破烂烂的桌子，旁边有小贩在卖烤鸡。旅行者们聚在这些餐馆里，相互打听消息，说者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人人都很平和。

餐馆的门前停着拖车、日本摩托、丰田汽车和扎着沙梯的罗孚越野，那情形就像是西部时代拴在门前的马一样。这些交通工具上都绑着铲子，上面堆着睡袋、帐篷和一箱箱的衣服。每辆车上都带着好些绿色或灰色的塑料桶，里面装着水和汽油，还有备用轮胎。



街头酒吧里人们主要谈论三个话题：边防检查官、行贿以及穿越撒哈拉的危险。出于汽车故障和燃料不足，每年有几十个欧洲人和非洲人在沙漠中丧生。

一年前，一家法国人开着罗孚越野车偏离了主道，在去阿利特的半路上车子坏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位母亲将她、她丈夫和两个小孩如何同高温、饥渴作斗争以及无助地等待救援的绝望心情记在了日记里。在日记的最后，这位母亲用潦草而无力的笔迹发出无望的求救的呼喊，让人看到这一家人的生命已近衰竭。

就在几个月前，一支由5辆车组成的旅行车队载着10个人沿着同样的路线行进在沙漠中。他们迷路了，这在撒哈拉经常发生，因为绵延几百英里的岩石和沙丘之间没有路，只有最天然的痕迹。先是一辆车走不了了，于是这辆车上的人挪到另外的车上去。而后其他的车也一辆接一辆地出了故障或

燃尽了汽油，直至10个人全都挤在最后一辆车里。这辆车也由于负载过重而趴下了。10个人在沙漠的烈日之下没能等来救援，一个个地死去了。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显然，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走在主道上，可我们再三被告诫，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沙漠里没有真正的路。

除此以外，旅行者们还互相交流经验，看哪些边防官是可能帮助我们的，哪些则需要贿赂，再讲一些因挟带违禁品而被抓住的可怕故事。因为急需硬通货，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对外汇实行严格的控制，坚持要旅行者将其携带的所有硬通货换成他们国家那不值钱的第纳尔。

没有人能在经过一个个非洲国家时把所有的钱换上10次甚至15次。这不仅仅是因为换钱时由于当地货币贬值并且要付兑换费而吃亏，而且有些货币是根本无法兑换的。一出阿尔及利亚，第纳尔就成了废纸，而在该国的南端又没有银行可以把钱再兑换回来。

于是穿越这块大陆的旅行者无一例外地被迫成了走私者。查出这些未申报的硬通货于是成了该国一项重要的国库收入——或者对于边防官的私囊也如此——因为是他们在不遗余力地搜查旅行者的秘密金库。通常，他们除了没收这部分藏匿的钱外，还要罚“走私犯”2～3倍的钱，直至旅行者囊空如洗。这情况使塔曼拉塞的酒吧社会热衷于谈论如何在自己的身上或交通工具上找到最佳的藏匿点。

我和塔贝莎只担心把钱藏在哪儿，因为我们没有毒品或其他违禁品。我穿着一条钱袋，让我欣慰的是在整个旅程中它一直没被边防官发现。我们的一辆摩托车上有一本沾满油

污的手册,放在座位底下一个脏兮兮的袋子里。我们把钱夹在手册的页间,想到要检查到这儿可是不容易,油污太脏了。在我的那辆摩托车的油箱底下有一根空的管子,也塞满了我们的钱。

在塔曼拉塞,旅行者们的冒险精神使我们颇为震惊。我们遇到过两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老师,他们休了一到两年的假来非洲探险。一个新西兰人要走陆路从伦敦回到他的家乡。他说,新西兰有 300 万人口,在英国总是有大约 2% ~ 3% 即 7 万新西兰人。不过,我们在非洲除了传教士一家以外没看到别的美国人。

塔曼拉塞是有路可达的最后一个镇子,因此我们须经过海关和移民局的检查。在这儿,我们的护照、国际驾驶证和货币申报单都被盖上了出境章。然后,我们的微型车队——两辆摩托和一辆卡车就进入了撒哈拉的领域。

离开镇子后由于没有路标,我们问了路才知道怎么走。来塔曼拉塞的路是修缮过的双道柏油路,挺好走的。而我们从别的旅行者那里知道,从塔曼拉塞往南就无路可走了,只有一片汪洋的沙海。从镇子往外走 31 英里,路终止了,我们触到了沙子。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方圆几百英里内全是沙子。我们进入一个深谷,从 4500 英尺的地方开始走下坡路。

由于沙漠空旷无垠,旅行者可以任意选择路线。我们沿着众多卡车留下的印迹走,这条印迹大约有 2 英里宽。如果沙漠风暴刮起来的话,这些印迹就会被吹得一干二净,这样我们就得靠指南针在这浩瀚沙海中引航了。

有一刻钟的时间我被塔贝莎车后的滚滚沙尘呛得喘不过

气来，于是，我们拉开了距离。塔贝莎在前，我在她后面约半英里的右侧，皮埃尔则在我之后几英里处断后。

我们往撒哈拉的腹地走得越深，地形就越像沙漠。左右两边林立着沙丘和低矮的岩石。黄沙覆盖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威胁着要湮没我们，而且不许我们走快。

有时，沙里矗立着路标、55加仑的鼓或高大的牌子，为我们指引方向。

如果塔贝莎能找到轮胎的痕迹，她就跟着走。她希望不管跟的是谁，这个人知道他在往哪儿走；当然我们别跟上土匪、走私犯或已经迷了路的人。如果有50道交错的轨迹横在她的面前，她会选印迹最深的那条走。每隔3～4小时会有一辆卡车在离我们约1英里的地方朝北开去，或者超过我们也向南走，但并不与我们接近，让我们不断怀疑自己是否在主道上，如果确实有这么一条主道的话。卡车的出现总是先让我们感觉好些，觉得我们大致没有偏离方向，但它们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后不久，我们又开始担心上了。

一路上我们碰到的一堆堆烧焦的汽车残骸也让我们感觉好些，表明我们应该是在主道上。由于汽车零件在沙漠中奇缺，这些报废汽车上的零件被拆得精光。

做为领头的，塔贝莎开得很慢，尽量拣沙漠最硬的表面走。尽管如此，她还是会陷到沙子里，排气管被埋了进去。这时便显出了集体的力量。我下了车，在脚蹬下放一块板以防止车继续下陷，然后把车轮边的沙子刨开或者推平，这样塔贝莎可以一点点地把车子开出去。我们带着一把折叠的军用铲子，但不是很管用。用我的手把沙子刨开效果更好些。

但即使我把沙子都刨开了，塔贝莎也不能马上提速。她

得慢慢地放松离合器以避免轮子飞转，使车子在松散的沙子里陷得更深；但又不能放得太慢，这样会把离合器烧坏的。每次我们闻到石棉的糊味儿时都很警觉，因为出发时我们没想到要多带离合器片。有一段我们花了3个小时才走了15英里，我们频繁地陷进去，频繁地刨出沙子，频繁地把车推出来。



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糟糕路段。车子的排气管被埋入沙中，步履维艰。

塔贝莎的车子一旦被解放出来，我就往前走几码，看看前面哪儿最好走。一般我们无法直着往前开，因为前面的沙子更松更难走，这样我们就只能探索旁边的路。

有时我们会开过一片多石的区域，上面有一两处低矮的灌木点缀其间。还有的时候沙子会变得很坚实，于是车子能以35英里的时速嗡嗡地开过去。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沙漠的陷阱，这些松散的沙子捕获了不计其数的汽车，留下了被拆

得精光、烧得焦烂的残骸。

第一天我们才走了75英里的路，而我们开了10小时的车。那天夜里，虽然已精疲力竭，但怀着以集体力量战胜沙海的喜悦，我们3个人在沙漠里宿营。我们用丁烷炉沏茶烧饭。在这儿没有支帐篷的必要，因为这儿的地形跟火星的表面一样，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不会下雨，空气干燥而凉爽，自然也不会有露水。我们不必担心野兽或昆虫的侵扰，因为这片荒野上不存在任何野生生物，没有树叶、蜥蜴、蚂蚁，甚至没有一只蚊子。

沙漠的寂静是如此纯粹，它不像我所体验的任何一种寂静。没有生命，撒哈拉也就没有我们惯常能感受到的背景音响：没有鸟儿的"喳喳"声，旁边昆虫的"嗡嗡"声，远处飞机的轰鸣声，也没有树叶的"沙沙"声。

我打破了这种沉寂，打开收音机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这似乎有渎天物。西方盟国和伊拉克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加剧，我们庆幸自己与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化之间隔着数十英里。

缀满星星的天幕比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天空还要清晰。一轮满月出现了，因沙漠没有湿气、尘土和污染，月亮显得格外大而明亮。我们到哪儿，哪儿就留下生动而活泼的月影。我们找出一本书，竟真的能在这片明亮的月色里阅读。

银盘般的月亮……深沉的寂静……线条优美的沙丘——这异国的夜景令人心旷神怡，把我和塔贝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它如此浪漫而美好，我想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蜜月之地，尽管到这儿来很不容易……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继续我们的旅程。

在沙丘的顶上，风吹黄沙在凹处形成了一层不深但很容易陷入的浮沙，使我们在这里作徒劳的挣扎。有几次在摩托陷进去后，汽油从油箱和化油器里喷了出来。沙漠在和我们较量，它想占上风。

我们见到了更多被拆掉和废弃的汽车，都是在厚厚的积沙边，向两边或朝后倒着，一堆一堆的，成了沙漠陷阱的牺牲品。很有可能它们开得很快，掉进了沙漠的“口袋”里，然后逐渐陷了进去。这让我想起一些描写沙漠的老动画片，画面上一个出水处旁堆积着一堆白骨。在这儿，汽车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辨别方向仍然是很难的事。任何一条印迹都可能是主道，也可能把我们带向无路的荒野和死亡。有时，在看不见路标的地方，混乱的印迹指示着相反的方向，我们只能爬到一辆废弃车的最高点向南眺望，希望找到下一个路标；如果找不到路标，就找下一处堆着废弃车的地方，希望这些汽车的残骸能为我们指示主道的方向。

我们目睹了一辆正陷进散沙里的罗孚越野车。车主将两块 10 英尺长的沙梯垫在了前轮下，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他们得一直这样做，直到走出这片松软的沙地。

虽然是 12 月，沙漠里仍然酷热难当。太阳升起来一小时后就开始炙烤着我们。白色的沙子吸收了阳光之后又把它反射回去，使我们被夹在中间受到来自上下两个方向的烧灼。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大汗淋漓，尤其在车子陷入沙坑里的时候更是挥汗如雨。不过，由于担心虚脱，我们还是穿着皮夹克和皮套裤。有几次我的汗湿透了牛仔裤和皮套裤，除了在西伯

利亚最颠簸的几天，这是在我 25 年的摩托车旅行生涯中绝无仅有的。

在撒哈拉继续行进了几天后，我以为我第一次看到了海市蜃楼。那是一辆双排座的脚踏车，车上有两个穿着一袭白衣的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并等着这个白色闪光的影像消失。待我们与那海市蜃楼肩并肩地行进时，车上那对裹一身白的人转过头，透过他们戴的防水镜盯着我们看，活像是从奇异的梦境中跑出来的两个怪物。

我大吃一惊，示意他们停下，问道："上帝，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从哪儿来？"

他们是法国人，正骑着脚踏车穿越撒哈拉作蜜月旅行。他们十分爽朗而且兴高采烈。我们用 5 天走过的路他们用脚踏了 10 天。

走了几里地后我们遇上了一个往北走的意大利人，他的摩托车抛锚了。我们提出把他捎回南边的阿利特，但被他拒绝了。他害怕他的摩托车会被土匪偷走或是被沙漠吞没。

我们的油箱里快没油了，于是我们用水换他已经用不上的汽油。他指望会有从南边来的卡车把他和他的摩托车带到北边，但我很是怀疑。要是这条道上车辆稀少呢？

每当想起在塔曼拉塞听到的那些关于葬身撒哈拉的故事，我不禁要怀疑那个意大利摩托车手是否还在那里等着捎他的卡车，也许他那被拆光的摩托车和遗骸已经成了给后人的警示，显示着撒哈拉的残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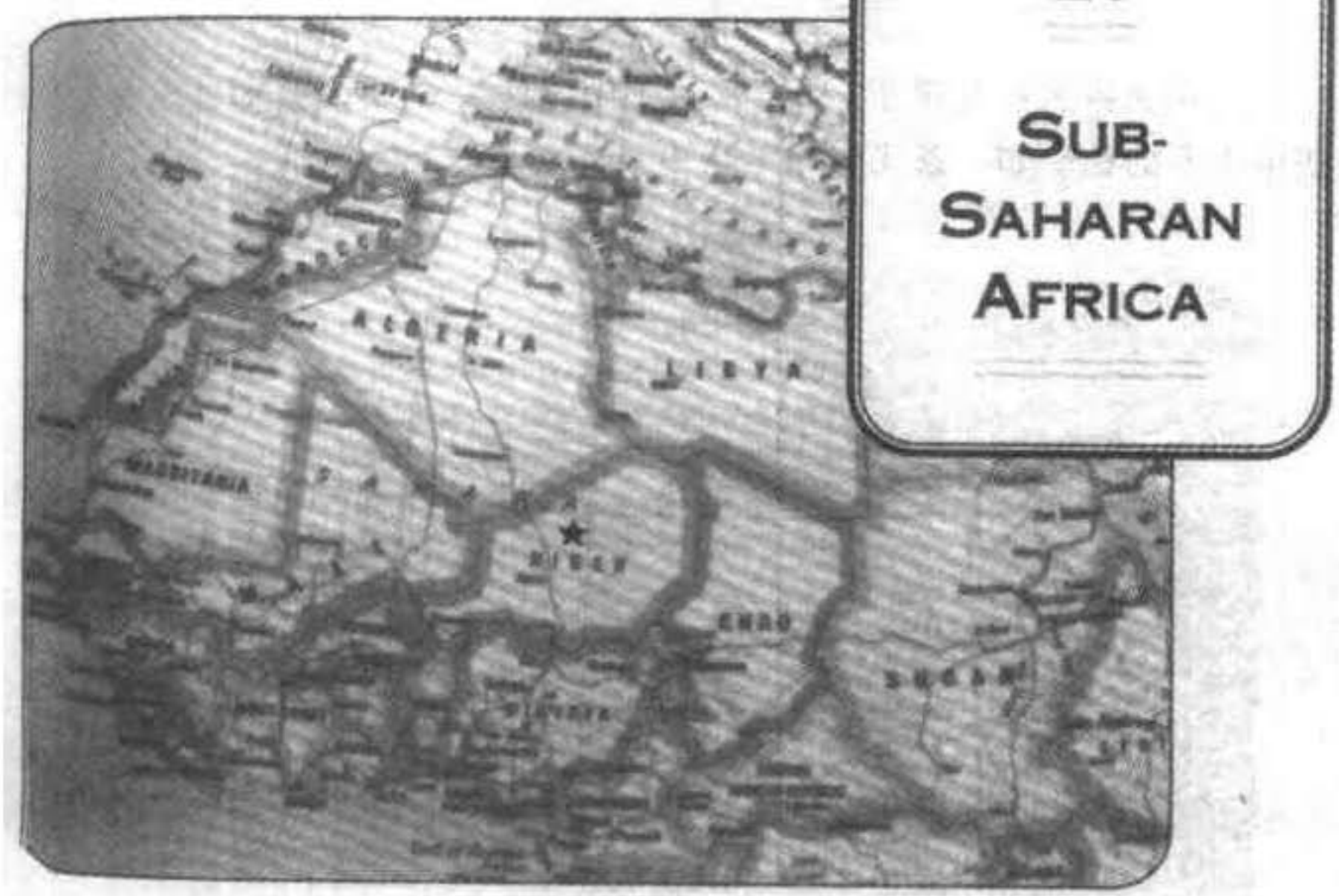
终于，我们触到了沙漠南部边缘的一片平坦的沙地，矮小的荆棘树告诉我们附近一定有水。

塔贝莎咧开嘴狂笑。我们以35英里的时速前进，身后扬起长长的沙尘。她为我们越过了撒哈拉而欣喜若狂，一路欢呼雀跃。

我也很高兴，为我们没有成为丧生于此的一员而欣慰，这片风景充满着火星般的美丽与死亡。这是整个旅行中非常艰苦的一段，每天都汗流浃背地和环境作斗争，但我们闯过来了，没有被不期而至的厄运所捕获。就在我们乘胜前进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道：

噢，瞧，骑手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你让我爱上了你

在我们停下来喝水时，塔贝莎还在笑，她对我说："我一年级的时候，有个星期天第一次去滑冰。我记得当我自己能滑过整个池子时的感受——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真棒！真棒！真棒！'。这就是我今天的感受——'真棒！真棒！真棒！'"



20

SUB-SAHARAN AF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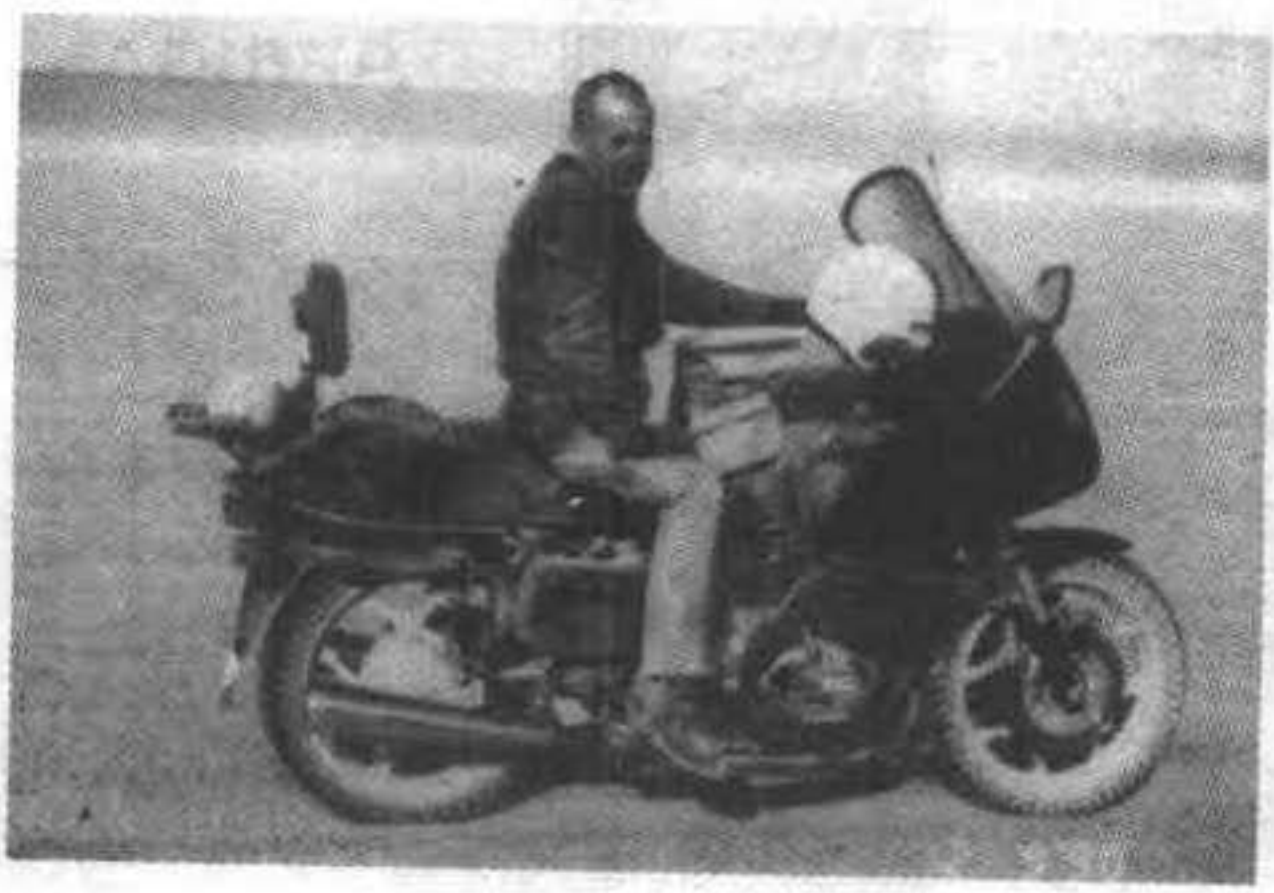
20. 撒哈拉周边的非洲

SUB-SAHARAN AFRICA

从阿尔及利亚一踏进尼日尔，一切都变了。

我们从北非的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来到阿利特，这里也是伊斯兰教的属地，却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黑非洲大城市。在我们缓慢地向南行的路上，单调的沙丘变成了风化的岩石、杂草和灌木，几天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有生命的东西。

离阿利特还有几里了，我们看到了烟。然后经过了一个法国人开的铀矿和一条飞机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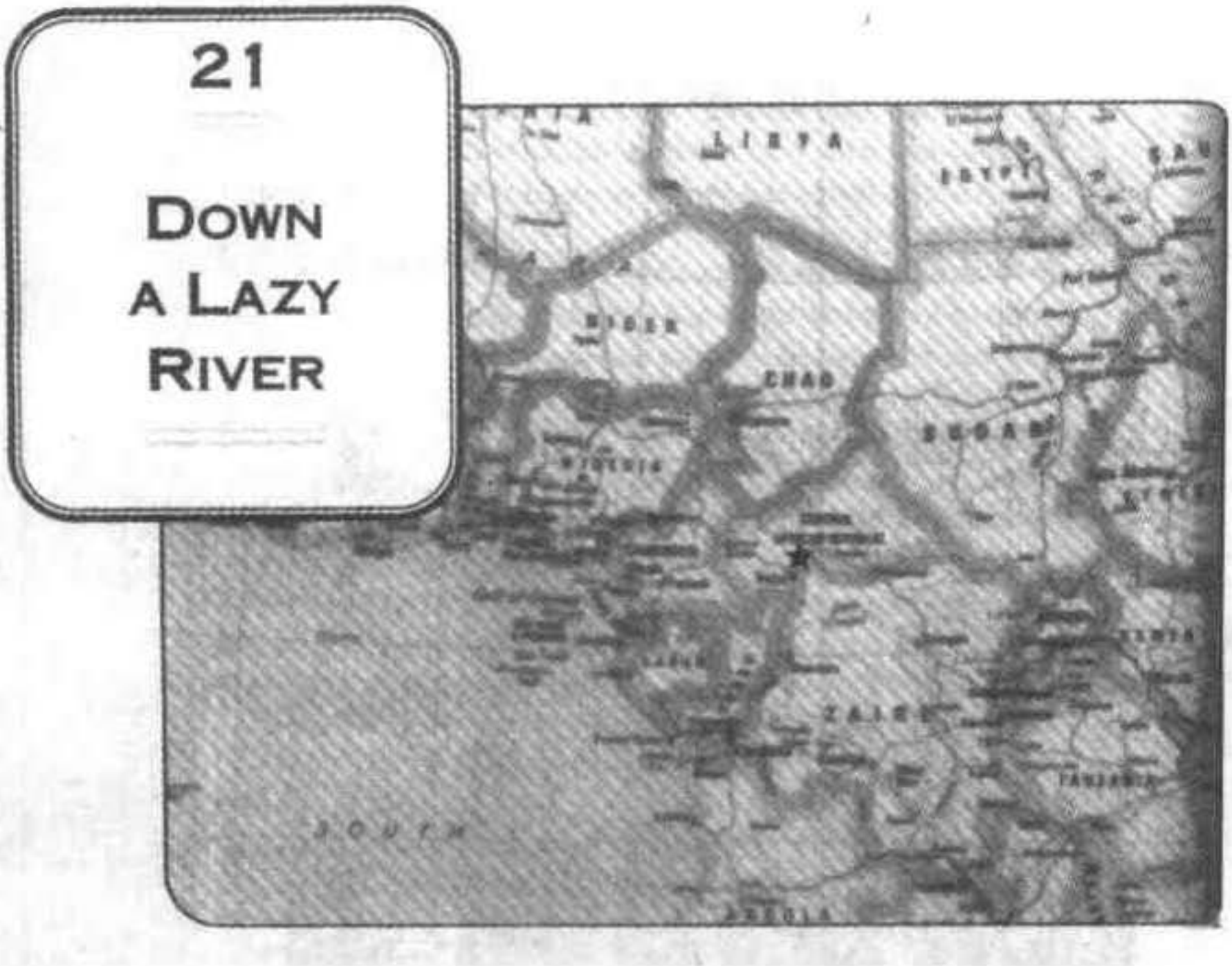


撒哈拉的好路段——好走多了。

离阿利特越近，路就越好走。这儿的沙子被压得很紧，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我们还走上了一条四道的土路，这条路无疑是通向铀矿的。

阿利特也是个旅游者云集的镇子。这里新旧混杂，既有土砌的茅舍，又有现代化的房屋。体态丰满、不戴面纱的女人头顶什物，身后背着自己的宝宝，在大街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街边是开门营业的肉铺和在火上烤肉炸油饼的小贩。

我们坐在一间酒吧里饮着棕色大瓶子装的非洲啤酒，无法将眼前的景象同我们刚经过的那种严格的伊斯兰文化联系起来。石蜡灯在黑暗中闪烁，黑人们向我们微笑致意，我们感



21. 顺流而下——一条慵懒的河流

DOWN A LAZY RIVER

船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破破烂烂、锈迹斑斑，中间堆着一捆捆的圆木和货物集装箱。甲板上人头攒动，挤满了非洲本土的黑人。驳船将“嘎嚓嘎嚓”地顺着乌班吉河而下，最后汇入刚果河——“一条吞并了所有河流的河”，扎伊尔人如是说。雨季还没来，路上大约要走 8 天的时间。

“唔,你们是美国人,”他瓮声瓮气地说,“那么我将用你们在肯尼迪机场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们。我要彻底搜查你们,因为你们在肯尼迪机场就这么搜查我们的。”

我想他说的没错。

当中尉看到我们带的 BBC 收音机时,他说:“你们用豪萨语收听节目吗?”这是当地的语言,BBC 也的确用它播音。尼日利亚是英属殖民地,所以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按捺住不耐烦,说:“不,我们不懂豪萨语。”

他很恼怒,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懂我们的语言。他想知道我们是从哪个部落来的。

“我们没有什么部落。”

这使亚伯拉罕中尉更加傲慢。

我一时疏忽,将没有盖尼日利亚章的驾驶证件交给他看。

他异常愤怒,那上面竟然没有出现他的国家。

“我们是非洲最大最强的国家,”他咆哮着,“我们不是第三世界,我们是世界强国,一个富裕的世界强国。你们最好记住这点。”

他把我们能想到带上的每一个文件都检查了一遍:国际摩托车证、国际行驶许可证、接种疫苗证、入境签证、摄影器材物主证明、旅行保险单、驾驶证件和护照。

他看起来对我们所做的充分准备很失望,于是和手下人对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不放过摩托车上任何一个部位。所幸的是,我们不需要贿赂他们,但我们放在柜台上的一盒烟转眼就不见了。最后,他让步了,带着厌恶的表情,挥手给我们放行。

至此我们开始意识到,像这位豪萨人一类的边防官会让

我们每次过境都要花去一整天的时间，那么单单是穿越非洲就需额外的两个星期。

塔贝莎还在发烧，继续吃着阿斯匹林。我们穿越尼日利亚的一路上，碰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都耗去了我们一大段时光。每当卫兵在检查我们的证件和摩托车时，我都禁不住要问他们：你们这些愚蠢的检查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样做会把给你们带来宝贵硬通货的外国旅游者吓跑的吗？

皮埃尔没想到要准备北非的签证，因此他用于行贿的钱比他预期的多，而我也要多付他钱，比我原来想的要多。不过，看起来这还是值得的，我们准备的补给品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塔贝莎的病还是不见好转。我肯定这只是轻度中暑，建议她尽可能多吃盐，多喝水——苏打水、瓶装水，什么都行。虽然她需要休息，但我们害怕在尼日利亚逗留，因为在军事检查站我们遇上了这么多麻烦。塔贝莎和我都愿意尽快到喀麦隆去，再也不要见到那些检查站。

在离开尼日利亚前的最后 5 英里处，我们碰上了路况极坏的土路，我们很费了番周折才走了过去。水曾经流过这段路，干了以后成了河床。路面很硬，形成了一道道的槽，还有许多一二英尺深的小洞，我们不得不择路而行。

我们刚从撒哈拉出来，却发现马罗瓦更热，热得令人窒息。我们在这儿找到了自阿尔及利亚以来第一家像样的旅店。在这儿甚至可以用信用卡，这对我们是个帮助，因为我们自阿尔及利亚以来已快把现金花光了。这家旅店很干净，房间是新的，有空调、游泳池（池子里真有水！）和现代化的酒吧，

这些让我有点发晕;还有,我们可以洗热水澡,这些太让人难以相信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已经差不多是美国一座小城市里的假日旅店了,而对于我们,它简直就是里兹酒店。我们感到尽早从尼日利亚出来的决定是对的,只是塔贝莎为此受了苦。



假如卡诺的艾克普医生真能处理这些问题的话,他可以在纽约的公园大道上挣大钱。塔贝莎不让我停下来去造访这位神医。

招牌内容:请来造访并咨询:当地神医艾克普大夫(在尼日利亚注册行医)专治痢疾、腹泻、黄热病、巫术、不育症,提供提升、逆境、爱情魅力、经商运道、投资风险、考试成功、行大运、算命、失业等咨询,给我们打电话……

她开始咳嗽了，到这儿的第一个晚上咳得更凶了。阿斯匹林越吃越多，可不管用。浑身疼得厉害，本来只是胸口疼，现在转到耳朵上了，她觉得双耳疼得钻心。她病了9天，没能战胜这个病魔。

“我得找医生了，”她说，“这病越来越糟。”

我们发现自己很幸运，我们来对了地方。隔壁就是一家私人诊所，是一对姓张的中国夫妇开的。

我把塔贝莎带到那儿。张大夫怀疑是疟疾，要给她验血。

塔贝莎很担心。我们听过很多非洲诊所里用过的针头传染艾滋病的故事。不过，张大夫有一个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的废弃针头，都用消过毒的玻璃纸包得好好的。于是塔贝莎同意接受张大夫的治疗。

这位中国大夫不仅有现代化的设备，还有一间单人病房，虽不过是一个水泥砌的立方体，里面摆了一张床，但有空调，还有卫生间。

我带了些水果和苏打水来，握着塔贝莎的手安慰她。她在床上躺了48个小时，正好过了一个圣诞节。

皮埃尔问我多要了些钱，住进了一个便宜点的旅店，然后每天晚上都换一个当地姑娘玩。我提醒他这可能传染上艾滋病，但他笑了起来，对我的提醒置之不理。

张大夫诊断塔贝莎得的是支气管炎，让她服用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他很高兴我们付的是硬通货，而我对他收费之低感到惊讶——两三百美元什么都有了：抗生素、病房、治疗等等。

马罗瓦是个有趣的地方，我很高兴我们在这儿待了9天，好好地休息了一下。

我们和一个叫迪特里希·莱恩哈德的满头金发的德国移民交上了朋友。他经营一家客栈和一家餐馆，我们在那儿和他共度了几个晚上。

早在70年代，迪特里希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非洲淘金。他把汽车从欧洲开到这儿，然后高价卖出。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做了20多次这样的旅行，有时甚至一次开两辆车。一时间他爆发了，直到其他车贩子也涌了进来。在一个高利润的市场里事情总是这样的。而一旦利润被瓜分，这门生意就没有做下去的意义了。

他和他太太都30来岁，经营着一间餐馆、一家纪念品商店、一个酒吧，还有一家旅店。他还有汽车修理的生意，专为旅游者服务。他们有两个孩子，许多仆人，日子过得不错。

不过，从谈话中我们得知，他们的生意正在走下坡路。来旅游的人不如过去那么多了，车贩子也少了。80年代后期，非洲的旅游业举步维艰。货币贬值、限制进口使国内负担越来越重。非洲的经济陷入困境后，战祸便蔓延开了。旅游者被吓跑了。

这些国家向西方学到了如何抓住旅游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你开车到非洲国家的边境，很顺利地就能入关，只需留下一盒烟或一瓶威士忌就行了。那个时候旅游者通常都没有签证或其他相关证件。他们有的是在自己国家惹了麻烦之后跑到这儿来的，或者是无法重新开始生活的人。

莱恩哈德一家热爱他们的生活，但事情越来越不妙了。孩子们慢慢地长大，而他们不愿让孩子在这儿成长，因为非洲

不像以前那么有希望了。在20年代，这片大陆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就是流落异乡的人的麻烦。他们是因为想逃避什么而离开了家乡。一个西方移民在非洲就像是一条大鱼在小池塘里一样，他碰不上什么竞争对手。从吉姆爵士的时代开始，移民们发现他们无需跑得太快。

如今莱恩哈德想另寻出路。如果他不得不回德国的话，他会将自己置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等到塔贝莎能下地后，我们去了一家豪华的法国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

餐馆的名字叫"乐沙海"。我们吃得非常好，但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在餐馆45年的历史里，它的主人——一个叫吕克·菲力普的八旬老人——使之保持着一流巴黎餐馆的档次：穿着特殊制服的侍者、无懈可击的举止、法国红葡萄酒和一道道精工细做的法国菜。

菲力普先生和太太从法国带来了所有的东西——文化、举止、菜肴、餐具——现在生意却做不下去了。探险家们不来了。独立战争开始后，旅游的人也少了。他想让儿子接管这分店，儿子却到好莱坞拍电影去了。

他太太死后餐馆歇业了一段时间。现在重新开张后他打算把它卖掉。但一两年后餐馆将不复存在，没人会在撒哈拉的边缘买下这只象征巴黎人奢华的白象。

和很多人一样，菲力普将失去他干了一辈子的工作。我们在整个旅程中听到尽是这一类的故事。不管人们建立起什么来，不管那房子、博物馆、文化和国家有多好，它都注定要消

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到过几十个像迦太基这样曾辉煌一时的城市，它们曾称霸一方，却落得个被瓜分的下场；或者是曾经富丽堂皇的家园，最终毁于一旦。不管那些有200年、300年甚或1000年历史的古城堡曾经怎样雄伟气派，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堆堆爬满青藤的废墟。一个帝国、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或一个王朝曾经强大，在历史上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菲力普先生会把这家餐馆开到他开不了的时候，也许等他死了以后。政府会接管过来，然后把它搞得一塌糊涂，因为喀麦隆的官僚们根本不会按照菲力普先生的方式去经营。菲力普和他的餐馆曾有过几年的好光景，但就到此为止了。

这里的报纸满篇都是关于邻国乍得的血腥叛乱的报道。

气势汹汹的士兵抢劫了国家公园和动物园，用机枪射杀动物来填肚皮。在安哥拉，由美国支持的一派武装与另一派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扎伊尔随时可能陷入一场血腥的射击比赛。这么多冲突令我想起星期六晚上在酒吧间的争吵，那些醉醺醺的好斗分子非得争个胜负，可他们争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

尽管喀麦隆的周围有这么多的骚乱，但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还是乐观的。这儿的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国民都是受过教育、很文明的人。在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喀麦隆成为第一个闯入四分之一决赛的非洲国家。

喀麦隆自然资源丰富，人民素质高，眼光向外看。从这点来说，这个国家是个值得投资的地方。它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英语，这将给投资者带来方便，而且使得它能一下从两个外

部文化里不断汲取更新的信息。国民不但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存在，更被鼓励去了解这个世界。这在专制的国度里是难得一见的。

投资者可以择机将钱投向农业、冶金、林木和粮食生产上。他可以收购业绩好的公司，然后再卖给喀麦隆的南部邻国，像南非和博茨瓦纳，或向北卖给欧洲。

还有，喀麦隆是个小国，这意味着种族派别不多。它的疆界无需重新划定，至少不用像非洲其他国家那样大范围地变动。

非洲的许多国界都是人为划分的，当年的殖民者们骑马走入森林，指示一个国家开始和结束的地方。比如，赞比亚只有780万人口，却有25个不同的宗族。看着地图你会奇怪当初这些国家都是怎么形成的。疆域的界定既不是按地理状况，又不是按宗族决定的。那只是当年塞色尔·罗得兹碰巧走到那儿了。

苏联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分裂，东欧的国界也要按民族来划分。非洲不会太平，直到各个国家的边界是以自然的地理状况和种族派别来完成划分。

经过一番养精蓄锐，我们又朝南开拔了。道路还不算太糟，因此我们走得很顺。走了1000英里后，我们来到前法国殖民地中非共和国的首都班吉。连续开了12小时的车，我们已是精疲力竭，浑身僵硬酸痛。由于前一天晚上是住在帐篷里，因而我们对进入有文明的地方很敏感。

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正值除夕之夜。我们入住诺瓦酒店。疲惫不堪的我们急需一顿热腾腾的晚餐，于是来到

了紧邻饭店的“热带加那”餐馆。这实际上是一个夜总会，其喧闹和时髦足以令其跻身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这里的新年晚会荡漾着西式狂欢的气氛：香槟、法国特餐、口哨、彩带、欢呼，还有五光十色的派对帽。几杯香槟下肚后，我们的疲惫感奇迹般地消失了。我们一直玩到凌晨，跳舞、和别人交换帽子、和那些口哨吹得最响的人一块儿吹。

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非共和国曾一度靠商品经济发达起来，现在却垮了。贫困无处不在。那些机灵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在非洲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出现，现在却像嗅出轮船将沉的耗子一样，卖掉他们的生意跑了。

警察已有3个月没拿到工资了。我们晚上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不得不贿赂拦住我们检查护照的警察。他们称之为“礼物”，1美元～5美元就可让他们满意。倘若他们还要，我们就警告要检举他们，让他们有麻烦。

中非共和国的最大问题是它的货币，但和困扰其他非洲国家的货币问题正好相反——它的货币太坚挺了。几十年前这个CFA（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和法国法郎挂钩，后者如今又同德国马克挂钩。如果中非共和国现在可以为它的货币定价，政府宁愿以现行汇价的一小部分作为它的价值，而那个时候商品的价格很高。改变汇率是很困难的（当中非法郎在1994年初贬值50%后，所有说法语的非洲国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怀疑这个问题还未得到完全解决）。

由于世界商品价格是以美元计算的，这使中非共和国雪上加霜。美元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下跌60%，于是中非共和国所得到的真实价值比起20年前大为减少。最要命的是，商品

价格急剧下降，跌幅常常达50%。中非共和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它从商品里只获得以前价值的20%。它还养着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庞大的警察和军队，使它的状况更加糟糕。

多么奇怪的地方！在一个没有电话、街道肮脏的城市里，居然有几家上等的法国餐馆，其菜肴之精致可与巴黎和纽约的餐馆媲美。当然，由于其荒唐的货币，菜的价格也和巴黎和纽约的一样。

在1月份，我们竟能喝上新产的葡萄酒。在弗莱迪餐馆——它成了我们最喜欢的餐馆——我爱上了一道叫Capitan Lasagna的菜，是用一种类似于鲈鱼的大河鱼做的。饭后我们享用掺伏特加的水果冰激凌，弗雷迪称之为"陆军上校"。我们远在第三世界的腹地，离我们上一次吃这些东西的马赛有好几光年，然而我们却在古巴雪茄和意大利蒸馏咖啡的香气中消磨了几个安逸的夜晚。

班吉得名于它附近的那条湍急的乌班吉河。城中挤满了从乡下涌进来找工作的人。现代化的街区和宽阔的大街笼罩在芒果树的树荫下，被开得猩红的花映得很灿烂。中央集市里人流如涌、熙熙攘攘，生意很红火。

被称为"五公里"的黑人居住区令人难以置信，其夜生活和它的野蛮一样出名。酒吧、餐馆和迪斯科舞厅里有五光十色的各种活动。我们在新年那天去了那儿。整个镇子热闹非凡，夜生活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

皮埃尔在外面折腾了一天，追完漂亮的黑人姑娘又追白

人姑娘。他又向我多要钱，我不想给，可禁不住他一番花言巧语，最后还是让他拿到手了。

我们去政府部门办理签证。我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中非共和国依然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只是不公开罢了。

每一个黑人官员的隔壁或邻桌总有一个法国人，许多问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是"顾问"，肯尼迪时代我们在越南的军队中也用这个词

我立刻注意到法属殖民地与英属殖民地的区别。法国的影响无处不在，比英国对其殖民地的影响明显得多，英属殖民地与其殖民者的脱离更干脆些。在中非共和国，连总统的参谋长和总统卫队长都是法国人。法国给来这儿教书的老师发放补助和免去税赋。有几次，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因来这儿与中非前"国王"让-贝德尔·博卡萨狩猎，后者送了他许多钻石礼物。回巴黎后这事成了丑闻，法国人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后殖民主义政治的真正价值。

我们开车经过一片房子，看起来像是贫民窟。窗户上的玻璃坏了，墙上的砖头在往下掉，草坪上杂草丛生。

我新交的非洲朋友让告诉我："这是大学。"

"盖了有多久了？"我问。

"有 20 年了。"他答道。

我很吃惊。这所大学是用法国政府提供援助的钱盖的，不管来自"和平机构"的援助还是欧洲殖民遗产，西方的馈赠在非洲的各个地方被惊人地浪费掉了。

我们得在这儿做出决定下一步怎么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们反复考虑的事。

前面有两条路，两条路都不好走。我们是穿过扎伊尔——穿过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的雨林，走据说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还是经过安哥拉，穿过内战的枪林弹雨而去？

班吉像塔曼拉塞和阿利特 -样是交叉路口。塔贝莎和我仔细研究了地图，并向每一位旅行者打听最新情况。

“可不是件轻松活，”从西边来的瓦尔特说，“要是早几个星期，在‘比较干’的季节，你们有可能走得了扎伊尔的路。但现在雨季说着就来了，森林里就算最好的路也成了泥潭。”

我想起了伊萨克·迪内森。她住在离肯尼亚首都仅几英里的地方。肯尼亚的雨水比扎伊尔少多了，可她在《走出非洲》中还是写到，在雨季里她甚至无法到市区里去。

地图上说安哥拉的路况要好些，但我们不敢肯定。由于战争，那儿没有旅行者经过。现在战斗平息了，但随时可能再开火。而扎伊尔虽没有战火，但随着雨季的来临，政府马上要关闭道路，沿途很有可能没有汽油供应。雨季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说不定被困在某个村子好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把我们穿越火地岛或安第斯山脉的机会给破坏了。因为南美洲一进入冬天，旅行者就无法活动了。

思来想去，我们决定走安哥拉。正在减缓的危险——BBC短波报道证实战事已平息了下来——总比明确知道的灾难要好些。对于走过撒哈拉的沙丘、非洲的“可通行”道路和西伯利亚满是尘土的高速路的摩托车手来说，穿越战区似乎比走过几百英里的泥潭要强些，尽管当地人称这些泥潭为“路”。

纽约那边，帮我看家的尤莉斯要退休了。她找到一个叫裘德的年轻人来代替她，说这人是个电脑鬼才。他很敬业，高效率地在纽约领事馆为我们办好了去安哥拉的签证并用快件寄给了我们。我为我们有这样有力的后盾而备感欣慰。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到安哥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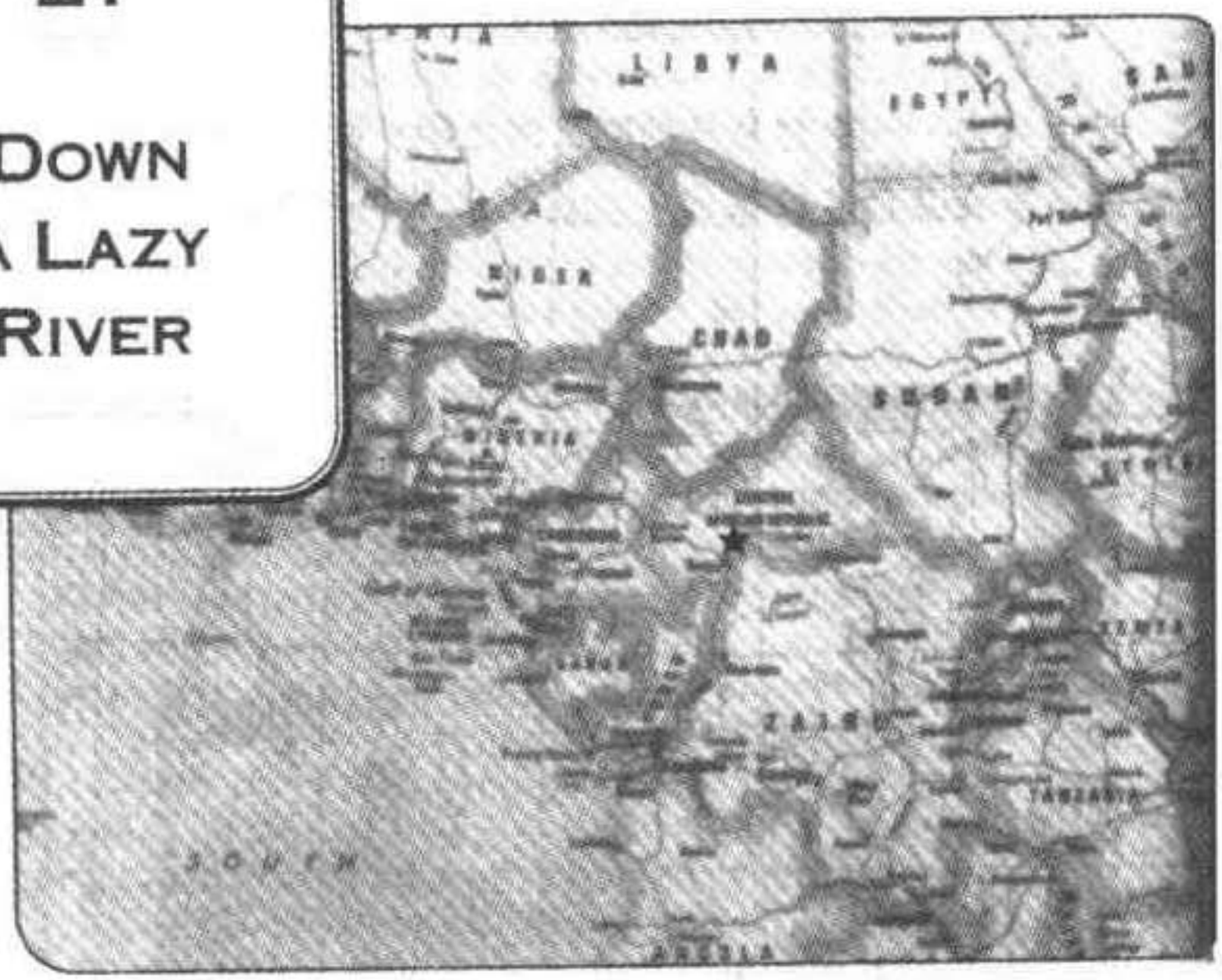
从班吉到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没有陆路，这两个姊妹城市是我们的起点。法国顾问告诉我们，我们和3辆车去布拉柴维尔的唯一途径是在刚果河上乘驳船，穿过扎伊尔最西边的城市金沙萨，从那儿我们可以开车往南走到安哥拉。

“记住，”他说，“驳船上没有人也没有食物。事先买好所需的一切。”

“走吧，”我对塔贝莎和皮埃尔说道，“我们去看看这个驳船。”

21

DOWN A LAZY RI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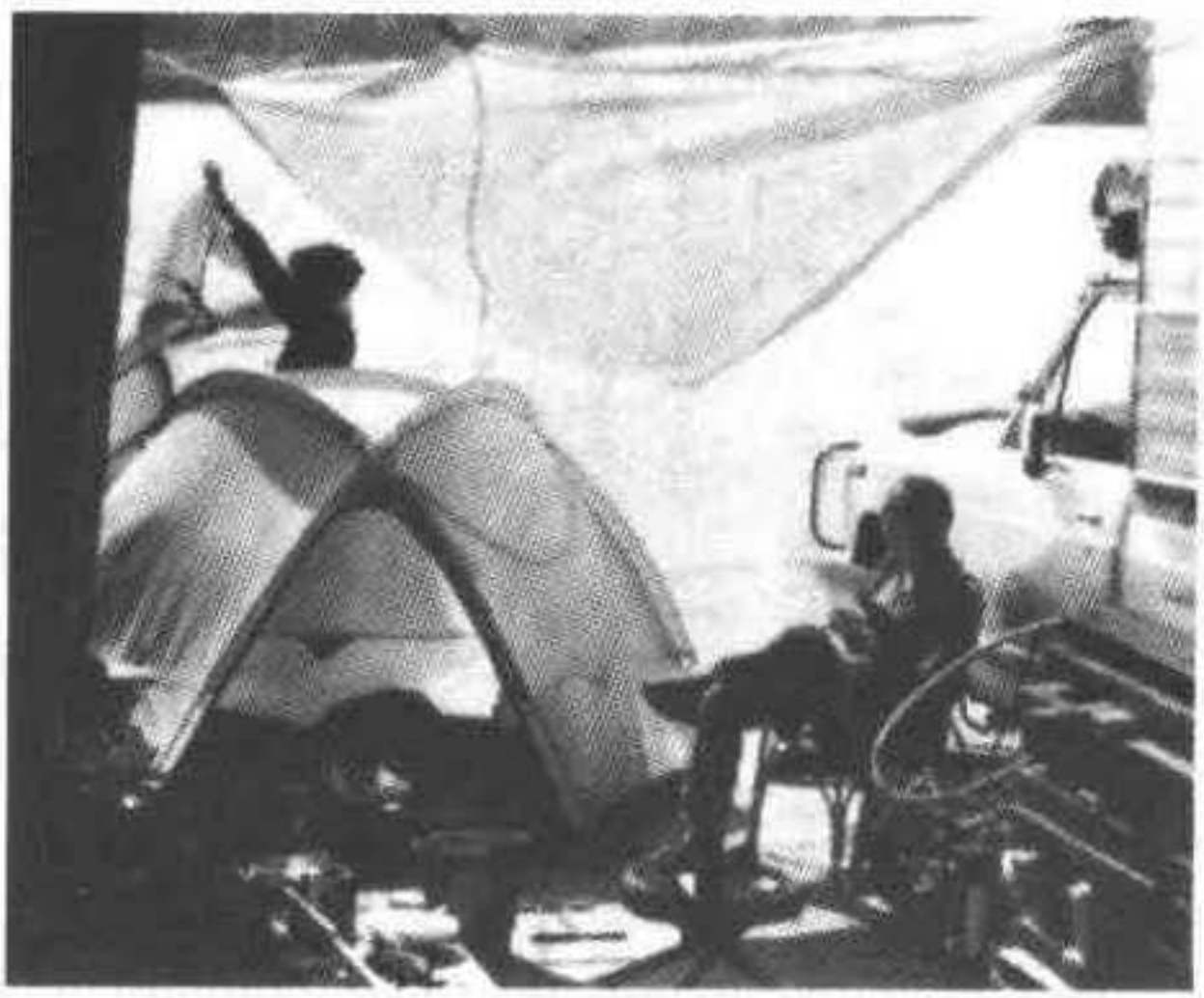


21. 顺流而下——一条慵懒的河流

DOWN A LAZY RIVER

船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破破烂烂、锈迹斑斑，中间堆着一捆捆的圆木和货物集装箱。甲板上人头攒动，挤满了非洲本土的黑人。驳船将“嘎嚓嘎嚓”地顺着乌班吉河而下，最后汇入刚果河——“一条吞并了所有河流的河”，扎伊尔人如是说。雨季还没来，路上大约要走 8 天的时间。

我很兴奋——穿越丛林的刚果河之游！我们得在甲板上搭帐篷钻睡袋凑合这段旅程了。这不仅是一种探险，也是南行的唯一出路。



我们将帐篷支在沙中非的乌班吉和刚果河飘流而下的驳船甲板上。

于是1月下旬我们把摩托车和卡车运上了驳船，在后甲板上安营扎寨。

一只拖船如期而至，拖着连在一起的4条驳船，像一个流动的村子，载着几百人，顺流而下。

临时搭起的桌子边做起了各种生意：面包、药、盐和肥皂等等。通道上挤满了吆喝和讨价还价的人，有的甚至为一盒火柴而喋喋不休。有人向我兜售鲇鱼、鳗和一种大嘴、鱼鳍跟

触角一样的河鱼。

农民和渔夫带着一家人把他们的鱼和粮食拿到布拉柴维尔去卖。船一边走，他们一边把肉熏干，把麦子磨成面，还把东西卖到沿途的村子里去。一只7英尺长的鳄鱼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在桌子底下趴着，它的眼睛里闪动着怒火，仿佛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束缚它的绳子，它可得给我们点颜色瞧瞧。

猎人和渔夫乘着平底船靠近我们的驳船，向倚着栏杆的商人们兜售猪、羚羊、香蕉和鱼。我们每到一站，村民们便涌上来，叫卖他们的龟、蜥蜴、猪、蛇，甚至还有一篮子一篮子的毛虫。

宰杀的、鲜活的、磨好的、腌过的、晒干的，这些丛林与河流的产物在通向布拉柴维尔的大河道上缓缓滑动。

我们的船友们早餐吃面包和茶，到下午晚些时候一般吃一碗树薯粉和豆子。我们始终吃不惯树薯，这种长在地上的野生植物令我们想起粘乎乎的生面团。不过，烟熏的鳄鱼肉却很鲜嫩，口感像鸡肉，这让我们很吃惊。有时，邻居们会请我们分享棕榈、车前草、毛虫和烤猴子。我们断定，那位法国顾问所说的“没有吃的、没有人”指的是没有西方的食物和西方人。

这是塔贝莎第一次在旅途中建起一个简易的厨房，做起了家务。我们的膳食除了取材于周围的原材料以外，还有出发前我们买的食品。我们的食品很丰富。

我们的右边是刚果，以前属法国的刚果；左边是扎伊尔，以前属比利时的刚果。我们“嘎嚓嘎嚓”地行进在地球上最富饶的地区、一些科学家称之为“地球的肺”。这儿每年的降雨

量达 100 英寸。在炽烈的热带太阳的照耀下，这雨倾注到近 200 万平方英里的刚果盆地里，催生出成千上万种生命。船舷两旁的河岸上布满着上百种树木、上千种花草、几十种哺乳动物和上百种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我们的驳船就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生物。

皮埃尔还是老样子，四处勾搭当地的小姐，他从一只船走到另一只船，向小姐们献殷勤，递上西方的香烟，给那些年轻的耳朵、脖子和手腕带上些廉价的小饰物，以求对方尽快上钩。

每天，我们的四周都上演着生活的戏剧——出生、死亡、交媾、谈判、争吵和妥协。和我们的船友们比邻而居，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所有习性，彼此彼此。

每天晚上我们钻进防蚊帐篷，拉上拉链，然后小心翼翼地消灭掉帐子里的所有蚊子。可第二天早晨我们经常被蚊子的"嗡嗡"声吵醒，它们不知怎的突破了帐篷的防线钻了进来。

每到一站，那个牧羊人都要上岸去给他的羊群收集树叶和树枝。这个流动村庄里的某些地域弥漫着谷仓的味道。

正式的厕所在拖船的后部，我们的排泄物自然就从这儿投进了河里。厕所旁设有两个河水淋浴，是公共的。一早一晚这里排上了长队。我和塔贝莎每天中午洗澡，这时的人不多。

淋浴的水不能开关，因为拖船的水泵不停地将河水抽上来。由于没有另外的更衣室，我们只好在淋浴间里脱衣服，还得设法让衣服不被淋湿，这可不容易。河水清澈，但还算暖和。冲洗后，我们得在哗啦啦的水流旁擦干身子，穿上衣服，尽量别再弄湿了。

我们的驳船不仅是流动的村庄，还是个流动的购物中心。

我们时不时地停靠在村子边，主妇们争相拥上跳板，购买盐、肥皂和其他日用品。商人们则下船到村子里收购鱼和野味。

有的村子盖的是茅草屋，用竿子架在河岸上；有的是泥砌的房子，上面搭着茅草。大多数的房子前都有院子，每天都清扫，因而不长草木。这让我想起亚拉巴马许多黑人家的院子。我想，给院子除草是黑人经过移民西方和奴隶时代后留下来的仅有的一点文化传统了。

晾衣绳上挂着洗过的衣服，丛林里独木舟穿行在塔树之间。孩子们奔来跑去，男人们大都穿着牛仔裤，戴着硕大的帽子，在一块块的水域里撑着他们的独木舟。

一见到这种静谧的村子，塔贝莎和我就要进去走走。

我们常常能碰上形孤影单的阿拉伯人，穿着传统的服装，坐在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商店里。他看起来和环境很不和谐，一个戴着穆斯林头巾的商人在住着 600 个刚果人的村子里。我猜他们和莱恩哈德一样，远离故土，来到竞争少的异乡试试财运。

在一个村子里，一个白人开着辆破旧的罗孚越野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大约 4 分钟后，他又轰隆隆地折了回来，用法语问我们："你们到底是谁？"

让·迪埃普和妻子安吉丽卡 3 年前从巴黎来这儿开发伐木的生意。刚果正吸引外国企业家来投资。他被一家法国公司派到这儿来，把桃花心木和其他法国没有的木材运往法国。他聪明、反应快、彬彬有礼且有城府，看起来不应该是生活在

这片黑色中的人。

我们已经几天没洗过干净澡了，我们的新朋友邀请我们去他家冲个热水澡。对我们，这像是要我们去天堂一般。

我们驶过一所房子，我觉得是学校。

“不，”让说，“这是家火柴厂，有足够的人手，却好几年都没生产出一根火柴。”

我问：“工人什么都不干吗？”

“他们去上班，然后就坐着。”他答道，“总共有 7 个人——1 个老板，6 个工人。”

20 年前，不知出于什么政治原因，北朝鲜向刚果捐资建一家火柴厂。这个国家除了木材也没别的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

可惜，这家工厂效率低、竞争力差，政府搞商业总是这样。国家卖不掉火柴，部分原因是其货币和高价的中非法郎挂钩，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儿的人都不懂怎么生产火柴。而火柴厂又是国营企业，政府不能解雇工人。我记得刚果国家航空公司只有两架飞机，却有 400 多名工人，也是一个中央集权制下的摆设。

这 7 个工人每天去火柴厂上班，无所事事，每年还要休两个星期的假，然后再回来，继续无所事事。20 年来他们竟没生产出一根火柴。

我们离开班吉的时候，1 条拖船拖着我们 4 条驳船。等到我们驶入刚果河的时候，我们的驳船队伍已经扩大到 7 条了。

刚果河！流速达每秒 100 亿加仑，仅次于亚马逊河，是世

界上流量第二大的河流。其间可航行的河段达8500多英里,形成了一个交通体系。约瑟夫·康拉德称之为"一条伸展开的蛇,头部扎进了大海,尾巴迷失在丛林深处。"

拖船换了条更大的。约瑟夫船长是如今这个流动城市的市长和法官。每逢当地警察向我们勒索"礼物"时,约瑟夫船长会插进来,塞给那家伙一个纸包。他很高兴把我们的啤酒储藏在他的冰箱里,有几次我们邀请他一块儿喝几杯。

"我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市场,"他向我们讲解道,黑檀色的脸上闪动着自豪的光,"是几百英里内唯一的药店、诊所和酒吧。我给人们带去一个城市。"

从船长的舰桥上望过去就知道他说的多么正确了。现在驳船已经是11只了,拉着上千人。甲板上的炉子和火盆冒出了烟,形成了一层薄雾。所有的通道上都堆满了人。女人们有的在奶婴儿,有的冲着小孩嚷嚷,还有的边洗着衣服边唱歌。男人们在玩扑克和掷骰子。间或有几个古怪的理发师在替人剪发。一只驳船的后甲板上有一个长着络腮胡的人在杀猴子。

随着我们沿河而下,商业越来越繁荣了。商人的桌子上摆放着棕色肥皂、玻璃纸包装的饼干、面包、一袋袋大米,桌子下面大概还有腌好的羚羊肉。巫婆的桌子上有各种小瓶子、护身符和各式咒符以及一只干了的大猩猩的手,似乎以此来加大巫婆的魔力。其他桌子上卖蚊香、抗生素、治疟疾的药、一瓶瓶的盘尼西林粉、皮下注射针头和一堆堆色彩亮丽的胶囊。

有张桌子上放着一堆大瓷碗或大锡碗,里面是炸过的毛虫和蛴螬,这些东西对经过者的诱惑如同炸薯片和法国油炸

食品一样。

最后，我们的驳船增加到 13 条，全都由那只拖船拉着前进，拖船连在最后 4 只驳船之间。

驳船越多，皮埃尔的活动空间就越大。他得以在不同的甲板上搞到不同的刚果姑娘，有时一天好几个。

有一天正当我们“嘎嚓嘎嚓”地向前走的时候，甲板下面突然震颤起来，只听“轰隆”一声，塔贝莎和我被甩在了一边。

我们周围的人都失去了平衡。桌子上装肥皂和盐的盒子冲到了地上。我们跑到舷边。这时已是干季的最后几天，雨季即将来临。水位很低，我们的船触在了暗礁上。

在驳船前端，约瑟夫船长把拖船向相反的方向开走，试图把我们拖出去。拖船又推又拉地折腾了 25 分钟也没成功。我们搁浅了。

我们有点不安地看着水手们把拖船与其他驳船脱开，将拖船驶入河中。我担心起来。船长是去求救吗？要是驳船漂走了怎么办？他也许知道他在干什么，也许未必。刚果河上的船长能受过多少训练呢？

在河中央，约瑟夫启动所有的柴油发动机，开足马力向我们冲过来，像是要撞击我们——他确实这么做了——可不是轻轻地碰，而是狠狠地撞了一下。但此举奏效了，最左边的驳船从暗礁上退了出来。

现在我们 13 只驳船在没有导航船的牵引下，一只连一只地顺着湍急的刚果河滑下去。



到我们的旅行结束时，福乐·刚果号拖船已拖了13条驳船。

拖船上又突地冒出了一股烟，船长加快马力赶到了驳船大队的尾部。如果他不能熟练地在急流中航行，将拖船驶到位并和驳船挂钩的话，13只驳船可能会漂流而下，撞上河岸，后面的船又会一个接一个地撞上前面的船，那将乱成一团，十分危险。

但船长知道该怎么做。他熟练地将拖船驶到位，与驳船重新挂上钩，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终于，我们抵达了终点站，布拉柴维尔。

我们在非洲的流动村庄里生活了13天。船上的商人们打点好东西，一转眼在码头上又开起集市。像殖民时期的美

国人，每当供应物资的轮船越过大西洋靠岸时，数以千计的市民涌上前来，竞相购买新鲜的物品。这些东西一天之内被抢空。

布拉柴维尔是刚果的首都，也是最南边的城市，比班吉发达。二战时这里曾是法国自由阵线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那时住在这里。

一座仓库的侧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列宁像，他的手举过头顶，带领着工人阶级向前进——一刹那我仿佛置身于俄罗斯，受到了文化上的冲击。我想起刚果正坚定不移地实行共产主义，是非洲仅有的两三个把70年代列宁的哲学完全搬回家的国家之一，而那时，列宁主义在第三世界里风靡一时。

在布拉柴维尔郊区，我们参观了世界上第一家大猩猩"孤儿院"。

"孤儿院"里的20只大猩猩是守林人送来的。现在按照法律，他们有权没收所有标价出售的大猩猩。"孤儿院"是英国的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约翰·阿斯匹诺出资建立的。这个人在英国拥有2个野生动物公园。他花了1500万美元来修建和维持这个"孤儿院"，还计划再投100万美元修建更多的设施。这个公园也是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现在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这里的许多猩猩亲眼目睹了它们的妈妈被猎人屠杀。它们的老师亨利告诉我们，这种经历对它们的伤害和对3岁孩子的伤害一样。这些幼年猩猩需要24小时的监护。亨利30出头，是位动物学家。他解释说，猩猩妈妈一年内不会给小猩猩断奶，一般要等到它们到三四岁的时候才断奶。



船长和大副指挥下的福乐·刚果号是一艘组织严密，效率很高的拖船。他们还给我们冰镇啤酒喝。

一屋子的猩猩孤儿就像6岁的人类一样，每一只都以它们不同的个性和古怪的表情引人注目。亨利告诉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表明猩猩的遗传基因99%和人类有联系。看着这些孤儿，我能相信它们和我们很相近。

一只猩猩拍了一下我的屁股然后跑掉了，等我没看它的时候又来一下。有几只猩猩挺害羞的。有的喜欢玩乐，有的爱炫耀。它们和我们沟通得如此好，就像它们在和我们谈话，让我们知道它们的个性。不像是一屋子的猫，它们不会让我们知道它们在想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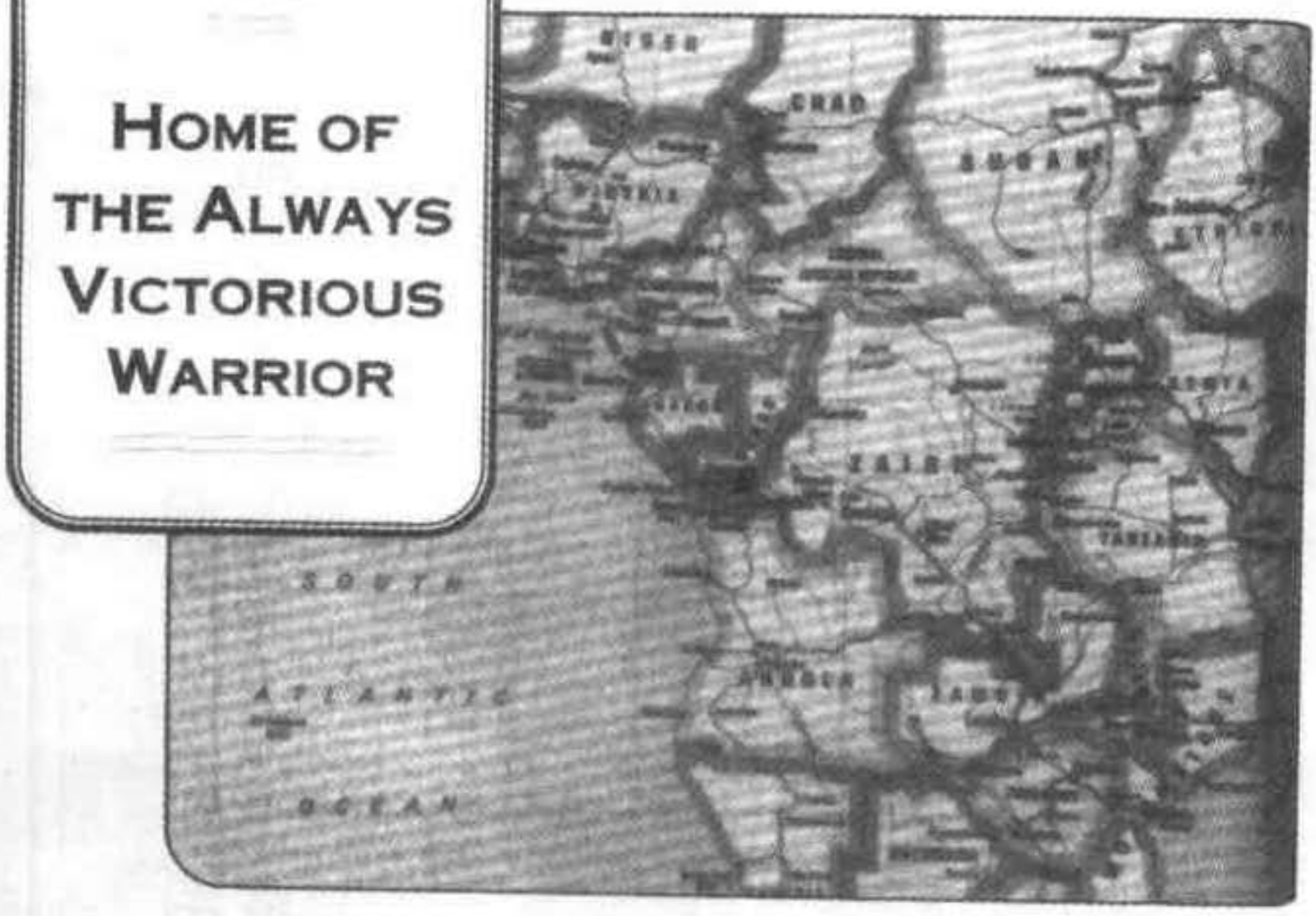
这个20英亩的营地是为这些孤儿重返丛林做准备。亨利让我们放心，它们虽待在公园里，却仍保留着它们在丛林生

存的本能。我想起在驳船上看见的猩猩的手。我不寒而栗，想着不知这里哪些猩猩的手会被摆在巫婆的桌上卖。

一只2岁的猩猩在我身上爬来爬去，不太招人喜爱。亨利说了它几句，它就下去了，拍了拍我的后背，让我别恼火。

22

HOME OF THE ALWAYS VICTORIOUS WARRIOR



22. 战无不胜的战士的故乡

HOME OF THE ALWAYS VICTORIOUS WARRIOR

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是我们自阿尔及尔以来到过的第一个大城市，但也没什么起色。有钱的扎伊尔人带着步话机和移动电话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因为他们的有线电话用不了。旅店里很多东西以美元标价。那些以当地货币标价的东西则每天都在涨，连报纸都如此。餐馆的菜单上没有价码，每道菜

一天一个价。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前两天，BBC 的短波报道说我们原计划穿过安哥拉的那条路线上战火又燃了起来。

我们又踌躇起来：穿过扎伊尔还是安哥拉。怎么选择啊！一边是枪林弹雨，一边是随时可能比西伯利亚还糟的道路。即使是通往南部首府路邦巴什的主干道也被形容成一条泥河。

我们到美国大使馆找到一位官员菲尔·科万，想让他帮忙出出主意。我们询问安哥拉那条路旁的情形怎么样。当得知美国支持的尤尼塔武装分子是由这个使馆负责时，我们知道他不能透露很多情况。

"就跟我们讲讲要避开什么，"我说，开始明白为什么使馆官员那么不情愿见到同胞，"不用告诉我们秘密。"使馆人员有上好的工作，工资高，住在漂亮的房子里，受到驻在国的礼遇。这时他们那脏兮兮的国人来到这里，带来问题、要求、抱怨和委屈，将他们完美的日子破坏掉了。

其实安哥拉近在咫尺，他却向空中挥挥手，说道："我不清楚。"他答应给政治处的同事打电话看看能问出点什么。

然而第二天我们再来时，他的态度更冷淡了，简直是冷冰冰。

"没人清楚安哥拉的任何情况，"他板着脸说，"但别往那儿去了。"

我由此推断，他要么不想告诉我们可能会受伤的消息——他不想单独负这个责，要么他和政治处认为我们是间谍。我们决定走自己的路。

接下来的24小时里BBC报道安哥拉战火在升级，但我仍拒绝通过丛林里1500英里的泥浆走到路邦巴什。

每一个穿过扎伊尔的人都能讲出可怕的故事，我可不想和他们一样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另一方面，即便安哥拉的路好走些，我也不想被打死或被扣做人质。所有旅行者都警告我们留神安哥拉的地况，据说那儿的独腿人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多。

每一次比较都显出扎伊尔更可怕一些，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它是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分裂的典型。

作为环撒哈拉的第二大国家，扎伊尔的面积是加州、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三州面积的总和。它的资源丰富，钴、铜、钻石、锡、锌、银、镉、金和钨的储藏量很大。咖啡、橡胶、棕榈、可可和茶树很容易栽种。它巨大的内陆水运体系直达内地，同时也是非洲水力电气的一个主要基础。尽管如此，它的人均收入却是非洲最低的之一。多年来其经济因腐败、主要出口产品价格过低、庞大的外债、资金流失和通货膨胀而濒临崩溃的边缘。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具备经济大国的潜力却成了世界十个最穷的国家之一。

货币的汇率是3000扎伊尔兑换1美元，且天天都在跌。扎伊尔人每天都得跑几趟银行去查看最新的汇率。到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汇率已是几百万扎伊尔兑换1美元了，两三个月前还是700000:1。这种超级通货膨胀往往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崩溃的前奏。

除了商品贬值以外，扎伊尔和非洲许多政权在分裂。这是因为美国人和俄国人不再支持这些政治凶手了。冷战时

期，两个超级大国往这块大陆上投了几百亿美元的钱，用来拉拢那些政府。和非洲其他的独裁者一样，扎伊尔的独裁者蒙博托一直脚踏两只船，直到他认识到他的钻石、铜和钴矿对我们比对俄国人更有价值。

如今，他如此惧怕他的人民，以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刚果河的一只驳船上，把自己保护起来。蒙博托·塞塞·塞科·古占·尼班度·瓦·萨·班加总统——意即"战无不胜的、人人惧怕的战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个人财产估计在60～80亿美元之间。他在统治者的宝座上已待了26年了。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他腐败、偷窃国家财产和祸国殃民的事。



他在国内走动的时候，总是被秘密警察和一只只装满钱的箱子包围着。每到一处，他有目标地向人们施舍他的扎伊尔以收买人心。任何具备经济意义的企业都被收归国有，换句话说，蒙博托把所有的好行业都偷进了自己的腰包中。作为政府，除了他家村子前的一条路和国家航空公司以外，他没花一分钱在国家的基础建设上。即使是最贪婪的殖民者也不会以这样无耻的方式对待他的殖民地。

在他的压迫之下，国家用于学校、医院、道路和社会福利的钱全加起来还没有在他一个人身上花的钱多。在他当政时期，他为自己修建了11座豪华宫殿。他在西班牙有一座16世纪的城堡，在巴黎有一个奢侈的府邸，在瑞士有一座带32个房间的豪宅，还有23处房产分布在欧洲其他地方。《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每隔两三个星期花5000美元请理发师专程从纽约飞过来为他剪一次头发。

他不是非洲唯一的腐败政客，但却是最腐败的。多哥的军事独裁者纳辛比·亚德玛将军在外国银行的秘密账户里藏

着数十亿美元。在过去的35年里，非洲因独裁而致富的人不计其数。西方媒体曾透露，尼日利亚的财政体系使得国家财富几年来被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蚕食掉，至少有300亿美元被转到了瑞士。据报道，亿万富翁有6个，千万富翁有600个，百万富翁达5.5万人，而2200万的尼日利亚百姓一天的收入还不足10奈拉，合1.5美元。

联合国的报告里说，非洲5岁以下的孩子中有40%患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给这些孩子的身心造成了危害。而那些贪婪的非洲统治者们从这块大陆掠夺的财富估计有1000亿美元——几乎都来自外国援助——用这些钱修建基础设施足以把数千万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驾驭着扎伊尔的一小撮精英开着他们崭新的梅塞德斯—奔驰车在破败的马路上兜风。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仿佛不存在似的。他们到欧洲购物，让孩子在欧洲受教育。

扎伊尔3500万黎民百姓的生活却十分贫困。铁路还是殖民时期修建的，火车因为缺乏燃料难得跑几趟。大部分公路已破败不堪。学校没有书和纸张，合格的老师寥寥无几。医院里的设备、实验室和药品少得可怜。商业已基本停顿。刚果河沿岸的扎伊尔人还算幸运，他们还有东西可买卖。我们经过了倒塌的谷仓、房屋和水塔，大片的橡胶和棉花种植场因荒废又变成了丛林。仅存的一些橡胶和棉花也难得有收成，因为卡车到不了这些村庄。没人还敢梦想过上好生活。

扎伊尔人明白自己的国家并不穷，是那些“精英”们偷走了一切。他们自己受穷，看到邻居也都在受穷。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是好人，被一种该死的制度坑了。

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了这种反映。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和宝马汽车都有经销商，但没人做摩托车和自行车的买卖。这是给穷人带来便利的交通工具，也没人经销便宜的丰田车和菲亚特车。

安哥拉的战斗更加激烈了。我们只能开车穿越扎伊尔，或者坐飞机去南非，但那将破坏我梦想里的精华部分。

我们还是开车。我们向南朝路邦巴什驶去，第一站是奇克威。

令我们欣慰的是，路不算难走，大部分是坚硬厚实的土地。第一天我们走了300英里。皮埃尔对文明的欢愉依依不舍，但还是随我们土路了。他那辆笨拙的卡车慢腾腾地走在前头，挡住了我和塔贝莎，我们有时就超过去径直往前开。

在一个路口我们拐错了弯，离开了大路，碰巧遇到了一个侏儒村。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非洲的下层阶级，被认为未开化的人。他们的身高大约在4.5英尺～5英尺之间，身体的比例很匀称。我被这些还不及我一半的小人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第一次像巨人般巍然耸立于其他的成年人之中。做为纪念，我买了一只侏儒用的弩。

尽管在城市里有些黑人雇用侏儒做仆人，但大部分侏儒没有像其他部落那样向城市迁徙，而是赤身露体地生活在丛林里。干嘛要去城市里被人奴役呢？

我惊奇地发现汽油只有2.5美元1加仑。我搞不清楚是政府为了让人民高兴而把汽油卖得很便宜呢，还是货币贬值的速度太快，连提价都来不及。

“得了吧，吉姆，”在一个叫穆可可的村子里皮埃尔向我哀求道，“你有钱。今晚再给我点儿吧。”

“不行，我说过该给你的都给了，”我回答说，“再没有了。”

看着他用靴子的鞋跟在土里磨来蹭去的样子，我以为他还要再说些什么，但他转身走开了。我对他厚着脸皮老来问我要钱十分厌恶，我想我在扮演他巴黎童年里的什么角色，完成他父亲未尽的事宜。可这是个现实的世界，不是他少时任性的巴黎。

他满心不乐意地答应到玛旁古的天主教传教团那里和我们碰头。接下来的一整天里我们大汗淋漓地行驶在扎伊尔的主干道上，这条路已跟一条大泥沟没什么两样了。

日落时我们疲惫不堪地停在玛旁古传教团的宅子前。没有旅馆，我们感到自己能找到热情的传教士还是幸运的。弗朗西斯主教阁下允许我们住进主楼西边的客房，这座房子里有一些空房间。这是个低矮、方形的建筑，四周是宽敞、带顶的走廊，走廊的房顶是由拱门和圆柱支撑的。不像其他许多传教团，这里只有非洲人。

这一天我们行路十分辛苦，而皮埃尔的情形比我们还糟糕。他比我们晚到 2 小时，精疲力竭、汗流浃背、浑身是土。他一到这儿就来找我，还是要钱。我一口回绝。见鬼，我一个子儿也不欠他。

有人告诉我，我性格中有几个致命弱点，其中之一是如果有人逼迫我，我一定反击。我的家在亚拉巴马，家教很好，长大后我按照规则行事，从来没有理由逼迫任何人做什么。但我一到纽约，就遇上了不遵从游戏规则的人，于是我更加一意

孤行。

我想这里面还有深层的原因。我内心中隐藏着一股愤恨，那是当我看到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包括祖父母在内——一这些能干而生气勃勃的人一生错失良机，最终一事无成的时候。我的祖母格兰蒂丝在四五十年代是俄克拉荷马雨果市的一个通讯社记者。她是那个男权至上的蒙昧社会里的初生之犊，这个小巧玲珑的女士——身高不过5英尺——总是大踏步地走进警长的办公室，采访那些杀人犯。但她和一个叫达奇的人结了婚。这个人一生的鼎盛时期是他当学生会主席和大学橄榄球队长的时候。等到我知道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年的梦想已变成了褪色的回忆，两人对此都很清楚。

祖母——我叫她格兰蒂丝——错过了她最好的机会。她明白生活能给出的比她已经得到或能够得到的多得多。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能看出她内心的挫折感——一种愤怒。我很爱她，不愿意走她的老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别人拿走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的一个原因。

因此我拒绝再给皮埃尔更多的钱，我知道一旦我让步，他将没完没了。

我们站在马路上，传教团里的人围拢过来。他不停地向我要钱，越逼越近，而我就是不答应。他失去理智，给了我一拳，把我打得向后一趔趄。他比我高大强壮得多。几个当地人把我们推开了，劝走了我。我很生气，边走边与人论理，把皮埃尔留在了走廊上，让他自己在那儿露宿。而我走到房子的后面，到塔贝莎和我的房间里去了。

因想着如何处理皮埃尔的事，我闷闷不乐，一晚上没怎么睡，倒是第一次体验了十足的热带暴风雨。雷声大得能把人

从床上震下来，大雨冲蚀了塔贝莎的摩托车下的泥土，车子倒了下去。我不得不在半夜起来，吃力地把两辆500磅重的车推到走廊上去。暴风雨直到天亮才停了下来。

我本来希望在皮埃尔醒来之前离开此地，大家各顾各。没这么走运。他也没睡好。早晨起来后塔贝莎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房子前面去拿我们留在那儿的大部分补给品。有十来个人围在那儿，都是非洲人，正用法语和皮埃尔聊天。

他走过来问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他看起来比前一天晚上还要疲惫。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答道，"我们接着走我们的路，但你不要和我们一起走了。"

在我打包的时候，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从他放在车后的行囊里取出了他的猎刀。这刀我以前见过好几次，但这会儿着实让我害怕了。

他把刀握在手上，鬼鬼祟祟地朝房子的后面走去。我立即明白他是冲着那两辆摩托车去的，那是我们离开这儿的唯一途径。

我没跟过去，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绕过房子。我刚拐过最后一个弯，就看到皮埃尔已经朝着我的那辆宝马去了。他似乎在找下手的地方——可能是轮胎，也可能是油管。他当然奈何不了发动机，但他有的是地方搞鬼。看起来他简直像要消灭我的摩托。

我竭尽全力，冲他喊道："你给我离那车远点！"

皮埃尔抬起头，吃了一惊，然后向我走来，举起了刀。

"吉米，我要杀了你！"他嚷道。

我一边转身跑掉，四处溅起泥浆和污水，一边禁不住想到

他叫我“吉米”是想让我恼火，因为他知道我很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达到目的了。

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脑子一定转得飞快。我不想和他打架，更不想和他手上的刀子打，但我要把他从我们的摩托那儿引开。我意识到我必须跑得比他快，尽管他比我年轻25岁。他吸烟，而且我从来没有见他做过一丁点运动。于是我铆足了劲跑到了房子的前面，希望和他在那儿交锋。我祈祷不管怎么样其他的人会救我。

我一边跑一边侧头看看他是不是跟上来了，以免他折回去弄我的车。我还不停地用英语叫道：“救救我，他有刀！”这很傻，因为扎伊尔人都说法语。

在房子前面的那些人大概不明白我在喊什么，但他们意识到出事了。我绕着房子跑到一半时，有四五个人向我跑来。我跑过他们，一直到我看见他们把皮埃尔截住后才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他们人多力大，其他人也迅速赶到了，好歹让皮埃尔冷静了下来，然后把他带进屋子里，叫来了警察。

警察很快就到了，我松了口气。我把情况从头至尾地讲给一个上尉警官听，他又问皮埃尔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我拒绝付给他工资。他说，作为雇主我把他带到这么远的地方，现在我应当掏钱让他回巴黎。

不是这么回事，我解释道，他想杀了我，我希望拘捕他。我们想往南走，不想让他跟着我们。从我们这方面考虑，两三天就可以放他出来。

上尉那张光滑而威严的脸上一筹莫展，似乎在表明几个任性的外国人之间的争执不在他能管的范畴之内。他大约6

英尺高，几百磅重，蓄着浓密的胡须。不过，即使旁边有一群人又喊又叫，他也能巍然不动，冷静处之，仿佛他经常在骚乱中判案。

“你想让我拘捕他吗?”他用法语问我。我的法语只有点头问好的程度，于是塔贝莎替我做翻译。

“太对了!”我说，“他想杀了我。你可以问问这些人。”

“好吧，”他对手下发出命令，他们向皮埃尔走去。然后他对我说，“你得付20万扎伊尔。”

我哑然失色：“付钱?! 为什么?”

他耸耸肩。“有很多费用。我可以看看你的护照吗?”

“当然，”我说，“全都是合法的。我们也有签证，一切手续。”

他扫了一眼，然后把东西揣进了口袋。

“我想我们最好一起进城，把这事解决了。”他说。

这意味着我们要走70英里到伊勒玻。那是个不小的镇子，有驻军，还好和我们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我不愿被耽误，争辩说我们得上路了，我们还要赶时间。但我知道，我就是说得再着急，我那“南极冬季寒流侵入南美最南端”的论点在非洲赤道上是没有说服力的。

伊勒玻最让人厌烦的莫过于尘土了，干脆地说是泥浆。在市中心立着一个警察岗，是翻过来的垃圾桶，警察站立其上指挥交通，很多地方都用它来做安全岗。伊勒玻的这个已废弃多年不用了。

我们在镇上最大的一家旅店“棕榈酒店”要了最好的一间房间，这个旅店是殖民者在本世纪20年代为迎接比利时国王来访而建的。房间装潢得很华丽，周围有露天的大阳台。宽

敞的浴室里是20年代的摆设。楼下有餐厅,但实际上什么吃的都没有。

"先生,"服务生用生硬的英语问,"你们需要几桶水?"

我有点意外,问塔贝莎要几桶。我们决定要两桶。

很快我们便明白服务生为什么这么问。鉴于我们的浴室曾是国王的,它就不会有自来水。盥洗、淋浴和冲厕都得用水桶里的河水。最后,我们的瓷砖地上排起了几十个水桶。

棕榈酒店也有它的优势,它每晚收费仅1美元。在这儿,房间价格仍是很久以前定的,没有随货币的贬值而调整。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离开这儿,于是赶紧来到了上尉的办公地。

上尉的立场是要我们偿付我们造成的麻烦、因我们而起的费用,20万扎伊尔够了。

"都是些什么费用?"我问。

塔贝莎翻译了过来。我们要为皮埃尔进监狱付钱,要管他的饭,还要付看管他的钱。我可以付扎伊尔,但上尉更想要美元。他不是傻了,他们的货币正以每天1%~2%的速度贬值。

我向他要回我们的护照。

他说还是放在他们那儿更安全。每次我问他的姓名,他都光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不理我。

我要求打电话到金沙萨的美国使馆。上尉的脸上放出光来——这主意可不错!他本人愿意带我们到镇上的电话处。

我要找大使本人听电话,坚持让他找人来这儿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上尉走在我的身边，我得胜般地向镇上唯一的电话走去。电话在社区中心，一所有游泳池、篮球场和酒吧的房子，只是都没有开。

上尉拿起那个仪器，捣鼓了一阵，“电话坏了，”他说，一边抱歉地耸耸肩，一边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回到棕榈酒店，我把这件事又想了想。

我从鞍囊里搜出一支笔和纸。我踱到了邮局，实际上是个20英尺见方的小屋。我把头伸进小屋的窗口，将信递给邮递员，告诉他寄到金沙萨的美国使馆，从这儿往北不过一两百英里的地方。

“这信不能寄。”

“为什么？”

“你没贴对邮票。”

“怎么才算贴对邮票？”我问。

他摇了摇头。“这信寄不了。我们不往那个使馆发信。”

现在伊勒玻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处境。没人想开罪上尉，这位上尉既然没有更好的名字，我和塔贝莎就叫他L上尉。

我到外面朝四周望了望，看看有没有邮筒，好把信扔进去。但一个也没有，就是有也没用，因为这只呆鸟管辖着全镇的邮递系统，像当昆的凯宾夫人一样，没有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能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发出去。

伊勒玻警察系统的二号人物是一个单薄、委琐、留着一撇八字胡的家伙，据说是这里的移民官，但没说移民官在这个内

陆腹地是干什么的。好几次他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傻笑，对我们说要把我们投进监狱。世界上有好警察就有坏警察，在这丛林深处也一样。

像L上尉一样，他也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们。塔贝莎和我互相叫他“雷恩”（意为人造丝），因为他总是穿着光滑的人造丝衬衫和长裤，颜色是非洲常见的色彩。

这可是两个野心勃勃的警察，只对大“礼物”感兴趣，不像班吉的街头警察，像小骗子一样只要个把美元。倘若他们一直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就比较容易逃脱上级的追查，如果我们把这事捅到上面去的话。而我确实打算这么做。

第二天晚上，L警官作为我们的客人和我们在棕榈酒店共进晚餐。

和平常一样，他穿着制服，做威严状。我们得知他来自扎伊尔的另一地区，不属于本地的宗族。

不幸的是，他要摆架子不是很容易，这里没什么可吃的。酒店提供野猪、树薯、家猪和鸡肉。晚饭后他带我们去警察局旁边的迪斯科舞厅。

舞厅是一块露天空场，四周有围墙，中间一块有顶棚的是酒吧，乐队在一边演奏。在一片西方和非洲的混合乐曲中，几百号人在这里跳到凌晨三四点钟。

上尉不怎么常来这儿，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地。我们都在一张桌子边坐下，要了几瓶装在大棕色瓶子里的啤酒。所有这些自然是我们掏钱，我们竭力做他的朋友，拉拢他，好让他把我们的护照还给我们，我们也好早点开路。

皮埃尔的护照也被扣下了，他本人被安置在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我们几个哪儿都去不了。通过聊天我得知，上尉想要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怎么处置我们确实感到困惑。

他能读懂手下人的意图而做出道义上的裁决，但我们和他以前碰上的人都太不一样了，他无法断定谁是谁非。他自认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要把我们带到当地的天主教传教士那里，让他们帮着出出主意。

让-皮埃尔神父和其他两个比利时教士都70多岁了，他们自二战时就住在这儿。他们的领地包括一座大房子和几所客房，都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他们自己发电。

布道和救世只是这三位教士的副业，他们的主要职业是经营当地的啤酒垄断权。大约每逢星期天他们会做一次弥撒，但其余的几天里他们就卖啤酒，好像麦芽比圣酒更能服务于他们的目的。

我们把故事对他们讲了一遍：皮埃尔是我们雇来运送补给品的，他把钱花光了，还袭击我，如今又要我给他出回法国的路费。

让-皮埃尔神父说道："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叫到这儿——你们、上尉和那个法国年轻人——我们来把这问题解决了。"

我们高兴起来，这听起来才像个地方法官，有丛林特色的。也许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不久就能走我们的路了。

一两天之后我们都来到传教士的地盘。塔贝莎这几天来一直紧张而焦虑，但咬紧牙关挺着。由于她的法语比我的好多了，因此不得不一块儿过来做翻译，否则她宁愿待在旅馆里。

当我们站在那儿等着的时候，被一个比利时老人吉尔伯

特·蒂尔伯格先生拉到了一边。他告诉我们他住在100英里以外，在这里等着他矿上需要的柴油运过来。他和他的这几个教士老朋友住在一起，是方圆几百英里内唯一的白人。

“我得告诫你们这里出现争端或麻烦时的两三个问题，”蒂尔伯格先生用别人听不见的低声说，“如果你们陷入了麻烦，越快解决越好。等闹到当地的法庭上，就没完没了，恐怕得要好几年的功夫。你就脱不了身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想了想。我突然有一种幻觉，仿佛我们得用堆积如山的“礼物”来摆脱当地律师和法官的纠缠。“我们这些在这儿的外国人——也没剩几个了——绝不想路过此地的外国人出这类的事，这会让我们陷入更加复杂的境地。”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如果我们在法庭输了，他们更加觉得可以在外国人身上敲诈一笔；如果我们赢了，扎伊尔人会觉得丢面子，转而迁怒于人，很有可能就是他或者教士。

“尽快把事情了了，越简单越好。”他说。

我听懂了他明白无误的潜台词：给点钱，然后赶紧走吧，别想你的为人之道了。

我提出给皮埃尔足够回金沙萨的盘缠，他可以去那儿找法国使馆，让他们帮助他回巴黎。

让-皮埃尔神父问皮埃尔，我们的协议里是否包含他回巴黎的路费，他还算诚实，没有撒谎。没有，他说，没包含。

神父问我：“你把该付的钱都付给他了吗？”

“是的，”我说，“还多给了。”

让-皮埃尔神父问他钱在那儿，他耸了耸肩。神父又问我他拿钱做什么了，我告诉他全都花在非洲的酒吧和女人身上

了。皮埃尔闷闷不乐却又不免自夸地讲了一通，生怕向神父隐瞒了什么似的。

他们退到屋子里审议去了。只一会儿，我们得到了裁决。

让-皮埃尔神父说我们不欠皮埃尔任何东西，他被困在这儿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我们愿意帮助他回金沙萨，那是出于我们的慷慨。

当然，这不是正式的判决，神父不具备法律效力。我现在相信扎伊尔没有真正的法律机构，整个国家都是蒙博托的天下，一切都由他和他的爪牙说了算。

让-皮埃尔神父告诉上尉我们是诚实、合法和负责的人，应当让我们走。回到镇子里，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他同意教士的裁决，我们一交完应付伊勒玻的司法费用，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离开了。

就是说，不管教士们怎么裁决，他还是要我们向他行贿几十万扎伊尔，这个数目随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而增加。

像秃鹰聚拢在将死的小牛旁边，我们每去一次警察局，上尉的手下人就多了一些。他们也要分一杯羹。

我和塔贝莎就如何溜出镇子展开了反复的讨论。就我们听到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开摩托车往南走，从这儿到路邦巴什的600英里的路已被政府关闭了，要到雨季结束时才重新开放。一路上没有地方加油。

我想马不停蹄地开回金沙萨的美国使馆。

塔贝莎说这主意很蠢。上尉肯定会开着四轮汽车追赶我们，或者用无线电、鼓或其他什么神秘的非洲通讯工具在半路上诱捕我们回来。

我得承认她是对的，于是我放弃了。

到第六天，上尉带我们到他家吃晚餐，见见他的家人。虽然我们是他的准囚犯——被软禁在旅馆、护照被扣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但他自始至终都不失尊严，颇有风度。闲聊中他告诉我们，他的工资是固定的，这在一个恶性通货膨胀的社会里已经是个大问题了，而他又连续几个月都没领到薪水了。这种情况下，要么就受穷，要么连正直的人也得干出格的事。可能，敲诈我们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但不管怎么说，他告诉我们碰到的每个人——所有人都对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太太、店铺老板、小学生——我们是文明的、懂道理的人，罗杰斯是一个教授，不是个坏蛋。这里的坏蛋是皮埃尔，他是个骗子。但上尉还是要我们的钱。有一次上尉暗示要用这钱的一部分把皮埃尔送上去金沙萨的驳船——和我们正好背道而驰，拉大了我们和他的距离，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于是我收起了我的自尊，和他达成了交易：交几千美元，付扎伊尔，让我们离开伊勒玻。

我没有那么多的扎伊尔，但他能想办法。银行可能已经关了，但当地的一家兑换处可以为他服务。

在兑换处，我拿出了几叠面值百元的美元和扎伊尔，经过几番小小的讨价还价，我换足了需要的钱。

钱一到手，上尉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只需让移民官验审一下就行了。

验审？移民官？

他是说……雷恩！

我们上当了！在过去的几天里，雷恩一直贪婪地盯着我

们，现在我明白是为什么了。这好事他也想插一腿。不用说，他和他的同伙——上尉就这对"肥鹅"已达成了协议，七尉先宰，然后他再上。

我的脾气在这个熬人的过程中本来就好不了，这时我的怒火要爆发了。

"别担心，"上尉说道，语调很温和，"没事了，让他看看你们的护照就让你们走。"

我这位新朋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触到我的身体时，我打了一个激灵。我说不出他是善意的还是正把一头愤怒的羊羔引向屠宰场。

"我带你们去。"他报以惯常的宽厚的微笑。

雷恩的办公室里没有几件家具：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空空荡荡，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只有木制的百叶窗，其他便什么都没有了。全扎伊尔的官员都偏爱这样的摆设。

雷恩是个看着让人不舒服的家伙，他的一举一动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他那"狡猾"的性格。他在纽约会让人不舒服，在伦敦也会让人不舒服，但在这儿——扎伊尔的内地，他看起来尤其让人不舒服。

与他办公室一墙之隔便是监狱。我们经过时牢门开着，我往里瞥了一眼囚犯，他除了贴身内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士兵们走进去开始揍他。他们没把皮埃尔关进这个监狱，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儿太可怕了。

我问一个士兵这家伙究竟干了什么。原来他偷了4头猪，必须在这儿待到他能还清这笔账：10万扎伊尔。

雷恩在他的书桌后面，看到我们落入他的掌心，脸上放射

出兴奋的光芒。他单刀直入地问我们要证件，

我差点乐出声来。如果他想找的是这个碴，没门儿。我们的证件无懈可击，

他一件一件地查看，又重复了一次。

"这不可能是对的！"他叫道。

他在看第3遍，一张张、一页页、一条条地检查。不错，我们有签证；不错，我们有到这里、钻石矿附近的通行证；啊，对了，我们有所需的一切特许证和摩托车的国际行驶证。

我都有点得意了。现在我庆幸听了金沙萨领事馆一个官员的话："噢，顺便提一下，你们办了经济区通行证了吗？"我们为这个文件又花了一天的时间，但比在这儿花时间划算，这儿可要贵上100倍。

这下雷恩坚持要对我们进行彻底搜查。他让我们把摩托车开过来，在他的指挥下，他的手下打开了我们的行李。我们紧盯着搜查者，以免他们把违禁品塞进我们的行李。他们没发现我们在摩托车上藏钱的几个地方，雷恩什么也没找到，他连抬起眉毛的机会都没有。

既然没查出什么漏洞，雷恩审时度势，控告我们让两个同性住在一个房间里。几天前，两个男性游客，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新西兰人，在棕榈酒店开了一间房间。现在他们已经走了。

"这些人不是和我们一起的，"我跟他说，"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

"但你们也住在那儿，"雷恩以胜利者的口吻说，"你们知道这事。"

"这没道理，"我说，"既然你们知道这情况，干嘛不拘捕他

们?"

"他们没钱。"雷恩说。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吃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想起在扎伊尔别的地方也看见过同性居一室,便跟他说了。

"更有甚者,你们还非法换钱。"雷恩不理我的话,身子向后一靠,越发洋洋得意了。

"那些扎伊尔——我们用来付给上尉的?"我结结巴巴地问。

他得意地点点头。我更加目瞪口呆了。每一本指南书上都说这是绝对合法的,别人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在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什么罪名都行,只要能扣在我们的脑袋上。

"那怎么可能是非法的呢?"我对他说,"上尉本人带我们去的。"

"是我在管移民,"他回答,"而不是上尉。"

我们给他看了几本指南书,说明换钱是合法的。

"我不管这些,"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法律。"

我还在申辩,他则坚持要罚我们的钱。我不干,他冲我叫嚷起来,我也对他嚷嚷。

最后他把我关进了监狱,是这座房子里几个空房间的一个。没错,我可以从窗户上爬出去,但院子里站着个卫兵,我是跑不远的。

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怒火中烧。

最后,我又一次屈服了。

我答应付给雷恩几百美元,只要他保证让我们离开伊勒坡。他说我们可以离开,但只能坐火车走,因为往南的路已经

被封住了。他已经无法让我相信他的话，他那狡黠的表情告诉我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我们还得去他家吃晚饭。

我们对此人深恶痛绝，但不能不接受这个邀请。我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他别想让我们上钩。他想让我们对他感觉好些，这样等我们到了路邦巴什后不会举报他的所作所为。好一把如意算盘。

那天晚上，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都在家。和其他所有的非洲男人一样，他使唤妻子像使唤仆人一样，用完了就不理她了。塔贝莎是西方妇女，可以和雷恩与我同桌吃饭，而他的妻子只能在旁边伺候着我们。

饭后他说："现在我们出去喝杯啤酒。我们得交个朋友，握手言和，这样彼此都留下好印象。"

对此我们仍然无法拒绝，于是去了迪斯科舞厅。上尉也来了。一坐下来，他们又开始向我要钱。

我肺都气炸了。"等等！你们跟我说我不用再给钱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了。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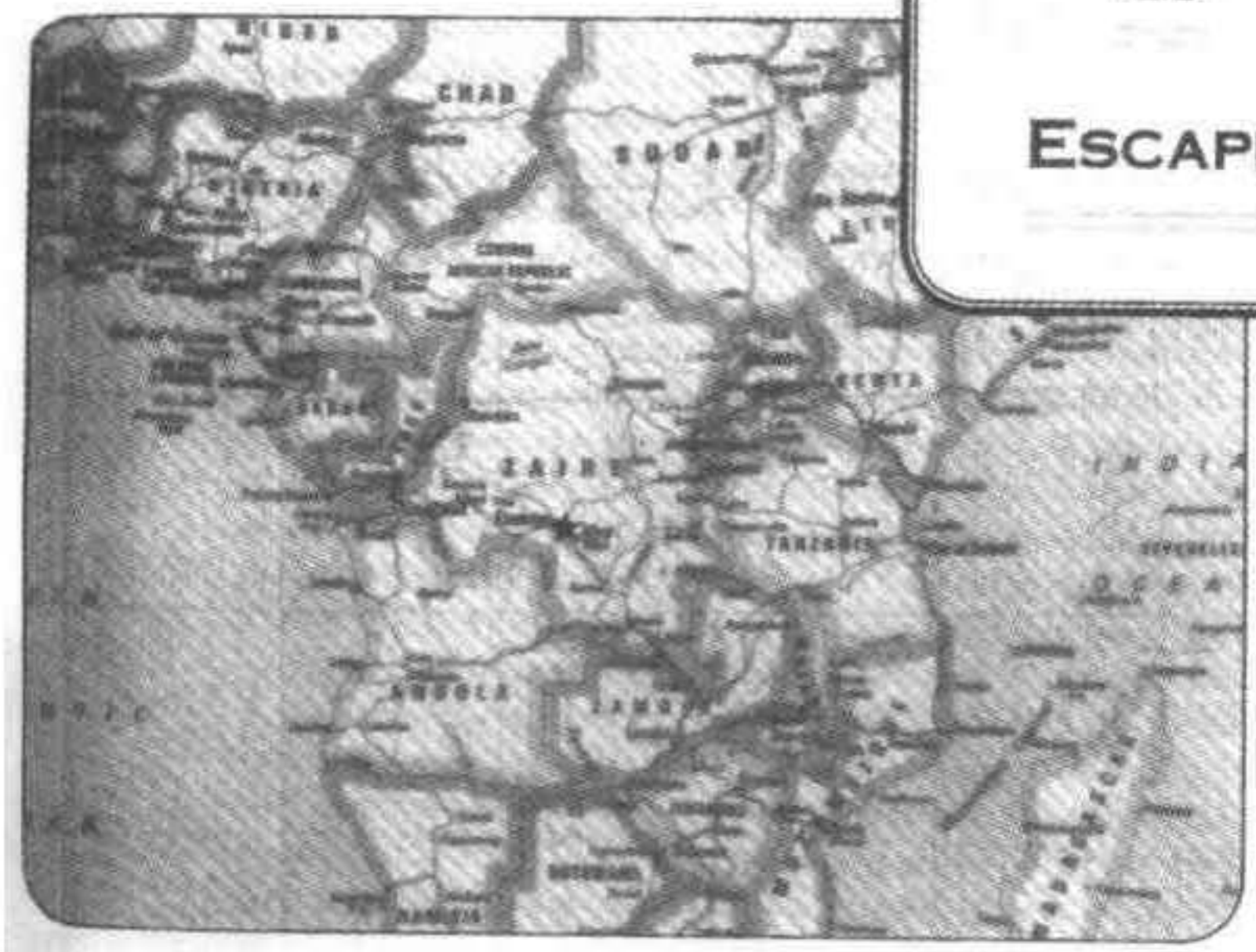
他们格格地笑起来，指着我，笑着说："好吧，不给就不给。"

我们喝酒的时候，我说："既然大家在一块儿挺高兴，成了朋友，我拍几张照片，留给你们做纪念。"他们可以不讲他们的名字，但有照片我一样可以揭发他们。

我拍了十几张宝丽莱，虚张声势地递给他们，想办法将两张有雷恩和上尉的照片藏在了手掌里。我想象自己在路邦巴什的内政部里说："瞧，就是这两个混蛋干的。我要把他们扔进监狱，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于是，经过9天的拘禁，我们在雷恩、上尉和当地一队乌合之众——警察的陪同下来到了火车站。

至于他们为什么坚持要我们乘火车走，我想既然我们已被搜刮一空，他们要确保这两只怒气冲冲的鹅被铁马送得越远越好。这是我至今唯一一次被逐出城市，坐的是火车。



23

ESCA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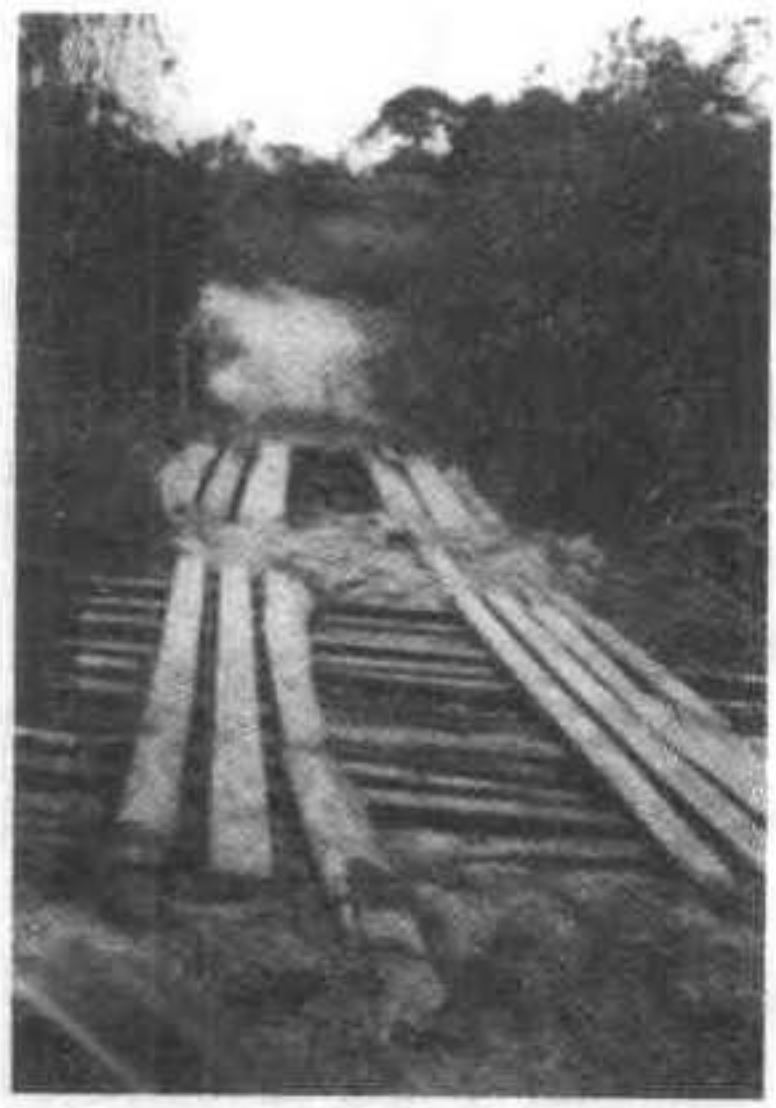
23. 逃　　亡

ESCAPE

我们坐在平台货车上，在火车的嘎吱嘎吱声中一摇一晃地向南驶去，两旁是茂密的丛林。

好消息是我们摆脱了皮埃尔、L上尉和雷恩；坏消息是这辆哼哼唧唧、摇摇晃晃的火车要用长得多的时间才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而不是火车站长所允诺的两天。离开伊勒玻，令

我们两人都松了口气，但也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火车的主人不管什么原因把我们从平台上扔下去，我们就得尝尝这个星球上最密集、最危险的丛林的滋味了。



这是连接扎伊尔各大城市间的主要干线。他们的独裁统治者蒙博托是个富翁，而他的国家是个贫民窟。

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铁路火车都有自己的制动装置，我们还知道为安全起见，一列火车上只有一节车厢有刹车。很明显，我们这节车厢不会有刹车，另一节装有五六名自命不凡的扎伊尔士兵和一辆梅赛德斯—奔驰车的车厢也不会有。我猜他们偷了这辆车，准备孝敬他们的将军；也可能是把这车运去修理。

连续不断的雨水冲断了道路，这些火车和河里的驳船成了扎伊尔的生命线，铜矿和钻石是由它们运走的。没有它们，

整个国家将处于死一般的状态。

扎伊尔完全处于混乱之中，铁路运输也不例外。火车停的站太多，等的时间太长，而且每到大站，所有的车厢都要被分开，组合成一列新的火车。有的路段用柴油牵引，有的则用电气牵引。燃料少得可怜，这使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于是，随着我们的平台火车从一个站走到另一个站，那辆装着士兵和该死的梅赛德斯—奔驰车的车厢不断地冲撞我们的车厢。每到一个站，他们那节车厢会接到新的列车上，而我们只有等着。我不停地要求铁路职员另外给我们安排一辆带刹车的平台车厢，但在这丛林里找不到可以装卸我们那两辆笨重摩托车的平台车。

每到一个镇子，警察都会找到我们，要求检查我们的证件。我们很幸运，非洲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殖民地，因而语言不成问题。在俄罗斯和中国，英语仍是待选的第二外语，而日语正把英语排挤出中国。确实，地球上将近一半的人讲不同程度的英语，而在此地，我们随时可以用英语、塔贝莎的法语、一点点当地语言和手语对付过去。我曾担心这些地方警察会像上尉和雷恩一样耍花招，但他们没有。

真让人吃惊，西伯利亚人居然比扎伊尔人的工作效率高。在西伯利亚我们也曾坐平台货车走了大约600英里，但那次我们用了两天半。而在扎伊尔，用了9天。

既然在站上总要等很久，我们就有时间到沿途村子、镇子和城市里去看看。我们在卡南加——一个大城市里待了好几个小时。铁道旁堆着几百条废弃的铁轨和上千条枕木，都被撬起来扔在了一边。

逃　亡

真是惊人的浪费。这个国家钢铁匮乏，却任凭铁轨躺在这里生锈。我想任何一个聪明的外国人只需到这儿来，给当地人一点好处，把这些东西拿走，就可以发财。

当地人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熔炼成有用的东西？因为这是扎伊尔，没有人来组织做这些事。

我们漫步在卡南加，这原是个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的城市。而现在，古老的比利时殖民建筑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和荒废了。

“瞧，”我说，“以前这是个邮局。”

“那儿，过去是家旅馆，”塔贝莎说。

“那是家裁缝店。”

“一个学校。”

“市政厅。”

“一间仓库。”

火车站有 50～100 年的历史了，几十年来——大概在比利时人走了以后——就没有再油漆过。大部分房间——旧式的候车室、男士洗手间、女士洗手间和餐厅——已经关闭，上着锁。有两三间办公室还开着，其中之一是站长的，也是那么简陋，一个四壁空空的小屋子里放着一张书桌、一个台灯和一台老掉牙的、只是偶尔能打得通的电话。

一辆九成新的四轮罗孚越野车从我们身旁经过。

“上帝，”我说道，“这玩意儿从哪儿来？”

答案就油漆在车门上：约翰逊浸信会教堂捐赠。一个肥胖、穿着讲究的非洲人坐在方向盘后，一副当地贵族的派头。他显然是此地的大亨，开着美国的约翰逊浸信会捐赠的汽车。

他的样子当然不会让人以为他是在为教堂工作，看起来他是用这车做更世俗的买卖。

从卡南加市里往外走的路上，我们经过了道吉—普利茅斯汽车经销店的遗址。看得出这个店以前规模不小：这边有车库，墙上有褪了色的60年代的汽车招贴画；那边是展示厅，只是玻璃已经碎了，前门用木板封了起来。在我的家乡亚拉巴马州的德莫玻里斯，道吉—普利茅斯的经销店30年前就被关闭了。从那些风格相近的老招贴画和过时的商标来看，这间店也是在同一时期被遗弃的。

我们考察了许多像卡南加这样的城镇，无一例外地让我们感到痛心。水塔生锈倒塌，一度繁华的主干道两旁的两三层建筑物被打上封条，成了一堆废墟。一代人曾花费金钱、精力和心血修起并养护的这些建筑，如今只剩下碎石瓦砾。不仅一座座城市是这样的，我们经过的农田、种植场、农舍也难逃厄运，大量的资本、精力和心血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火车又停了。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去逛集市，这里卖蚱蜢和蝗虫。塔贝莎不愿多看，可我买了几只蝗虫尝尝，味道不错，嚼起来嘎嘎地响，有甜味。

一个做买卖的在街角一个空荡荡的大商店里展销他独特的二手T恤衫，有三百来件之多。上面绘着西方的图案，从单调的耶鲁神学院徽章到难看的感谢死神像，真是应有尽有。

虽然他卖的都是旧衣服，但他的库存丰富，选择余地大，足以把美国的校园商店比下去。

我明白了这一点：这家伙意识到他的T恤衫奇货可居，于是在集市上卖力地推销他的商品。

他从哪里搞到这些T恤衫的呢？这家商店的另一头在卖一箱一箱的旧衣服，每只箱子上写着捐献者美国教堂的名字。

“你想捐献这些东西的人是要他们拿到这儿来卖的吗？”塔贝莎问道。她是曼哈顿上西区自由党的正式党员，但她的自由主义信念已开始动摇了。

“我有点怀疑。”我答道。

世界上再没有比扎伊尔更潮湿的国家了。如果你想要水，只需拿只水桶到外面去放上一天就行了。然而，我们曾碰上一个和平部队的自愿者，他的工作是挖井。的确，水井挖出来一两年后由于无人管理被填掉了，扎伊尔人不需要井，也不会养护井。可这个人的工作是挖井，于是他就挖了。

“恐怕以后我再也不会投票赞成外援了，”塔贝莎说，“一路上我们没见到一处物尽其用的地方。”

事实上，外援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是助长了劣迹斑斑的政权的惰性。独裁者和他们的政治爪牙从中学会了如何搞到外援，而不是让他们的国家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外援也教会了这些国家里最精明强干的商人怎样对控制外援的政客溜须拍马，而不是做好生意，赚取硬通货。在一个外援充足的国家，军队不是用来抵御外敌，保卫祖国，而是镇压异己，巩固独裁统治。在外援的驱使下，西方的政府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的银行家、学术机构和联合国的官僚们编制了无数的报告，研究如何使用这些援助，而那些强盗官员对这些报告不屑一顾。

我们要做的是教会发展中国家如何开放市场，使其商业具备同其他国家竞争的能力。一个国家的商业不繁荣，又怎

能国富民强呢？商人不拿出魄力投入资本、时间和精力以增加财富，商业又怎能繁荣呢？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想要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发展自身的优势，其产品要比别国的东西质优而价廉。外援延误甚至破坏了一个国家商业人才的开发。往好了说，导致了经济停滞，往坏了说，使一国丧失了尊严与精神，而这些对一个社会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离路邦巴什 150 英里的地方下了火车，决定到公路上试试运气。9 天里走走停停，行了 500 英里，这蜗牛爬行般的速度快把我们憋坏了。当地人告诉我们，进城以前没有加油站，但我估计我们油箱里的油够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况且，黑市总还可以依赖，我们不至于中途抛锚。

事实证明，当地人讲的是对的，一路上确实没有加油站；而我却错了，我们没见到黑市。即便我们到了路邦巴什，在这个大城市——规模非常大的——第一个加油站也没有油。油站服务员说不会马上有油。

“到哪儿能搞到油呢？”我问。

他指向另一个加油站。

我们驶过三个街区，同样被告知没有油。

服务员耸了耸肩，说：“嗯，谁会有油呀？”

我们紧追不舍，他又给我们指出另一个加油站。

最后，我们找到该市最大的加油站。他们有点油，答应卖给我们 20 升，而我们每只油箱能装 60 升。一盒香烟递过去，我们能买 30 升。我自然想让他再多卖点，但他不敢，说他最

多能给这些，算是帮我们的忙了。

这是路邦巴什——南方重镇唯一有油的地方。

汽油并不贵，只是搞不到，跟西伯利亚一样，便宜但无货。但这说明一个道理：油价定得过低，就没人做这项买卖——个人如此，公司和政府也如此。

第二天，我们又去那儿买了 10 升，还跑到别的油站碰运气，但没搞到更多的油。

以后，我们一分不差地按照服务员告诉我们的时间又回到最大的那个加油站。

没油了，他说，一边习惯性地耸了耸肩。

我怒不可遏，喊了起来："这算是什么国家？怎么连汽油都没有？"

对那家伙说这些毫无意义——这是什么国家？怎么可能没有汽油？说这话就跟你嚷嚷"你们怎么连氪气都没有？这是什么星球？"是一回事。

一个白种女人开车进了油站，她的小儿子坐在前排座位上。她面带惊诧的表情问到："Qu'est-ce qu'il ya?"（这儿出什么事了？）

服务员咕哝道："是老板娘。"

她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问："火星人着陆了吗？是不是殖民者又回来了？"

我们反复被告知，除了过去的殖民者，没人能拯救扎伊尔，可他们再不愿意回来了。

塔贝莎和我，我们自己也有点诧异，向她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我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给她听，我们的计划是骑摩托车环球旅行，可到这儿却没有汽油了。我们把宝押在她的

同情上，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她的名字叫艾略丝，她的丈夫恰好是扎伊尔石油公司的地区总裁，该公司隶属于比利时一家大石油公司，殖民时期结束后继续在这里做生意。他负责公司在南方三角洲的经营，这个地区占了该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在她的建议下，我们跟她去了她家。她和丈夫住在被高墙围起来的大别墅里。

我们在那儿喝了些凉的饮料。我们见到了她的母亲，涂桑夫人。她生在扎伊尔，已经70多岁了。老太太一直想乘飞机去一趟金沙萨，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想在两个大城市之间走动走动，像我们从芝加哥飞到纽约一样。扎伊尔共有三个这样的大城市。

涂桑夫人每天都去机场，准备飞往金沙萨，可每天又不得不返回来，因为飞机没有油料。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是在南方三角洲石油大亨的家里，而他的岳母不仅飞不到金沙萨，而且由于经济混乱、电话缺乏而天天不辞辛苦地跑到机场去看看有没有油料。

航空油料需用硬通货才能买到，扎伊尔没有钱。毫无疑问，航空公司得预付钱。有点头脑的商家是不会让扎伊尔以信用付款的，尤其是国营的航空公司。

艾略丝吩咐一个仆人出去一趟，他拿着一只20升的塑料桶回来了，然后把油灌进了我们的油箱。

我们想付她钱，但她根本没打算收钱，还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她丈夫没在城里，他去金沙萨试图解决燃料匮乏的问题，这已是一个重大的危机了。扎伊尔不可能没有大危机。

她说她家自1921年就来这儿了。我们听她讲述她在比

利时读书时的故事，在那宁静的日子里她怎样常常往返于两地之间。她父亲是位工程师，到这儿来建设铁路。她向往地回忆起多年前良好的道路状况。

“过去在比利时的统治下，”她说，“每个城镇都得负责经过它的道路，他们把路养护得很好，所有的路都铺得好好的。现在谁也不必对任何事负责，于是路全都破败了。”

艾略丝描述着过去的种植场如何富足，郊外的农田里一片茂密，农夫种出多少东西，市场上的商品多么丰富。

我说应当把中国人带到这里来，他们能让庄稼在这片沃土上疯长的。

“没用，他们试过，”她说，“即使是中国人也干不了，因为这里的政府无药可救。不肯合作、没有零件、没有汽油——什么都没有。”

我感到震惊。中国人所需无多，倘若连他们——世界上最勤俭能干的农民都放弃了，那真是无药可救了。这说明没人能和蒙博托共事。

涂桑夫人告诉我们，过去路邦巴什周围有三千块种植场，现在则屈指可数。

在路邦巴什，我们遇见了一个叫穆伊斯·奎拉的中年黑人商贾，他以前是位经济学教授，说一口流利英语，成长于殖民时期。

“我对殖民时期和现在的可怕时代都很熟悉，”他说，“情况只能越来越糟。我们需要有人来把我们组织起来，带来资本并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国外。我们需要这些，需要钱，需要制度，需要技术。麻烦在于，如果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公司愿

意回来，他们自己的左翼会大吵大嚷的。当今政治思想的时尚不允许其资本家来为这个国家拨乱反正。我们需要被殖民化，但没人能够或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麻烦。”

记录在案的事实证明了摩伊斯的论点。30 年前，同为石油富国，尼日利亚按人均比印度尼西亚富；同一时期的加纳按人均比泰国富，两国均为农业国家。

在这 30 年里，尼日利亚和加纳放弃了殖民主义、外国资本、外国技术，说他们要用非洲的资本和非洲的技术。结果他们追逐外国援助，实行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

和 19 世纪的美国一样，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开门接纳外国资本和技术，而几乎没有伸手要外援。今天尼日利亚和加纳落入世界最穷的国家之列，而泰国和印尼兴旺发达起来，成了环太平洋经济奇迹的典型例子。他们的人民更加富裕了。

这可不是发霉的经济杂志里争论的观点。它们是事关数千万人生命的试验，事关重大的经济观点在这里一争高下。我无法想象出更好的试验，能让美国以外的大部分世界亲眼目睹并铭记在心。

有一天，扎伊尔可能会以它的四大城市为中心，分裂成四个部分——金沙萨、卡南加、路邦巴什和基桑加尼，也可能分裂成更小的区域。各城市之间都是泥潭般的道路，因而没有公路交通，人民只能坐火车或驳船慢吞吞地来来往往。

的确，地理和气候状况使基本建设难于实施。即使在干季，建一条公路或铁路的速度也赶不上雨水冲毁路段的速度。然而，在比利时殖民者的统治下，他们既建起了基本设施又维护了这些设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扎伊尔具备好的经

济基础和廉洁的政治体系，它会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如果一家投资公司和美国的农业技术连袂，再让中国农民加盟，他们可以在这儿发财。就是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这里的庄稼自己也会长。你什么也不必对它们说，更不用给它们浇水。土地之肥沃、树木之茂盛，令人惊叹。由于靠近赤道，一年之中这儿有三季成长期。

这个国家曾一度把粮食出口到欧洲，如今它成了粮食进口国。尽管这里有地球上最富饶的土地，可扎伊尔人仍然养不活自己。相反，我们在扎伊尔的市场上只能见到树薯，还有蝗虫和草蜢，它们当然不是驯养的家禽。偶尔我们看见五六只畸形而枯萎的西红柿，总会惊异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

扎伊尔将彻底地分裂。迄今为止把它拴在一块儿的唯一力量是蒙博托和美国的金钱与大炮，以及独裁者偷偷摸摸地从俄罗斯得到的任何支持。两个超级大国都宣称它们保住蒙博托的统治是为了创造中非的稳定。

现在冷战结束了，再没有支撑这个独裁者的理由了。他的人民仇恨他，终将会把他打倒。

这片大陆上的另外几个国家，如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已经开始了邪恶的内战。它们的货币业已崩溃。这些——但不包括扎伊尔——是聪明的投资者应该关注的地方。扎伊尔的内战还没打起来。等到蒙博托被某种力量驱逐之后，部落首领和权贵掠夺国家财富的时期必将到来。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将等到内战打完了，边界重新划定后，新当选的民主政府急于开发国家资源的时候再行事。我想，一旦边界划定，蒙博托下台，这时会有一段稳定时期，正是投人的契机。

一旦内战开始，离结束就不远了，因为没人愿意资助扎伊尔的冲突。这儿无利可图，扎伊尔人自己什么也没有，其他人更别想得到什么了。

在现实世界里，扎伊尔必须仿效泰国和印尼，对外开放，迎接外国的技术、管理和资金——就像19世纪的美国所做的那样，否则它就得先分裂，而后才能回复到健康的经济状况。我知道西方许多好心人认为在一个国家瓦解之时应当伸出援助之手，但红十字会、联合国和其他慈善机构应当对它放手不管，任其瓦解。殊不知，输送援助只能延长扎伊尔人必须经历的经济底谷的时间和痛苦，本来他们走出这个谷底需要一两年，这下得挣扎三四年了。

只有当扎伊尔人自觉意识苏醒的时候，他们才会迎来一个重组的机会，获得一个崭新的开端。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在所不惜。这并不残酷，而是重整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和经济的最快捷和有效的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走投无路之时会说，这是我的部落、我的集体，不管怎么说我属于这儿。于是他们将同心协力、自给自足。

那时法律和秩序将重新发生作用。不管在此之前出现了苏联式的解体，还是由土匪头子在非法统治这个破碎的国家，抑或扎伊尔军阀在巧取豪夺，人民终会要求有序之治。不错，在国家分崩离析之时会有一段无政府的混乱时期，但那将内耗得十分厉害，因为每个人都被卷入了。最终，人们会说："我们要稳定。"人们不可能长时间生活在混乱与战争之中。因此，最好让它尽快垮掉，而不要延缓它的痛苦，因为延缓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它堕入战争与混乱的命运，只能使情况更坏，就像伤口不经治疗，任由它化脓一样。

逃　亡

只有在分崩离析之后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且看，西方和共产党向非洲注入了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导入的。但是，非洲有哪个不发达国家是因为外援而成了发达国家的呢？

一旦有了和平，就会有人说："天，我们种的西红柿真不赖，干嘛不卖给街那头的人呢？"于是他们开始做点小本生意、这是有坚实根基的生意，而不是和平部队的自愿者或国际货币基金的金融家强加的。

20世纪存在着太多的干涉，除了像台湾和韩国获得军事援助的情况以外，我们很难找出一个不发达国家在他国干涉不变成了经济自给自足的榜样。而另一方面，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却在没有外援的操纵下兴旺发达起来，这些地区的经济至今仍在快速发展。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非洲王国曾经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家之分。许多部落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建筑在牢固的经济基础、法庭制度和财富之上。既然非洲的部落曾以一种文明结成一体，那么他们能再一次凝聚起来。

真正的地方政府将从这些部落中产生。这些新的州郡将在自愿的基础上与别的州郡结盟，而不是由蒙博托或联合国来差强人意。只要考虑到十几个不同的宗族被强行置于一个单一的政府体系下，我们很容易看出扎伊尔永远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它作为国家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是由比利时人拼凑起来的。

其他人，尤其是那些爱搅到人家生活里去的人应当站在一边，让扎伊尔人自己分解成自然的状态。我们每尝试一次支撑的企图，就犯一次错误。应当顺其自然，让这些人自己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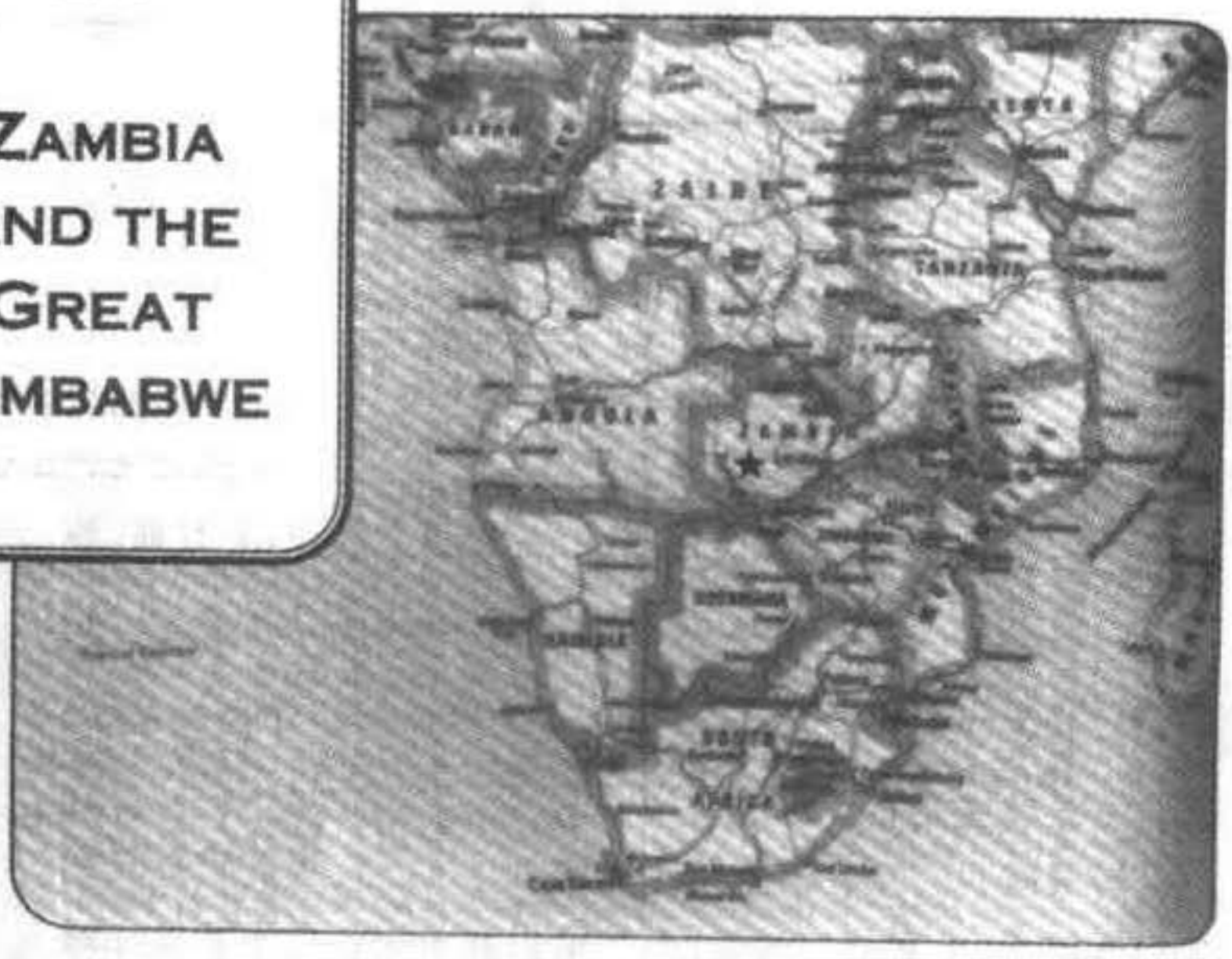
决自己的问题。

西方人有一种傲慢的偏见，它出自于统计学的观念，认为我们能改变历史，强制性地把世界装进我们乐于看到或熟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态中。

可我们做不到。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和钱来阻止扎伊尔即将到来的崩溃。

24

ZAMBIA AND THE GREAT ZIMBABWE



24. 赞比亚和大津巴布韦

ZAMBIA AND THE GREAT ZIMBABWE

我们很高兴赞比亚离路邦巴什不远。

迄今为止，我们已在扎伊尔待了5周。我们两人都从心底里对它厌烦。我们往南走，到达了边境。

我们害怕这儿的边境和以往一样，挤满了人、小汽车、卡车，到处乱哄哄的，证件又被检查一遍，我们还得花钱行贿。

不料，进入赞比亚后事情变得很简单。边防官说牛津英语，我们走到海关，说："我们是旅游者，经过这里。"就听"啪"的一声，我们过关了。

忽然间，我们又回归文明。

我是说，非洲标准的文明。如果一个普通美国人来到赞比亚，他将退回到原始的条件中。但这里的路是铺好的，人民是理智的，货币虽有贬值但未崩溃；他们还有汽油，有食品，你可以买蔬菜，还有罐装苏打水。

尽管边境上的每个人都如甜饼般可爱，我们还是跳上摩托车赶紧离开，遵循过境的第一要诀：一过边境就赶紧溜走，谨防有人改变主意。

转眼间我们又驶入了一个军事检查站，但站里的士兵朝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通过，似乎他们看出来我们不是走私绿宝石或黄金的贩子。来这儿的白人游客本来就很少，长途跋涉者则无论肤色种族都是绝无仅有的，更不用说来自非洲大陆以外，穿着皮套裤、骑着他们看来奇怪的机器的旅行者了。在扎伊尔经历了那么多的警察和军事检查站后，我们感到多么轻松啊！

全世界的军事检查站大都是为遏制走私而设的。政府试图阻止能带来硬通货的国内产品的输出。

绿宝石是赞比亚经济的一大支柱，政府声明只有国家能收购绿宝石，价格也由官方定，自然比全球价格低了一大截。如果你在赞比亚出售绿宝石，就必须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官方，否则就属违法。绿宝石生产商心知肚明，他们只要把宝石卖到国外去，就可以挣更多的钱。

这种国家垄断的生意经在全世界通行。举几个例子，加

纳的可可、哥伦比亚和拉美其他国家的咖啡、俄罗斯的黄金、尼加拉瓜的香蕉、玻利维亚的锡、津巴布韦的烟草、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

赞比亚经济中心周围的道路修得非常好。市场上货物品种繁多，汽油和电力供应充足。我不能想象赞比亚的领袖、仁慈而铁腕的肯尼斯·匡达离任后的情况。他是该国25个宗族部落的黏合剂。

在第三世界领袖的伟人祠里，他被奉为神灵。神也罢，人也罢，他正处于被颠覆的过程中，因为他的中央集权统治失灵了。

赞比亚780万人口不分地理、宗族和语言地被混在了一起，这是英国人胡乱拼凑的所谓北罗得西亚。我怀疑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日子能否长久。

在离维多利亚瀑布六七英里的地方，我们听到了“隆隆”声，看见气雾自瀑布处蒸腾起来，当地人称之为“发出雷鸣的云雾”。我们可以径直出入瀑布中，那真是惊心动魄。

在池潭的小桥上，雾水浓密成雨。狒狒随处可见。

这个瀑布的宽相当于尼亚加拉瀑布的一倍半，高则将近两倍。瀑水自峡谷奔泻而下，不同于尼亚加拉而其雄伟壮阔远甚之。数百年来它开辟出一条深深的河道，在丛林之中蜿蜒迂回。

因为我们经过赞比亚进入津巴布韦，因而注意到两个国家对待瀑布的巨大差异。两者都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个旅游胜地招揽生意。然而，赞比亚这边只有一个像样的旅馆，政府的干预杜绝了竞争和选择。在另一边的津巴布韦，旅游设施却

开发得很好，旅馆、商店、度假村、乘飞机观光、团体旅游，旅游服务应有尽有。五星级的维多利亚酒店以其修剪整齐的草坪和 1907 年的装潢，堪与新加坡的莱弗士酒店或沙沃伊酒店媲美。

边界的那边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商家可以做任何能赚钱的生意，因此他们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

而赞比亚这边只有一座单调的旅馆，因为匡达博士控制着一切。他于 1964 年当选，至今仍在任。自英国摄政的北罗得西亚变成赞比亚后，其公民获得了选举权，一人一票——但只能用一次。从此，这个国家就陷入了独裁统治之中。

自然，旅游者来维多里亚瀑布观光时，他们去了津巴布韦那边。

这个例子客观地表现了自由市场和限制过多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之间的差异。河两岸的市场经济和专制主义在较量，但它们不是对手。

津巴布韦拥有一部变幻无常的政治史。1923 年它成为自治的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1965 年它单方面宣布独立，成立了由白人统治的共和党政权；1978 年它成了双种族国家，白人操纵着黑人傀儡政府；之后的一年左右英国恢复了对它的管辖；1980 年它又独立了，建立了津巴布韦共和国；1987 年，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它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

其自然资源丰富，以外贸为主的经济相对发达，基本建设已达到相当的水准。除烟草大量出口外，石棉、铬、铜及其他矿产也运送到许多国家。眼下，自给自足的农业使之可以向邻国输出谷物和其他农作物。

然而，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管理不善、干旱和商品价格的下跌使之陷入了财政困境，包括财政赤字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依然奉行马列主义，但不得不尝试放宽对经济的控制，有利于私营经济和工农业的发展。

我们在黄格国家公园外的“象牙木屋”住下，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地方。

每一套客房都建在森林中央的一棵树里，这样的客房有12套。浴室在树的底部，而卧室完全是正规的，大小和一般的卧室一样，室外有门廊环绕。木屋的客人从没有超过两打，来这儿的人都住在树里和鸟儿共居一室。附近有一个小泉眼，招引狮子、长颈鹿、斑马和森林里的其他动物来到这里，客人们可以在门廊看到这个景象。

客人们可以在主屋的一张大桌子旁吃到美味佳肴。木屋的主人自殖民时期就经营这个地方了，在房子上下了大力气。家具是新的，管件很时髦，房间的布置很适宜。他们力图使客房占有率达到至少40%，这样就能百分之百地赚钱。

大多数客人天不亮就起床，到公园里的大泉眼处观看聚集在那儿的动物。看够了，拍了照片，再回来一起吃一顿丰盛的英国早餐。

一天夜里，塔贝莎和我听到屋后传来大象发出的咕哝声和喇叭般的声音。这些是幼年雄象，它们成群结队地活动，因为它们年轻，和我们的青少年一样。等它们过了12岁之后，会找到一位异性伴侣，双双离去，干大象要干的事。我们觉得这是近观大象的绝好机会。

我们从树上爬了下来，叫了一个司机，钻进一辆吉普车，

驶向那个泉眼。

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我们看到了十几只大象。我们正观察着，它们突然受了什么惊吓，蜂拥着朝我们冲过来。我们待在原地，动弹不得——仿佛瘫痪了一样。当它们离我们还有五六十码时，我们——塔贝莎、司机和我肯定自己要被大象踏在脚底下了，然而，就在最后一刻，它们掉转头走了。

过后，木屋主人告诉我们，大象不喜欢踩在湿软的东西上，害怕会滑倒。它们避开泥浆、滑溜溜的树叶，我想还有摩托车手，因为他们身上装满滑溜溜的血液。

津巴布韦的许多农场已经荒废了。它们是从白人殖民者手里接管——没收过来，不管什么原因奖励给当地人的。50年前这里一派兴旺，生产的粮食出口国外；而今天，农场里空空荡荡。

津巴布韦政府决定实行粮食限价的政策，以使每个人都买得到便宜的粮食。还有比这更悲天悯人的吗？它们给谷物定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强行从农民手中收购谷物。80年代中期，在实行此项政策以前，该国谷物年产量是180万吨——是吨，不是蒲式耳。现在他们每年生产3万吨，产量减少了98%。

这又是一例政府为求廉价供应而人为地限定价格的愚蠢做法，俄罗斯也一样，政府最终把这种愚蠢的政策规定到每一种产品上去。

而政府是如何解释这一失败的呢？

“这是干旱造成的。”

是事实吗？和往常一样，我从资金流向上寻找答案。

政府总算明智，还未规定鲜花的生产和销售。80 年代中期，花农生产了价值 500 万美元的鲜花，出口国外并赚取外汇。今年他们生产了价值 2 亿美元的鲜花。花农的生产能力在这场灾难性的干旱中显著地提高了 40 倍。

既然可以种植鲜花，为何不能生产谷物呢？

因为政府没有对鲜花限价，花农可以赚取兰特（南非货币单位——译注）、美元和德国马克，因此尽心竭力地种花。

倘若政府放开谷物价格、手头有资金的农民觉得有利可图，便花钱修筑灌溉工程，这样，即便低能的农民也能赚到钱，于是，粮食就有了。

政府决不应当限定价格，而让它顺其自然地上涨。俄国人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若要把燃料价格恢复到市场价格，他们必须提价 150 倍。如果他们任其随着年头慢慢往上涨，没人会注意到。在美国我们都说："上帝，我想起汽油只有 1 加仑 20 美分的时候。"但是大街上并没有骚乱，因为汽油的时价就是 1 美元了。但如果一周之内价格从 20 美分涨到 1 美元，就可能出乱子。只有在政府人为地限低价格而又突然放开，致使价格飞涨，才会导致政治危机。

人类无法本能地掌握这一点，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一个政府无需为高价格担心，因为高价格会增加供应，最终使价格下落。经济学的课程里自然会讲到这一正确的理念，只是政治家们总爱用限价的权宜之计。这决不是办法，它减少了供应，使情况更加恶化。

我们一到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就又试图找到扎伊尔大使，检举上尉和雷恩的事。我们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也试

图这样做,但两次都未果。下一个我们要经过的有扎伊尔使馆的国家是美国,因而在此之前我们别无它法,哪怕我们只是希望追查这件事情也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我去见一位政府官员,告诉他我认为他的国家前景很好,将来的某个时间我会来此投资。

"如果我投资的话,"我问道,"我可以随时撤资吗?"

"不行,钱一旦到了这儿,你就不能撤回了,"部长说,"我们要建立我国的外汇储备。这对各方都最有利,包括你们外国投资者。"

"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吗?"我目瞪口呆,问他。"你们在阻挡资金的流入,而这是你们迫切需要的。没人会把钱投到不让他们取回的国家。"

"不行,我们必须对汇率进行控制,"他说,"不然就留不住资金了,它们会跑到瑞士去。"

"等一等,"我说,"我在这儿,我想把外国资金投给你们。我想把钱带进来,但等到我要收回来的时候你们却不允许。"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外汇储备。"

"难道你们不明白,如果你们允许资金自由出入,"我说,"会有很多钱离开,但最终也会有很多钱进来。"

现在墨西哥认识到了这一点,最终实行了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过去50年里,拉丁美洲的资金大量流失,就是因为其货币限制的规定。

这些当官的绝不会明白,他们在制度瓦解时强行实施货币控制,致使人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钱弄出去。政府在阻止资金流失的同时,也导致了货币走私。富裕的公民会卖掉不

动产，买入邮票、古董、黄金和钻石并把这些财富偷运出去——其方式是难以限制的。但是，没人会把他的钱偷偷运进来。

21 世纪将不同于 20 世纪。

其中一个重大差别是人口、货物、信息和资本的流动性将大得惊人。20 世纪经济学的一个主题是通过货币兑换实行资本控制。货币控制最简单的形式是，如果一个美国人要去伦敦，他可以不经申报带走 3000 美元；若想带更多的钱，就得缴纳特别的税了——还往往不止税的问题。

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管公民带多少兹罗提、法郎或美元出境呢？

假如我把要带走的美元换成 5000 法郎，那么美国的外汇储备里——无论是公民拥有总量还是政府的法郎存量——就少了 5000 法郎。当一家美国进口商需要向法国购买葡萄酒时，他的支付能力就减少了 5000 法郎。

对美国人来说，法郎多的是，很容易获得。但是，我们的银行系统直接获取法郎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把我们的东西卖给法国。

很多年来，我们卖给外界的比我们从外界买进的多。因此，我们积累了许多外国货币：日元、德国马克、法郎和英镑。一旦美国人要买法国葡萄酒了，他去银行取出一些储备的法郎，把它们还回法国说："卖我一点葡萄酒。"

我想表明的是，通过货币控制解决外汇储备匮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些控制办法就好比邦迪创可贴一样治标不治本。整个社会的需求——哪怕只是拖拉机——都得由一个机

构——比如中央银行来确定。只有当市场是自由的、脱开了任何束缚，本国货币具备合理的价值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运作：开采绿宝石，出口到法国，换取法郎，然后再把法郎卖给那些愿意进口葡萄酒或拖拉机的人。如果持有法郎的人不愿把东西卖给他们，那么葡萄酒和拖拉机进口商就需提高价格，直到卖方无法拒绝。

正是这样的有效活动使得一个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和外汇储备。

尽管像约翰·坦普顿这样精明的投资商会在一个国家的货币未自由兑换时向该国投资，但我只会前去考查情况。在其货币未真正实行自由兑换时，我是不会把钱投进去的。

依此类推，我敦促我所有的美国朋友在外国银行开一个户头，哪怕只是保险起见。其次是在经纪商或本国银行处购买外汇。人们买人寿保险和汽车保险的时候从未想过真正用它，但等到你不得不用它时，你庆幸自己有保险。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每一个美国人应当放一些钱在国外。我不知道未来25年美元的命运如何，但我清楚过去25年美元的情形——和其他主要货币相比，美元贬值了三分之一多。

美国的财政状况糟糕得很，我肯定最后——10年之内，我们将实行货币控制。美元将跌破价值，到那时美国人会像今天的意大利人一样急需外汇，政府将限制我们带出境的数量。我们得花——比如说2 500美元才能去英国度一次假。

至于现在把钱存到国外去还属于爱国的行为。政府愿意美元下跌，变得不那么值钱。美国的政策就是要降低美元价值，因为我们的政府认为这样能使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

有竞争力，美国的钢铁工人有更多的工作，农民的麦子和谷子可以卖得更好。我们的政府鼓励公民卖掉美元，这一点我完全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但不幸的是，美元将持续下跌，直至失控。当此时，政府恼羞成怒，将过错归罪于"邪恶的金融家"。而一旦实施控制，货币会进一步下跌，因为人们都将走私美元。

这情况出现一两年后，我妈妈会从亚拉巴马打电话给我，说："我得带些钱出境。"

于是我将知道我们已到最坏的地步了。许多人将提着满满两箱子的钱飞往伦敦，或乘船渡过大湖。这一次，货币控制也行不通，尤其在通讯和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更不会奏效了。当然，我们的政府也无法得知问题的症结在哪儿。

这就是我为何如此看好拉丁美洲的原因之一。拉美国家的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试图用货币控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但现在他们摈弃了这一做法。拉美人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他们现在明白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走在了非洲的前面。他们从70年的教训里懂得货币控制是行不通的，而非洲人还未到达这个阶段："好吧，我们知道货币控制不行，那让我们再试试别的办法吧。"

非洲不幸还存在殖民者遗留的边界问题，而拉丁美洲的国界更稳定、更合理。

我们在朋友斯坦·穆登格的陪同下，参观了大津巴布韦的遗址。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唯一一位撰写前殖民时期南部非洲各王国历史的人，这段历史不幸未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因此，不像写一部普莱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他

对其历史资料的来源有点含混。

这座古老的石头城的遗址是撒哈拉以南最大的古代建筑。据斯坦介绍，就历史地位来说，它与玛雅、罗马和阿兹泰克同等重要。在我看来，大津巴布韦像是一个大的要塞，外面围着许多房了，可能和中世纪的大城堡一样，建在一座小山上，下面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镇子。

在津巴布韦人的眼里，这些遗迹来自他们祖先统治天下的时代。很明显，那时候的某个王国已有相当的发展。非洲人从这里知道了很多：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修建了如此精美的建筑，由此可以推断，他们的文明也发展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

这个像迷宫一般的石头遗迹建在一座高而陡的山上，旁边有几条通道。每天，工人们得把水、食物、木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背上山，这需要组织庞大的劳动力。在那个时代的非洲，这样像蚂蚁搬家似的活动组织得相当得力，可能和今天的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这是组织和纪律的表现。

非洲民族主义者利用大津巴布韦来证明他们的观点：非洲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历史渊源，尤其当他们被认为没有古代文明的时候。

他们声称非洲还有其他的古代文明。罗马和中美洲只有石头建筑，而他们的先人们用木材修筑房子。由于木头会腐烂——在丛林里腐烂得更快，因而那些灿烂的文明没有保存下来——没有房子，没有遗址，没有工具，没有历史的记录。

我不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津巴布韦人为什么又回到部落和丛林生活里去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知道阿拉伯商人曾经来到这个南端，因为津巴布韦的黄金手工艺品在阿拉伯

时有出土。如果阿拉伯商人曾把科学和外界的东西带到欧洲，那么他们肯定也带到了津巴布韦来。

在津巴布韦我们需要取得南非的签证。两个国家没有政治关系，但幸好南非有一个贸易代表处在这儿，行使驻外使馆的职责。

在代表处的楼前，黑人排起了长龙。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出租车司机。

“这些人在等去南非的签证。”他说。

南非？我们吃了一惊。我们走进去要求签证，但被告之得等四个星期。

“为什么？”我问。

“因为这些人也要去南非。”回答说。

我们说服贸易代表，我们不是要加塞挤掉别人，而是南美即将来临的冬天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行程，从而博得了他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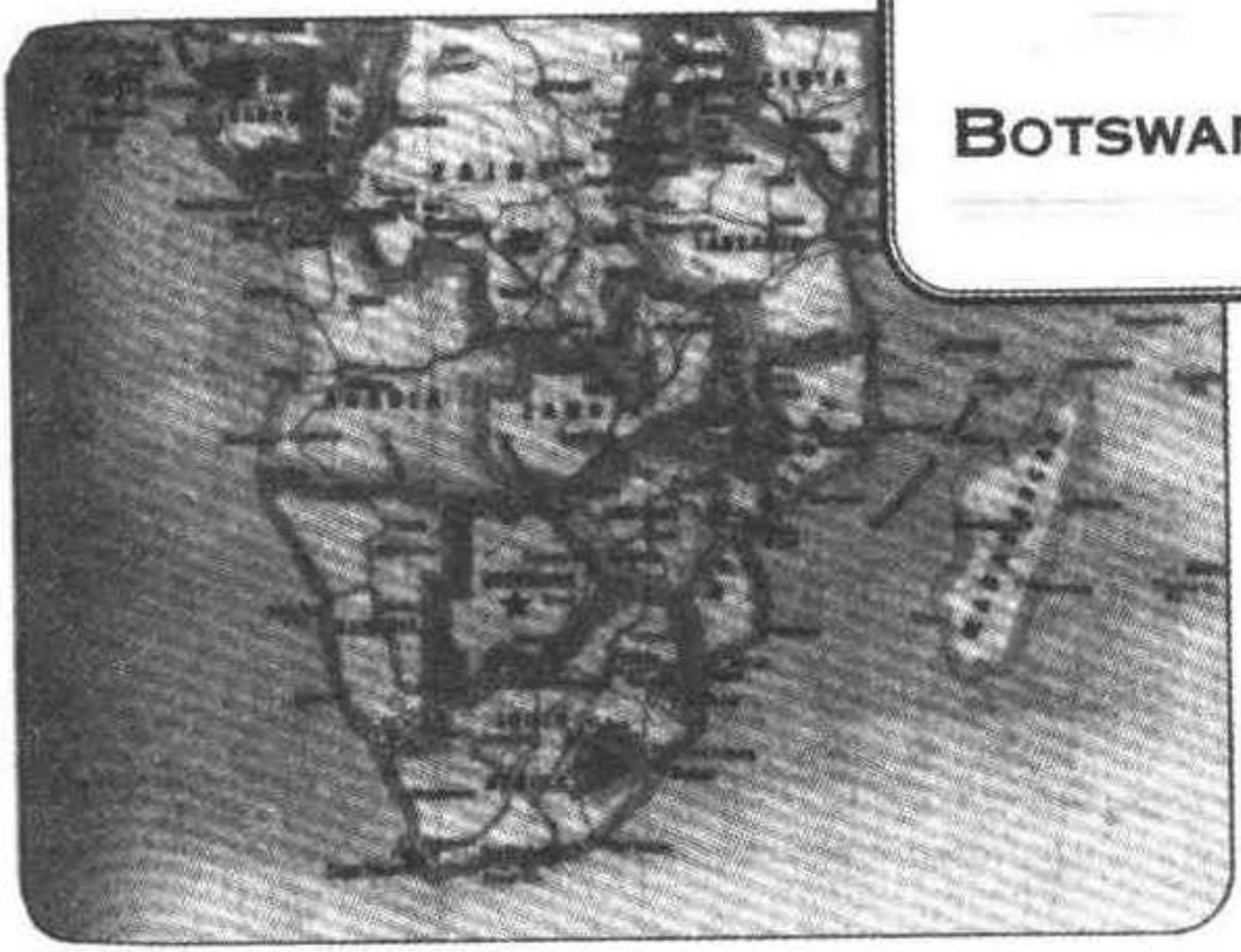
塔贝莎站在我的身旁，手里还拽着她那本破烂的、表明她自由主义者身份的护照，用迷惑的声音问道：“等等，有件事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离开黑人统治的工人阶级的天堂，而跑到种族隔离的南非去呢？”

津巴布韦人用脚来投票，这是最有力的选票。对他们来说，南非是机会的乐土，他们削尖了脑袋从一个非洲国家到另一个非洲国家，不管后者是不是遭到西方舆论的强烈谴责。

我们急于想知道为什么。

25

BOTSWANA



25. 博茨瓦纳

BOTSWANA

我们已经听说博茨瓦纳的海关官员对旅行者带多少钱入境不太在意。但当我们靠近边防时，我还是忐忑不安起来。

我们被要求填写一份表格，说明我们带入境的钱数，这和我们到过的所有紧巴巴地实行外汇控制的国家没什么两样。

我问边防官："我们得把所有的钱都换掉吗？"

“不需要，想带入和带出多少都由你。”

“我们换钱的时候，需要在这份表上盖章吗？”

许多实行外汇控制的国家不仅坚持要知道你带入境的每一分钱，而且你每次换钱的时候，还要在你的兑换表上盖章以记录这次交易。出境时需向他们出示这张表。

“来吧，”他们会说，“让我们看看你还剩下的1900块钱。”如果你不能出示这1900块钱，他们会认为你在黑市上把钱换了，这样他们的央行就分不到他们那一份儿了。这又是政府的一个把戏，和赞比亚买断国民的绿宝石、玻利维亚控制它的锡一样，这是对外汇的垄断。

“我换钱的时候需要出示这份表吗？”我又问了一遍。

“不用。”

“我需要再把这份表交回来吗？”

“我想你离境时得交回来，但我也不能肯定。”

如果谁都不清楚这事，说明这表已经很古老了，是旧时代的遗留物。

我们驶离边境。这儿的公路比津巴布韦的还要好，的确是不错。

转眼间我就喜欢上了博茨瓦纳。

其一，入境很容易；其二，这儿没有外汇黑市。一些坐在街边小凳子上的人可以给你换钱，只收取一点点佣金，却省去了跑银行的麻烦。

仅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事实就令我动心来这里投资。你也许是个高明的投资者，但如果你得通过黑市把钱带走，那将给你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尤其所涉钱数大的话。如果当

地的某个人——比如政府官员知道了你的情况，又不喜欢你，还看上了你的钱，那么，无论你有多聪明，你都得把没带走的钱搭进去。

有时，我不在某个国家投资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制度用到我身上就会发生变化。科威特就是其一。70 年代末它的股票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就像荷兰在 17 世纪的郁金香泡沫一样。我急于要卖空，因为等泡沫爆破了的时候，其利润就说不好了

那时在科威特，如果你想买 100 万美元的股票，只需填写一张 100 万美元的支票，将日期填迟 6 个月，然后交给你的经纪人就行了。至于你的银行里有没有这 100 万无关紧要，经纪人在 6 个月里无法兑现这笔钱。如果股市上扬，你赚到了钱。在这种金融制度下，你可以想象得到，股票只有一个方向——上涨，被一片空头支票的海洋浮了起来。

政府职员写下 2000 万或 3000 万美元的支票，全都填迟 6 个月。6 个月后这些投资者们可以卖掉股票，把钱还了。

但当然了，他们没这么做。他们又开出一张支票，这次的数额是 5000 万或 1 亿美元。

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股市爆炸。科威特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这应该意味着我在股市崩溃后能迅速地将利润转移出境。但我没有在市场上卖空我的股票，这令我痛心疾首，因为我无需动作便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那样做，政府会对我另行规矩，而我永远也甭想把钱带出去了，那样的话我可能连本都得赔上。政府会说我是个奸诈的投机分子，是我挑破了泡沫。它会用别的办法整治我，把我钉死在这里。我相信即便我是个科威特人，如果我是空头，他们也会这样对我。只要股

市崩盘,他们将决定每个人都不能幸免。

这是国际性投资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许多国家玩这个游戏是不简单的,但如果你去了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地方,那更是自讨苦吃了。

科威特?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股市崩盘,政府职员们把他们数千万美元的延期利润赔了个精光。

当我们来到弗兰西斯镇时,我叫道:"上帝,瞧这个地方!"

除了名副其实的购物中心,人们开着高级轿车和卡车,全是新的。满大街跑着丰田车。在津巴布韦,轿车和巴士都很旧,而且不多。在弗兰西斯镇,巴士车都是新的。许多建筑正拔地而起,我们的左右两边矗立着崭新的大楼。

我心里有声音在说:"嘿,这儿正发生着什么变化,我应当去了解一下。"在尚不清楚原因和程度的情况下,我已感觉到我们越往南走,货币就越坚挺。这有点像穿越中欧之旅:从保加利亚到罗马尼亚,再到匈牙利,货币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坚挺。等到了奥地利,先令已坚如磐石了。

无独有偶,我们越往南走,其繁荣程度就越高。

赞比亚比扎伊尔要繁荣些,津巴布韦更繁荣。博茨瓦纳比津巴布韦又进了一步,及至大陆的最南端,南非已是非洲经济的火车头,将德国和加利福尼亚的地位合二为一。

我得知博茨瓦纳有许多矿场:铜、钻石、铜镍和煤。该国人口不过100万,幅员却近似得克萨斯州那么大。近来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10%,四倍于美国。它是世界三大钻石生产国之一,钻石为国家赚取75%的外汇,占政府收入的60%。政府的自由企业倾向和保守的金融政策吸引了一些外国资

本，不过投资者仍对这个国家对南非的严重依赖表示担忧。

总的来说，博茨瓦纳是个有趣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了非洲黑人被禁锢的期望。战争始终是历史的分水岭。战争打破了这块大陆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衡。很多非洲人远渡欧洲，在那儿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回到家园，他们当然注意到了英国殖民者。战后有许多外国人迁到了非洲，给非洲带来了繁荣，尽管非洲人认为他们都是来剥削他们的殖民者。



当英国人在 1957 年被逐出加纳时，它的第一任总理宽姆·尼克鲁玛发誓说："如果我们自治，我们将在 10 年内把黄金海岸变成一个天堂。"

加纳以外的许多黑人意识到战后的全球性繁荣并未在他们那儿兑现，因此自然地想到如果他们把外国人——那些压迫他们的人赶出去，事情就会好起来。

他们把外国人赶了出去，可事情变得更糟了。作为新民主主义者典范的尼克鲁玛成了独裁者，将其反对派投入了监狱；使法庭在媒体面前扮演了小丑的角色；强迫农民把产品卖给他在加纳可可销售委员会的密友，这些邪恶的人用低价收购消灭了小农场主。到 1966 年他逃到罗马尼亚时，尼克鲁玛已为非洲今后 20 多年的统治创造了一种模式。

整个非洲在后殖民时期都实行一人一票——但只能选举一次的制度。独裁者们出现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地从"剥削者"手中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东西，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之类的事就无所谓了。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榨干殖民者的油水，他们就可以永保江山。他们没收了土地，将自己

打扮成漂亮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过是地地道道的独裁者和暴君，穿着时下流行的社会主义外衣，这种理论被他们说成是合理的社会政策。

然而这个理论不管用，一点也不比任何一种中央集权的理论管用。当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独裁者们越来越疯狂地抓住手中的东西不放。为了支撑业已崩溃的经济，他们设置关税，实行进口控制，限制货币的出入，实行这个规定、那个许可证，想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

这又是政府用邦迪创可贴治标不治本的例子。这些措施只能在短期内起到缓解的作用，但他们的经济还是继续呈螺旋式下降的趋势。70年代，他们曾有过一段回光返照的商品经济繁荣时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由全球性商品短缺托起的繁荣竟是因10年前离开非洲的殖民者引起的。他们离开时带走了生产技术、管理经验、销售策略以及能带回家的每一分钱。非洲大陆上所有东西的产量自然都降了下来。在开发其他的矿场和土地以填补这块经济空白之前，产品价格猛涨了上去。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价格的上涨，独裁者们会和苏联的共产党一样，在很久以前就被颠覆了。

到80年代后期，非洲领袖们已经无计可施了，再也找不到可用的创可贴。随着新的矿产和农产品涌入市场，商品经济的繁荣消失了。整个大陆的非洲人呼吁着变革。变革意味着民主运动，如同18世纪在波士顿发生的那样。

今天，50多个非洲国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成立了开明的政府，像赞比亚、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我认为这是由于没完没了的宗族之争造成了许多问题。但我不认为这些问题

会比中欧的更难解除。

为什么呢？过去45～50年间，中欧人在想，如果我们有了民主，就会有繁荣。而我们西方人知道民主并不一定意味着繁荣。

中欧可能会走非洲的老路：选举中央集权的政府，情况不对的时候它会用更紧的控制来“解决问题”。这样，同非洲一样，中欧的民主可能胎死腹中。如果不考虑非洲和南美的历史，两个地方走的是同一条路：诸多的限制、高通货膨胀、种族冲突、崩溃的货币，最终是独裁统治。除了经济混乱的根本因素和不合理的边界以外，中欧还是个武器库，这使得其政治问题更加复杂化。

非洲的老百姓和南美老百姓一样，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足以让他们明白，对于政府应当采取何种形式，他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像中欧人，他们现在拥有集体的智慧，懂得仅有民主是不够的，某些政治和经济政策行不通。

他们现在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忍受压制，必须消除各种限制和控制，拥抱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现在管理这些国家的人正放开经济，实行私有化。他们不再认为将一切集于中央控制之下是解决问题之道，而懂得国家企业办不好，只有解除企业者的束缚，才可能取得繁荣。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非洲必须走它自己的路。19世纪的殖民主义、社会主义都尝试过并且失败了。真正的民主可能行得通，但也可能行不通。行得通的必定是一种解放人们的精神、使之做得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允许市场来帮助人们找到他们自己的出路。

尽管非洲人民或别的任何人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往何

处去，但几十年来非洲第一次踏上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驱车前往哈博罗内，城市发展得非常好，我们还以为是到了蒙特哥马利——高楼、大道和清楚的路标。我们换了钱，兑换申请表的确无需盖章。我们和银行家、经纪人和其他金融业人士交谈，他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这里的货币是自由兑换的。

不仅可以自由兑换，还是硬通货呢。我奇怪它怎么不会贬值，至少像里拉或欧洲其他几种疲软货币那样。

这儿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钻石矿，几年前刚发现的。这个地区还经营一片大牧场，甚至出口牛。在中非我们只看见山羊和猪，而这儿却有牛。牛被放养在一片空旷的大草原上，是个传统的好营生，是部落的人衡量每户人家财富的标准。博茨瓦纳另外还有一个强于非洲其他国家的优势。我做的背景调查表明，博茨瓦纳的贸易为顺差。这就是说，每年它的出口大于进口。

它的政府预算甚至也是顺差。

这令我震惊。政府预算出现顺差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稀奇的，更何况是在非洲。博茨瓦纳有三年的外汇储备，就是说，如果它明天开始停止出口，不再赚取外汇——德国马克或美元，它的央行仍具备以目前的汇率进口 3 年的能力。还是那么多的索尼电视和凯特彼拉拖拉机进入国内。

与之形成对比的意大利，其外汇储备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周计。实际上，许多国家只有几周或几个月的外汇储备。政府既然无隔宿之粮，只好严格控制货币和进口。

我做了更多的背景调查，发现博茨瓦纳真的有民主选举。

反对党政客、那些下了台的在野人士告诫我，警察系统开始有点腐败。还有一个问题令我担心，博茨瓦纳的钻石销路不畅。我不认为钻石市场会很快萎缩，但我肯定不会不停地把钻石买下去。

我感到我必须谨慎从事，因为政府有可能愚蠢地处置那笔多出来的钱。我就不认为政府建起的那座纯碱矿会给国家带来财富。政府可能和跨国大公司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做和娱乐有关的项目，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这么做，而不管这么做赚不赚钱。如果那座纯碱矿搞得不好，只能证明政府在一点点地浪费国家财产。

后来我发现纯碱矿真的不行，这当然打住了我来此投资的念头。政府开了矿，也生产出了纯碱，但就是不赚钱。媒体引用政府的言论说不盈利的问题出在技术和纯碱的价格上。喏，这个解释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新闻，因为我肯定这个政府和其他任何一个政府一样，从不会把错误归咎到自己身上。我要做的是判断一下到底是因为纯碱价格的下跌，还是因为政府不称职造成的。

还有一方面，政府认为国家应当完全实行资本主义，因此需要一个股票市场。如果国家要发展工业、建立健全的经济、提供就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就必须用股票市场来融资。

于是政府通过了法律、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其他用以吸引资本的一切手段。但它走不了多远。由于市场太小，整个国家就只有一家股票经纪商，是和巴克雷银行合资的。这让我感觉不错，因为我知道银行不会马上消失。整个股票市场是在1个人的办公室里，他手下不过6个职员。

实际上，整个市场就在这个人的书桌上交易，他勾兑买入

和卖出的报单。市场总共有7只股票。

我继续调查。我去见了主管股票市场的部长，他确认了政府支持融资的立场。

“不错，”他说，“我们将逐步完善它。我们将不断通过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法律，对上市公司给予税收减免，鼓励个人购买和持有股票。”

政府至少认识到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它不能仅仅建立起一个市场而出售股票就行了。那样人们会说：“股票是什么东西？我可不想沾上它。”

但如果政府说“股票可以分红利，而我们不对此收税”，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明白“嗯，如果我把钱存银行，就得纳税；但如果我把钱搁到股票市场这个新兴事物里去就不用纳税了。”于是他们就会把钱放到股票市场里。

这个政府学会了这些技巧。于是我问：“有谁反对它吗？有谁反对股票市场吗？”你到哪儿都得当心这个问题。如果出现选举，反对党上台之后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不喜欢这种玩意儿。我们将改弦更张。”你就得出局——如果你能够的话。

“没人反对，”他说，“反对党也赞成这个。”

我去查看了一下这些股票是否很贵。我用传统的评估方式：资产负债表可靠吗？他们分红利吗？收益率高不高？这些工业是否盈利？它们在博茨瓦纳的前景怎样？

情况看起来不错。我判断我不会赔钱。这些股票很便宜，最坏的情况不过是股票价格不动，我得不到回报。我希望我所有的损失即是机会上的损失。不管怎样，它们都分红利，因此我不至于一无所获。我将以硬通货或半硬通货分得红利。

我断定博茨瓦纳有一个健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也断定一个全新的股票市场将建立起来，政府支持它，反对党也愿意发展和鼓励它；我还断定股票相对于红利及其他股票市场的传统评估标准来说是便宜的。我来此投资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博茨瓦纳紧邻南非。

我知道南非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可能成为另一个阿根廷——印钞票、通胀蔓延、选票可以买卖的老阿根廷，也可能成为开放和健全的国家。我分析的结论是，即便南非是博茨瓦纳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它未能成功，博茨瓦纳也不会陷入灾难。我在博茨瓦纳不至于赔钱，因为它的股票很便宜，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支持它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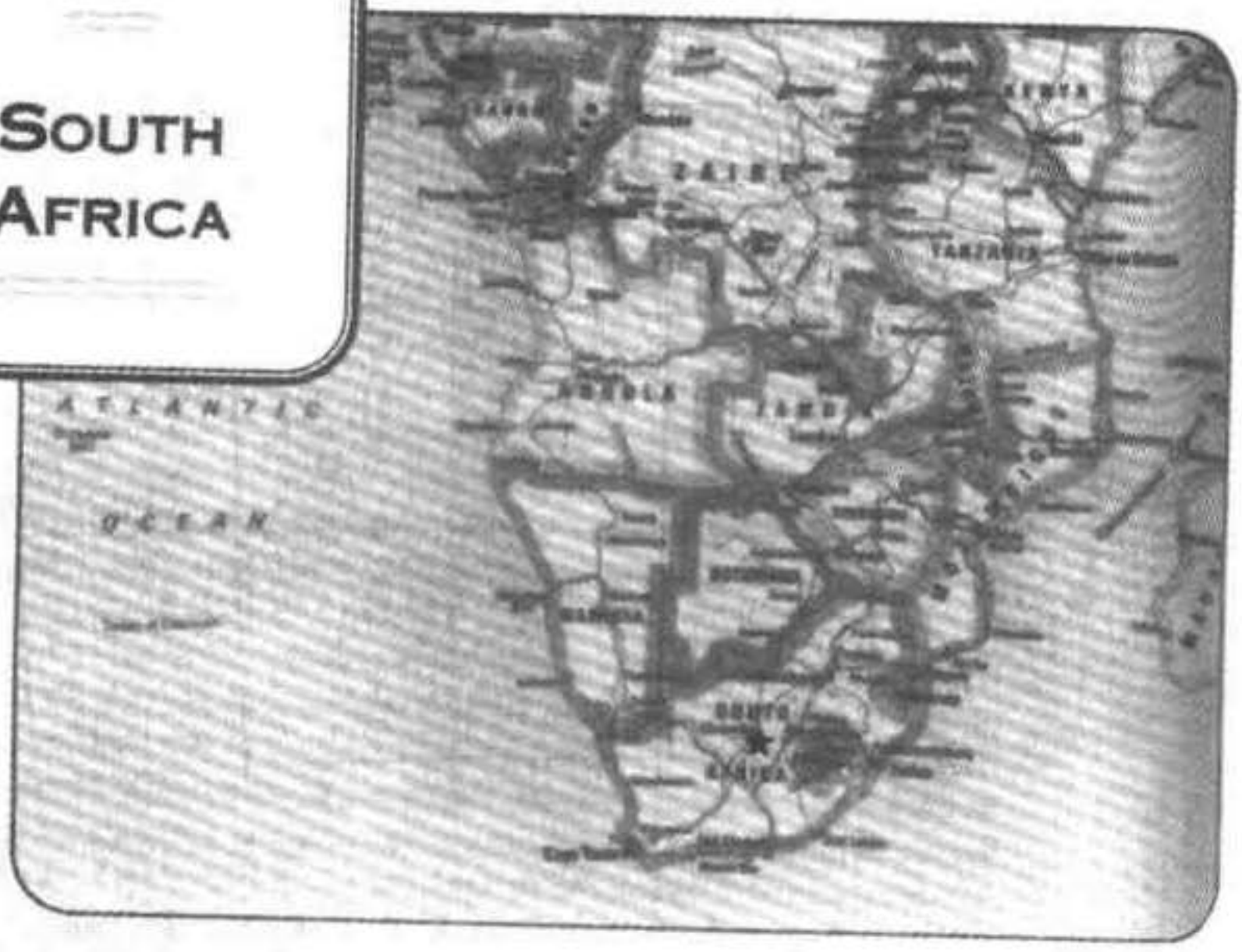
如果南非带着十足的动力飞速发展，我会在它最北端的邻居博茨瓦纳赚大钱，正如我们的邻居加拿大因我们的市场而富裕起来一样。我开始认为博茨瓦纳是投资南非的最佳途径，因为这里没有南非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我可以在全无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南非全部的发展潜力。

我回到经营股票交易的那个人那里，买下了所有的7只股票，因为我看不出选择这些股票有何不同。显然，当你初涉股市时，你不会选择街角酒廊这样的股票，而会买最大、最可靠的企业——银行和矿场股。那7只都是这样的股票——全无风险。刚开始，我决不会投入很多钱，我喜欢先湿湿脚，看看会出什么问题，然后才会完全进入。

从那以后又有几家公司上市，都是此类大公司，我买下了所有这些股票。当弗兰西斯镇的乔氏街角酒廊上市时，我就该撤出这个股市了。希望这事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生。

26

SOUTH AFRICA



26. 南　　非

SOUTH AFRICA

我们在金伯利停下。这是我一直想来看看的地方，这儿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穴，名字就叫“大洞”。

早在1871年，这里的一座大山上发现了钻石。从那时起直到1914年钻石被开采光，这座山不仅被夷为平地，而且还挖出了一个纵深800码、方圆37英亩的巨大洞穴。数以万计的

人从世界各地涌到这里淘金,相当一部分人发了财。这些人用双手挖走了2800万吨泥土,筛洗后找出了大约6000磅、即1450万克拉的钻石,按时价价值近2000亿美元。

镇上的戴比尔斯钻矿的规模看起来不亚于"大洞",而且似乎要比"大洞"出产更大的价值。

纵观历史,绿宝石、蓝宝石和红宝石的价值在许多文化中比钻石高。钻石成为宝石之最是近期的现象。100年前,绿宝石比钻石值钱得多。

戴比尔斯采矿公司不仅垄断了南非的钻石,还通过控制钻石的供应逐步主宰了全球价格。为了激起人们对钻石的需求,该公司所做的广告宣传——"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它在大众的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每逢情感的盛事,如订婚、结婚和特别的纪念日,他们需要一颗钻石以示纪念。

至少从古代中国和创世纪起,生意人就力图建立垄断。早期的中国皇帝以处死相威胁,禁止蚕的出口。耶稣出生时智者带给他的芳香树脂乳香也是垄断的产物。生产这种树脂的两个阿拉伯城市也禁止乳香树的出口,违者处死。他们的垄断使乳香的价格和我们的黄金价格一样,每盎司400美元,这就是为什么乳香被视为送给新生儿的贵重礼物了。

与南非毗邻的安哥拉正经历一场可怕的战火,但即便如此,大约有5万左右的人仍在那儿挖钻石。由于安哥拉处于无政府状态,戴比尔斯无法控制这些采矿者。不过,一旦安哥拉有了政府,它的第一件事——交战双方的政党都如是说——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把钻石市场置于控制之下。他们

将颁布法律，告诉采矿者："你们只能把手中的钻石卖给我们——中央收购单位，否则就得进监狱。"

对买主他们则说："我们不让你们从生产商那儿买是为你们好，要不那些贪婪的资本家会卖给你们假货。"

实际上，这些措施是用来控制价格并帮助政府插手硬通货的。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戴比尔斯成功地把钻石的价格抬到一个过高的水平上，实际上绝没有这么高的经济价值。如今这个垄断开始瓦解。历史上戴比尔斯一直百分之百地控制着钻石的生产和销售，现在这个份额降至80%。在今后的30年里，钻石的价值将比现在低。显而易见，这类宝石是不值得投资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还是供求关系的法则在起作用。戴比尔斯把价格定得很高，激励人们去寻找钻石。为了维持高价，他必须买断所有生产商提供给他们的钻石，如果不这么做，生产商就会把钻石卖给别人。价格有了竞争就会直线下落，戴比尔斯的发明将变得毫无价值。

而另一方面，如果戴比尔斯无休无止地买下所有生产商提供的钻石，它最终会把钱花得精光，没有能力再买下去。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钻石的价格都会下跌。没有东西是恒久不变的，人为的控制更不例外，无论是官僚还是资本家来操纵都一样。

戴比尔斯的成功靠的是它用买来的钻石作为银行贷款的附属担保物。但银行逐渐识破了这个大诡计。它们在小心翼翼地考虑是否能在其他同行明白过来之前偷偷地撤出来，以免到时因过于拥挤，自己的出路被堵住。

结局来得可能比我们预料的还早。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戴比尔斯拒绝把年度报表送呈它在美国的潜在投资者。显然，它企图掩饰目前的处境。

我的建议是什么？卖掉钻石，买入绿宝石、红宝石和蓝宝石。

世界媒体对南非问题的热衷是使南非和世界关系复杂化的一个因素。记者们似乎对暴力情有独钟，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媒体焦灼地等待南非爆发争斗，好给他们提供绝佳的素材。不幸的是，媒体对整个事件没有进行任何细致的分析。扎伊尔和乌干达独裁统治的垮台被报道为闪电雷鸣，媒体于是跟进。不过，媒体搅进了南非的问题里，还不承认他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我们访问莱昂·卢时，这个观念更加清晰。莱昂·卢是南非的一个白人，拥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库。他在一系列绝妙的文章和畅销书中阐述了造成南非现状的因素。

他在书中指出，种族隔离应当被拆除，因为它对市场的极端扭曲不仅伤害了黑人，也伤害了白人。他把道德问题放在了一边，而用经济学的观点来探讨。他审视形势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他说："当然种族隔离是不道德的，但即使撇开道德问题，你只是从想挣更多的钱或面对现实的角度看待它，它也是破坏我们国家的因素，它将导致战争、叛乱和一连串问题。"

卢向南非白人灌输这样的事实：如果没有种族隔离，他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在我们西方人眼里，南非是白人和黑人冲突的角斗场。的确，这里存在许多这样的冲突，但其政治

党派和利益的多样性比两极种族冲突的内涵要丰富得多。

通常情况下，我和塔贝莎不会去拜访像卢这样的人。我们希望路程是随缘而行的，我们只见到有缘碰上的人。但由于南非是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地方，而我们又知之甚少，因而此次是个例外。

卢的思想库就建在他家那座古老的大房子里，他把家变成了一所学院。这幢房子和约翰内斯堡的每一幢大房子一样，坐落在围墙和大门里面。内战、偷盗或其他什么原因使南非遍地都是围墙，装上了电子及其他现代化的安全设施。约翰内斯堡是个被墙围起来的城市，城市里是被墙围起来的家。

在会议室里我们讲述了我们的旅程。

他说："天哪，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喜欢这样的旅行，不亚于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为什么我没有和你们一起旅行呢？"

卢以其责任感、聪颖和敏锐的洞察力打动了我。这是一个看得透皇帝新衣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国家所存在问题的根源。我很快就和他亲密无间了。

为了说明南非黑人能做什么，他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的公共交通系统。20年前，政府对公交实行垄断，所用的巴士破破烂烂，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一系列定点服务的出租车、小巴和大巴应运而生。由于这些出租车司机不能把车停在政府的巴士车站，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手语。乘客在街上就可以打手势告诉司机他们要去哪儿，司机也用手语回答："不，我们不往那个方向去"，或者"这是开往南方广场的巴士。"

这支自发的体系运转得异常好，以致政府最后被挤出了公交行业。现在约翰内斯堡的私营生意十分红火。这是顾客

和商人互惠互利、同仇敌忾的典范——政府的限制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卢和我都从理念上同意,如果政府不插手那么多的事物,像卢的公交故事里所说的那样,每个人的日子都会更好过些。他在书中还揭示了南非黑人在历史上曾是优秀的农民,比白人能干得多　这也是他们被剥夺了土地的一个原因。种族隔离部分是因经济利益而起的。

很难相信,成文的种族隔离政策——又是一个经济困境导致种族争端的例子——只存在了46年。南非在二战后经济陷入了困境,政治家们决定用大量新规定、许可证和要求——保护部分行业的做法——来挽救经济,也挽救他们自己。最终深受其害的是黑人。为了支撑这个由法官说了算的摇摇欲坠的混合体,更多的种族区分的法律随之出台,使这个国家陷入更深的泥沼。这是中央集权统治的又一明证,它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依托在种族主义的政策上。

一个国际性的投资者不得不把南非纳入考虑的范围内。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物产丰富、资源充裕、资产雄厚、气候宜人、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基础设施完善。无论从哪个方面——地理、气候、幅员、多样性和潜力来讲,南非都是非洲的加利福尼亚。他不仅有山脉和海岸线,还有令人惊叹的花、鸟和各种动物。

我问莱昂,他的祖国未来如何。

他的观点是,种族隔离已难自承其重,它对经济的束缚已到令其窒息的程度,南非人不得不重头来过。这自然意味着他们必须摈弃种族隔离,因为这个国家大多数的规定是以牺牲黑人为代价,帮助白人制约竞争,保持他们地位,从而富裕

起来。

纳尔逊·曼德拉的非洲国民议会是个大麻烦。非洲国民议会仍抱着过时的左翼思想不放，尽管这种思想已跟不上世界的步伐，它仍是该党的主流。等到曼德拉死后或下台时，年轻的一代会取而代之。

南非的许多人、尤其是黑人存在着激进的思想，他们认为别人亏欠了他们。在被解放了的非洲其他国家里也存在这种想法："三百年来你们从我们这儿偷走了东西，因此，你们欠着我们。我们要剥夺你们的一切。"

尽管这种态度不无道理，但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每个人都受到了损失。一旦非洲国民议会上台，它的左翼"改革"可能使南非倒退 10 年。

我的观点是，这个国家在一个理性投资者来此投资前，将经历一个疯狂印钞、高税收和高赤字的时期。种族冲突和国内骚乱可能会更严重。不过，冲突到达高潮，即所有投资者都逃离该国之时，可能正是买进南非货币——兰德之日。假定非洲国民议会不会继续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这时的货币值会是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莱昂的看法要乐观些，他也许会是对的。他感到曼德拉的非洲国民议会将赢得南非大选，最终许多白人和大多数黑人会投他一票。莱昂断定非洲国民议会将当政一个任期，4 年或 5 年，取决于宪法是如何制定的。非洲国民议会大概是和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等同的政治党派。一届任期期满后，非洲国民议会或许会由于不胜其职而被相当于共和党的南非党派所取代。政治形势稳定下来，经济发展将重新启动。

这并不是说世界范围内的"共和党人"能解决所有问题。

他们做不到。两党制度使社会在左右两翼间交替而渐趋稳定，这将是投资的最佳环境。

当我提醒他战后非洲的“一人一票选举一次”的惯例时，他回答说国际上的压力绝不允许南非再走它北边的那些国家——像扎伊尔、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走的老路。我不敢肯定国际上对此有这么大的发言权，即使有，南非还有部落冲突的问题悬而未决。

尽管我为南非和它的可能性着迷——谁不想从起始点开始投资非洲的德国或加利福尼亚？——但我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是等待，等到我相信变化的确要出现的时候。

投资者最好什么也别干，直到他看见钱躺在街头，等着他去捡。投资者最爱犯的一个错误是相信他们必须不停地做点什么，把闲散资金投放到什么地方去。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某一笔投资上赚到了大钱。他们欣喜若狂，得意非凡，对自己说：“好吧，现在我再把钱投到另一个地方去。”

其实他们只需把钱存入银行，然后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拿得准的机会，可他们却急不可待地又投了出去。妄自尊大！投资的诀窍是不赔钱，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的钱每年有9%的复利，就比那些起伏不定的投资者挣得多。他们虽有过好年景，可也有血本无归的时候。蚀本可能断送你的生意，它破坏复利率，而复利是投资的精髓。

在约翰内斯堡我们同一个大学老友亨弗雷·穆拉德和他的妻子塞瑞妮蒂·穆拉德聚了聚。这对于我们不拜访故人的宗旨又是一个例外。但25年来我很少见着他，实在不能错过

这个机会。

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亨弗雷一回到祖国，就爱上了比他小20岁的黑人姑娘塞瑞妮蒂。他们同居了，在一个可以以"姘居"罪判他终身监禁的年代。在牛津大学，甚至在他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南非大学，亨弗雷就一直是反种族隔离分子。多年来他和塞瑞妮蒂一直住在白人区里，离警察局仅50码之遥。他说在南非，两个种族间的约会比世人料想的要多得多。现在他们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

塞瑞妮蒂是亚历山德拉的一位教师。该市是暴力、争斗和流血事件最多的热点地区。塔贝莎和我去看了看她的学校。在教室外，孩子们在打扫得很干净的地上玩弹子游戏，令我回忆起自己在三四年级时打弹子的情形。大一点的孩子在踢足球，那样子和我们玩垒球和橄榄球一样。不过，十几岁的孩子不那么活跃，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沉稳。

她的教室大约有40张书桌，一张紧挨着一张地排放在一起。班上有70～75个学生，这意味着只有40个学生有桌子，剩下的或站着，或成群结队地四处闲逛，或干脆不到学校里来。窗户上的玻璃都没了，好在这儿的气候不错，不至于成为大问题。

她教四年级。她的课把我带回到我在亚拉巴马上语法课的日子。那时，我们总不停地出海报，在墙上贴图画。在50年代的亚拉巴马，我们有地图册、图表等教学辅助材料。

这儿可没有。塞瑞妮蒂要用粉笔时还得自己花钱买，学校没有这类供应的预算。这儿也没有布告栏、图画和图表。墙上的漆已斑驳。她甚至连书都没有。

她把我们带到学校图书馆。我们感到诧异，这地方也能

叫图书馆：只有三个教室那么大，金属架子上几乎是空的，只零零星星地摆着几本书；唯一的三本杂志是《今日非洲》、祖鲁人的期刊和非洲国民议会出的一本地方期刊，我们没见到其他的非洲杂志，当然更不可能有外国杂志了；书架上有一本地图册、一本百科全书，都很旧，破破烂烂的。过去的书要多些，但不是天长日久用坏了，就是被偷走了。

我们作为纽约的来访者被介绍给大家。我看到这儿的行政人员和教师们精神萎靡，甚至有点呆滞。但这并不奇怪，他们处于无望的境地。学校有三四千学生，却只有几百本书，一个班75个学生只有40张桌子，没有教学材料。一个星期前有三四个学生死于骚乱，使学校更加不安，不知何去何从。

当我们走在这所令人沮丧的学校里时，我想到了很多有关老师的事。这儿会有不少好老师。他们薪水微薄，许多时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可每天还是走进校门教书育人。过去曾帮助过我的许多老师付出了心血，尽管那时亚拉巴马的一些地方还很落后，但他们执着地任教并热爱这个职业。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学到东西。我的确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大量的知识，甚至我进入耶鲁大学后都没觉得学到这么多东西，可能我没有和霍奇克斯大学的毕业生做过比较。我的老师们坚持要我们掌握基础知识，像乘法表和英语语法。

塞瑞妮蒂的同事们也想让孩子们学到知识。他们知道学生不想学，条件太差，前途黯淡，但他们仍每天来到学校，决心要教孩子们一些东西。可即使学生们确实有所收获，他们的将来也未必光明。我们很钦佩塞瑞妮蒂的勇气。在没有钱、没有材料和校方的支持的情况下，她也每天到教室里来，毅然决然地把一天的工作做下去。

终于，我们驶进了开普敦。

现在，我们从非洲的最顶端走到了最低端——直线距离0.5万英里——行了1.1万英里的路。这段旅程无异于一次丰盛的感官筵席，从撒哈拉被风刨光的山丘，到扎伊尔茂密富饶的热带雨林，风光尽览。



好望角——如今就在我们眼前。学过的地理和历史课的记忆令我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开普敦的美丽和现代化，使我们感到博茨瓦纳仍不过是个偏僻地区。即使南非是非洲最富裕发达的国家，我仍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如果曼德拉的非洲国民议会掌权的话，这个国家将步被庇隆主义毁掉的老阿根廷的后尘。很可惜，这么多黑人坚决认为现在该他们索取点东西了，因而不会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作为投资者，我所担心的是，一旦南非的形势

发生恶化，整个大陆都会变得和扎伊尔一样。

这是一个有着宜人的气候、大量技术知识、熟练工人和绝好机会的国家。尼日利亚本可以因其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成为大陆的经济强国。错误的经济管理导致种族和宗教傲慢的抬头，结果是其政治危机看来只能以国家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来结束。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南非的基础设施、殖民遗产、同一的历史记忆和资金基础，并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沿途的景象令我们感到身处堪萨斯，或者欧洲。电话畅通，汽油随处可得，餐馆、旅店、五金商店——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应有尽有。因此，南非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后者需要完善其基础设施。我们在中国见到的车辆不多，西部几乎没有公路。但南非有公路、高速路、电话线、电力和充足的供水系统。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有赖于塞色尔·罗德兹及其几个同伙千方百计地寻找钻石和黄金。如果他们在富含钻石和黄金矿的扎伊尔也如此这般，扎伊尔将会成为经济强国。这不仅仅是塞色尔·罗德兹剥削了黑人，他和手下人当然这么干了，他们尽可能地使用廉价劳动力；关键在于钻石和黄金的发现迫使资本家们修建基础设施以攫取利润。这给南非带来了繁荣，并为它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们忘记了在19世纪的美国，正是这些难缠的资本家像康莫多·旺达比和杰·郭德，不仅因铺铁轨而暴发，而且修起了使美国日后经济飞腾的基础设施。塞色尔·罗德兹在南非做了同样的事。再举一个资本家发展基础设施的例子。还记得我们从撒哈拉出来走上尼日尔的那条平坦大道吗？它的存在是出于当地一个铀矿的需要。

南　非

在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比这办法更好地发展基础设施的了。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铺设道路，架起电话线缆。以正确的政治手段来建设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我们许多人愿意认为世界银行的官僚们在对一个国家考查一番后，能够准确地判断出需要修建什么以使该国成功地发展起来。不幸的是，他们很难把项目经济地设在合适的地方。这些官僚们常常在河上架一座桥，但除非那儿有潜在的经济活动以利用这桥，否则它不会给该地区带来繁荣。自来水因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便利而被引入村镇，但它并不一定带来繁荣。道路、电报电缆和供水系统应当建在经济活动频繁的矿场、工厂和城市的附近，企业家为了获取利润，甘愿把资金置于风险之下。

一个稳稳当当地拿着75 000美元年薪的官僚，会比一个冒着赔钱、损失名誉和机会的风险的企业家做出更经济的决断吗？我向你保证，企业家的深思熟虑和审时度势要比官僚强一百倍。企业家要保证他能与投资项目保持联系，为工人提供住宿，用像样的公路把产品运出来。

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想的模式。1914年以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企业家在19世纪大举外债以发展自己的基础设施。我们修起了铁路和运河，兴建了城市和工厂。

今天，我们的赤字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不足为奇。举债并非坏事，只要把钱用于明天的生产性资产，像我们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那时欧洲人把钱输送到我国，这样可以赚得丰厚的利润。而我们也在20世纪得到了回报，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国。

这种情况本可以发生在扎伊尔。假如扎伊尔把那些的确愿意发展该国经济的企业者吸引过去，到时它的经济将非常强大。可惜，它在六七十年代把所有的资本家都赶了出去，仅仅因为他们曾经是资本家、殖民者或剥削者。

经济上，19 世纪的美国和今天的非洲或西伯利亚差不多。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货币控制、限制性政策、移民政策和签证；也没有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和工作队，指使钱应该投在这儿或那儿。如果机会适可，资金就会畅通无阻地流向那个地方。如同水往低处走，哪儿的回报最高，资金就流向哪儿。

资本不分黑人或白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基督徒或穆斯林。它只在乎安全性和利润。它与机会并存。资本不关心它滋养的是以色列还是埃及，是电子业还是钻石矿。

明白了这一点，俄国人可以很快地解决他们的问题，使私人财产合法化、向每个人适度地征税、令货币自由兑换，混乱的局面会很快好转，从而建立起新的秩序。这种形势将对外国资本构成吸引力。

在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说："不，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不要任何外来资本，因为它们会像剥削非洲人那样剥削我们。"

非洲人也这么说，但他们找了一个错误的榜样。19 世纪的美国大量举债，广泛地用于投资。我们没用这钱给独裁者买皮草，没给蒙博托买汽车。钱投到了生产性资产上，于是我们致富了。

这就是为什么南非比其他非洲国家都领先一步的原因，它得益于"剥削者"——那些真正的开拓者——所建立的基础设施。这些东西是以后的每一届政府和每一代人都愿意拥有

的。在西方我们听到有人说，只有欧洲人离开南非，南非人实现自治时，南非的问题才会得到迅速地解决。在实地考查了黑人治理的扎伊尔、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中非、刚果、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之后，我当然不会相信这是非洲走向繁荣和平等的必经之路。

我在想究竟谁是地道的南非人？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的确是黑人和白人，但在开普敦，文化和肤色都呈多样性。在英国人于19世纪来此开采黄金和钻石之前200年，被称为阿非加人的欧洲拓荒者已定居好塞角，建立了开普敦。通过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我们见到了汉尼斯·麦伯格，他是300年前来到开普敦的一个北欧家族的第九代子孙。他的家族拥有南非最古老的葡萄园，比绝大部分黑人在这儿待的时间还久。

他邀请我们到他的葡萄园午餐。席间我们和其他的客人品尝了他自己和竞争者制造的葡萄酒。午餐时光变成了丰富多彩的一天，最后以我们的桌上舞蹈结束。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晚上一个颇为复杂的舞蹈使我从桌上摔了下来，伤着了后背，历时10个小时的午餐还会继续下去。

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有时间回想一下谁是真正的非洲人。我们在北部边境看到的排着长队想进入南非的黑人，和上一世纪的移民一模一样。非洲黑人从北部地区移居南部，先是当矿工，后是做工人。

最早居住在南非的是科伊桑人，被白人殖民者称为"丛林者"或霍屯督人。他们人口不多，散居在今天南非的大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开普半岛。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便于同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进行贸易，在开普敦设立了一个中转站。一些欧洲人陆

25. 博茨瓦纳

BOTSWANA

我们已经听说博茨瓦纳的海关官员对旅行者带多少钱入境不太在意。但当我们靠近边防时，我还是忐忑不安起来。

我们被要求填写一份表格，说明我们带入境的钱数，这和我们到过的所有紧巴巴地实行外汇控制的国家没什么两样。

我问边防官："我们得把所有的钱都换掉吗？"

在 60、70 和 80 年代，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资助了数十个非洲政权。今天，财政援助停止了。现在美国人或苏联人都不再支持游击队的运动了。

他们的领袖或死或下台，非洲的政府正土崩瓦解，人民站了起来。这个大陆的现状和边界使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变革将带来冲突。不过，随之而来的战争将是短暂的，因为这个大陆没有多少武器来打持久战，人民也不愿意打仗。在其后到来的政治改革中，非洲人要么选择西方的模式，要么追随中国的模式，允许各种自由市场蓬勃发展。

非洲的边界现在已开始趋于合理。经过连年的战争之后，埃塞俄比亚和厄里特里亚就国家一分为二达成了和平协议。苏丹的边界问题也正在得到解决。索马里在我们干涉以前也在进行类似的变革。

当非洲澄清了它的种种问题之后，已经在非洲各地落脚的企业家就将被解放出来，实实在在地发展经济了。非洲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的商品市场固然萧条，但世界终有一天会亟需非洲的资源，尤其当前苏联产不出资源产品的时候。像扎伊尔，其土地极其肥沃，让一粒种子从你手中滑落，它就会径自生长。扎伊尔曾一度出口粮食，将来它还可以这样。甚至安哥拉都可能复苏。至于南非的将来，则完全取决于其政治斗争的结果。

我可以肯定的是，今后 25 年内，在非洲大陆上可以发大财。

毫无疑问，几年后我将回来做更广泛的投资。

Visas

Entries/Entrées | Departures/Sorties

REPUBLICA DE GUATEMALA

112-660-0786-11-21-11-102 VISA

No. 1434/c-11 CLASE 450

PASAPORTE No. 110173171

FORMA 63-A No. — — 0 — —

PERMANENCIA EN EL PAIS 30 días

EXPEDIDA POR Embajada

EN San José

FECHA 10-10-91

BUENA PARA ENTRAR Y SALIR DE GUATEMALA, EN VIAJES SUCESIVOS HASTA 9-10-94

SEGUN CONVENIO DE VISAS CON LOS E. U. A. DE 20 MAYO 60 MODIFICADO EL 9.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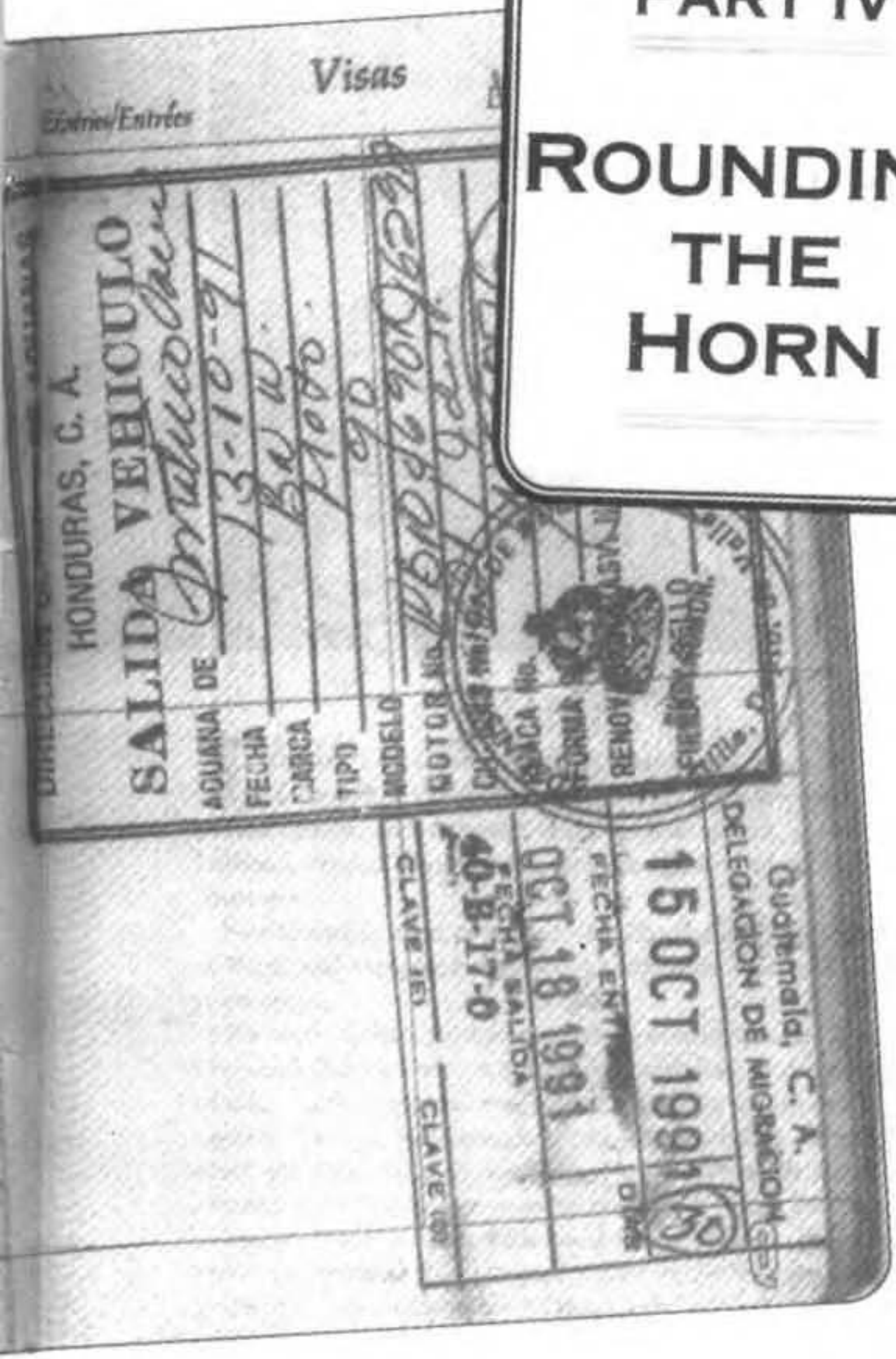
EMBAJADA DE GUATEMALA — COSTA RICA

José Espinoza Farf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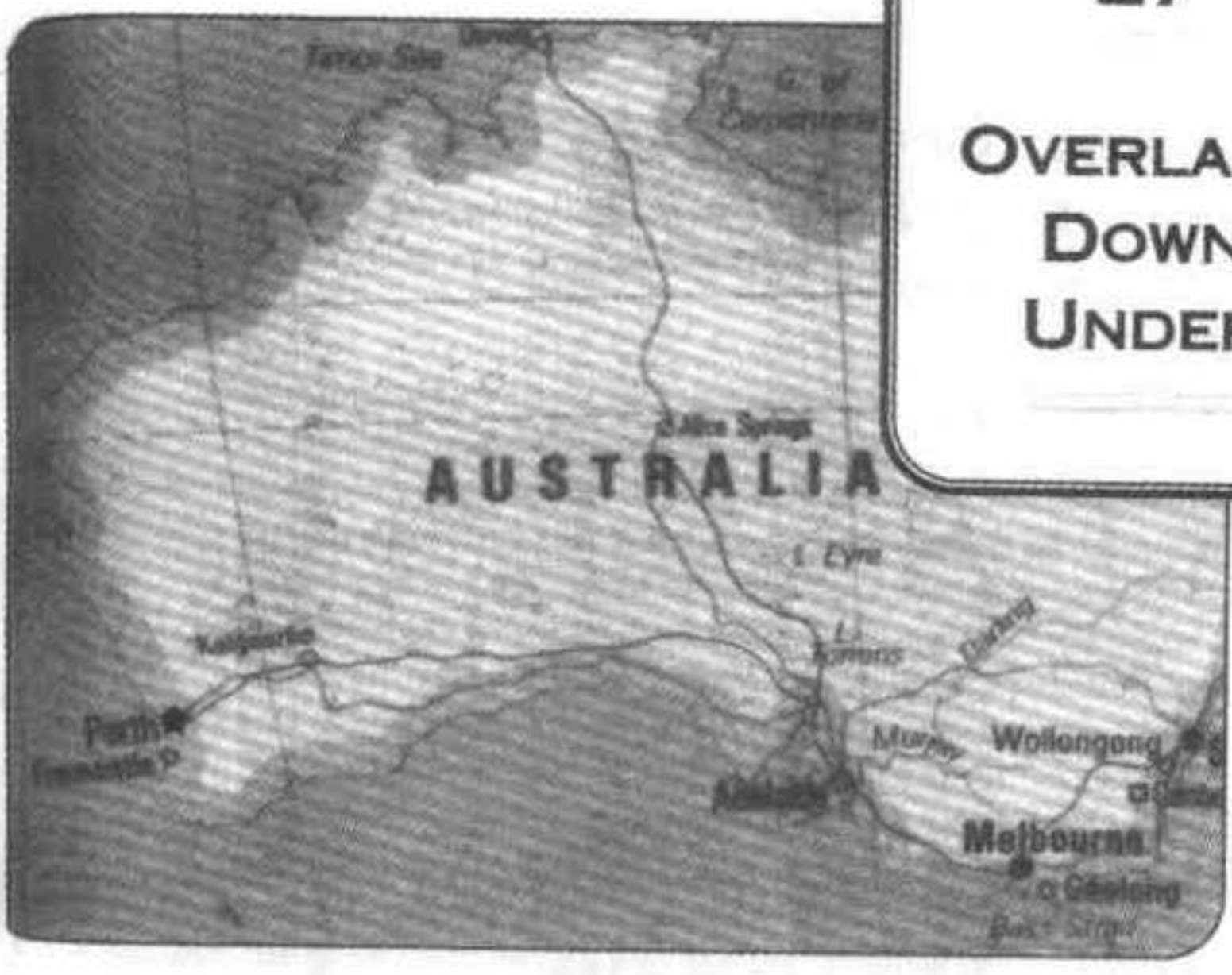
PRIMER SECRETARIO Y CONSUL

PART IV

ROUNDING THE HORN



:



27

OVERLAND DOWN UNDER

27. 横越澳洲大陆

OVERLAND DOWN UNDER

塔贝莎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西澳州的一名潜艇水手。他与一对年轻的澳大利亚夫妇结为好友，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那位丈夫弗朗西斯·伯特现在是西澳州的总督。

我们抵达珀思后，塔贝莎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他打了电话，并告诉他祖母要她一定找他们。

总督邀请我们去府上赴晚宴。塔贝莎解释了我们因为是骑摩托车旅行，一路风尘仆仆，没有什么正式的衣服，但总督并不在意。我们换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塔贝莎带了一双高跟鞋和一件黑丝绸裙装，是特意为这种场合准备的。我则穿着我的皮夹克和几个月来第一次擦亮的皮靴，系上了蝴蝶领结，就这样出发去赴宴了。

我们得知，总督是伊丽莎白女王在这里的礼仪代表。他在西澳州政府中的地位大致与女王在她的政府中的地位相当，是位剪彩和主持州宴的挂名首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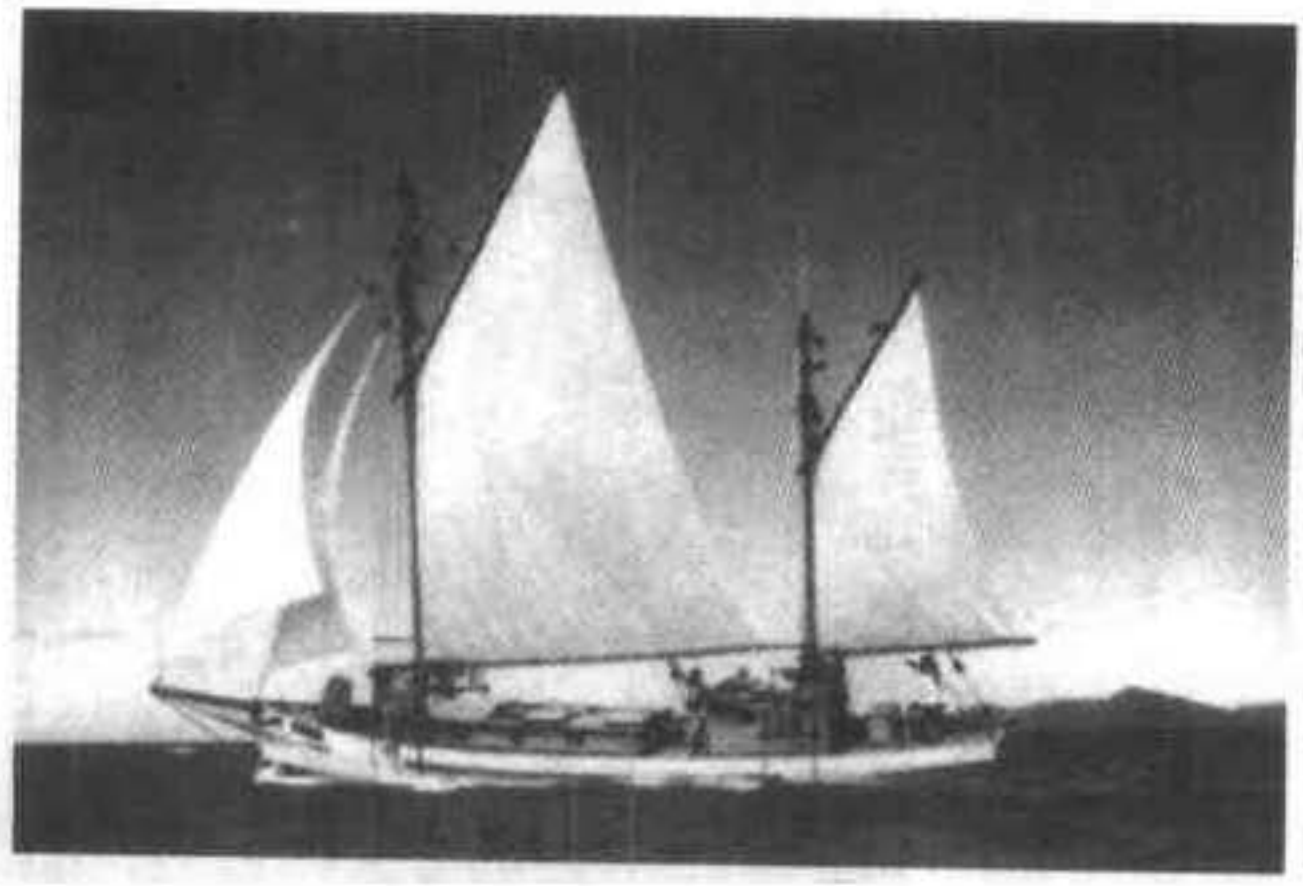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是由6个这样的州和北部地方省组成的。西澳州面积占全国一半，但人口仅160万。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大平原以西的各州人口仅有160万，那将是何种情景。

我们与弗朗西斯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的晚餐非常愉快。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们甚至参加了他们孙子的受洗仪式。

澳大利亚的面积和形状与我国南部48个州大致相似，沿其三面边界线旅行，其行程着实不短。

我们计划从珀思出发，沿西北海岸至达尔文，从达尔文南行至艾尔斯岩和艾丽思斯普林斯，然后沿原路北上，再折向东行至大堡礁。我们将到达东海岸并途经布里斯班、悉尼和墨尔本，从墨尔本乘轮渡到塔斯马尼亚，然后返回悉尼以便飞往南美。

从距离上讲，这条路线相当于从洛杉矶骑至西雅图，右转骑往明尼苏达——加拿大边界，南下至塔尔萨，北上返回芝加哥，继续行至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州，再穿行华盛顿州、华盛顿特区、罗利和迈阿密，然后乘上一条船去古巴，再返回亚特兰大。约有9000英里的摩托车车程。



我们扬帆驶过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用呼吸管潜入那儿的海底。

每个国家在高速公路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路标来警示野生动物的出没区。后来在这段路上，一只袋鼠险些撞着塔贝莎。





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亚瑟港近一百年来一直是一个殖民地。在大英帝国输掉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及其北美的殖民地之后，他们被迫寻求一个替代品：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路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路都不一样，可能只有得克萨斯除外。全国大部分地势平坦。大路像枪筒一样伸向前方，几百英里没有一个转弯。我们的橡胶轮胎在铺着沥青的大路上飞速行驶，赢得了大量宝贵时间。

我们第一次试图超过一辆大卡车时吃了一惊。我们一直绕着它骑——绕啊绕啊——直到我们发现它其实是一种被称为公路火车的交通工具。本质上讲，它是个拖着三节长长拖车的拖拉机，每节拖车都有 50～60 英尺长。公路火车是高速路上的骄子，它们有充分的理由成为骄子，这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又一例证。我们加大马力后才超过了它们。

在澳大利亚，人家都住在海岸地带，在内陆，除了沙漠以外没什么别的风景。我们驶过的城市之间长长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人造的东西——没有加油站，没有房屋，没有邮筒。

路边偶尔会出现提供汽油、食物和床位的驿站，只有这种驿站和零星散布的城市才打破了澳大利亚的广袤。时不时地有死去的袋鼠和绵羊躺在路旁，它们都是高速行驶的卡车和小汽车的牺牲品。非常平直的公路伸向无边的、空旷的、平坦的沙漠，显得那么超现实。这使我意识到，作为旅行者，我们是多么期望一路上所见的都是变幻无穷的风光，而不是无穷无尽、一成不变的景色。

我们用了一个半月穿越澳大利亚。所幸我们逗留期间恰逢干季，不用为下雨发愁。

西部的骤发洪水构成威胁。我们曾见到过被洪水卷入沙漠中的车辆的照片。沿途每隔1英里左右竖立着高达4码的深度标桩，警告摩托车手在洪水期水位有多深。后来在穿越安第斯山脉时我们又看到了警告雪深的同样的标桩。

在撒哈拉，我们有时一天仅能骑50或60英里。然而在这里，有那么几天我们每天骑700英里，是整个旅行期间成绩最辉煌的几天，因为除了驾车之外可做的事情不多。

我们所做的旅行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未曾做过的。在西部，我们常遇到人们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开车开到东部。我真想去那儿。”在东部人们说，“我从来没有开车到西部去过。”当你意识到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不但大部分地区荒无人烟时，你就会明白其中缘由了。

澳大利亚的地块很稳定，不像其他大陆，它很少有形成山

脉的地质断裂。惊人的美景偶尔伴随着盐湖和不寻常的突起物，如艾尔斯岩、奥尔加斯以及几座朴素的小山丘。在美国西部，一头牛需要 40 公顷土地才能生存，这里也一样，每只袋鼠或绵羊需要一大片牧场。

几个小时过去了，听到的仅仅是超现实的摩托车的轰鸣，见到的仅是沥青铺路、红色的陶土和岩石掩映的灌木丛。有一天晚上，塔贝莎说最近驾车的时候不需要有在非洲、西伯利亚和中国那样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因此她用了很多时间回忆过去的生活，重温她的童年、学校及大学生活的片断以更好地理解过去。

塔贝莎和我开始谈论旅行结束后的生活，讲起来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我们已经离开美国很久了，似乎以后我们将永远离开过去的那段日子。回去以后将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我们？当然我们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谁也不能肯定将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非常喜欢在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的路旁散落的澳大利亚路边驿站停留。在方圆几百英里之内，这些是一个旅行者唯一可以休息和补给的地方。路边驿站卖汽油，有个小餐厅和便利店，并且出租房间，通常不超出 8～10 间。驿站相距遥远，不可能受到竞争的影响而趋向一致，它们已演化为边界聚集点，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些驿站的气氛更激发了澳大利亚人每天随意饮酒的心情。早餐时就有啤酒供应，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晚上，旅行者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论轶闻趣事。偶尔有几位雇员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但店主和他太太像任何其他地

方人手不足的企业家一样忙得都顾不上坐下讲两句话。

雇员们都是游来荡去的流浪者，从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很久。一个路边驿站的员工起义了，因为店主破产了，不能付工资。但他们在那里工作，仅仅是为等拿到钱后再转移到下一个驿站。

很多店主的生意很艰难，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公路火车司机通常结伴而行，路上也不停留。我们猜他们轮番开车，就睡在驾驶室的后座上。

这似乎是购买驿站并开发连锁经营的大好时机。我断定他们的生意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海湾战争以后油价上涨，人们都不再旅行了。在这种萧条时期购买澳大利亚的驿站就好比在冬天买草帽。无论是为生意还是单纯为了心情愉快，旅行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大趋势。那些准备利用这一趋势抓住机会的人将会得到巨大的收益。

当我们行驶的时速达到65英里时，轮胎在沥青路面上的摩擦发出了令人满意的"嘶嘶"声。我们刚加满了油，太阳落下去了，大路在我们面前笔直地延伸，我们准备再驾驶3个小时到下一个驿站。

嘭！我的车在两腿间摇摆起来。我猜是引擎的某个部位爆炸了，从它巨大的爆炸声和我无法顺利驾驶的情况来判断，事故相当严重。

我只得驶向路旁，车倾斜地停下来。塔贝莎在前方放慢车速回头看我，猜想我是不是在调整头盔或者还是出了什么事。

我的摩托车后胎瘪了。审视了一番之后，我发现轮胎爆

裂了,裂开了个3英寸长的大口,这是我25年驾车生涯中的第一次爆胎。车胎从中央爆裂,我从未见到过摩托车也会发生这种事。通常摩托车的车胎是受力均匀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磨损也是均衡的,而这里是长长的、笔直的、平坦炎热的大路,又没什么转弯。塔贝莎协助我换上新胎,我们认识到必须经常地检查轮胎。

我一直以为爆胎是很危险的,但事故发生之时我们正高速行驶,并且我在控制摩托车时也没有任何困难。我不知道如果高速行驶时前胎爆裂将会是何种情形,我非常乐意再等25年后能找出答案。

我们终于到了达尔文,这是澳大利亚最靠北,离印度尼西亚群岛最近的城市。在城里可以看到各种肤色、各种民族、种族和各种事物,真令人吃惊。来自亚洲各地的人们都聚集到这里——中国人、韩国人、印尼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街上,我们听到各种语言以及语调奇怪的英语。

达尔文现在以及将来都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随着澳大利亚进一步开放,人们会越来越多地涌向诸如达尔文和珀思这样的边缘城市。它将成为这样一个城市,在这里积极肯干、有开拓精神的人将收获黄金般的硕果。人们通常很注意黄金的产地并蜂拥而至。如果现在有学生问我,若他坚持讲英文,那么在以后几十年应该去哪里发展?我会告诉他去达尔文,并告诉他可从事旅游业或任何与亚洲及这个交叉路口的贸易有关的任何领域。

在过去的15年中,达尔文的人口翻了3倍。整个北部发展都很快。北部地方省与阿拉斯加大小相似,气候宜人,风景

优美，旅游胜地众多。虽然人口不多，但有移民大量涌入。

此时的达尔文还未纳入全国铁路网，但将来情况当然会有变化。火车从南部北上开至艾丽思斯普林斯并延伸到达尔文以南一点点，但这仍然远远不够。一旦这种状况得以改进，达尔文将如虎添翼。从经济角度看，铁路对达尔文的重要性就像跨大陆铁路网的建成对加利福尼亚的重要性一样。

此外，达尔文北面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是两个具有爆炸性活力的国家。毕竟，印尼的人口位居全世界第四位。印尼人是出色的商人，在他们古老拥挤的国度里耕耘。而几百英里之隔的南方就有一个辽阔空旷的国家等待着他们去开发。

澳大利亚自然资源丰富。这里有15年前刚刚开采的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钻石矿。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镍、铜，未开发的土地、水，以及大农场、大牧场，它的任何东西都规模巨大。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每当修起一座大坝或灌溉系统，那么周围的整个地区都随之欣欣向荣起来。

这里是另一个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是另一个劳动力密集的中国。

再过几十年，如果当印尼人变得咄咄逼人地试图扩展其商务活动时，他们所选择的自然不会是北部拥挤的印度和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而是南方的澳大利亚，因为这里人口不多，军队少，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障碍。

我们从达尔文出发南下奔赴艾尔斯岩，它坐落在澳大利亚中部。

我们经过的地方是红色的土壤，比我家乡亚拉巴马的红

色陶上颜色更深更暗。因为距离遥远，塔贝莎曾提议我们不要安排去艾尔斯岩，因为它"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块石头。"

她时常谈起如果当时真的听了她的建议，那将是多么大的错误。艾尔斯岩有着那种应禁止拍照的令人敬畏的景观。我们骑着摩托车驶近时首先看到的是一片广阔的平坦的平原。突然，一只硕大的红色怪物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活生生地向我们逼近。

如果说艾尔斯岩不是活生生的，那么它就似具有灵魂或者就是精灵的家。这块岩石从一览无遗的平原当中竖起，高达1100英尺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独石。它虽然长达2英里，然而科学家们说它的三分之二被埋在沙下。它的外表看似一只巨大的史前动物的兽皮，距离愈近愈发现它的表面嵌着大洞，像斑斑点点的麻子。我们骑着摩托绕着它行驶，它不断地变幻着红色，就像它的巨大外形那样令人着迷。

太阳落山了，岩石表面的红色变得更暗更深了，并最终幻化为鬼魂似的灰色。

黄昏时分情况却正相反，岩石的灰色又变为深红然后成为淡淡的铁锈红。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没有下雨，但我曾见过雨中的艾尔斯岩的照片，雨中的岩石颜色呈深灰，几乎是黑灰。

我当然明白为什么当地土人把它作为圣地来膜拜，因这是个无数精灵出没的地方。

虽然澳大利亚路况绝佳，我们却从不夜间赶路。骑摩托车旅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骑摩托车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赶夜路，我们就会错过在摩托车上欣赏新地方带来的刺

激和感动，这样就会虚度此行了。

安全对于摩托车旅行者来说从来就不是个小问题，在夜间驾驶比白天驾驶危险得多。70%的摩托车事故是由小汽车引起的。汽车司机在撞了摩托车后总是说："我根本没看见他。"如果他们在白天都看不见你，那么在夜里就更看不见你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晚上人们喝酒喝得多。在夜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危险，袋鼠、牛、坑、碎石——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骑摩托环绕地球一次，我们就想真正地看一看这个世界。为什么偏要在夜里做环球之旅呢？

我们喜欢悉尼，把它列为想久居的城市之一。我的前三个选择是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东京，然后就是悉尼、曼谷和罗马。

悉尼是富有活力充满生机的首都，而墨尔本则炫示着古老的财富和教养，而务实的纽约和矜持高贵的波士顿更是举世闻名。当一个旅行者到达珀思，人们总是问他，"你从哪里来？"在悉尼，人们想知道你挣多少钱；在布里斯班，问你是否来一杯啤酒；在墨尔本，人们问你上的是哪所公立（私立）学校。

在澳大利亚居住的30%的人并非生于澳大利亚。巨大的移民潮翻卷过它的海岸，使澳洲在过去的20年间急速地繁荣起来。然而它仍只有1700万人口——国土面积相当于美国，而人口只比纽约州多一点。

日本人也发现了澳大利亚。在每个大商店、大旅馆和旅

游区，我们都能看到日本人。日本人自然而然地要到澳大利亚寻找自然资源，就像旅游者看中的正是澳洲的地理位置一样。你会看到澳大利亚和日本在未来的岁月中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因为这两国相互的长远利益比两国分别与美国的长远利益都要更大。

在澳大利亚，虽然空地很多，但大多数人仍住在城里。20%的澳大利亚人住在悉尼，15%住在墨尔本。在邻近的新西兰，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奥克兰（如果这个百分比在美国也适用，那么纽约市将有8 500万居民了）。20世纪的农业革命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而在19世纪不存在可以支撑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的技术。

我们开始考虑下一站，从澳洲到南美洲。

在准备开始下一行程之前就开始为具体的旅程安排操心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在我们当时所在的大陆上为下一站考虑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所做的任何计划也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在津巴布韦饱览美景之时要对自己说："嘿，我们从澳大利亚怎么去南美洲呢？"而其实在津巴布韦是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们可以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班机。我们可以先到里奥加耶戈斯，再从那里去火地岛。这是南美洲最接近南极的最南端，从那里我们可以向北骑。航班每星期飞一次。旅行代理商说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安排我们在新西兰停留一星期，然后赶下一星期的同一航班。

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

新西兰基本上由北岛和南岛两个岛屿组成。

如果一个旅行者想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骑车旅行，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选其一，那么新西兰是当之无愧的选择，因为它是如此细腻如此美丽。对于有心欣赏惊人美景的赛车手、摩托车骑手或普通的旅行者来说，整洁的新西兰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不规则的澳大利亚。对于骑手来说，新西兰的路更是如人佳境，因它们峰回路转，两旁看不尽的变幻美景，令人激动。然而在澳大利亚，通常骑1000英里也没有变化，日复一日，眼中的景致竟是惊人的相似。

新西兰的宜人气候和地理特征与加利福尼亚相似，也同样变化繁多。国家虽不大，却以无尽的多样化闻名。除了丰美的草地和冒烟的火山之外，它还有农田、沙漠、城市、冒气泡的热泥眼、天然喷泉、冰山、海洋、多沙的海滩、崎岖多石的海岸线以及众多山脉。当地的毛利人从未发明书写文字，他们的远古的南太文化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战用的独木舟以及图腾柱的雕刻上，在各处遍布这样的展览。在几百英里之内，游人可以钓鱼、滑雪、高空跳跃，还可以远足、潜水、看鲸鱼，乘筏在激流中漂流。飞机和直升机数不胜数，游人可以体验“空中游览”。鹬鸵——新西兰人的自称——喜爱迷宫，因此他们在树篱中修造了巨大的迷宫。他们甚至已开始出口建筑技术，尤其是出口到日本，在那里，优秀的新西兰设计师们自己充当顾问。

在新西兰旅行有点像度蜜月。新西兰人友善、随和、乐于助人。塔贝莎和我都爱上了这个新鲜、活跃的国度，都想在一周之后再继续逗留几天，但冬天的临近迫使我们不得不早日动身。我们将在6月和7月在距南极几百英里之遥的安第斯

山和火地岛旅行，这就相当于1月骑车穿越加拿大的洛基山。我们每星期的拖延都将使自己更多地体验南美洲的1月和2月即加拿大式的严冬，并将可能使整个行程拖延6个星期。

新西兰这个国度有人口400万，绵羊6000万只。小羊羔在春季降生之后，四条腿的生物的数量常增至1亿。这个国家的经济历史就写在其羊和羊毛的故事中。在70年代，俄国人用硬通货购买羊毛以期提高国人的生活水准，使羊毛的价格飞涨。丰富的石油资源给中东带来了繁荣，阿拉伯人开始放纵地大吃羊肉，羊肉的价格也暴涨起来。这种状况持续至80年代。很快，羊肉和羊毛的供应都过剩了。

俄国人后劲不足，阿拉伯人再不能高价出售石油了，需求一落千丈。新西兰政府为继续保持这种繁荣并让选民开心，想出了个好办法。显然，这只不过是世界对羊肉和羊毛的贪婪需求中的“临时下沉”。情形随时都会好转。同时，为什么市民们就该受苦呢？

新西兰政府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宣布“我们将尽数购买农民们生产的所有羊毛以稳定价格”。正如戴比尔斯对钻石市场采取的措施一样，这个委员会向农民提供了补贴并使价格稳定在较高水平。农民们并不傻，他们养更多的羊，生产更多的羊毛，向政府出售。多年来，委员会用借来的钱如数购买，直至最后再也无能为力。然而，俄国人手头拮据，中东战争扼杀了那里的市场。在联合国禁运下，伊拉克当然不再订购任何羊肉。处在伊拉克占领下的科威特也退出了市场。

不幸的是政府多年来一直高抬价格，所以一旦熊市来临，价格反而降得更快。每当有人试图在问题创口处贴上一张邦

迪，市场的滑坡通常要比正常情况下更严重。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况。政府多年来一直在为我们的财政状况贴邦迪，而一旦最终算总账的那一天到来之际，后果将会很可怕。

事实上，新西兰政府借钱买羊是为了维持农民的生活水准。在美国我们借钱制造武器并且以转账支付和各种津贴相施舍。如果我们借钱投资于公路、铁路、工厂和电话系统，那是一回事，但借钱以稳住羊毛价格以使农民能买电视，那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在政治家们眼中，他们买来的是选票。柏拉图、杰弗逊和德·托克维尔和其他政治作家曾警告过世人这种民主的至高危险：政客们会为了大批选票而出卖国家的生存权。

现在有些人或许会说："等等，难道我们没有堆满羊毛的仓库吗？难道羊毛不会最终体现出其价值吗？"但我说如果你把钱用来修路，路可以增加生产力。成立一个以支撑一种消费物品价格为目的的卡特尔与修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世界的经济历史中充斥着一些试图支撑价格又未能成功的卡特尔。

任何人如果出于支撑价格的目的而购买数量巨大的某种产品，那么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是经济学中最古老最普通的一条规则：你可以控制价格，你可以控制供应，但你永远不可能长久地控制两者。

举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例子。石油输出国组织试图控制石油价格，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受到高价导致高供应而带来的压力，使这一整个机制崩溃了。另举一个例子，为了支撑锡的价格，马来西亚人几乎破产。

新西兰的问题产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政府借债以让

工人和农民高兴，宁肯提高就业率也不愿为将来打算。

新西兰的财政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选民们重新选择了保守派。我所谓的“糟糕”是指高通货膨胀、高利率以及极高的失业率，因为物价高涨，没有人买东西。货币如此贬值，没有人负担得起进口像新西兰这样一个小的与世隔绝的国家急需的外国商品的费用，因为在那里不生产任何晶体管或汽车。选民们开始意识到商品的价格是昂贵的，通货膨胀上去了，他们买不起索尼电视机或日本汽车，也没有人能得到工作。他们开始对政府表示愤怒。

然后就发生了关于人民和中央银行关系的一个更为不同寻常的故事。在那个 10 年开始之际，新的保守派政府到银行与之订下了契约，这份书面契约规定政府不能废除契约。契约规定央行必须把通货膨胀控制在 2% 以下。

“你们这些银行伙计们做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政府的人也会做我们份内之事。但如果我们做不到，你们也仍必须做你们应做之事，因为我们是政客，政客们是不能信任的。”托利党人说这种话是因为他们能知道自己是政客。他们害怕这一国家的政治意愿将发生变化，并且他们会被迫退回到起点。

你瞧，中央银行完成了它的工作，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并且从那时以来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 2% 以下。

当我们穿越新西兰时，我不由得特别注意那些羊。我拿出商品图研究羊毛价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图表上绝对肯定地体现了羊毛价格的大滑坡。

同时在我身旁，我看到的是一支勤奋的劳动大军。他们

像任何人一样也会对一点儿施舍感激不已，但他们远离世界的中心，知道谁也不会来管他们。虽然他们1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福利国家，但新西兰人的本质个性是朴实无华、自力更生的。

我研究了一下新西兰的股市，发现它如果不是过去10年中世界上主要股市中最糟糕的，那起码也是最糟糕的行列中的一分子。当然，我仍能忆起70年代和8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繁荣。新西兰除自然资源外一无所有：这些资源包括羊毛、羊和其他农产品，因此新西兰是那段繁荣期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当这段美好时光结束之时，它是最先沉入深渊的国家。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就能让人明白，这是世界上受打击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因为它除了有限的农业以外一无所长。聪明人知道，繁荣期已经结束，该把钱转移到其他领域。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使人明白，为什么在过去的10～15年间新西兰的股市是世界上表现最糟的股市。

这种状况刺激了我的投资欲。我首先看到一个萧条的投资领域，股市。然后我看到一个萧条的国家，它的萧条是由其经济特性以及对羊毛、羊和其他农产品的糟糕的公共政策导致的。最后我又看到一个政府正试着做一切正确的事情以支撑它的货币、搞活它的经济。新西兰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此外他们别无选择。否则的话，他们的货币就将会消失，就像许多非洲国家货币消失了一样，他们自己也将面临可怕的境遇。

很明显，我必须在这个股市里投资。我开了账户，存了一些钱。

像往常一样，我给自己找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经纪人。有

这样有实力的公司相助，我对破产的风险倒不太担忧。如果经纪公司本身看似快破产的样子，那政府就有可能接管公司或对其强行兼并。

我先开了一个小户头，试试看是否一切运作顺利。我担心账号登记错了或通过越洋国际电缆的操作把我的钱转丢了。首先，我想知道这一系统能否顺利运行。

我平常阅读世界报纸时并未特别研究新西兰，但到了这里以后我学到了很多。在经纪人的办公室里，我翻阅了有关市场的各种书籍，包括股市年鉴。我回顾了这个国家在过去10年或15年间所发生的事，那些基本事实，包括收支平衡状况以及这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概要。

我想在新西兰对羊毛进行直接投资，但如果我买羊毛期货，我必须操心它们将在某时到期或我可能付出一笔追加保证金。因此我尝试在羊毛交易所买个交易所席位。每当出现严重的熊市时，股票交易所、糖交易所、黄金或债券交易所都变得非常萧条。在萧条市场进行投资的最佳方式就是购买一个交易所席位然后随它去，通常甚至连最低保证金都不用付。

不幸的是，这里的期货交易所是几合一的。如果你在羊毛交易所买了一个席位，那么就等于你在整个期货交易市场都购买了一个席位。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单纯地尝试羊毛和羊，但我不能得到这种席位。

我在新西兰开账户的另一原因是想在环太平洋地区体现我的存在。因为时区关系，新西兰的市场是每天开市最早的市场。有时我想在午夜开始交易，我就必须等欧洲或东京开市。而新西兰是最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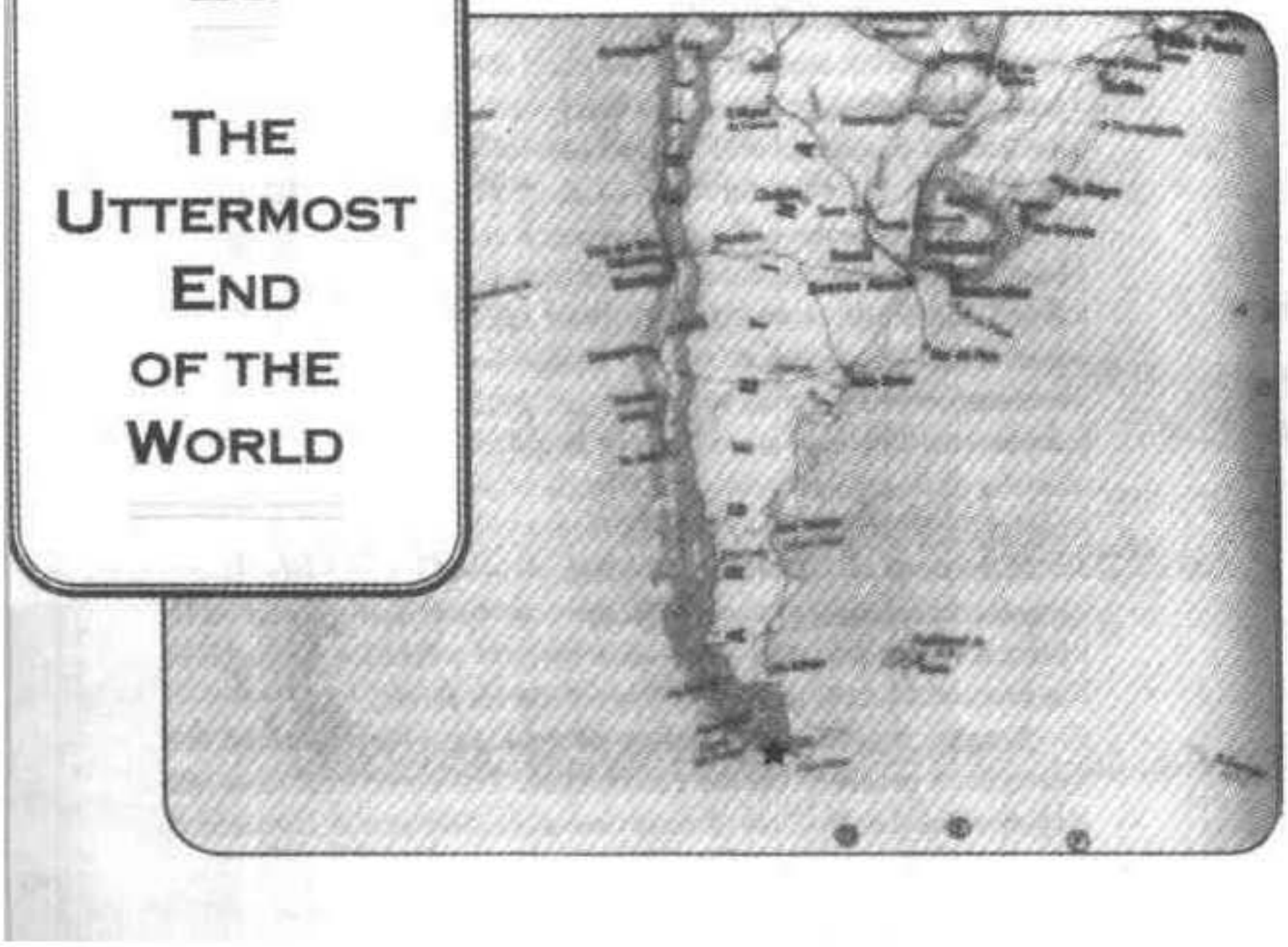
我怎样利用这一点呢？比如说在星期六下午，我相信美

元将在星期一早晨贬值，那时美元握在手里就一钱不值了。那么，我可以早在亚洲、欧洲和纽约开市之前就在新西兰抛出美元。我可以买黄金。如果我认为世界股市将在星期一早晨崩溃，那么在新西兰，我可以最先卖出，因为这里将是最先开市的。如果我认为由于某种原因，股市将出现大规模上扬，同样，这里还是最早开市的地方。事实上，新西兰星期一的早晨仍是纽约的星期天下午。

新西兰的股市有几百种选择。我选中了20种，都是关于农业和原材料的并且盈利情况都很良好。当我开始尝试时，我还对澳大利亚农业投入了一小笔钱。我寻找的公司都是能够幸存的公司，以防万一我对何时投入市场的判断有误时能有退路，这一国家还未结束困境呢。

28

THE UTTERMOST END OF THE WORLD



28. 世界的最极端

THE UTTERMOST END OF THE WORLD

很多方面来说，我们仍是亚拉巴马一个偏远小城里的十孩子，我们被途经的伟大世界中的景象和奇异感动不已。穿越麦哲伦海峡！从火地岛呼啸而过！在我的生命中，曾几何时，这些还只是地图上的奇异名字，而现在我离麦哲伦历史航线仅咫尺之遥。

火地岛的冬天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寒冷，地势大部分很平坦，被风吹得秃秃的，但是景致很可爱。这里有羊、鹅，还有红褐色美洲驼，一种类似美洲无峰驼的动物，人不多。

为了吸引人们前来观光定居，这个岛是免税的。实际上，阿根廷政府鼓励人们迁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的所有地区。虽然这是个国土面积属世界第八的大国，但其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首都。

火地岛的最大城市乌斯怀亚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这个城市为了吸引定居者前来，当然需要提供所能想象得出来的一切鼓励措施。一位银行经理告诉我，这一地区需要发展旅店业和渔业。空荡荡的商店和建了一半的设施表明生意状况不够好。

在每年6月份，早晨太阳10点钟升起，下午4点钟落下，这给我们留下的行路时间非常短暂。在“世界的最极端”——当地人喜欢这么说的——光线是不断变幻的奇迹之源。

这里的旅游业将会兴旺。这里的风景美得令人叫绝；绝佳的越野滑雪太容易发展了；帝王蟹味道鲜美。在这个城市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前往南极，我坚信南极将会成为非常成功的旅游胜地。正如撒哈拉边缘的塔曼拉塞繁荣起来一样，因为旅游者想看一看沙漠。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地去看南极，乌斯怀亚也将兴旺起来。

乌斯怀亚也许人口不多，但我却分明感到那繁荣景象正轰隆隆地逼近。我想在这儿买地。

毕竟，这个城市才刚刚出现了第一批房地产代理——大发展难道还会远吗？

我们驾了一只船出海。在波浪滔滔的海面两侧是耸立的陡峭的山，使比格尔海峡看似阴森可怖。到处散布着多石的岛屿，一个岛上栖息着鸸鹋，另一个则盘踞着海豹。

年轻的公海豹们在我们周围表演着潜水，它们跳动着、摇晃着，像鱼雷一样潜入水底。在岩石上，海豹的社会等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高高在上的国王受到另一只大海豹的挑战，而下面的年轻公海豹们互相挑战。在更远处，其他的老海豹被淘汰出局，它们不再去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了。

这里包含着什么样的教训呢？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本次旅程的尾声。我们已经离开纽约 15 个月了。每天早晨在我们离开旅店或宿营地之前，我都要在笔记本上记录下里程数。到现在已经记录了 4.3 万英里。我想我们还要再行 2 万英里。

我非常想看南美洲。智利的繁荣已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我想去看看这对其他南美国家带来了何种影响。我对这块大陆的印象是：它正在摆脱历时 70 年之久的熊市，并已为全大陆的经济繁荣做好了准备。

虽然我们已接近智利，然而要去首都圣地亚哥却没有什么路况较好的路。向北的唯一一条铺过的路是沿阿根廷海岸北上至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的人除了泛美公路以外根本不知道还能怎样前往中美洲，因此我们决定等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再作打算。

我们在南美大草原上向北而行，奔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美大草原的颜色和质感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草原迥然不同。草原上的野兔在我们周围蹦跳，雄鹰在头顶盘旋，比非洲鸵鸟小一号的野鸵鸟颤动着灰色镶白边儿的浓密羽毛在草原上跳跃着。

阿根廷湖边几十只粉红色火烈鸟的景象使我们不禁驻足。骑摩托车在湖边游览是个绝佳的安排，一旁是山，另一旁是广阔的湖。森林和砾石散布的地带显得很原始，似有精灵出没一样，蔓生的苔藓和奇形怪状的树木、岩石似乎被附近的南极磁场变成了魔鬼。

在水那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蓝蓝的物体。我们沿湖骑了约 10 英里，那个巨大的物体的颜色加深了，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个物体变得越来越大。

它是墨雷诺冰川，长达 150 英里，是世界上仍在移动的几个冰川之一。空气中回响着呻吟声和响亮的破碎声，最后汇集成来福枪的呼啸声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当冰川最终到达阿根廷湖时，它的前部呈现为一堵 160 英尺高的冰墙，它用了几百年时间一英寸一英寸地挪出了安第斯山系。它把湖水一分为二，像一个移动的大坝一样。偶尔有大块的冰破裂开来掉进蓝色的湖水，造成了蓝色调的流冰，使湖水一波一波地拍击着湖岸。

这一移动的冰坝把湖面分割为两半之后，每 3～4 年它都要在巨大的水压下爆炸，它崩溃的图景惊心动魄，可长达几小时之久。这种奇异的景象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因为它是那样不可预测，有时还在夜里发生。崩溃过后，700 年的冰融入蓝色的湖水，挥发至空气中，再化作雪花降落，最后再次形成冰川。



阿根廷巴特哥尼亚高原的帕瑞托摩瑞诺。冰川前面的这些冰是几百年前在安第斯山脉冻结而成的，此后一直向这个湖缓慢南移。

想一想这种景象有多壮观，我对于旅游宣传促销的如此缺乏感到吃惊。南美洲的南端是遥远的，但很多人们喜欢去的地方也同样遥远。这种促销的缺乏部分是由于阿根廷的守旧，而这一点已随着这个国家再次向更广阔的世界开放而得到改变。

冰川给某些人带来致富的绝好机会。所需要的不过是个机场，有了机场，人们可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过来。外国人可以先飞到阿根廷，去观赏北方的伊瓜苏瀑布，再看看冰川，然后过海去南极，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主要景点。在加拉帕戈斯也发生过相类似的由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发展。那里修了一个机场，现在数千人涌向那里，财源滚滚而来。邻近的城市

加拉法特就静等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与一位牧羊人交上了朋友，骑着摩托跟在他破旧的卡车后。这里的农民多数都陷于极度的困境中。他的福特卡车已买了11年了，但他近期内是买不起一辆新车的。

我们去了新朋友罗兹的牧羊的农场。这个家族100多年前来自福克兰，并得到了大片的土地。就像美国西部一样，阿根廷政府用赠予土地来吸引定居者开垦边疆。

这里的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那么大。罗兹一家把几块约5万英亩的土地出租给了他人。他们的土地收益仅敷支出，因为放牧一只羊就需要10英亩土地。但罗兹一家在许多人已经放弃牧羊之后仍然在困难的时期维持着农场。

阿根廷政府仍然拥有这个国家的多数土地，尤其是在南部。为了成为土地拥有者，公民须向政府建议一个项目并予以实施——比如说造一幢房屋。经过四年多的无数官僚程序，他可以出低价拥有土地。

罗兹的祖父拥有75万英亩地，但他的孙子们把大牧场分开了。在祖父的那个时代，约1900年左右，阿根廷比美国要富。今天我们说富得像得克萨斯人、阿拉伯人或日本人，而一战前的欧洲的表达方式却是“富得像阿根廷人”。罗兹的祖父是那些富人中的一个。

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在于技术，在于在合适的时候处于合适的地点。16、17世纪，西班牙人主要在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定居。阿根廷不过是一个广阔的、几乎未开发的平原之地，既没有黄金也没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事与物。西班牙人带来的许多牛和马逃跑了，过上了野外生

活。它们没有遇到天敌——阿根廷没有狼或狮子——因此得以繁衍，产生了众多的种群。

经过许多年，这些牛被称为阿根廷下等人的牧人驱赶到南部，如果谁要吃牛排就必须成为出色的骑手。阿根廷人口不多，他们的牛肉市场极小，因此牧群数目越来越多。欧洲没有大平原，而牛肉又是那么美味可口，可是不管一个牧人是位多么出色的骑手，他也不可能把牛群从阿根廷赶到巴黎。

19世纪末期出现了设有冷藏设备的远洋船。阿根廷的牛突然之间变得难以置信地有价值起来。

任何在南美大草原上的人，能够对付野牛群的优秀骑手都致富了。就像在得克萨斯，大牧场在阿根廷得到发展。成功的牧人把自己从下等人转变为富有的牧场主。

那时的美国没有那么多的牛，因此牛肉的供应主要来自欧洲市场，但阿根廷人后备充足，这是从西班牙人那里传下来的遗产。众多的移民涌入这两个国家。在欧洲，当人们决定是北美还是南美平原能使自己更富裕时，通常要靠掷硬币来碰运气。

要搞清楚这些事情有时颇费时间。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弄清楚阿根廷是个错误的选择。当全球的企业家认识到牛肉生意是多么有利可图时，很多人都投身进去了——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阿根廷失去了可以轻易得来的财源，于是政府试图用保护性关税、法规和外汇管制来补偿，这些做法却使其每况愈下的经济更为糟糕。就像新西兰在8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阿根廷的经济在20、30年代和40年代呈螺旋状下滑趋势。政府借债以维持短期的生活水准，债务由此积累起来。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建工厂。阿根廷的一切来得太容易了，金矿发现得太快了。他们是那么富有，不需要为将来而投资。他们选择了邦迪来盖住伤口而不是用手术来消除深层的癌症。他们所得到的是几十年的痛苦。

在火地岛看海豹我们觉得乐趣无穷，我们还租了一条船去瓦尔德斯半岛。

7月是这里看鲸鱼的最佳时节。因为其他时候风太大，而7月还正是鲸鱼交配的季节。因为是冬季，所以旅游者很少。我们的船有一刻曾被十几只露脊鲸包围，这些鲸鱼忙着交配，都顾不上注意我们。船靠得很近，我们甚至可以伸出手去触摸它们光滑的皮肤。

这些露脊鲸的鲸油、鲸骨、鲸脂以及一切都有实用价值。它们每年这个时候到这里交配。像往常一样，每只雌鲸鱼都能吸引三或四只雄鲸鱼的注意力。

导游指给我们看两只雌鲸鱼，背朝上在离我们的船几码远处漂浮着。这是雌鲸鱼向异性发出的信号，现在她刚刚结束交配，离她远点。

我们步行到海滩上，公海象在这里休息，为等待8月雌海象回来而养胖自己。雌海象回来，交配季节开始之后，公海象就得待在陆地上守卫它们的女眷不被强盗抢走。这意味着它们几个星期不能捕鱼或吃东西，这就是它们让自己胖起来的理由。我们走在它们中间，这些巨大的“香肠”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这个半岛上遍地是动物。另一个海滩上满是海狮，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打架，有的在游泳，有的在粗声大叫。我们碰

到一只只上岸休息的受伤的企鹅，像啮齿兔子一样的秃鹳，还有海象、猫头鹰、羊、狗、牛、粉色胸脯的鸦以及南极的鸽子。

每天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长。我们沿着阿根廷海岸驶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路上经过的乡间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宽广空旷的大草原上道路又长又直。在一整天内我们没有看到一棵树。这些辽阔的平原当然有发展的潜力。

确实如此，阿根廷人的人均牛肉消费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大。每个小城都有个不小的烧烤营地，在城里这种地方有几十处。与各色烤肉同时供应的还有血肠，盛满烤血和香料的容器，我觉得特别好吃。

阿根廷将会成为旅游者的天堂。这里有几十种珍奇动物，有山峦、海滩、沙漠，可到南极滑雪，在广阔无垠的南美大草原上驰骋、打猎，一切应有尽有。在北部能看到独特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和世界奇迹伊瓜苏瀑布。现在的阿根廷政府已摆脱了军人统治，或至少把军方安抚得平静下来并停止了70年代和80年代的暴行，政局稳定，可以致力于发展经济了。

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把摩托车送去修理了。塔贝莎和我乘飞机飞到世界十大瀑布之一的伊瓜苏瀑布。

伊瓜苏河是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三国接壤的地方。伊瓜苏瀑布就坐落在这条河上，瀑布的景象是激动人心的：300英尺的落差使得飞流而下的瀑布重重地拍击着河水，并不断地在其水雾笼罩范围之内产生巨大的彩虹。像维多利亚瀑布一样，伊瓜苏瀑布使得尼亚加拉看起来微不足道。1541年

唐·阿尔瓦·努内斯偶然发现了它，而在此之前的几百年时间内，瀑布一直是南美部落的神圣的埋葬场。

瀑布从"魔鬼咽喉悬崖"之上呼啸而下，把我们笼罩在浓重的水雾当中。彩虹在水上呈拱形状，鹦鹉和鹰在浓密的绿色丛林上方徘徊。雨燕像石块一样飞速地钻入水雾当中去捕昆虫。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替尼亚加拉瀑布感到一点儿窘迫，我们大陆上的瀑布与这里的瀑布不可同日而语。我起先还以为一切都缘于那里的公关和宣传做得很棒，后来我意识到尼亚加拉的名声只不过是另一个来去匆匆的历史潮流的结果。

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北部是很繁荣的地区。那个时候是铁路而不是飞机表现着"流动性"这个词的含义。新富起来的人想见识新东西，而铁路恰好为他们提供了手段。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仅仅见识过尼亚加拉瀑布，那么你会觉得它很壮观，因此一个自我壮大声势的宣传活动开始了。铁路为招揽乘客而宣传瀑布，没见过世面的游客轻而易举就被打动了。更多的营销手段和舆论宣传最终使尼亚加拉瀑布成为——"尼亚加拉瀑布"。

但是像大多数事物一样，市场饱和了，瀑布的地位就下降了。交通技术进步了，使旅游者能飞到更远的地方。

尼亚加拉确实有一个突出景点是世界上的大瀑布所不能比的，但这一点对招揽更多的旅游者也没有什么帮助。在1月和2月，尼亚加拉结冰的景象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不寻常的冰层。在伊瓜苏瀑布你永远找不到冰雕，但有多少人愿意在2月份去布法罗呢？

距里约巴拉那20英里远处坐落着世界上最大的伊泰普水电站以及边境城市"东方之城"。这是个真正兴旺的城市，这一切都是因为花费了几百亿美元修筑大坝。附近的福斯—杜伊瓜苏白大坝建成以后，人口由3.5万增至15万。这是个完美的例子，说明企业家为修大坝而建的基础设施现在可以为游客以及任何可以利用它的工业而服务了。

伊泰普在当地方言中意为"唱歌的岩石"。它是巴西和巴拉圭共有的，作为两国分界线的巴拉那河就是电站的电力来源。它由世界银行贷款250亿美元建成。大坝宽5英里、高80码。工程历时17年直到前不久才建成，最后一台发电机刚刚投入生产，现在大坝发电能力达12600兆瓦。与它相比，埃及的阿斯旺大坝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而我们的胡佛大坝根本数都数不上。

塔贝莎认为看大坝是浪费时间，但因为我几十年来一直阅读有关它的信息，所以特别渴望一睹其风彩。它与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造的东西一样令人震撼，我所指的符合这种等级的东西，包括泰姬陵、印度的埃洛拉窟、复活节岛，马丘比丘和蒂卡尔。这是一个工程奇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规模巨大，包括自动滚梯和内部纵横交叉的狭窄过道的复杂结构。就像埃洛拉一样，一切都计划得井井有条并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才修建而成。它是现代世界的奇迹。

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然导游书中几乎很少提到这里，我却会向那些愿意欣赏这一体现着人类创造的美感和想象力的纪念物的人们乐此不疲地推荐、宣传它。

由大坝所导致的政治局势同样有趣。巴拉圭只有450万人口，却与人口1.55亿的巴西一样拥有大坝的50%。巴拉圭自然用不了属于他们的50%的电力，所以他们把自己90%的电力卖给了巴西以换取硬通货，然后用这笔硬通货偿还外债。有朝一日他们将会做得很成功。他们将看到良好的收支平衡，并充分地发展他们的国家。

我很清晰地认识到在20年之内可能产生的政治问题。当巴拉圭的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它可能想重新要回这部分本属于这个国家的电力，而巴西却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重要的电力供应，它或许会想出一条诡计来侵略它的小邻居，或对两国间的协议"重新商议"。因此，这预示着可能会出现违反协议的情况，或一国对另一国的轻蔑会成为侵略或重新商议的理由，而小国巴拉圭对此却几乎无能为力。



29

BUENOS AIRES

29. 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太已基本被我们甩在身后了，我们决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留几个星期。这个城市成为我们最心爱的城市之一。它充满能量，喧闹异常，夜生活热闹极了。城里的餐馆晚上9点才开始营业，甚至11点钟还有人携儿带女而来。白天黑夜的交替已恢复正常，气候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与赤道

的距离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几乎相同。

我们决定上西班牙语课。我一直认为西班牙语将成为21世纪的语言之一。自从我不那么忘我地工作以来，我心灵深处一直有个愿望：到拉美待6个月，学西语。

西语为什么将会如此重要？西半球的两大主要语言是英语和西语。中文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也将变得重要，但中国离美洲太远了。在下一个世纪，南美国家将会越来越具活力，越来越富，而我们所在的地理区域将会越来越不具有活力，越来越穷，这时将会出现西班牙语国家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是具有政治和历史缘由的，因为毕竟我们确实夺走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阿拉斯加和路易斯安那是我们买的，但这两州并不是。人们对这种劫掠的记忆是非常长久的，波兰、乌克兰、俄罗斯和匈牙利就是例子。如果要找我们还夺走了佛罗里达、亚历桑那和得克萨斯的证据的话，并不是很难的，这几个州都有很多讲西班牙语的人口，而且最后那两个州还与墨西哥接壤。说到底，墨西哥有一半领土现在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了。

育空和阿拉斯加是另一个极端——这两州是我们此行的最北端。这些地区将来发生变化的条件显然已经成熟了。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空想家想在他们那一地区创造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将由阿拉斯加、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艾伯塔省、华盛顿州、蒙大拿、俄勒冈和艾达荷组成。他们拟议把这个新国家称为卡斯卡地亚。从地理上来说，它将比欧洲共同体大。从年国内生产总值及2500亿美元销售额来看，这一地区现在位居世界第十大经济区。发现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讶。

这两省五州将会分离出去吗？也许不会，或不会很快分

离。这更多的是不断明确的地区特性问题，而不是政治家野心勃勃的宏伟设计的问题。这是群众性的革命，是变化中的世界的产物，是这一地区自己为自己选择的新方式。卡斯卡地亚是想象中的国度，在这里的居民摆脱了欧洲和东海岸思维的束缚，进而追求一种更自由、更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

在21世纪，每个民族都渴望更多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世界将会充满像卡斯卡地亚这样的新地区。

今后50年的历史主题将是国家的分裂和重组。加拿大将分为三部分，此外我想印度也将一分为三，可能分为印度、穆斯林和旁遮普；意大利将分为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巴西将分为南北巴西两部分。

在经历了70年的管理不善之后，拉美国家正在最终摆脱那曾经摧毁其经济的旧做法——把现在的非法毒品合法化。如果当这些国家真的做到这一点，这一大陆将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美国的拉美人将对我们说："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是我们的。你们以武力把它夺去，我们想把它要回来。你们歧视我们。我们的人民再也不愿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的国家是要垮掉的国家。他们想回来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富裕繁荣的。"这种熟悉的导致战争的挑衅语言将再次产生，矛盾进一步加剧。

人们的目标各有不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个国家保持统一，那么仅教授移民者的孩子其母语而不教英语将会是巨大的错误，这种做法只会酝酿分裂主义，而这是全世界纷争的主要起源。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些讲其父辈感觉最舒服

的语言的孩子们走到一起来，那么就应千方百计教他们西语、中文和乌尔都语吧。如果总目标是使我们现在谈论的所有政治实体生存下去并充满活力、取得成功，那么我们需要大家都讲同一种语言。美国是诸多移民群体的大熔炉」在像美国这种国家里，将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根线就是共同的语言。多文化主义——政治、哲学以及教学法运动——未来将导致美国边界的重新划分。你只需看一看讲法语的人都对加拿大的统一做了什么就会明白。

在过去的20年里，一种疾病在美国蔓延。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但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对劲。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并未改善。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水平20年间没有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大笔资金都投入非生产性用途，投入消费了，从而导致了巨额债务和货币在20年间的持续贬值。

所有这一切将会变得更糟，非常之糟糕，并将滋生分裂主义分子。没人设下计谋，没人渗透我们的社会，使其腐败，是我们自己把生存权拱手相让了。

没有人说：“好吧，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学校只教孩子们西语，使他们都能流利地讲西语，以此来强迫他们认同拉美文化。我们将拥有西班牙社区、西班牙体育运动队、西语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我们将等待30年或40年，直到艰难的时刻到来。然后我们将开始分裂运动，肢解并摧毁美国。”

虽然整个分裂计划并不会得到精心的设计，但事情将会如此发生。多文化主义将帮助我们把一切送给他们，永远在争取短期选票的政客将出卖我们的命运。

我们在迎合所有的人。在加利福尼亚，你可以得到用任

何语言填写的选票。在上一次选举时甚至有一小部分选票是用爱斯基摩语填写的。加利福尼亚的选票通常总会有 100 个修正说明，因此总得有人坐下来把那些复杂的文字翻译成俄语、爱斯基摩语、越南语、乌尔都语以及任何人所要求的任何语言。

美国人已被过去的 100 年惯坏了，被二战结束之初的几十年间我们对日本、德国这样的国家的一时的操纵而宠坏了，我们以为自己已不受普遍规律的影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认为自己不受普遍规律影响的人患了一种道德疾病，而这种被称为傲慢的病是非常致命的。

我并不是在试图表现自己有多聪明或多气愤；这只不过是历史。自从我们开始以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世界就一直是这样的。分裂主义是一切经济萧条时期的历史产物。多数人会有所行动来最大限度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他们一直这么做并将永远这样做。在这一进程中，新社会和新结构将会建立。他们所习惯的政治结构迟早必须改变以适应这种变化。

美国人很难相信这种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国家，甚至可使他们的国界也发生改变。他们不应有这种想法。国界和政府是会随经济利益而发生变化，而经济利益是常常改变的，正如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此外宗教、民族和语言的原因也会起作用。世界上任何国界都不可能历时几个世纪而不变，更不用说永远不变了。我们以为这次情况会不同，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示。

比如，一位投资者会说："这种股票垄断了市场，它将永远以每年 25% 的速度增值。"

我问:"那么那些带来竞争或替代的股票的高回报又怎样解释呢?"

"对,对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石油来说确实如你所说,但这次情况不同,因为(它的专利,管理,市场地位……)"——你自己继续填空吧。

其实,根据经济规律、历史规律、政治规律以及社会规律来推断,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有所不同。万有引力规律永远不会为照顾某个人而暂停,而这些规律虽然更微妙更复杂,却如重力规律一样严格。如果它们不具有普遍性,我们也不会称其为规律了。

"噢,可这里是美国呀,这里情况不同。"我总是听到人们这么说。

我希望如此,但不幸的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情况永远不会不同。每笔费用都要偿付。不管你是西班牙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或美国人,重力同样起作用,该掉下悬崖的总归要掉下悬崖。

我们报名上西语课。塔贝莎的语言天赋远比我高得多。我很懒,诵读又有困难,脑筋不灵活,或生来就对语音语调没有感觉——谁知道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我为太多其他事情而分心。我好像又重新回到了纽约的摩托车技工学校。我没有什么时间去上课,因为我在为股市以及旅行的许多细节问题而操心。

打电话是再容易不过了——西伯利亚和非洲当然毫无指望——因此我不断地与纽约通话,购买新债券,因为旧债券已到期了,或把钱转往欧洲。我们需要零部件和航海图导游书,

因此我致电纽约的祖德把这些物品空运过来。

我决定在新西兰股市做更大的投资。我寄给祖德一张支票先做记录，然后再寄给经纪人。虽然我每天询问情况，但这张支票却永远没寄到新西兰。我在心里分析着是再等几天呢还是把它撤销并重写一张呢。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哪有时间去上西语强化班呀。

而塔贝莎一天学六七个小时，她贪婪地消化着这些课程。她法语讲得很好，所以学西语进步惊人。

我在研究阿根廷股市。我见了股票交易所的主席、经纪人、财政部长以及律师，试图预测出这个股市是否值得投资。我感觉到经过几十年失败的尝试，这个国家已开始认识到国家在创造繁荣这方面的能力有限。报纸上说新总统和新财政部长已决心改变佩伦主义，因为正是佩伦主义把一切都国有化了，就像英国的工党所做的一样。当然，佩伦向穷人允诺政府将购买重要的工业和商业并解救人民，保证为他们提供工作。他印钞票，订规则，保证工作，保护经济。

你毋需对财经和政治太精通就会知道就是这种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政策毁掉了经济的发展。它使阿根廷陷入了长期的螺旋状下滑的泥沼。我真希望政治家们能够命令奇迹产生并保护工作，并有命令树上长钱的能力，但不幸的是世界并不能如此运作。加努特国王命令海洋退却，这么做当然行不通，而政治家保护工作以及经济，使之不受世界无休止的变化的影响之努力也同样行不通。也许在短期内将奏效——直到下一次选举——但绝不可能长期奏效。

在80年代晚期，阿根廷有几个阿合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0000%。货币政策完全崩溃了，货币极度贬值。

阿根廷在大萧条时期处境很痛苦。然而不像很多其他国家，二战也并未使它摆脱困境。胡安·佩伦允诺要拯救他的人民，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富有那样得意了。这也许是美国也将会发生的事情。有人会走过来"拯救"我们，他是另一个罗斯福，另一个将捞走所有选票的虚假的救星。我们将罗斯福神话成美国的救星，但多数人不知道，在1940年，这里的失业率仍高达16%，直到二战爆发，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扭转。

不仅仅是阿根廷从前的政治机构失信于民，就连那些将军们也名声扫地了。如果现在军队在阿根廷发动政变，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人民不会答应。

我所看到的情景令人高兴。这个国家似乎已吸取了教训。公众已经学到了我们美国人尚未学到的东西，这就是即使政府亲自交给你，也不会有"免费午餐"这种好事儿，一切费用都得偿付，不是现在就是最终。

我对在此投资感兴趣，因此问这些官员他们是否认为政府或整个国家将会回到过去的年代，重复过去的做法。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怀疑，"其中一人说，"谁都无法确切地知道政府这次是不是认真的——我们以前常听到这种说法。但过去每当他们实行货币控制时，你总可以转到街角去换钱。"当然，他的意思是指活跃的黑市。

"我们在谈论的可能是笔数目不小的钱。"

"你并不是第一个需要把很多钱转出阿根廷的人。我们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我不会帮助你，但有许多人会帮你。"换句话说，他在让我知道即使情形再次变糟，我的资本也不会砸在阿根廷。

我被说服了。政府已宣布将集中发展三种行业——电

讯、旅游和采矿——这三种产业对阿根廷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是极有意义的。阿根廷将对这三种产业减税，而这几个行业并不享受政府的投资或微观管理，这将为它们带来繁荣。非常可悲的是阿根廷的矿业极不发达，因为在阿根廷，地主并不拥有其土地的矿产权。拥有750000英亩养牛场的场主都不能在其土地上采油或开采黄金和钻石，因为他们没有矿产所有权。这就是典型的佩伦的做法。当然，结果是一切都得不到发展。

阿根廷满足我的两项基本投资标准。第一，变化即将来临——我在这个国家已几星期了，我可以看到这一点——第二，投资仍然非常便宜。现在，一旦钱将被投到这三个产业或其他产业中，股票将高涨。我想买最大的公司，因为当市场行情看好时，各种金融中心机构将表示有兴趣并建立特殊国家基金，成立地方办公室，在股票交易所买席位，并在全世界宣传阿根廷。这些大机构将买下最大最强的公司，并进一步把其价值抬高

我研究了市场，买了19种股票，这些产业都是我觉得有发展前景的，这些公司都有极好的收支状况，可以保底。

“噢，又看到它了！”塔贝莎抓着我的胳膊大叫。

她指着一家珠宝店橱窗里的一条金项链，原来这条项链与她在伊瓜苏瀑布的一家高级珠宝店所见的、令她爱不释手的那条是同样的。金项链由中等大小的金链串连起来，上面镶嵌着20多种绿色、红色、蓝色和黄色的半宝石，设计风格整洁、现代。我们走进珠宝店，她再次试戴。

12月份就到她的生日了，我很想让她高兴高兴。我在当

天下午溜回那家珠宝店买下了那条项链，希望能给她一个惊喜。

从店里出来，一路走一路问自己到底该怎样把它带回家去。我不想带着它在剩下的15个边界地区穿梭，因为不断的边界检查极有可能让她发现金项链。我不相信阿根廷邮政局，因此我安排了信差专门送这条项链。

我们现在离美国5000英里远，我们开始计划回家的路。我们知道已走过了南美洲最容易走的部分，在我们北边有许多国家，包括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巴西，我们将经过霍乱区，体验内战，并将与土匪、贩毒者以及与贪婪的警察和卫兵打交道，当然，还有糟糕的路况。

在穿越美国时，你可以与来自旅游机构的导游商议行程，并能得到有关路途和可能遇到危险的准确信息。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不同渠道把整体情况东拼西凑起来，就连找张地图也相当不易。

有两条路线：沿东海岸或西海岸北上。东海岸的绝大部分都是巴西国境。而走西线我们将能看到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简直就是南美文化的一个横截面。此外，我想看一看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因我有意在其中几国投资，即使这条线也会使我们遭遇游击队、毒品战争、土匪和疾病。

大家都只知道泛美洲公路，连当地的旅游俱乐部对其他路线也所知甚少。在伊瓜苏瀑布的巴西汽车协会有一张全国地图，我诱使他们把此图卖给了我们，但他们不知道怎样从巴西驾车前往如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这样的在他们眼里是怪异的

地方。这种对旅行情况的无知恰恰是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会碰上的。

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并不比这多多少，但我们决定西行去圣地亚哥，然后再沿西海岸北上结束此行。我也希望去看看复活节岛、马丘比丘和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些都是长久以来我在书本中读过而又特别急切地想去看一看的地方。

从巴西出发去这些地方将会很困难。其中一方面原因是我们很害怕"光辉道路"，这里的游击队似乎对任何与秘鲁政府当局有关的人和事都增加了打击力度。我们决定在沿途每个秘鲁领事馆都做停留以掌握有关动态。如果秘鲁的战争越打越酣的话，我们总是可以进入巴西。

最后，在7个星期之后，终于到了该离开阿根廷去乌拉圭的时候了。我们真不愿离开这里，因为我们喜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气氛、当地的人们和充满着的活力。

蒙得维的亚被誉为南美的瑞士，真是名不虚传。这里有为数众多的外国银行，包括瑞士、荷兰和德国的银行。人口仅300万的袖珍国乌拉圭仍然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巴西和阿根廷希望它存在，更确切地说，它们需要它存在。南美的所有人都需要一处金钱的避难所，就如同欧洲国家都需要瑞士一样。在养牛带来的繁荣消失之后，乌拉圭损失严重，它此时必须调整自己并把自己变为强大邻国们可以藏匿钱财的地方。当拉美国家坚持实行货币管制时，乌拉圭的邻国们将盛满现金的公文箱投向了乌拉圭，从而使其继续存在下去。

今天，实行管制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价格低廉的机票、越来越多的旅行、电汇以及采取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都使得人

们可以回避管制。今天的各国政府要摧毁国际贸易吗？如果实行外汇管制，我可能只用美元买瑞士手表，然后在德国卖表以换取马克，而我可能把这些马克留在慕尼黑。全球贸易日渐兴旺，而各国政府又意识到各国都需要国际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外汇将比过去难得多。

乌拉圭满足了一个基本的人类需要，在此，人们可以保护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产。如果这个国家不存在，南美人也会创造出另一个这种地方来藏匿现金以防被其政府没收去。也许随着南美限制的放松，这个地方将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各国所需要和利用，但乌拉圭将仍然从其邻国的繁荣中受益。

实际上，这里没有股票市场。我想找个经纪人替我买一些股票，但有几个经纪人畏缩不前，因为市场不活跃并且没人愿意为股票操心。这一切反而刺激了我的胃口，使我愈发想得到它们。我最后找到了一位愿意帮忙的经纪人并开始买股票。

我们穿越乌拉圭中部，这个国家的景象使我们感到愉快。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再次进入阿根廷并驾车前往圣地亚哥而穿越整个大陆。我们经过了一些小山丘以及与世隔绝但很友好的城镇。一路上看到很多羊。这里的人从没见过像我们这样的骑德国摩托车的美国人。路上不断有旧车驶过，很多都是20年代人们在过好日子时买的，并一直小心地维修到现在，因为没人买得起一辆新车。

像往常一样，在通过边境的几天前我们就开始查地图，琢磨在哪里过境最合适。美国人已习惯了到墨西哥和加拿大旅行，他们以为边防都是一样的，中央机构发布命令，边防哨兵

执行命令。而事实却远非如此，通过边防检查站在各地是极为不同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向其他旅行者咨询，借鉴他们的经验，并查对导游书以寻找最合适的过境地点。我们总会选择那些旅行者常来常往的边防，因为在这些地方若延误过久就会招致许多旅行者的怨言，并且这里的卫兵对应付外国交通工具和过境驾驶执照很有经验。

我们选择了科隆过境点离开乌拉圭重新进入阿根廷，导游书上说这里过境比较容易。通常我们会留出一天时间过境，但我们在阿根廷曾逗留过几星期，于是我们午后抵达边境，盘算着能在国境那边的科隆过夜。

“等一等，”卫兵说，“这两本过境驾驶执照写的是同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驾驶两辆摩托车。”

“不是，”我说，“这些是我的驾照，这两辆都是我的摩托车。这是我夫人，我们在环球旅行，你可以从这些图章上看出我们已去过这么多国家了。”

他看我的神情就像一个乡下佬知道一个城里人在欺骗他一样。“罗杰斯先生，你不能驾驶两辆交通工具，难道不是这样吗？她开你的交通工具必须得到许可。”

“那好，她得到了许可。我就站在这，我允许她开我的车。”

“不，不，我们必须看到书面许可。”

“好，我这就写。”

“不，你必须出具由使馆公证的特别许可。必须一式四份，还得有大使签名。”

“你说什么？”我说，我终于冒火了，“我们已到过阿根廷。我们已驾驶这两辆摩托车到过这个国家一次。我们在阿根廷

从南骑到北，在这待了7个星期，一直没出过问题。”

我指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边境机构盖的图章，心里想起这个国家的人有悠久的喜欢受贿的历史。当我们把摩托车空运过来时确实填写了无数表格文件，填得脑子都木了，这使我明白，若干规定在怎样窒息着这里的贸易啊。

“我们能不能付某种特别的费用来解决此事？”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看一看贿赂是否能行得通时的最佳措辞。我憎恶行贿，可我不会让几个钱耽误我们几天的行程。

他不屈服。我要求见他的上司，蒙德斯下士夸张地、疲倦地摇着头，表示同意他的下属的意见。“在全世界都必须出具这种许可。”

“全世界！”我说。“我已环游过世界。我到过40个国家，也包括你的国家，从来也不需要这种许可。”

“当然，但在拉美任何地方都需要。”

“我到过乌拉圭，我也到过你的国家，我从来也没需要过它。”

在一小时的争论之后，蒙德斯下士仍不肯让步。他说在乌拉圭的派桑杜有阿根廷领事馆，在那里或许可以拿到会让他们满意的文件。

我们发动了引擎。这时，塔贝莎说：“吉姆，今天是星期天。领馆星期天开门吗？”

“上帝才知道。我们去看看。”

领馆开门，这真是奇迹。那天正是阿根廷的选举日，阿根廷公民要依法参加投票，因此领馆开门以方便那些在国外的公民投票。

我们找到一位年轻的总领事劳尔夫·桑托斯，他去过世界

上许多繁华大都市，显然是一位年轻的外交领域的有为者。他带着8岁的女儿胡安妮塔下午在领馆处理选举事宜。他已在这个职位上做了几年了，他的以及他夫人的父母可以常从边境那边过来看望孙儿孙女。

在闲聊中我们感到他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在领馆举办艺术展，做一切促进国际关系的事情。这是个小领馆，因此他身兼数职。比如，当阿根廷人在往返巴西的路途中，由于发生交通事故而丧生时，他得返回阿根廷去买棺材，因为乌拉圭的棺木——全木的而不是木加铅的——不能通过阿根廷卫生标准。甚至阿根廷的棺木制造者也有自己强有力的行会。

"关于那个边防站，我们已听到过无数怨言，"他的英语比我好。"我们过去看看，我不直接领导他们，但理论上他们应向我们这里汇报工作。"

我们这位新朋友把胡安妮塔塞到前座上，就开着他的车往边境去了，我们骑着摩托车紧跟着他。他耐心地而坚决地与卫兵争论，但没起作用。

"我不想丢工作。"蒙德斯下士说。

劳尔夫在外面对我们说，"我夫人和我甚至到这里来给这些家伙做过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就是想和他们交朋友。"

"我们怎么办？"我问。

"你需要一份经过公证的许可，"他说，"这就意味着在星期天去找一位法官出具证明文件。"

我们请他帮忙。他说，首先我们得找位律师，因为像我这样一位小人物用英语手写许可是不够的。这份文件必须是西语的，而且要措辞正确，打印出来并由法律官员封口并盖章。

劳尔夫打了一些电话。他找到一位法官，去他那儿开车

要半小时。这位法官愿意放弃星期天下午的休息，但我们得交费。

在法官家的办公室里，我们提供了一切必要信息——护照号、车牌号、驾照号，一切我们能想得出来的号码。为了以防万一，我甚至允许塔贝莎驾驶我的两辆摩托车。我向法官要了多余的备份以防在北边再次遇到这样的事，每份文件都必须盖章封口。我们为此花费了几百美元。

几小时之后我们和劳尔大回到边防，骄傲地把闪光的新文件交给蒙德斯下士。

他把我们的登记表、驾照、护照和过境驾照仔仔细细地审视着。感谢上帝，我没把那条金项链带来。我永远不能保证塔贝莎在这种检查过程中看不到它。

“我们不能给这些过境证明文件盖章。”蒙德斯下士最终说。

在随后的争论中我们发现，他并不知道过境驾照是什么。这个边防站太偏远，蒙德斯下士和他的下属是那么地缺乏训练，以至于他们从未见过这种东西。让导游书见鬼去吧。

我们自己以及总领事都各自解释了几遍，如果他在这种证明我们的摩托车已进入过他的国家的证明文件上盖章，对他的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失。事实上，如果我们离去的时候过境证明文件上没有再盖章的话，他的国家也许会挣几十万比索。阿根廷届时可以自动向英国的皇家汽车俱乐部提出申请并得到车辆的全额进口税。

没有海关过境通行证明，谁也不能驾着任何车辆周游世界。想象一下，在阿尔及利亚入境时，必须寄相当于2万美元的第纳尔以保证当你在阿尔及利亚时不把摩托车卖掉。在阿

尔及利亚另一边出关时，你也许会收到你的20万第纳尔，或者官僚机构会拖几星期、几个月或几年才寄给你一张支票——当然是以第纳尔计算的。那么，你又如何对付尼日尔？还有尼日利亚、扎伊尔和博茨瓦纳？

“我不在乎阿根廷人能得到几百万比索，”蒙德斯下士说，“我只关心我的工作。”

劳尔夫又对他做了一番工作，之后他说，“先生，这里有份我要填的表格，是关于一辆交通工具进入国境的。现在，如果我在这份海关证明上也盖章，我就等于证明这辆车已两次入境了。”

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我指出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能怎样呢？”我又加了一句。“这只不过是关于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格罢了。”

蒙德斯下士看我的神情就像一个大人看一个问了一个特别愚蠢问题的小孩子一样。“先生，这只有一辆摩托车。”

我很愤怒，我想干脆让他在他那份表格上盖章，然后我们只带这份东西进入阿根廷算了，但我又担心，在国内某处或离境时被拦住。他不懂何为海关过境证明，但可能遇到的其他十几位警察却懂。或许蒙德斯下士可能玩一个更有技巧的游戏——让我们只带着他的文件入境，然后叫一个他在路上的警察朋友拦住我们检查海关过境证明，他们两个人间再均分一笔数额颇丰的贿赂。

最后劳尔夫打电话给卫兵的上司，海关和移民处的头，这是在星期天的晚上给他家里打的电话。他的影响力还能起点作用。桑切斯先生答应见我们。

塔贝莎留下照看摩托车和装备，我钻进劳尔夫的车，我们

驶向科隆。

我们先就在星期天晚上来麻烦桑切斯先生致歉，然后我们坐下聊天。虽然我累得像散了架--样，但还得给他看我们环游世界的路线图并讲几个有关我们历险的有趣故事。我见了他夫人和孩子。随着拉美式闲聊的继续，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我很不耐烦但也不掩饰这种情绪，真想在这糟透的城市里找家旅店歇下来。

劳尔夫解释到，他在世界上很多首都都工作过，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罗杰斯先生是位博学的教授，他环游世界也从未遇到过这种问题。他小心地暗示着，如果这件事得不到妥善处理的话，阿根廷的形象就显得是太落后了，并将会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柄。

最后我取出过境驾照海关证明。劳尔夫和我立即明白桑切斯先生也不知道海关证明为何物。我想如果乌拉圭人进入阿根廷，他们只需在边防填写当地的表格就够了。

最后劳尔夫想出个主意来解决"两个文件--辆车"的问题。士兵为什么不干脆把两份文件用订书机订在一起呢？

对这--主意的愚蠢性我几乎要抱怨出声来，但桑切斯先生认为这个主意太棒了。他写了一封信指示他的属下照此办理，也就是实际上把两张纸订在一起做成一份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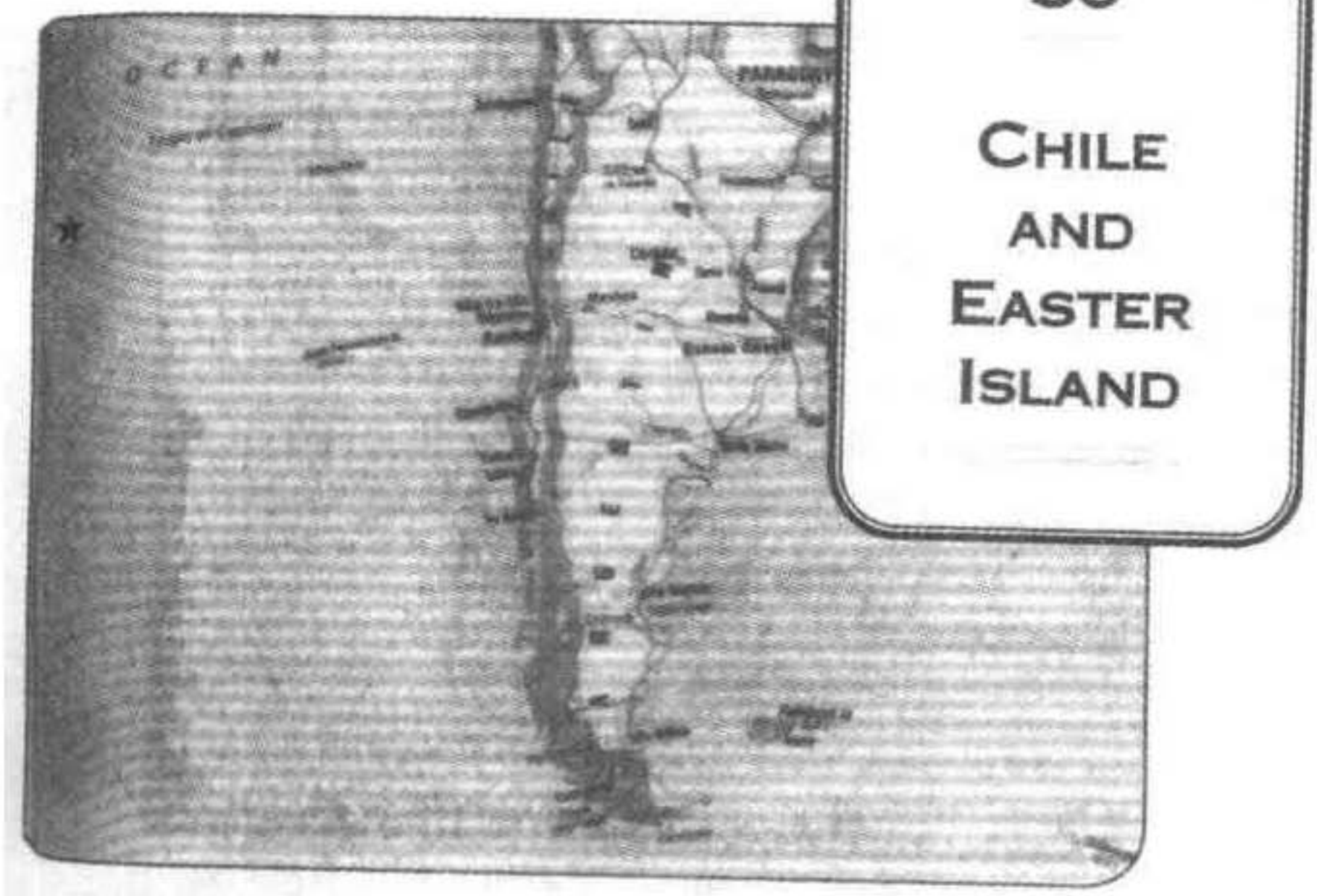
在握了--大通手和说了一大堆互相祝愿的话之后，我们返回了边防。此时已快 10 点了。

我认为这种方式不能起什么作用。把两张纸订在一起？难道没有一种蜡封能把两张纸封在一起吗？是不是还得有位法庭官员用流畅的西语写--封经过公证的信来说明这 -程序？那将得再耗费多少小时，再花费几百美元呢？

最终还是老板的指示起了作用。蒙德斯下士极快地把文件装订在一起，这一场历时 10 小时的过境争执终于宣告结束。

出了检查站，塔贝莎和我对劳尔夫许下了旦旦誓言，我们交换了地址，请他下次到纽约时一定告诉我们。并将随身带来的几张印有苏珊·B·安东尼头像的美元送给他两个女儿和他们夫妇以作纪念。

午夜时分，我们到达科隆的旅馆，我们躺在床上的感觉很少像现在这样好过。



30. 智利和复活节岛

CHILE AND EASTER ISLAND

离开阿根廷前往智利的路上，我们看到安第斯山系在六七十英里远处安然耸立。广阔的葡萄园在我们周围的大草原上伸展着。

离山里越近气温越低。每隔 200 或 300 码远就竖着高 4 码的深度标桩，标示着这里下的雪曾经达到的深度。

绕过合恩角

在约6000英尺高度时，天开始下雪，但我们没有停留，唯恐被大雪阻住。到下午四五点钟时，我们到达了蓬特—德尔印加。我累坏了，但还得继续前行，这样才能躲过那有可能来临的暴风雪。可我们很想在安第斯山里住一夜。现在我们已到达差不多10000英尺高度，路边有不少滑雪旅店。

我们发现了一处过夜的好去处，所以如果我们一旦被大雪阻住，那也不会是世界上最糟糕不过的事。在旅馆，他们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上山的道路将会被清扫干净的。即使有暴风雪，我们仍然能赶路。

第二天，阳光灿烂，我们在世界的最巅峰行驶，这就是当时的感觉。在10000多英尺的高山上，我们在水晶般清澈的山里领略着阳光、空气和白雪。我们穿越安第斯山，幸运的是并没费什么劲儿，却让人感到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所以我们在两天内就骑上了世界的巅峰，高高地站在山顶上，倍感欣慰，那感觉与在西伯利亚或撒哈拉完全不同。结果这次安第斯山之旅成了我们最成功的旅程之一，就像夏天骑摩托穿越山里一样简单。

摩托车发出“嗡嗡”的轰鸣，我们渐渐明白应该小心影子，因为这些影子后面通常隐藏着大块大块的冰。我穿着电热背心，塔贝莎扭开了她的车把手的加热开关。冷空气包围着我们，这些措施都是重要的，它们提供了生理上需要的温暖和心理上的舒适。其他能使我们保持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的东西就是硬糖了，这些小糖块中的糖分能维持我们正常的新陈代谢，加强我们的注意力。

最后，我们离开了阿根廷，在检查站只用了两分钟就解决

了问题，不像入境的时候用了 10 小时。你猜到了：那里或者以后都没有人拦住我们查“许可文件”。

现在我们到了无人之地：阿根廷和智利边防站之间的那几里长的一段距离。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常以为边防站总是背靠背的，你一离开美国就得与加拿大人或墨西哥人打交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边防检查站通常相隔几里，中间只有一块孤立的小牌子告诉你，你已越过边境。政府不愿在特别偏远的地方设边防站，卫兵也不愿在那种地方工作，况且在沙漠或山区可能还缺水。从阿根廷离境的人只能走一条路，这条路一直通往几里之外的智利边境。

我们利用这一段无人之地换车牌照。我们用新牌子和新号取代了从美国带来的旧牌照。为此我们得换新的过境通行许可文件。就像我们在北非所做的一样。有个当地的小店可以选择合适的号码造出新牌照，牌照的颜色当然是阿根廷当地的颜色。因为前面还要经过几个交战区，我们不想让人轻易认出我们是美国人。出入境的过境驾照通行许可文件中的登记和车牌照号必须吻合，因此在边界也得做些改动。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得预先计划，谨慎安排，周密考虑好每一步的细节。

关于新智利和智利奇迹我听到过很多，我急切地想亲眼见识一下。我得到的第一个警告就是智利人很严谨很严格，这一点在过境检查时就体现出来了。他们似乎只想弄清楚我们没把水果或蔬菜疾病带入境。我不喜欢这样的耽搁，但至少防止植物疾病符合智利的利益，因为农业是其主要产业。



塔贝莎翻越安第斯山从阿根廷来到了智利。此次旅行中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强盗、战争、流行病和野生动物

边境检查让我想起了那串项链。它邮到纽约了吗？我不断提醒自己要问问纽约家里包裹是否已寄到了，但我一直忘了问。

过了境几里路就是铺过的一条平坦笔直的路，雪已被铲掉了。我们飞速向前行驶，飞快地掠过两旁的山峰和积雪。

虽然没有任何迹象出现，我们却突然遇到了一段几英寸厚积雪的路。几辆正在犁路的推土机向我们压过来。我们一寸一寸地向前挪，非常小心地不让车轮打滑。塔贝莎像往常一样走在前头。

两辆推土机从两旁夹住了她，并向她的摩托车逼近过来，我吓坏了。我大喊。他们要么没看见她，要么就在玩一个奇怪的捉人游戏。我大叫着警告他们。

她扬起拳头向他们挥着，骂了司机一阵，她的头盔随着她的动作前后晃动着。路很滑，如果她一时心里发慌导致车轮打滑，她将被这些庞然大物的"厂当"作响的钢制轮胎轧在底下。

她从夹缝中挤了过去，滑着逃出了险境。又向前行了100码，她把车停靠在一边，回过头用英语说了一句：真见鬼了。她挥动着两只拳头愤怒得直发抖，大骂他们差点儿杀了她。

我感到欣慰、骄傲、胜利和钦佩。我立即理解了那天晚上我们终于抵达伊斯坦布尔时的喜悦。我的女伴，她是一个出色的英雄！

在圣地亚哥看到的景象立刻使我们相信这确实是南美最繁荣的国家。在智利，大家都能注意到智利的经济与其邻国经济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是现在的智利与20年前的智利之间的差异，那时的智利是个完全瘫痪的空架子，而现在的智利货币甚至与美元的比价也在升值。

我搞到了每周一次飞复活节岛的航班的最后一个座位。塔贝莎没有去，她想留下来休息、采购。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去找一些我需要的地图和导游书，发份电报。买股票的那张支票仍未抵达新西兰，她会去取消这张支票，寄一张新支票给纽约。

复活节岛是一个约65平方英里的三角形的岛，三面各有一座死火山包围着。火山当中有一个湖，湖边满是野草，土壤是由冷却的岩浆形成的火山土。我在想最初的居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这里距离智利2300英里，与任何亚洲板块的

距离都有8000英里，与其最近的邻居、西边的皮特凯恩岛也有1300英里。

当然，复活节岛上最令人震惊的景象就是那些巨大的头像了。差不多有1000个左右，都是在火山岩上以几乎相同的风格雕刻而成的，许多头像重达20吨，高达10～20英尺，最大的头像重90吨，高32英尺。主要的差别在于有的是短耳朵，有的是长耳朵。

自1722年此岛首先被欧洲人发现以来，这些神奇的令人困扰的头像，这些临海而立带着忧郁傲慢表情的头像，这些立在巨大的祭坛上的石像就已经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生存下来的几千岛民住在茅草棚里，靠稀疏的植物艰难谋生。由于多年的内部争端，他们的生活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战争和食人是很平常的事，或许这就是早期人口压力和蛋白质短缺的结果：他们甚至不记得头像背后都有些什么故事了。

是谁刻了这些头像？为什么刻了这么多？它们是怎样被不远万里运到这临海之地的？这些沉重的独石是怎样站起来的？那些红色的顶髻，那些重12吨用红色火山石刻成的单独的石刻是怎样被搬到头像上的？一个距南美大陆2300英里之遥的岛屿是怎样开始有人居住的？

玻利维亚和其他南美国家的古老石刻艺术与这里的头像和祭坛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我确信岛上的居民一定来自那里而不是来自亚洲或波利尼西亚群岛。南美洲周期性的地震所产生的海啸可以远远地波及到这个岛屿。

我猜测南美人的一支部落在一次航行探险中，也许为了逃避地震的余震吧，被这样的海啸漂送了2300英里，最后来到这里，而这里就成了他们的新家。

这里最大的一个平台支撑了 15 个巨大的石像。一直到 1960 年，它仍然完好无损，可是一次海啸后，它被弄得面目全非了。

在一个火山附近是一座不小的城市的废墟，但现在所剩下的却只是四散的岩石，没有任何线索能说明石刻为什么到此就停止了。科学家们估计，就像他们对撒哈拉的情况进行估计一样，几百年前这个岛上被树木和浓密的植物覆盖着。

这与金字塔一样神秘莫测。科学家计算了一下，为雕刻、运输并将这些石刻艺术中最大的重 90 吨的头像帕罗竖立起来，大约需要 23 000 个人日，将近 75 个人年。帕罗仅仅是这种石刻的 1/1 000。如果完成一件普通的头像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么雕刻 1 000 件就需要这个小岛贡献出 2.5 万个人年。雕刻祭坛和那些红色的顶髻又需要多久呢？

300 件头像在拉莫·拉拉卡山中正被刻到一半，这座山是头像最初产生的地方，而这时雕刻匠们突然停止不做了，他们的作品有的刚开始，有的已快结束了，就这样原样冻结在那里。雕刻完毕之后，这些头像的背部将与山体分离并被运下山，有时要运至 15 英里之外的地方，竖立在专为此目的而建造的石头祭台上。

这些采石场里的以及运输途中的石像还未被刻上眼睛，因此被称为盲巨人。考古学家猜想是否要在这些石像被运到面向大海的位置之后才刻上眼睛，让它们在最后才能看到这个世界。

我猜想刻头像的人们一定生活在极度繁荣的时期，因为在某一刻他们刻了无数作品——在我看来这就像失去控制的牛市。一个贫穷的社会毕竟无法发展这样宏大的艺术。这个

小岛通过某种方式积累了足够多的我们所称的资本，为它的岛民奉献了这些必定是地球上最大的艺术工程之一的石像。可问题仍然在于，在一个方圆65平方英里的岛上能有多少繁荣呢？

随着繁荣的势头越来越旺，所刻的石像也越来越大。在进行雕刻的采石场里，一些头像比完成的头像要大两倍，总长甚至达21码。我猜当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雕刻工作停止时市场已经饱和了。是因为饥荒、地震、海啸、疾病，还是因为内战？

根据古时流传的故事，由于一场战争使得这一一度辉煌的文明沦落到原始的状态，岛上的两派长耳部落和短耳部落悉数死亡。发生在一个6.5乘以10英里的没有出口的方圆区域之内的一场大决战——而今天甚至无人能想起它爆发的原因。疯狂而又荒谬的一场战争。

然而陶醉于权力的政治流氓在酒吧里爆发的另一场星期六夜晚的争吵不仅会毁掉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会毁了他们家人和朋友的生活。

几百年之后所有这一切将无一幸免于难，正如其他世界奇迹的消失一样。

在圣地亚哥，我看到智利是个中央集权观念和资本主义观念之间的战争的完美的实验室，而且这场实验几乎已完成了。在经过了中央集权的极度管理不善之后，智利已经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的经济转变，结果其经济突飞猛进，出口急剧增长。它是第一个进行深度结构改革的南美国家。经过15年的努力，成效显著。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集权政府从1970—1973年间统治智利。他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标志是四位数的通货膨胀以及由基本必需品的短缺所导致的每日示威游行。在这样的经济崩溃期间，智利多年来的就业状况糟糕透顶。如果有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处于困境，似乎注定永远要遭受扎伊尔式的贫穷，那么这个国家便是从前的智利了。

阿连德在1973年的流血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把600家被没收的公司还给了前主人，并把部分国有经济私有化了。在他长达17年的统治过程中不断出现严重的践踏人权事件，死亡和失踪人数达到2000～3000人。

他的政府在1976年实行了自由市场改革，建立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提高了利率。每当一个财政状况极糟的家庭、公司或经济正视现实并吞下苦药时，最初的阶段总是极端痛苦的，正如智利所采取的这些步骤一样。这是智利从几十年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管理不善走向恢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历。海外产品价格更为便宜，而智利产品却更为昂贵。现在国内生产厂家必须学会竞争，否则就被淘汰出局。到1982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许多效益差的公司破了产，这是使一个国家更具竞争性的努力中必须经历的时期。

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财政部长努力实行了一些稳健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国有企业被卖掉了，政府降低了进口关税，解除了经济管制。公司被迫在全球竞争，否则就没有活路。政府以强迫性的个人退休账户取代了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储蓄计划在一些亚洲国家已实施了几十年并创造了巨额投资资本，效果显著。国家对私有企业的补贴

被取消。允许利率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而工资由劳动力的供应情况来决定。

15年来采取的这些强硬的经济决策取得了重要成果。出口额由1985年的40亿美元猛增至今天的100亿美元。自1984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6.5%的速度增长，进入90年代更以10%的速度增长。政府自1990年以来在增加了卫生、教育和住房开支的同时还有了大量结余。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内增至360亿美元，翻了10倍。失业率从1982年的20%降至今天的4.8%。人均收入将近3000美元，与韩国和葡萄牙并驾齐驱。智利甚至与其主要贸易伙伴日本也有贸易顺差。这个国家已成为南美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典范。

各政党、工会、军方、教会、大学以及企业界都关心这一新的民主制度，这一点很重要。成为一位商人，拥有财产，建立公司，创造工作机会，甚至获得财富都是受人尊敬的。

我们到处看到繁荣景象。普罗克特·甘布尔、百事可乐、比萨饼屋以及肯德基家乡鸡这样的美国公司投入了巨额资金。专门食品零售公司奥本·佩恩和巴斯金—罗宾正计划开直销店。智利商人也到邻近国家投资。但并非仅是富人和管理阶层从这样的兴旺中受益。电话现在很普及，面向工薪阶层售便宜商品的仓储店纷纷开张。

智利可能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发达国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并未得益于中央集权、国际货币基金或联合国的计划。这一切的发生是由于政府不再拖经济的后腿，它放松了管制，允许国民充分施展其搞好经济的自然本领。

同样重要的是智利人实现这一转变所花费的时间。智利

在中央集权的草堆里打滚时丧失了很多机会，它的经济发展停滞了多年，这个国家需要重建的东西太多。智利的转变花费了15年时间，也许还可能更长。现在的人们都愿意看到结果，但不幸的是经济并非二三年之内就能转变。

无论如何，智利做到了。如果拉美其他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不能像智利一样把经济搞上去，那么这些政府对人民可就得有一大堆的解释工作要做了。

自然，智利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把其股市的价格哄抬了上去，成为头版新闻。

而我多希望5年前能到这里来，那时我就能投钱进去了。因为当股市成为头版新闻时我通常是不投资的，在这种时刻我会卖空。然而智利的增长太强劲，结构状况也太好，是不可能卖空的。股市也许会暂时滑坡，但我敢打赌，它还将在很长时间保持高涨。

智利终于在几十年来第一次呈现出如此的民主和繁荣。

智利极大地减少了贫穷，对此我更感到不胜惊奇。政府和联合国所颁布的数字表明在过去的3年中，政府通过广泛的繁荣计划使贫穷人口从520万减至420万。为了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准，智利政府做了更大的努力。努力之一即是为小公司注入资本。在最贫困地区，政府可以为诸如缝纫机厂这样的微型公司提供小至350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使得家庭能够购买机器并从负担过重的厂里承担一部分计件零活。像这样的许多以一间空闲宿舍为厂房的微型公司效益惊人的好。它们的员工占整个劳动力大军的40%以及全国特贫人口的80%。

在美国，正如你在一个饱受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国家里所能期待的那样，把计件零散活包出去是非法的，这样一来妇女就无法在挣钱的同时照顾孩子。理由是这些妇女的利益必须受到保护，她们不能与罪恶的工厂主做出自愿的安排，这些厂主会暗中利用她们。事实是工会通过一项法律来保护工厂的工作，它们有能干的游说者能保证这项法律一直生效——否则工会就威胁不投立法者们的票。而带孩子的妇女没有工会，没有游说者，也没有能力以选票做筹码。

此外，智利政府还为数千名优秀生提供奖学金、书费、伙食费、交通费，提供诸如自行车这样的奖励。同时，政府的工作——研究计划为那些雇用学生并为学生提供带薪在职培训的雇主们提供补贴。当这一计划开始之时许多人以为孩子们不会感兴趣，但很快这一计划就显得供不应求了。

虽然圣地亚哥一片繁荣景象，但它也不失为是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它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虽然严格的法律每天禁止一些车辆上街，但烟雾仍很重。

通常我会在下午给纽约办公室打电话。有一天为了核实一批晚到的货我没有在通常的时间打电话。祖德不在。只有临时的会计萨利在。我感到奇怪。祖德并没说他雇了人做他的工作。

“我应怎么处理这笔转给祖德的 8000 美元的账?”萨利问道。

“什么 8000 美元的转账?”我问。

“他从你的经纪账户中挪走的 50000 美元贷款又怎么处理?”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不需要喊叫,罗杰斯先生。我听得很清楚。”

我冷静地解释道:“我从来没同意过给祖德贷款。”

我完全警觉了,于是给德比瓦思·普林普顿公司的巴巴拉·罗宾逊打了电话,她是我在纽约的律师。

“你能打电话真好,”她说,“但你慢点儿说。”

我给她解释了这件事。

“我可以马上过去看看。”她说。

“千万过去看看。”

“他知道我们要过去吗?”

“不知道,我还甚至从没见过他。你也许最好带个卫兵一道去。”

“马上就去,”她答应道,“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我让他们一到你的办公室就给你打电话。”

我在旅店的小房间里踱来踱去。50000美元的贷款!还损失了些什么?所有那些借口——关于海运服务,在迈阿密丢失的包裹,关于他说的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那些借口,他的报告中那些对不上号的小细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还“贷”给自己多少钱?他不可能从我的经纪账号里拿钱出去——难道不是吗?他有多聪明?他没有取钱的签字权——但假设他伪造了我的签字呢?在法庭里我或许能打赢与经纪公司的官司,但得和他们的保险公司打一场拉锯战。我不仅会被剥夺钱财,而且他所做的不管多愚蠢的投资也可能搁浅——甚至现在可能正在贬值。而我却在满世界闲逛,以为自己根基足够稳,可以离开几年不去管生意。这个家伙——我的上帝,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雇员——却可能让我破了产。

我做了什么？我怎么能这么笨？这是我嘲笑别人会犯的那种初级错误。不仅毁了我的旅行，而且可能连我自己都毁了。我也许会中途结束旅行，带着摩托车飞回纽约去把这场混乱理出个头绪。

电话铃响了。

“吉姆，”是巴巴拉，“我在你办公室。你要我做什么？”

“情形怎么样？他拿了多少？他在哪儿？”

“慢点儿，一次讲一句话。我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在那儿吗？”

“不在，会计说他今天上飞行课。”

飞行课？他应该是我的全日制雇员。他是想用我的钱飞往墨西哥或南太平洋——用我的钱？

“吉姆，你在听吗？”

我要让她做什么？我担心的不是音响或空调。假使丢了什么东西巴巴拉怎么会看出来呢？

“账本，”我说，“查账本看是不是有可疑的交易。那笔50 000美元的贷款就是个例子。查查祖德是否给自己贷了更多的钱。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贷款，是不应该有的。”

被查问到不寻常的交易时，萨利说她不明白当我在南美的时候是怎样用信用卡在长岛买了音响设备的。

“这地方一团糟。”巴巴拉一小时之后又报告，“桌上杂乱地堆着纸张、账单，档案也放得毫无秩序，差不多都没归档。我们不知道哪些账付了哪些没付。”

“祖德还没回来？”

“没有。这里还有几张支票是给一个新西兰的经纪人的。拿这几张支票怎么办？”

他一直手里押着那丢失的支票？他没把第二张支票寄走？他有什么计划——设骗局卷我的资金逃走？

“我要解雇他，”我说，“我要封掉那间办公室，他就进不去了。让人给那家信用卡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对他搞的鬼名堂概不负责。找个会计查查账本看有什么损失。”

我对此感到气愤，就像旅行中遇到的许多事让我气愤一样。我知道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在哪里，没有我的授权他肯定不可能提款——难道不是吗？经纪人对此有明确的指示。最糟糕的肯定就是电话被切断，我们的一张信用卡被取消——可能已经被取消了？我破产了吗？我是不是得回去工作？

我阴沉着脸欣赏当地的风景。这一天天我似乎没什么更多的事可做了，于是我就在这里好好地过——即使这样做会杀了我。

巴巴拉发现祖德一直在尝试把我的一个经纪账户的50 000美元转到我已授予他代理权的一个银行账号上。

祖德终于出现了。他们解雇了他并给了他一封证明信。账单和纸张堆得各处都有，记录乱七八糟，上帝才知道哪些付了哪些还没支付。她说，简直一团糟，我必须马上飞回家。

是的，她已换了办公室的锁。是的，她已中止了他对任何银行和经纪账户的代理权。是的，她已找到了装有项链的包裹，将把它放在银行保险箱里。不，她找不到比这更多的贪污的尝试了。什么时候我能回去？

临时会计萨利不很精明，这无疑对祖德来说再适合不过。问她天气怎么样，14分钟后你仍在到处打听天气状况。你必须抓住她的思维拼命摇晃并对她叫喊，“这事先放下。现在告

诉我，今天天气怎么样？”可是我们需要她，因为我们需要个大本营来处理信用卡费用和现金预支。那些账单得抵达目的地并被付清。她知道账簿在哪里以及各种记录都到哪儿去找。因此我决定雇她为全时工，做审计并依法向祖德追讨债款。

“我不很确定雇她是否明智，”巴巴拉说，“她觉得告发祖德，对雇她的人反咬一口心里过意不去。”

“是谁给她付工资？是我的钱！难道不该对我忠诚吗？”

“别激动，吉姆，她只是在一些方面能力不行。”

“你有什么建议？”

“可以在这里找个合伙人。”

“出多少钱？”

她建议的费用足够让一个排做环球旅行了。她的账单已经可能超过贪污的那个数字了，而我所要的不过是在今后3个月里接电话付账单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付账单，我们寸步难行。

她都第10次说我应马上飞回了，然而她答应雇用萨利。我还需要继续在电话交谈里紧抓住她的思维。

我打消了不安，决定继续旅行。这是我一生的梦想，半途而废飞回纽约将违反本次旅行的宗旨。

我们沿着泛美公路前行来到了一个叫做阿尔加罗沃的小城，在这里，我们租了一条船前往一小岛去看企鹅。这是一叶轻舟，我肯定一个大浪就能把它掀翻。

我们非常高兴地找到了塘鹅栖息地甚至看到了海狮。一个私人赛艇俱乐部在岛外围建筑了海上屏障以保护小海湾。但这使偷猎者得以偷走、偷吃企鹅蛋，并进而导致企鹅数量进

一步减少。

安第斯山中之行令人难忘，这是世界上最棒的摩托车之旅。有时泛美公路沿海而行，有时又被挤在山与海之间，有时它插进山里并在高原徘徊。然后，它跌入山谷，仰视着路两旁的山压顶而来。上上下下的山路令人激动不已。甚至见到的颜色也是奇异的：深翡翠绿的草，鲜黄绿色的小灌木，而灌木的新生尖尖则是明亮的浅绿。而仙人掌的绿色又完全不同，它稍淡些，却同样的浓烈。

智利境内的泛美公路是另一项杰出的工程伟绩，路面铺得很好，虽然高低错落有致，但路的隔离墩和排水系统都做得很精致。有时当我们在山路上驰骋时，看一眼深不见底的峡谷都感到害怕。

当我们接近巴列纳尔时，植被渐渐变得稀疏了。按照地图指示，我们很快就会到达另一个沙漠。公路两旁有小的纪念碑、十字架和圣祠，竖立在人们因事故丧生的地方，比我们在阿根廷或苏联看见的都多。很多事故都发生在平坦笔直的平面上。为什么？司机们睡着了？他们喝醉了？太年轻或太没经验，不知道驾驶的危险？

这些当然没躲过我的眼睛。也许我们在美国也该竖立起警示牌或类似的东西。

我们最终到达了沙漠，就像月球上的景色一样荒凉。智利境内的这一片高于太平洋海面600英里，被称为阿塔卡马沙漠。沙漠继续伸展到秘鲁，几乎到达厄瓜多尔。有时沙漠仅宽几百码，有时又宽至几英里。海和山之间的地域通常葱绿肥沃，就像加利福尼亚，但这里完全不同。这是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在有的地方甚至400多年来都没有下过雨。

我们通过了沙漠，我们的右首有一座山，山顶覆盖着皑皑白雪，左边是浩瀚的太平洋。沙漠主要呈现为红色，但有时转为白色，它的地表形态不断变幻，时而是尘土，时而是石头，时而又是沙子，时而又是巨石，但一路上总能闻到海的气息。

我与塔贝莎的关系在这次旅行中发生了变化，我想15个月的单独相处总会使关系产生变化。我清楚地回忆起当我们离开保加利亚时，她的化油器的塞子掉了。我们四处寻找，弄到了一条破旧的橡胶管，我们用神奇3M胶带把塞子塞进化油器的塞嘴，这一招奏效了。那天晚上在旅馆里她很兴奋，很高兴，脸上愉快的表情美极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经历了一次小事故，但想方设法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把它修好了。我那时太累或太不敏感而没有充分领略那一时刻的美好。

几个月以后在俄罗斯我们遇到了生产头盔的夫妻店主人伊果和瓦伦蒂娜，我对他们那种温情脉脉的关系感到惊异不已。

他们令我大开眼界，我认识到在婚姻多年有了孩子之后仍有可能有这种温馨的感觉。也许这世上存在真正持久的爱情。当我们沿南美西海岸骑车旅行时，我意识到我对塔贝莎的全部感情有了多大的变化并仍在发生多大的变化。我发现和她在一起我是多么高兴。我们两人醒来感到能在一起是那么愉快，那么激动。

我们的爱越来越深厚，两人都感到欢欣鼓舞。我现在知道我可以做出一生不变的承诺；我曾想过在这次旅行结束之后我们的伙伴关系是否还能继续，我是否还能找到对其付出

一生承诺的另一个人。

我们决定虽然在南美经历了这种浪漫情感，但回去之后的6个月之内我们什么也不做——不分开也不结婚。我们离开原来的世界15个月，离开得太久，都需要一段时间做些调整。

我回到美国后的生活？我成年后的生活似乎分为两部分，1980年以前我在华尔街工作，1980年以后我做各种事情，而最高潮就是这次旅行。旅行标志着我生活中第一阶段的结束，我已准备好进入生命的第三阶段。我不知道这种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我想要崭新的生活，而且已为它做好了准备。

31. 在光辉道路上

ON THE SHINING PATH

[redacted]们接近了秘鲁，“光辉道路”的故乡。

“光辉道路”是存在了10年之久的游击队运动，是那个时期世界上仅存的游击队运动。贡萨洛主席是秘鲁研究哲学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四把剑”，是前三把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之后的继任者。他的组织“光辉

道路"——正式名称为秘鲁共产党——将接管秘鲁，接管南美洲并把世界带入工人阶级的天堂。

当我们还在澳大利亚时，新闻媒介就充分报道三名在秘鲁为贫困秘鲁人服务的澳大利亚修女被光辉道路枪杀。道路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们这些修女通过帮助穷人来支持国家，因此我们将消灭你们。

南美这里的报纸大量报道的是关于"光辉道路"誓杀一切外国人的警告。它枪杀无辜的旅游者，破坏旅游业和货币，以此来摧毁国家。

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了"道路"的残酷和奇怪推理。在我们到达秘鲁几星期以前，"道路"在利马以北 50 英里的一个实验农场抓了 3 名日本农学家。它的推理是在秘鲁工作的所有外国人一定在为国家工作，因为他们不是在为"道路"工作。"道路"处死了 3 名农学家。

日本政府从秘鲁撤走了 52 名农业工程师。"道路"的 5000 叛军使一个有 2200 万人口、12 万军队的国家陷于瘫痪。

这些报道自然让我们心里发虚。我们是北美人，我猜测在游击队看来北美人比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更可恨，我们不仅是旅游者，是他们发誓要枪杀的人，而且我还是"道路"的理论家可能称之为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反基督者、黑暗的资本主义王子的那种人——最起码也是个资本主义走狗。

除了读报，我们在途中还在许多秘鲁的领事馆停留询问，"这些天情况怎么样？现在他们在哪儿？"

当然，使馆官员总是说"道路"受到控制。领馆和使馆拿工资就是为了说"到美丽的秘鲁来看一看吧"。

这个国家情形似乎比交战区更糟糕。战争中的中立人士还能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然而除了这些狂热的游击队之外，秘鲁正处于20世纪最可怕的霍乱区的中央。

在边界，我们去了智利这边的秘鲁领馆。这是我们获得信息的最后机会了。如果消息不妙，我们就跳过秘鲁，从一条未铺过的路跨越安第斯山，前往巴西，再想方设法从巴西几百英里的腹地往北前往中美洲，这些路远比不上在泛美公路上驾驶舒服。

我们先问容易的问题，我们向领事打听北边的公路情况。

“头60英里左右路况不太好，”他说，“但那以后一直到利马情况都不错。”

这真令人欣慰。糟糕的道路对摩托车手来说简直是恶梦。我问：“在国界那边我们能换钱吗？”

“当然能。”他答道，似乎我问了一个秘鲁人是否穿衣服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

“一过境就有一家银行。”

现在问重要的问题，“关于‘光辉道路’？”

他顿了一顿，“你一直走泛美公路？”

“是的。”

他笑了，“那么你不会有任何问题。泛美公路是我国主要的交通动脉。我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努力不让叛军控制它。”

这一切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们放心地开始北上了。

可是过了境之后并没有银行。我们向警察打听银行，他们打发我们到10～15英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市，我们在那里找到了黑市。

领事关于泛美公路控制权的信息也是错的。“道路”对沿公路的大部分城市都进行攻击。

我们最后住在一个没有电的城里。在此前一天，叛军——救星？——炸掉了城里唯一的发电厂。

与我们住过的许多其他南美地方相比，这里的旅馆简直就是老鼠窝。我们找到了一位邻人付了她一美元，她允许我们把摩托车存在她的起居室里，这么做是为了防止“道路”的同情者夜里路过时看到我们的外国摩托车，并报告给“道路”的高层人物。

破裂的公路向北延伸，沿途我们路过了一个又一个被破坏的村庄，清楚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了智利就是离开了繁荣，现在又到了第三世界。我真不明白“道路”怎能通过炸毁发电厂、屠杀无辜的修女和旅游者、摧毁经济和阻挠银行营业来劝导绝大多数秘鲁人追随他们。“道路”的领导人曾是个教授，人们会想他会有足够的智力水准和诚实而派一名中尉——或者甚至他自己——去看一看他南方邻国的经济奇迹。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会想他也许犯了个错误。难道一个叛军的无所畏惧的领袖没有足够的智力上的诚实去审视一番秘鲁、北朝鲜、俄罗斯和古巴这些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并把这些国家与民主的、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智利、南朝鲜和博茨瓦纳做一番比较，看一看他能学到哪些经验以帮助他的人民？上帝拯救我们这些真正有信仰的人，不论所信仰的是宗教、政治或科学的理论。

与秘鲁领事所说的不同，泛美公路一直到利马的境况都很糟。虽然有几个警察检查站，但游击队仍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个领事的工作就是诱使旅游者到他的国家去。他更

可能是个典型的官僚，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成功地蒙骗了我们。

我们肯定是他几个月来唯一的客户。“光辉道路”的工作做得真到家。从秘鲁的最底端一直到利马我们没看到一个外国车牌照，不管是其他洲的也好还是智利的、玻利维亚的或阿根廷的牌照都未见到。实际上，路上根本没什么车。

我们路过的每家工厂都有高高的护墙围着里面的院落，墙角处都有持枪的卫兵。若非那些写着炼铜厂或其他什么厂的厂牌，我们还以为是监狱呢。报纸曾报道过“道路”炸毁了40家银行。我们见到的每家银行都有差不多15个表情紧张的荷枪卫兵在把守。秘鲁人被迫用在安全保障上的巨额资金拖了经济的后腿　如果秘鲁能够结束这场战争，它将会在世界上变得更有竞争力。

我不太想让这次旅行结束。我决定还要再来一次。

“当然，”塔贝莎说，“但下次我会待在家里为你担心，写支票。”

“再过25年我要重新再来一次，”我说，“我要把同样的路线再走一遍，住同样的旅馆，看一看这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5年。届时我将72岁，还真不算太老。我要再写一本书。写那些国家、人们、地方和我自己，写这一切的变化。

每天晚上住旅馆之前我们总要停下加油。有一天我们加满油之后我给了服务员一张信用卡。虽然加油站写有接受信用卡的标志，可他并不知道怎样操作。以前从来没人使用过，

所以我只好进去见老板。老板发疯似地查了所有的手册，与我热烈地讨论怎样处理这笔奇怪的交易。最后他发现一次最多只能收6美元，所以我给了他三张卡，他又完全慌乱起来。在由此而引起的一片嘈杂当中，老板给三家银行分别打电话核实这并不是北美人设下的骗他钱的骗局。

已在里面耽搁了很久的我极不耐烦，坐立不安。塔贝莎在外面看着摩托车。一辆卡车驶来，5个人鱼贯而出，都带着革命者惯常选用的武器AK-47冲锋枪。他们都没穿军装，她立刻意识到他们是"光辉道路"。他们忙着加油的时候，一个家伙端着AK-47慢腾腾走过来开始和她调情。

塔贝莎弯下身擦掉了她那阿根廷的标记并立即制定出另一条环球旅行的基本规则：如果一个抱着AK-47的家伙与你调情，千万奉陪。别对他说，"放尊重点儿"，或"休得无礼"，要对他吃吃傻笑。她搬出老公做挡箭牌，说她丈夫——她的高大的丈夫——正在里面。她一直对他的玩笑抱以笑容。他的同伴加满了油并付给服务员现金，因为"道路"并不发公司信用卡。

最后"AK-47"问，"你去哪儿？"

她再次傻笑并问，"你去哪儿？"

"南边儿。"

她做出失望的样子。"我们去北边儿。真不凑巧。"

当我出来时，卡车已驶过拐角了。她吓得脸色惨白。

"怎么了？"我问。

"谢天谢地你用了这么久。"她给我讲了所发生的事。

"我得给老板看——"我中途停住。一张信用卡的迟缓的操作过程救了我的命？"我们离开这儿。"

她在颤抖。“说得太对了。”

利马曾是秘鲁总督大辖区的首都，当时的辖区包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以及秘鲁本身。在16、17以及18世纪早期，它曾是财富和奢华之城，美洲大陆没有其他城市可以与之相比。几个世纪以来，当欧洲人想起美洲时，他们所想到的首先是墨西哥城或利马。

对于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拓展，我怀有复杂的感情。最终总会有人发现这两洲、并使得它们与世界融合。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幸的是西班牙征服者们并不是我们在学校读书时从书中读到的高贵的探险者，他们是一群恶棍。就像野蛮人抢劫罗马一样，他们毁掉了所遇到的有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根本不考虑他们劫掠的文化财富。他们熔化了数万件无价的黄金工艺品并把金锭海运回国扩充其战时金库。

在僧侣阶层的鼓励支持下，西班牙征服者并不认为他们对南美土著人的行为应受上帝的规则或礼仪的支配；土著人属于次人种，对这种人的任何暴行都是正当的。最初仅几百西班牙人就能打败几万印加人，因为印加人正忙于打残酷的内战。皮萨罗利用叛徒的帮助抓到了印加皇帝。印加人为换他回来交了大量黄金作为赎金，但皮萨罗仍然杀了他。

皮萨罗和他的同伙自己留下了一部分黄金，把剩下的大部分黄金运回国献给查尔斯国王。有关这笔财富的新闻又吸引了数千西班牙恶棍南下新世界以分一杯残羹。

后来，得到授权拥有对其辖区无限制权威的西班牙总督向殖民者分发土地以及土著印第安人做为劳力。西班牙国王使不信任何宗教的土著人信仰了基督教，这使得教皇明正言

顺地把美洲做为礼物赠给了西班牙王室。这一体系成为变相的奴隶制，部落的成年男性被迫每年为西班牙人工作一段时间，只能得到可怜的一点工资。

利马建城于 1535 年，1746 年它几乎被一次地震完全摧毁。现在它是南美第四大城市，人口约 500 万。虽然利马周围众多的棚户区里挤满了打工的山里人，但城中心还是相当整齐紧凑的。

城中心的一些地方仍保留了殖民地时的风格，阿玛斯广场也很漂亮，但周围的多数地方破旧，脏乱不堪。只有在米拉弗罗斯和圣伊斯德罗这样的富人区和市中心的共和国大道才能见到一些树木和修剪过的花园。

在过去，秘鲁的条条框框比阿根廷还要多，这里条条框框束缚了秘鲁人的手脚。如果一个商人循规蹈矩不做地下交易，那么他得到营业执照要 9 年时间，甚至买一所房子也要花几年时间办手续。现在政府终于开始取消这一切繁文缛节了。我们在商店里，在众多街边小摊上到处都能看到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单单凭其活跃的商业活动，秘鲁已能与中国、中东和非洲相媲美了。

这并不该令人惊讶。一旦政府放松控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常以为使经济发展的方法就是对大企业实行激励机制或限制价格，但真正的出路在于给普通公民参与的机会，停止干预自愿交易——不做损害商业发展的事情。

秘鲁令我激动。它曾是美洲最富的国家，秘鲁的熊市已经持续了 200 年了。对于 17 世纪的西班牙人来说，墨西哥以

北的一切就相当于今天我们眼中的加拿大北部，是广阔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西班牙人不仅在秘鲁总督辖区发现了黄金，而且还发现了一座纯银山，按当今的价格计算可能价值2000亿美元。

秘鲁的白银曾带来繁荣，正如丰富的油气资源为沙特王室和文莱苏丹带来财富一样。曾有一段时间——一切当然都是暂时的——利马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这里的人的生活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高一个层次"，一位西班牙的编年史作家写道："赚钱和花钱成了一种狂热，使整个民族都着了魔。他们穿金戴银，或披猩红色的丝绸……总之，他们的餐具和厨具都是纯银制成。"

今天你仍然能从秘鲁的破旧不堪的建筑中发现古老财富的痕迹。在看过众多的秘鲁教堂、镶金的祭坛、豪华的马车和奢侈的家庭之后，我对这种消费财富的挥霍方式感到惊异不已。难怪西班牙帝国不能持久。

有朝一日利马将再次成为令人振奋的城市。在我们逗留期间，由于"光辉道路"、几十年的政府管理不善，以及霍乱的流行，价格一落千丈。但我看到新政府正在解除几十年来使国家停滞不前的种种束缚。如果我的预感正确，即秘鲁很快将经历再次繁荣的转折点，那么这里的股票收益比几乎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许多。

我认为"光辉道路"公关的能力比它打仗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不太可能把政府拉下台。它远远比不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成功革命。

因此，反基督派做了少量投资以支撑秘鲁的资本主义结构。

“他们从昆斯打电话来为你的跳伞课改期。”在我有一次给纽约打电话时临时会计萨利告诉我。

“萨利，我没上跳伞课。我在利马——秘鲁——南美洲。”

“我也觉得奇怪，”她说，“你肯定在前几个星期没去过昆斯？”

我叹了一口气，“没去过。怎么了？”

“我知道事情有点复杂，罗杰斯先生。这让我紧张。”

“萨利，什么跳伞课？”

“谢谢你。那位女士说费用已记入你的万事达卡了。她想知道既然你未能去成是否还想另找时间去上课。”

“祖德！他又做手脚了！信用卡号是什么？”

我们核对了，不是任何一张我的信用卡的号。他肯定给了他们用他自己地址申请的得到我事先同意的号码。我又找来了我的律师巴巴拉·罗宾逊。这张卡已经支付了1万美元，并且时不时地得续上约1000美元以保证它长期有效。

巴巴拉不知道他还拿了多少，因此建议我先取消所有的旧卡然后再重新启动。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只不过我不得不在利马重新启动这些信用卡。

利马没有直拨电话。旅馆接线生态度变得很不耐烦，因为我往纽约拨了太多次电话。虽然我每拿起电话一次就得额外付给旅馆一美元，但这增加了她的工作量。为了启动新卡和签那些文件，我们不得不像走马灯一样在利马的郊区来回行驶。在银行里我们耗费了很多时间，那里成队的身穿炮兵夹克的佩带手枪的士兵紧张地用眼睛瞄着我们的摩托车、牛仔裤和黑色的皮夹克。

10 张卡,10 家银行。每个银行职员也都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身穿牛仔裤和黑皮夹克、想重新启动纽约的一个律师取消的信用卡的家伙。他们猜想我首先可能是偷了这张信用卡的小偷,或许我的众匪和我杀了罗杰斯先生,偷了他的摩托车、钱包和行头,而现在又在进行一次大胆聪明的行动以从银行骗取更多的战利品。北去的电缆由于我的这些电传,电话和传真都烧得冒烟了。

我们飞往拉巴斯参观。

拉巴斯海拔近 1.2 万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首都。它坐落于低于玻利维亚高原平地几百码的天然峡谷的底部,白雪覆盖山顶的伊利马尼山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它。在我们越飞越近时,城中心的摩天楼看起来就像与原物成一定比例的模型一样,周围环绕着沿着峡谷的陡坡攀援而上的淡红蜡笔色的上著房屋。

拉巴斯建于西班牙人发现黄金以后的 1548 年。虽然能见到摩天楼,老城区仍保留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风格。

虽然玻利维亚是南美最穷的共和国,但拉巴斯显得比利马要繁荣。这也许是因为采金和卖毒品的钱都花在了这里而不是这一国家其他城市的原因吧。

这里甚至显得更土著。妇女戴着漂亮的小圆顶高帽,不知以什么神秘的方式她们把这一头顶上的传统保留了下来。西班牙人几百年以前就曾描述过她们的着装风格,今天这种风格仍然保持不变。

巫师们在街边设起小摊兜售药物,称这些药能为你在恋爱、生意、婚姻、生子以及任何你遇上麻烦的方面带来好运。

我要做到面面俱到。我买了特大号的招牌响亮的装有药剂的护身符玻璃瓶，据摊主说这是各种灵验集于一身的瓶子，能为你生活中的各方面带来好运。我一直把它放在化妆台上，迄今为止，一切平安无事。

印度有预言者，印度人认为在建房或结婚前必须请教这些智人，否则会交恶运。在中国，我们知道有风水，差不多属于同一种东西。非洲则有巫医。现在的药物学者承认那些所谓的原始治愈者掌握的生物和药理知识远比我们曾以为他们所掌握的程度要深。今天，药品公司甚至聘请这些偏远地区的粗俗治愈者作为药物顾问。全世界的人都请当地的巫师帮他们做决定，就像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所做的那样——即使是在高度文明时期也是如此。这其中是否包含着比我们的注重精确的科学所能解释的多得多的道理？毕竟，难道巧合真的仅仅是还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科学真理吗？

这里的交通状况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糟。道路并不是为交通而建的。街上排列着数百个摊位，提供换钱和打字服务。有些摊儿甚至设有电话，打电话要收钱。

这里的股市只有一年半的历史，仍然没什么上市的股票。由于没有公开市场，我被迫下订单“在街上”或私下购买股票。我想买一家啤酒公司的股票，一家银行的可转换债券，以及另一个即将上市的新股。

如果此间的旅游公司克里隆能公开上市，那将是绝佳的投资。

早在西班牙人踏上这片土地的几百年以前，玻利维亚的矿工就开始每天消费一磅古柯叶。古柯叶是制造可卡因的原

料，能为人带来能量和耐力。出于好奇，我像玻利维亚人那样尝试着嚼了一点叶子。第一次初试觉得很苦，但第二次第三次尝试就适应多了。我学会了忍到那一刻的暂时苦劲过去之后，然后就像亚拉巴马乡下人嚼烟草或牛蠕动其咀嚼物一样把嚼过的叶子留在嘴里。我还尝试了一下古柯伴侣，这是古柯叶做的茶，味道有点像日本绿茶。甚至美国驻玻利维亚使馆也给客人喝这种茶。当地人用它来抵御饥饿和高原反应。

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如一杯浓咖啡提神。古柯叶在自然状态是无害的，但也许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的人把烟草，一种美洲土著人只正式偶尔使用的草药，拿来没完没了地抽。古柯叶在这里的角色就像茶和咖啡对于更有理智的现代人一样，而“文明”的富裕国家却把古柯叶这种温和的兴奋剂升级为聚合着比它的正常效力大几十倍的能量的东西，并一天之内好几次地滥用它。

玻利维亚人嚼古柯叶并用其制作茶叶的历史已有400多年了。在印加人中只有皇室、僧侣、医生以及皇帝的送信人才能使用它。嚼了古柯叶，送信使者一天能跑100多英里路。

现代的科学家同意玻利维亚人使用古柯叶的传统方式是无害的，甚至它一点儿也不会使人上瘾。美国经常用给这种植物施用脱叶剂的计划来干预玻利维亚，这激起了当地农民的强烈抗议和示威。他们不懂为什么要放弃这种最好的经济作物，这种植物生长力旺盛以至于他们一年能收获4次呢。我在想如果中国人或韩国人闯进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给种植的烟叶施落叶剂，说我们正在把毒药卖给他们的国民，我们将作何反应呢。

即使存在着愚蠢的吸毒习惯，但如果我们不把毒品合法

化，南美和北美的诸多财政和社会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我明白有很多理由说明不能把毒品合法化，否则我们将会有21岁的年轻人在当地的药品店购买可卡因或名牌毒品了。但我们现在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巨大的犯罪打击和安全机构却使毒品生产者和使用者，包括社会都陷入困境。在美国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被偷来赞助由于非法利润而愈发膨胀的毒品贸易。宣布毒品为非法并不比宣布酒精非法更有意义。同样的基本问题产生了——规模巨大的犯罪团伙和腐败官员。对于烟和酒，我们成功地强烈呼吁人们少抽烟少喝酒，通过宣传已把抽烟喝酒定格为一种不够层次的活动，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在于把毒品合法化，并也在同时教育人们抵制毒品。

全世界正在花费数千亿美元打一场毫无指望的战斗。我们正在使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腐败无能。警察不想让毒品贸易停下来；对于他们这真是一桩好生意。现在他们可以没收想没收的任何东西，只要这种行为是打着“反毒战争”的旗号。

在拉丁美洲各地，我们都看到这种毒品贸易的腐蚀效果：腐败、死亡、走私，整个社会都受到损害。为什么不把这玩意儿合法化呢？如果毒品合法将会节省数千亿执法的费用，而这笔费用以及我们对合法毒品征收的税款可以更好地用于预防和医治任何滥用毒品而引起的病症。剩下的钱还够处理与使用烟酒有关的疾病，而且即使再减税也绰绰有余。

除非美国爆出一桩大丑闻，否则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许总统或最高法院的一名成员被发现由于毒品而导致腐败行为。今天，在几百位联邦法官当中有50多位拒绝审理毒品案，因为他们发现法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并且还对我们的社会有害。如果所有联邦法官都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也足够成

为一桩丑闻了。

在毒品合法化之后，那些空闲下来的牢房就可以用来关押腐败政客了。



秘鲁的安第斯山上的玛楚佩楚不愧为南美最知名的旅游景点。印加文明是多么辉煌动人！

当秘鲁人谈起的的喀喀湖这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可以航行的湖时，他们总不忘提一句湖面的波浪。这是他们用来强调分开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这一明亮蓝色水体的规模的方式。它的面积超过3000平方英里，确实大。但湖面上的天空是阳光明媚的，周围的陆地又是柔和的地形，这时湖水就不那么热情了。水面终年静止不动，这是海拔12000英尺以上的结果。

根据当地民俗传说，的的喀喀湖孕育了世界已知的最重要文化之一——印加文化。对于印加人来说，湖是圣湖、岛是圣岛。根据传说，当西班牙人到达库斯科时，当地土著居民把

太阳神庙中存放的印加王子胡亚斯卡的2吨重的金链扔进了湖底藏了起来。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在数年前曾花了8个星期乘坐一艘迷你潜艇搜索湖底。他没找到黄金，却发现了一只20英寸长的从来没浮出湖面的三色青蛙。

的的喀喀湖上有很多岛，其中最闻名的是巫罗部落的芦苇浮岛。这是一种绝妙的自卫法，进一步证明了人类在必要时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见过洞穴、城堡、护城河和地下城市。巫罗人在这里建造了巨大的芦苇岛——他们在10英尺厚的芦苇垫上建起了村庄。当受到敌人威胁时，他们就把整个岛驶向安全地带。

我们得知巫罗人在婚前要同居一段。如果不合适，就换个人——可换3个伴——一直到结婚为止。虽然我们已有不少的进步，或许文明社会可以从这种更为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学到点儿什么。

当地迷信说巫罗人血管里流的是黑血，使他们可以在静止不动的湖上生存下来。最后一个纯种巫罗人死于1959年，但岛上现在的居民——巫罗人，艾马拉人，和魁楚阿人的混合体——仍然沿袭着巫罗人的生活方式。他们钓鱼、猎鸟，以湖生植物为生，包括过去曾被用来建造家园、造船及构成这些岛的岛基的极端重要的芦苇。

在近1.3万英尺高的荒凉平原上坐落着惊人的、久已被人遗忘的石器文明时期的蒂亚胡亚纳哥的遗迹，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存在比西班牙人发现美洲要早几百年。

城中所用石块方正规矩，整个城看似分布整齐呈长方形。这些哥伦布之前的人是谁？他们的命运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不像其他古老的南美文明，他们除了自己的建筑之外没给后世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城中最大的建筑之一彪马·庞楚现在仅剩杂乱的一堆石头了，一些石头长 26 英尺宽 16 英尺，就像被一场自然灾难随便抛掷在各处一样。没人知道这是否曾是个宫殿或庙宇，它是一个谜。

挖掘证明在其千年的存在过程中曾经出现过 5 个独立的城市，一个建在另一个的遗址上。玻利维亚纵深丛林中存在了 1000 年的复杂的文明。

更令人惊讶的是，城中所用石块的采石场在 60～200 英里开外。重达 100 吨甚至更重的大石块被人在不用车轮、铁器或马车的情况下运过丛林地，而且在没有金属切割刀的情况下这些石块规则得像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令我赞叹的是人类的普遍天才。我从小到大一直以为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光荣是古人成就的最高巅峰，但这次旅行让我大开眼界。在迦太基、在津巴布韦、在西安、在撒哈拉、在西伯利亚——以及在这里的蒂亚胡亚纳哥、的的喀喀湖、苏兹达尔、及在撒马尔汗——我发现古老的光荣接踵而来。

建造这样一座庞大的石头城——数英里宽、几层高的石头城——需要不只一位意志坚强的国王的努力。首先，人们的生活需要超过最低生存水平，而且这样庞大的结构需要以十几、几十代人的社会发展和组织做后盾。他们的领袖需要自始至终致力于他们的目标，而不屈服于类似西班牙人的消费狂热。住房、食物和劳力都需要安排；需要建立起某种形式的首都；需要制定并执行计划；需要找到一种调动工人和中层

管理人员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们所称的原始社会实现的。我认为他们代表了人类之所以伟大的一切品质。我再次认识到人类会照顾自己并生存下去。

这里耸立着古文明所留给我们的石城蒂亚胡亚纳哥。几位统治者都具有计划并建造这一庞大城市的远见卓识，因此这一人类天才的丰碑得以屹立在此。

在1911年，海勒姆·宾厄姆——一位美国探险家——在寻找印加迷失之城时顺着印加酋长曼哥逃避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所走的同样的路线来到了安第斯山。

在艰难地登上7000英尺高度后，他的导游把他带到一阶巨大的建筑优美的石面台阶前，或许有100级台阶，每个都有几百英尺宽10英尺高。宾厄姆曾见过相似的台阶，因此并没有太激动。

突然，他心中如电光石火闪过，"我发现自己面前的是用最好的印加石匠工艺所建房屋的残墙。不太容易看清楚，因为这些墙的一部分被几个世纪以来生长的树木和苔藓所覆盖，但在浓密的阴影里，在竹林和缠绕的藤蔓间隐映着用仔细切割的石块精心砌成的白色花岗岩的墙。"

他后来又找到了一幢半圆型建筑，"其外墙恰好符合石块的天然曲度，是我所见过的砖石结构中的极品之一。而且，它紧连着另一堵美丽的墙，这堵墙是用精心挑选的质地极细的纯白色花岗岩砌成，颜色的匹配同样天衣无缝。显然，这是一位艺术大师的杰作。"

他在丛林中披荆斩棘，继续探险。"隐隐约约地，我开始意识到这堵墙和与之紧连的半圆型庙宇可以媲美世界上最

杰出的石制工艺……它的美让我窒息。这能是什么地方呢?"

宾厄姆被带到了马丘比丘,由于其苍翠欲滴的山中美景而无可争议地成为美洲大陆最著名最非同凡响的考古地点。今天它当然是南美吸引游客最多的景观。当他到达这里时农民已在附近生活和耕作,因此很难说是他"发现"了马丘比丘。我们被告之,正确的说法是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科学发现"。

我们的火车沿着银光闪闪的乌鲁班巴河——传说中的太阳河——驶入山中。我们周围高耸的山呈现一种深绿色,山顶隐藏在移动的迷雾中。

盘踞在陡峭的绿坡上的古老城市仍然大部分完好无损,只不过原来的茅草尖顶已经消失了。这座城市横跨于乌鲁班巴河 U 型转弯之上的一座山的狭窄山脊。白雪覆盖的山顶高达 18000 英尺。

当我们通过因蒂庞库的壮观大门时,迎接我们的景色神奇无比。从前这里曾是怎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啊!

太阳之塔建于皇家陵墓之上,它完美无缺的精确度使建筑根本不需要砂浆砌合。西班牙人在美洲到处都发现了这种不用砂浆的石艺,但却永远也学不会这种工艺。

三窗殿展示了安第斯的荣耀。这个城市是 625 英里山路的终点。像所有印加路一样,这条路也是铺过的,路旁隔一段就有驿站。对此我感到惊讶不已,这一切都是人类在没用马、车或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建成的。我们总以为石器时期的人愚钝原始,但这里就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发展了一种精细的文明,这种文明很显然具有社会等级、详细的计划能力以及

复杂的技术知识。

那些有点儿勇气的人可以迎接这样的挑战——攀登通往乌艾那比丘顶峰的令人汗毛倒竖的石阶，山峰俯视着神话般的城市。峰顶耸立着月亮殿。

自海勒姆·宾厄姆那时候至今，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清理和修缮工作，包括为一些房屋做上茅草屋顶，以及使原先的水道重新起作用。这是个浪漫的非世俗的景观——是做梦的地方。

像帕查卡玛和印加帝国其他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庙宇一样，马丘比丘曾居住过僧侣、高级工作人员、艺人、仆人，最重要的是那些选来终身侍奉太阳神的处女。这似乎是个没有穷人的城市，是个有观赏喷泉和舒适走道的山中堡垒。

没人知道这些人出了什么事。印加人没留下一点儿书面记录，西班牙编年史作家也没提到这座城市。他们可能死于一场流行病，或许由于印加帝国没落前后的血腥的政治争端而使城中所有住客都丧了命。

马丘比丘的挖掘仅仅使这些居民的命运之谜更为神秘。一共发现了173具人骨，150人为女性，很多人墓中葬有贵重物品，这使人们得出结论：马丘比丘是侍奉太阳神的处女们的避难所，保护她们不受西班牙征服者的污辱。在宾厄姆所称的一位高级女尼的墓中发现了一具女人和一只小狗的遗骨，还有一些瓷器，两只胸针和羊毛织物。女人得了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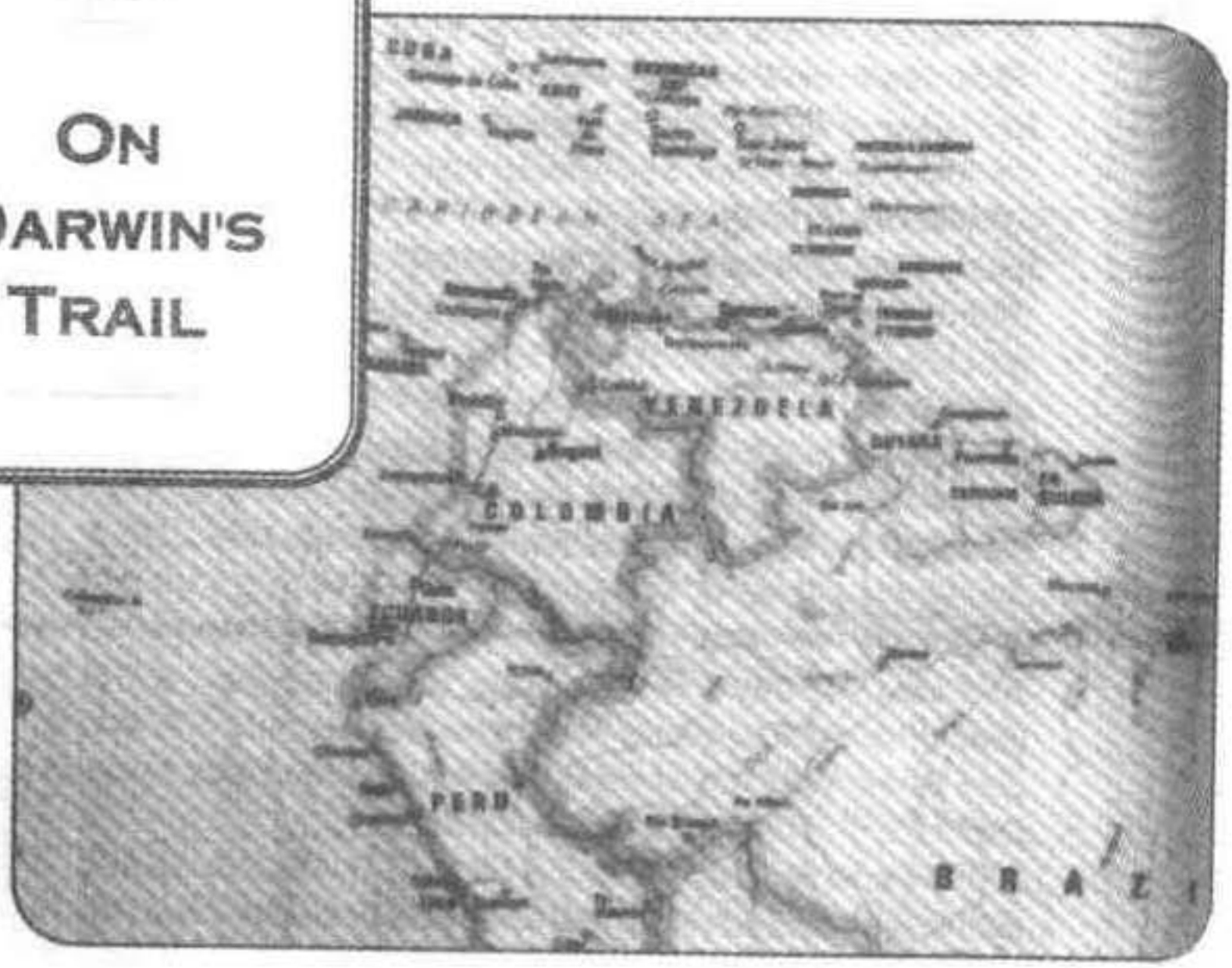
我们在库斯科品尝了当地名菜天竺鼠，味道像脆焦的猪肉烧烤。我们吃了头，吃了全部。当地的玉米酿造的烈性酒味道很冲，就像变了味的发腐的酒一样。

绕过合恩角

当地教堂的主打画“最后的晚餐”中餐桌上的食物有天竺鼠、自产奶酪以及塞了肉的青椒。300 年前的这位安第斯艺术家自然会假设这些就是“最后的晚餐”所供应的食物。

32

ON DARWIN'S TRAIL



32. 沿着达尔文的足迹

ON DARWIN'S TRAIL

秘鲁过境到厄瓜多尔的经历是独特的。泛美公路两旁突然出现了热闹的人群、无数的小摊、一个市场，就像在中国一样拥挤。我们在人群中艰难地挪动，心里在想：出了什么事了，边境哨卡到哪里去了。六七个家伙突然冲向我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做手势。他们说我们得停下，因为我们刚经

过边境哨卡。他们是换钱的。政府职员并不很关心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但换钱的可不想错过每--对潜在的客户。我担心在哨卡会被搜查，但后来证明过境相当顺利。

在边境的另一边，我们发现几十个换钱的坐在路旁的椅子上，人手一个计算器，人人膝上放一只公文箱。我一个接一个问下去，看汇率如何。这就像在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表上查看股价，这里是个竞争性的流动市场。他们的汇率基本相同。我搞不懂他们怎样谋生，这个边境由于南边的问题而没有什么旅游者通过。

我们沿沙漠中的泛美公路已走了2000英里。过了河进入厄瓜多尔之后，景色却戏剧性地变幻成丰茂的雨林。电线杆上都长着西班牙苔藓，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植物。虽然路况不坏，但驾车相当困难，因为路上或城里没有交通指示牌。我们不仅常常迷路，而且有几回我们绕了个大圈，从另一边出来时只发现我们所走的方向是单行道上错误的方向。

厄瓜多尔是繁荣的，在这里的车流量和经济活动都比秘鲁多。我们所在的南方，是这个国家最不繁荣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东北地区发现了石油。

我已见过有效的自由市场货币体系，而现在我又看到繁荣景象和出色的道路，来来往往的卡车、小汽车和公共汽车过边境是如此简单，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开放和流动性。如果我能找到股票市场，就决定考虑在此投资了。

泛美公路在这一段就似永不休止的节日，从早到晚都那么热闹。

路两旁的商店展示着香蕉、菠萝、橙子、柠檬、酸橙、番石

榴、西红柿——水果和蔬菜应有尽有。餐馆门旁挂着整只的猪，这些小餐馆最多不超过15张桌子。我们可以挑选中意的猪排，他们当场烤制，再配上色拉、豆子、米饭和一杯啤酒，就是丰盛的一餐。其他的小摊有卖衣服卖鞋的，卖管道工工具的，卖所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驾驶着摩托车从一条经过好几座桥梁的路况不错的公路进入了厄瓜多尔最大城市瓜亚基尔。这个城市的建筑物在蓝天的映衬下闪闪发光。我们找到了最好的旅馆，停好摩托车，就开始研究怎样去加拉帕戈斯群岛。我们知道，由于自然保护的原因，游客的人数是受限制的。

我们顺利地订到了机票。我们在岛上的机场登上了一条叫做达夫妮的船，开始了5天的探险。

有那么多的野生动物——海豹、乌龟、蜥蜴和海鸟——难怪达尔文把这些岛称作研究进化论的天然实验室。例如，一种源于同一祖先的椋鸟在两个不同的岛上就演化为不同的种类，使达尔文有了更清楚地研究进化论的机会。

在海岸上，我们巧遇一只刚刚生产完的海豹。她流淌在岩石上的血迹已经干涸。她精疲力竭，但她的新生儿正在她身旁跳来跳去。在我们周围，放眼望去，乌龟、海豹和海鸟们都在忙着交配或生产。小生命遍地都是。这真是一片多产之地。

达尔文的时代久已过去。近在30年前，加拉帕戈斯仍然还是个进化的实验室，但现在随着各处闲逛的像我们这样的人愈来愈多，这种时代已经结束。到处都是旅游者，每年有9

万游客上岛，近年来又有1.2万名当地居民上岛，为游客提供服务。游客从游船上向海里丢垃圾和污水，吃了这些垃圾喝了这些脏水的附近的海鱼有些已经有毒了。

山羊在这里生存的历史很久远。它们最早被引入时都是驯服的，但很久以来已跑野了。现在为了恢复环境当局所相信的某种几个世纪之久的平衡，这些山羊被杀掉了。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有些山羊已进化到能喝咸水生存了，在这种状况下杀山羊就变得更为可怕。

当地人用旅游业的部分收入建了一座足球体育场，但对大自然显然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在瓜亚基尔住的是城中最好的旅馆奥罗维尔德，或称"绿色金子"，它以此命名是为了嘉奖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物品香蕉，其出口收入占外汇总收入的25%。

这里的香蕉树是那么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地拨开望在前进道路上的树叶和树枝。你会很容易地明白为什么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危地马拉得名为"香蕉共和国"。

这些国家的香蕉出口占世界香蕉出口总量的3/4，其中一半销往欧洲，每年270万吨绿色金子。显然德国和比利时是他们最大的买主，两国的购买量在80年代增长了3倍。

厄瓜多尔的货币可以兑换，这个国家也很繁荣。按照我往常的习惯，在做了几次尝试以寻找能明白我的要求的代理人之后，我选中了当地最大的一家银行，它是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同时还在美国有一家分行。

我并不是性别歧视的人，但每个拉美国家都崇尚大男子主义。因此当我发现银行股票部的成员清一色都是女性时，我立即受到鼓舞。如果这些工作在当地人眼中是这么不重要以至于可以让妇女来担任，那就意味着这里的股市仍处于发展初期。这意味着我来得正是时候。

我要求见主管，并高兴地看到出来了另一位女性。当看到身穿黑皮夹克和皮护腿套裤的我想买股票，主管艾琳·伊内思立刻断定我是个毒品走私的货色。幸运的是我在投资领域的一个朋友凑巧在瓜亚基尔与我们联系上了，并恰好带来了一本约翰·特雷恩的一本书《新涌现的货币大师》，其中第一章就讲到了我的投资方式。用了一整天才用这本书以及几篇传真过来的杂志文章说服伊内思女士，让她相信我是光明正大的人，否则她还会锲而不舍地盘问我是否是个毒品贩子。她复印了我的护照，我签名签了1000次。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她没有查我的指纹——她要真那么做，我宁可把我的钱给她。

我们终于开了个户头。伊内思说："你到首都基多后还得到我们的法律部门签一些别的表格。"

我签了一张美元支票给她并指示她我要买些什么，我通常的组合是在萧条的股市上买最不景气的7种股票，比如银行、报纸和酿酒厂之类的公司。

没问题，她告诉我。

到了基多之后，我打电话给银行的法律部，但律师并没有给我回电话。我去看了他两次，但两次他都没在。一想去见他只是个形式，我就随它去了。我们参观过城里之后就开路北上了。

先来说一说以后的事。在我回到纽约之后很久，我的美元投资的全部结果就是一张被撤销的支票。我不断地写信给瓜亚基尔的伊内思女士，问她要确认回执、记录或账户收支表，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在此之后的七八个月后，我给纽约的大使写信。他给银行这个部门打了电话，我才最终接到了她的一封信。

“罗杰斯先生，”伊内思女士写道，“外国人拥有我国股票是不合法的，所以我将把你的钱给你寄回。你必须明白自从你在此存钱之后我国货币的汇率下降了一点。你可能不会全数收到你留在这里的钱。”

我十分气愤。我花了一整天确认这一点，这是当我在一个国家投资时所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现在我为自己定下先以小数目开始投资的规则感到高兴，所以如果发生类似这种问题，它们也仅是小问题。另一条规则就是我所打交道的银行都在美国设有分行。首先，如果你想把事情理顺，如果他们在美国有分行就比较容易。第二，如果有必要的话起诉他们也很容易——只不过我从未这么做过。

很自然，这家银行在美国的分行设在迈阿密，这个城市今天已成为南美货币中心。生活在东北地区的美国人认为任何有分量的东西都在纽约，但很多拉美人认为美国就是迈阿密——这里讲西班牙语，这里是他们知道的美国的全部，也是他们想知道的全部。在他们眼中，这里是拉丁美洲的香港、新加坡或曼谷，是一个对他们的生意有利的国际城市。

所以我给迈阿密支行打了电话，找到了一位为他们工作的哥伦比亚人，我想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是不是能帮我。

“如果银行现在只告诉我这是非法的，”我遏制着怒气说

道,“那么我收回的就不该足贬值后的数目,因为你们收钱的时候答应我替我买股票的。在股市上冒货币风险我不在乎,但银行不该在9个月之后的现在才对我说,‘嗨,这原本就是非法的。’”

“我不懂,”罗佩兹先生说,“我是个外国人。我有厄瓜多尔股票。”

“你有股票?”

“是啊 这似乎是场骗局。我看看能做什么。”

信件来来往往,每交流一次就得一个月左右。最后,迈阿密的新朋友告诉我,“我们把一切都办好了。如果签一些文件你就能买股票了,法律部会把这些文件译成英语。”

“就把西语的寄过来吧,”我说。翻译这些文件又得要2个月。

最后,我收到了西语和英语的文件。信中告诉我到纽约的厄瓜多尔使馆去确认我的签名。如果人人都得经历这些麻烦,那难怪厄瓜多尔没几个外国投资者,但至少这次这种一团乱麻的局面总算理出个头绪了。

在使馆,我把文件交给了负责的领事,她问我买的是什么。

“股票。”我说。

“不行,”她说,“我不能签字。”

“小姐,请读一下这封信。”

“不行,我不会读信。事情不是这么做的。你得……”她不假思索地说出一大堆复杂的手续。

“等一下,小姐,”我说,十分绝望,“请读一读这封信。这是厄瓜多尔最大的银行写来的,是银行法律部写的,他们说我

得把它们交给你们处理。”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胡僚！我坚持要见大使，或者纽约这儿的老板，不管他叫什么。

拉莫斯总领事出来了，他听过我的解释后对文员嘀咕了一些什么，但她态度很坚决，她什么也不打算做。

拉莫斯先生也转向我，告诉我需要办的那些手续，重复着她对我的拒绝。

“您难道就不能读一读这封信吗？”我问。

他瞥了一眼之后开始摇头，不行。

“你瞧，”我的声音由于沮丧而提高了，“我想在你的国家投资。你们为什么把这一切搞得这么复杂呢？贵国最大银行的法律部说行，我也说行——我想给你们国家钱，可是我得到的只是一场大骗局。”

他不断摇头，而我由于不敢相信这一切而头晕起来。这些家伙都生活在哪个世纪啊？我说我得去见他的头儿。好吧，在整个北半球在他以上再没有上级了，他就是老板。

拉莫斯先生和我又争论了一会儿，最后不知怎么他终于明白了。他一直以为我要买的是厄瓜多尔的羊驼或羊毛或其他什么经济作物，那样我需要有国内 100 万个不同部门批准的合同。显然从来没人到这里来购买过股票，这个事实通常令我高兴，但现在看来它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我几乎在这些事情上总是超前。也许这就像尼泊尔，上帝赋予我的理智让我认识到这个国家太原始，社会动荡的风险太大，不适合投资，因此当我最初在那里旅行时就一直没有投资。

“过 3 小时以后再来。”他说，“我们可以把文件打好，你就

可以签字了。"

他做出了一个美丽的笑容。所有这一切就是签字的保证了。

他没有食言，我也签了字。在我把美元支票交给他们15个月之后，我收到了确认回执，告诉我已经买了股票了。趾高气扬的我多买了一些——或者说我又寄了一张美元支票。至此为新交易的确认我又经历了一些麻烦。我打电话给厄瓜多尔，伊内思女士的一名职员会告诉我她们已买了股票，可她们永远不会及时地给我发来确认回执。

国际投资有其风险性，这些风险并非完全与货币贬值或股价贬值有关。



33. 达连断层之路段

THE DARIEN GAP

过了哥伦比亚边境之后的几乎 1 小时内，我们再次行驶在安第斯山的美景之中。在 45 分钟之内我们经历了山脚下的盛夏和云雾缭绕的山顶上的严冬，我们在山巅的云雾中穿行，我们进入沙漠，一片开阔地域，山丘，道路忽上忽下，变化层出不穷。对于喜爱驾车的人来说，这条路的风光是世界上最

指可数的。除了去阿拉斯加路上将经过加拿大的洛基山以外，这一段将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段真正的山路了。多么心旷神怡的一段旅程啊——但没有很多人冒险到这里来，因为游击队、毒品战争和霍乱让人却步。

人人都听说过“光辉道路”，但哥伦比亚的游击队同样危险，在这里就像在秘鲁一样让我们担心。这些游击队不像“光辉道路”一样有公关天才，它的干部们也没被派往欧洲向其他左翼运动推销自己有多么多么好，它是多么需要支持，以及它是怎样的“第四冲击波”

我们开始非常担心达连断层。从哥伦比亚到巴拿马，这一段被人遗忘的路段延伸了 100 英里，乌鸦们来来回回地盘旋。这一部分是从火地岛到阿拉斯加之间的泛美公路唯一未完成的一段。因为沼泽和丛林，从没有行路人像乌鸦飞翔一样在这段路上尝试过。

实际上，从来也没人想过在这里铺上一条路，甚至修一条简单的小路。如果有某位企业家能在这里修条收费公路——不让地方当局把路从他手里抢走——他将暴富起来，因为这一地区的旅游业前景甚好。开辟这样一条路将等同于开辟丝绸之路、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道路，以及通往澳大利亚北部地方省的道路：繁荣的时期，有利可图的时机。可是为此他将必须与奔腾的河水、丛林、沼泽以及政客的贪婪作斗争。

谁会使用它呢？夏天驶往阿拉斯加去数数路上的美国越野旅行车的数量。美国人是坐不住的，他们现在开始去墨西哥旅游，不久之后，他们将向巴拿马挺进。在那里，他们又将用期望的目光向南瞭望，并盼望能南下得更远，但面前却没有路了。美国人不会把自己的越野旅行车装上船去游欧洲或亚

洲的，南美洲对美国游客来说是最明显的前沿。一条通往南美的路！它将带来这个时代最大的旅游兴旺景象。

我们找不到一本描述怎样由南到北穿过这一个断层的导游书。这些书都以为你只向南行，并且谁也没想到你要骑摩托车，我们必须思考怎样通过这一段100英里的沼泽和丛林。

塔贝莎的摩托风驰电掣般地闯入人们的视线，在很多地方都不断引来惊愕的注视。

无数的目光追随着她。当人们从她头盔后面垂下的金黄色辫子认出"是个女孩！"时，他们平板的棕色脸庞上露出震惊的表情。然后他们才回过头来说，"还有一个呢！"这时的我刚在他们惊愕的注视下驶过。

进入帕斯托看起来就像进入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哥伦比亚比厄瓜多尔还要繁荣，到处可见购物中心、美国车、商店、完全现代的建筑。我想是不是贩毒的收入已深入到哥伦比亚的南端并把这里变为兴旺的城市。虽然眼中见到的公寓使我们想起堪萨斯州的威奇托，但游击队在此间也很活跃。我们路过的同一天就有7名政府官员被刺杀，但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们继续向波哥大前进，路况仍然非常出色。

投资者必须亲自到这里来亲自发现繁荣景象，因为贸易平衡数据是无法反映这种状况的。毒品贸易的统计数字在此无法体现。也许有很多钱已转入瑞士或巴拿马了，因此中央银行并没有记录。

从帕斯托到卡利的道路很出色，但我们必须小心注意岩

石的突然崩落。路边每隔不远就有补胎和换胎的地方，它们的象征就是挂在路边的一只旧轮胎。我们发现世界各地这些店的象征都是相同的。这里的轮胎做得不如美国好，可是当地人永远用这种轮胎，他们需要一个修理轮胎的地方。这里的路边修理店比非洲、西伯利亚和中国都多许多，因为车流量多，骑车的人也多。

我们在这里遇上的黑人和南美混血人比南部更多。泛美公路的路边生活由于咖啡店、旅馆、水果摊和肉铺而继续热闹异常。

就如在瓜亚基尔和基多一样，我们在帕斯托的航空公司和船公司都打听怎样通过达连断层。

我们在卡利找到有船可以运我们通过泛美公路中间那间歇的一段路程。船不定期从布埃纳文图拉启航，但一位旅游代理肯定地告诉我们他们不会运摩托车。通往布埃纳文图拉的道路极差，而且我们还得翻过一座山。另一位代理认为船会载摩托车但肯定不肯载我们。

然后我们又被告知一家航空公司可以运载我们、摩托车以及一切，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费用还比乘船低。又廉价又快速吸引了我。只需几个小时，我们就能从波哥大前往巴拿马城。

事情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已学会直到真的到了出发地点并坐进机舱之后才算大功告成，否则永远也不要相信这种话。

在波哥大的航空代理说他有一批货正准备要运。如果我们可以第二天走，他可以把我们顺便捎走。这意味着我们在波哥大不能像原计划那样待那么久了，但也意味着我们不必

再冒一架飞机也搭不上的风险了。国家之间的交通从来都不简单。可能有人在下个星期想知道谁让我们上的飞机，我们是否运了毒品，是否是走私犯，谁准许运摩托车的，以及我们是否注射了疫苗。此外，他们把货物装进另一架飞机或许要用两个星期，而那时就不会有我们的地方了。

在机场我们发现北上的飞机是架货机。就像在北京一样，他们以前从未像这样运过摩托车，因此，没有什么规定可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他们甚至没让我们取下电池、抽空油箱。

登机轻而易举就办好了，只用了二三个小时，一切就搞停当了而不是一整天才办好，所以还要再过几个小时才起飞。我们又急急忙忙乘出租车赶回波哥大的黄金博物馆，这里的黄金制品比南美甚至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多更好。可是悲剧性的结局却是西班牙人将成吨的金制品熔制成硬币并运回国，想支撑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帝国。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飞机原来像卡车那么长那么空。一辆液压升降机升起了绑着摩托车的平台，把它塞进了机舱。我坐在厕所外的软长凳上。塔贝莎在驾驶舱里瞭望乡间风景，不住地赞叹，让驾驶员告诉她这告诉她那。我怀疑他们是否对我也有同样的热情，我读起了《国际先驱论坛报》。

我离开南美时，这个大陆比我初到时行情更看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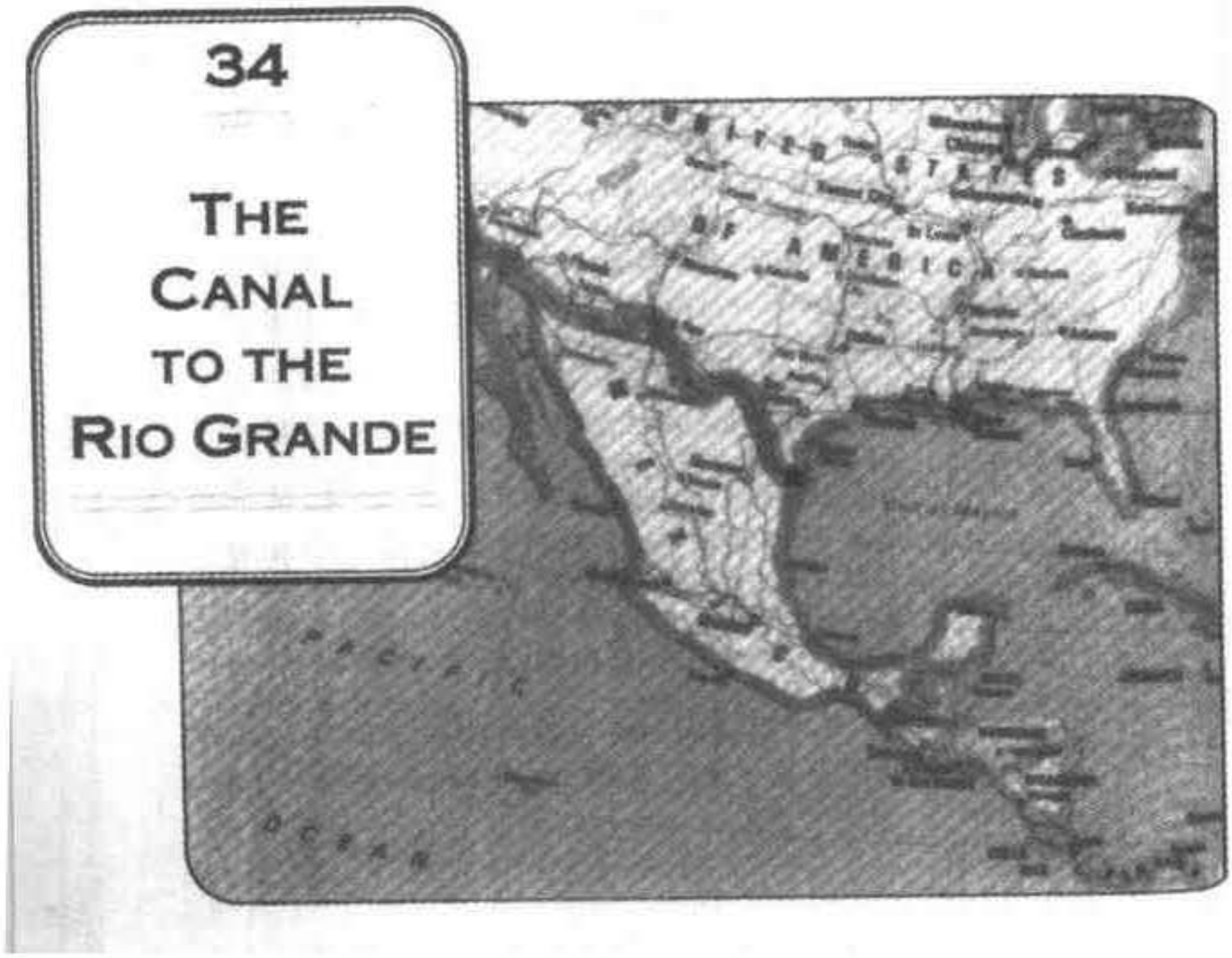
旧的独裁者和外汇管制几乎全都消失了，人们不再有心情容忍军方或左翼哲学教授的独裁。智利的经济奇迹对其他南美国家就像一块火腿：如果智利能改善富人和穷人的命

运，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能呢？

南美洲没有中欧和非洲那样的潜在的边境问题，这给它带来了稳定。西班牙人带来了两件好礼物：同一大陆许多国家通用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宗教罗马天主教。导致边境纠纷的第三大原因，即部落分歧几乎不存在，部分原因是由于早在19世纪时智利和阿根廷就杀掉了一切非欧洲人的后裔，从而解决了它们的部落问题。只有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还存在着拖延已久的边境争端。

南美洲人正在发展真正的股票交易所，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货币也越发稳定了。一个投资者还需要知道什么呢？我用在交易所购买股票的公式，在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以及阿根廷都买了股票。智利的繁荣虽然很诱人，但此时不是我进入该市场的好时候。

我很想看一看同样的经济革命是否也降临到中美洲。由于巴拿马运河的战略重要性，美国人已在中美洲干预了一个多世纪了。



34. 通往里奥格兰德的运河

THE CANAL TO THE RIO GRANDE

镇定地处理了祖德事件，然后我们飞也似地赶到巴拿马。与我们经过的地方相比，中美洲很小，差不多只有法国那么大，其2900万人口也只有法国人口的一半。

我怀疑巴拿马的好日子不会长久。也许今后几年的旅游业将兴旺发达一阵，但从长期看，随着军队和运河职员撤离，

该国的经济将会消衰。有朝一日这个世界将会觉悟并使毒品合法化，这将使洗钱业和银行业崩溃。

美元是巴拿马的正式货币，虽然巴拿马人称之为巴波亚。在美军撤走之后，巴拿马人实际上需要印他们自己的钱，因为我不知道除此之外他们还能从哪里得到更多的钱。在印钱的时候，拉美人有超额印刷的悠久传统。他们从运河得到的足够的美元可以短暂地维持国家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如果他们不对运河进行精心维修时就更是如此。

巴拿马城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前哨，一个美国殖民地。它让我们以为已回到了美国——有一家马丽奥特旅馆，还有肯德基家乡鸡和麦当劳。超级市场看起来就像美国的一样。我们甚至入境时不需要过境通行证，这几乎让我激动得眩晕，感觉就像一条深水鱼突然游出水面一样。我们被告知从这里到美国都不需要这样的文件，这就是为什么文艺巡演车能深入到这么靠南的地方的原因之一。

我们找到一家宝马摩托车经销商。除了通常的 1 万公里维修以外，行李架需要重新焊牢，我的一个后置减震器需要更换。天知道我们何时才能找到下一家经销商。我们的一本书中有经销商的名单，但这也许已是过时信息或经销商已经破产了。

巴拿马由于美军的存在而成为和平之地，但我们还是要进入 3 或 4 个战区。像往常一样，我们收集前方的信息。我们还得经过至少 7 个中美洲国家中的 6 个，虽然我们仍不肯定萨尔瓦多会怎么样，据说那里道路不错，但正值全面的见谁杀谁的战争期间。哥斯达黎加太平无事，但在尼加拉瓜，虽然

33. 达连断层之路段

THE DARIEN GAP

 了哥伦比亚边境之后的几乎 1 小时内，我们再次行驶在安第斯山的美景之中。在 45 分钟之内我们经历了山脚下的盛夏和云雾缭绕的山顶上的严冬，我们在山巅的云雾中穿行。我们进入沙漠，一片开阔地域，山丘，道路忽上忽下，变化层出不穷。对于喜爱驾车的人来说，这条路的风光是世界上屈

运河本身是现代奇迹之一。它耗资 4 亿美元，用了 75 000 人历经 10 年时间才建成。这笔钱在 1903 年可是不小的数目。运河建造者们遇到难题：热带疾病；地峡的不同寻常的地质状况经常使建造者面临滑坡的危险；巨大的水闸以及需要挖掘的土石方；需要建立全新的体系以进口每一颗钉子，组织规模可以与建造金字塔和马丘比丘相媲美。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船闸，运河把进入加通湖的船抬高了 85 英尺，加通湖在修建期间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湖。船只驶过其 23.5 英里的水面然后被降低 85 英尺高度进入另一大洋。

船只在运河中的通行并不循谁先来谁先过的规矩，它们需要早早提前预约。如果运河关闭几天，那么整个半球的航运都得停顿。

不幸的是，运河建于差不多 100 年以前，而航运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很多大船已无法通过了。即使船只可以通过，从大西洋的深水区驶过 50 英里距离抵达太平洋的深水区也要8－10 小时。

巴拿马运河现在在技术上已经过时了——太窄，船只通过所需时间太长。多年来造船厂设计船时得考虑是否能通过运河，船造得比理想中的又窄又小。然而，随着发动机和燃料效率的提高，船只只需几天而不是几个月时间就能绕过合恩角了，可以生产超级船只，避开巴拿马走合恩角。

供求关系再次失衡。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垄断着这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通道，不断提价。当通过运河需 10 万美元而绕合恩角需 97 000 美元时，船主就会选择运河，因为绕合恩角太不值，而当通过运河的价格是绕行的 2 倍，船主就选择

绕行合恩角了。

在世界史中从来没有哪种垄断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你曾经以为运河是最完美的选择,但世界变化了,并永远在变化。多数垄断定价过高或效率降低、懈怠、服务质量差。我们的邮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是由法律强加的垄断。除了美国邮政服务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许哪怕仅是往你的邮箱里塞一只信封。但即使这样,联合包裹公司还是揽来了包裹生意,因为顾客们付不起把自己的包裹交给邮局去邮寄的那份费用。

看大船通过运河真是赏心悦目的事。100 英尺宽的船身两侧留下的距离还不到 1 英尺。在运河所有操作过程中所需的这种高水平的军事精确度令我为运河和巴拿马的前景感到悲观。多数国家元首都会把拥有这样一条运河的巴拿马当做为自己的密友和政治仆从提供工作的源泉。

1990 年,1.3 万次的通行为运河赚取了 3.55 亿美元。在此前 10 年间,美国政府每年花费 1 亿美元精简运作改善运河设施。有没有获利?有谁知道呢?

美国在 1999 年撤走之后的第 1 年或前几年间,老的雇员将会把运河管理得很好,因为这些人一直在此多年了。但然后某个政客就决定如果让他外甥来做可以做得更好(记住,在这里每位外甥都需要工作)。看一眼账本后这位聪明的外甥会说,"嗯,我们的利润在下降。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润滑门闸?"或"干嘛要修补那条油船撞壁产生的裂缝呢?干嘛非不断地上油漆?干嘛为了不生霉点就要日夜开着空调?"增加利润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少维护。

最后,巴拿马的运河生意将会结束,一半是由于美国支持人员所赚来的钱将消失,另一半是由于维护的懈怠。巴拿马

人把运河错看成摇钱树了，谁也不清楚它是否赢利。如果有任何人们所清楚的事，那就是美国政府不知道怎样合理地做账，而且每当被花费的钱被列为国防项目时，我们的政府就会变得更加无可奈何。

中美洲在很大程度上比南美洲更受到北美洲的影响。有朝一日会有很多美国人开车到巴拿马再返回。我预见到有一天，阿维斯(Avis)租车公司可以租给你一辆车，你可以在巴拿马城还车，或者你可以在巴拿马城租车，一直开到塔尔萨。我们甚至能在加油站找到道路图，这在过去的四个大洲里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美国基本拥有这些中美洲国家的历史达150年之久。每当这些国家做得太离谱或变得太傲慢，我们就会过来施加点儿压力。在我的有生之年，这种事就曾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发生过。

哥斯达黎加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国民卫队，美国顾问教他们识图以及其他军事技术。识图？你会以为在这么多年以后他们的指导者早已掌握了这一方法，其实不然，我们的顾问仍然在那儿，仍然作为尼加拉瓜和我们在巴拿马利益的缓冲。随着飞机的出现以及今天交通的改善，运河的重要性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下降了，但将军们常常缺乏远见，仍然持续着上次的战争，如果不是再上一次的战争。巴拿马一旦变得重要起来，多米诺理论也就站住了脚。每一个巴拿马邻国的邻国都变得重要起来。

由于其美丽的海滩、山脉以及丛林，哥斯达黎加曾在不同阶段被美国人做为投资的场所。很多美国人退休以后在那里

定居。哥斯达黎加在过去的150年里曾经破产了三四次，但沿街叫卖的小贩总是幸免于难。该国的人均债务、财政赤字及通胀率都极高。我们听到要对移居哥斯达黎加生活的退休者加税的说法。这简直是杀死下金蛋的鹅的做法！从没有人会指责政府聪明。聪明的退休者将选择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墨西哥。

我仍然在哥斯达黎加做了投资，因为政府已决定发展股票市场。我到股市见了交易所的所长，是位女性。她正准备加入国际股票交易所协会。交易所官员接到建立股票交易所的任务，他们想看看世界上的其他人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

一旦她告诉我她正打算加入国际股票交易所协会，我本来可以立刻对她说，“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全部。买！就这么简单。”然后掉头就走。但我和她多谈了会儿，找到了一个稳健的经纪人开了个户头。将来这里的旅游业将大有可为。哥斯达黎加的主要经济工业是制糖、可可、咖啡及旅游业。可可、蔗糖和咖啡一直处于熊市，但如果这些农业市场重新兴旺起来，就将带动哥斯达黎加整个经济的腾飞。再没什么比牛市更能让投资者精神抖擞了。

我买了通常的那些种类：股票交易所最稳健的公司——最大的报纸、最大的酿酒厂、一家银行、一家农业公司，几乎它卖的都买了一点儿。我留下话，如果有更多公司上市就通知我，然后就上了路。

正当我们向哥斯达黎加边境进发时，我们被交通警拦住了。

“这个区限速50公里，你们都开到80公里了。”中士用西

语说。

“不是,”我用西语争辩,“贵国政府的地图明明说限速80,除非另有标志。”

“不是,城里限速50,”蒙多萨中士说。

“什么! 这里全是雨林。30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城市。”

“后面有标志说限速50公里,”他坚持,“你得交罚款。”

“我们回去,”我说,“你指给我看。”

我们像旅行队一样往回走了25公里,15英里。他骄傲地指给我看一个竖在我们前进反方向的限速50公里的标志牌。

“这是另一个方向的,”我用英语说,“这是往我们刚出来的那个城市方向的,你这愚蠢的狗东西。”

蒙多萨中士只懂一个英文词,“狗东西”。

“你侮辱执法官员,先生,”他说,“你还超速到88公里。跟我们走吧。”

我们都到了总部,一位上尉出来,我们双方各讲了各的故事。当我们讲话时,塔贝莎注意到一个士兵一点一点地蹭向我们的摩托车。

我立刻怀疑他要放毒品诬陷我们。我走过去说,“嗨,你想干嘛? 如果你想看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拿给你看。”我们早就得到过警告,在非洲、南美和中美洲,如果警察想整谁或把谁抓进监狱,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我们就像头号目标。

我交了罚款,表现出合适的谦虚。我说我骂了蒙多萨中士狗——如果我骂了他狗东西,那么我抱歉。

实际上,这是我们环球旅程中得到的唯一的超速单。

在经过边境哨卡进入尼加拉瓜之后，我们在几英里外遇上一个检查站。几英里之后又是一个，然后又是一个。

有时当兵的太忙于检查排队等候的汽车，这时我们就径直骑过去，他们都不会理睬我们。可多数情况下，检查我们是这些当兵的一星期枯燥生活的一件事。除了仔细审查我们的证件外，他们想和塔贝莎调情并贪婪地注视我们的摩托。如果我们幸运，这一切只要 15 分钟就够了；如果倒霉，45 分钟。我们总是说服他们不要什么都查。

在过了第 10 个检查站后，我已忍无可忍，即使我知道生气一点儿好处没有。在耽搁了数万英里行程之后，我不断尝试要自己忍耐旅行中这些不可避免的障碍，但该国全程 240 英里，怎么，要设 20 个检查站？每隔 12 英里 1 个？理智地讲，我什么都能理解。桑地诺和反政府武装已渗透到军队中，这个国家需要对他们采取点儿措施。

我问："为什么你们要查这两本护照？如果没通过一个又一个检查站，你以为我们能到得了这里吗？我们是在这个国家的中部——你难道以为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是在雨季在中美洲穿行。幸运的是每场雨都没下很久。

当我们在疾驶时，有时会看到前方一道雨帘，就像从空中喷射而下的瀑布。我们停下，披上雨衣，而后再行。不像美国的雨开始极小，在这里我们会遇上一堵雨墙。几分钟后，我们就会离开小暴风雨，就像从瀑布底下驶过一样。

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是个建筑衰败、到处枪眼的破旧城

市。这里没有浮华、光彩、什么都没有。战争拖垮了大家，拖垮了一切——人、建筑、环境。

这个国家的390万人为了并不体面的原因成了死亡的炮灰。一个机关枪手的掩体转弯处写着“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可怜的希望。

30年代罗斯福从尼加拉瓜撤走了海军陆战队，使得索摩查当了权。之后，不同的家庭成员统治了国家直到卡特总统不再支持他们，因此左翼的桑地诺接管了政权。

桑地诺赢得了选举。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噢，我的上帝，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了。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在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赞叹吧！”瑞典人送来了钱和志愿者。《国家》杂志组织其读者到此一游。俄国人送来卢布。丹尼尔·奥尔特加，桑地诺的领袖，把自己送到了莫斯科。自然，桑地诺是卡斯特罗的好朋友。自然，我们开始资助反政府武装，这最终导致了诺思上校和伊朗门事件。

世界对这个小国勃然大怒，毁了它的财富，因为其政府或许是假扮的共产主义政府，另一块多米诺牌倒了。

然后反政府武装赢得了下次选举。令反政府武装惊愕的是在交出权力之前，桑地诺把土地、工作和收益分给了支持者，正如普天下的政客一样。

如果这么多人的性命没有被这些匆匆而过的意识形态战争毁掉的话，那么这个事件真是滑稽可笑。

我们在哥斯达黎加决定穿越萨尔瓦多而不是绕开它。我们开始对通过战区变得无所谓，尤其是还得再驶过3个战区

呢，这一点却让我担心。

这里找不到高辛烷汽油，我对在萨尔瓦多能否找到这种东西更不抱乐观态度。

甚至离开这些国家也费时间，哥斯达黎加出关用了 1 小时，尼加拉瓜出关用了 1 个半小时。

在洪都拉斯入境更艰难。我们在边境受到了几个月来最彻底的搜查，而且在这一荒谬过程中的每一步骤，我们都得施以小恩小惠。

我们找到一家体面的旅馆，晚上去看了正在城里演出的美国国际马戏团表演。我们坐在前排，塔贝莎被称为“老外”。

旅馆的淋浴器坏了，我们只得再次用桶洗澡。我找不到明信片，因为没有什么旅行者到这个方向来——邻国的战争太多。

从萨尔瓦多边境到其首都圣萨尔瓦多的路上，我们不断碰上士兵。我看到了被战争毁坏的第一座桥，河上的桥身有一段倒在河里，我们就从临时的浮桥上驶过。看到这些令人痛心，天知道这些人用了多少年才建成这座桥，桥对他们是多么重要而造桥又花了多少钱，而一些自我标榜的救星竟把它炸了。

圣萨尔瓦多是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即使它正处在一场可怕的内战的中心。我们是星期天进的城，正遇上交通阻塞，到处是汽车。街道生活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扑来——室外咖啡座、小摊，以及走来走去的人们。我们品尝了鳞蜥，味道像鱼；还吃了烤犰狳，味道如同烤制了一块气味浓烈的鸡排。

与马那瓜形成强烈对比，圣萨尔瓦多看似洛杉矶。纽约

由于人口的稠密而比盐湖城更令人激动，更有活力。由于同样的原因，圣萨尔瓦多也令人激动，它竟容纳了这么多的人。

萨尔瓦多政府开始了一个特别项目——建立股市，可望在一年内开市。

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决定在此投资，我觉得最糟的局面已经过去了。该国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但也产鞋、家具、化学品、化肥、药品、化妆品——这张单子上的东西很多很多。制成品的出口，主要是向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出口，占其外汇收入的24%。而这一切却是在右派和左派打了12年的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了12年之后仍然得以发生了。这场20世纪末的典型冲突将令我们的曾孙们惊奇地摇头，正像我们今天对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摇头一样。

在这里，大家都厌恶战争。广告牌上画的是个残废的孩子，写的一行字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的感觉是这里的人民在说：“够了够了，让我们赶紧结束这该死的东西吧。”别的国家再没什么钱可以投进来，美国人也厌倦了这件事，因为每当我们翻开报纸总会看到我们的盟友又杀了6个尼姑或炸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别的让我们讨厌的事。双方的海报都宣称，“我们再也不想做这种事。”

我寻找投资的途径，最后找到了负责发展股市的人。他30多岁，上过东北大学。我到这里的时间比正式开市的时间早了差不多1年，所以如果我想现在就买就必须做反传统的事，也就是先从最后做起。

因此，我做了几乎从未做过的事情：我买了一个大私营项目即新开发的自由贸易工业园的股票。我看到战争即将结

束，而且预测咖啡和蔗糖价格以后肯定会上涨。我肯定萨尔瓦多定会成为赢家。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给这个地方充气，所以我知道战争结束后我们将投入数十亿美元。我们不会让萨尔瓦多在这一切发生之后走向失败。

在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做点儿投资并不像1945年在日本或德国投资那样大有前景，但谁都无法否认这些国家已跌到了最底层，更糟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们在危地马拉北部蒂卡尔停下看据称是最好的玛雅废墟。

蒂卡尔在巅峰时期即公元500至公元1000年曾是个拥有5万人口的大城。当西班牙人于16世纪进入尤卡坦时，他们只发现玛雅人的原始后裔，这些可怜的土著人除了他们祖先的传奇之外一无所知。

巨大的建筑屹立于几平方英里之内，原始的摩天楼在茂盛的丛林中高耸入云。这个文明经历了3400年，在时间和复杂性方面堪与埃及和中国文明相提并论。玛雅文明覆盖了相当于法国那么大的地区，包括现在的危地马拉、伯利兹、墨西哥的一部分、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光蒂卡尔一地就有3000座建筑，庙宇、宫殿、神祠、仪式平台、普通住房、球场、台阶、堤道和埋葬穹穴，这是历经1100年不断建设的结果。若不是因19世纪的某个野心勃勃的企业家披荆斩棘地在丛林中寻找制作口香糖的原料树胶而看到了这些巨大的石制结构，所有这一切或许永远也不会重见天日。当他发现蒂卡尔时，这些高大建筑只有顶部高出掩埋它们的土墩几英尺。无所不能的丛林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用土盖住了这些硕大的建

筑。如果事情发生在10年以后，那这位企业家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发现，那么蒂卡尔的光芒就将永远被埋没。这个故事与复活节岛的故事以及我们见过的许多其他景象让我浮想联翩，还有多少数百年数千年的文明甚至永远没有被现代人发现啊。

根据神圣的玛雅球赛规则，赢队的队长赛后为了纪念胜利要被作为牺牲献祭，这种做法令我们不解。人类献祭就像战争一样是我无法理解的人类发展中的一方面，正如我无法理解或容忍把生杀大权交给国家来决定的死刑一样。在18世纪的法国，饥饿的人因为偷面包而被处死。想一想在历史长河中为了那些我们现在甚至都不惩罚的"罪行"而被处死的数百万的人们吧——他们死去的原因仅仅为了是个基督徒、交换货币、不戴面纱、不参与集体、不支持罪恶的独裁者……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毒品"罪犯"由于一个告密者的一句话就被处死，他自己也受到来自国家的高压威胁和巨大压力。竭力支持州长的起诉人并不特别在意判谁有罪，一桩死刑案可为他们的努力添加另一份奖品。今天在"文明"国家里，只有俄罗斯、中国、美国和南非仍然处决罪犯。

纵观历史，无数无辜者被处死。我们读过多少描写谋杀者被绞死，而后来受害者又活过来的故事呢？如果被处决前知道这一切都是错误——也就是实际上你自己是清白无辜的，那将是种什么滋味啊，我不寒而栗。

在蒂卡尔废墟里，考古学家找到十几万件工具和器具，以及100多万件陶器碎片，借助于用碳含量测定年代。他们估

计所发现的仅是冰山的尖,还需要一个世纪的挖掘和鉴定才能够完全了解这些古人。诺斯卫城用了1000年才建成,因此仍保留了许多更古老的建筑,使得考古学家可能揭开这一文明发展之谜。玛雅人在其计算体系里已开始使用零和位置数字,这比欧洲开始使用这种来自印度和阿拉伯的复杂计算法早了1000年。

这是考古学家们迄今为止发现的石器时期文明的最高成就。人类的适应性可以使之运用本身现有的能力发展到极致,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和建筑。如果他只有石头,他仍然能创造出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有时比用钢和铁创造出的文明更为详尽。

看着这个有数千建筑的地方,我被人类建立社会组织和等级的趋向所震动。最高权威看来是宗教和世俗的结合,好像统治者既是高僧又是总司令。就像法老一样,他是半人半神。他和他的阶层致力于世俗的平常事务,同时也致力于追求石器时代的科学和艺术发展。

而他们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啊!在佩滕的庙宇金字塔高耸225英尺。在尤克思马,一座建筑就耗费了45万立方码的材料,100万吨切割的石块、砂浆和大块建筑材料。科潘卫城占地12英亩,高125英尺,耗费了250多万立方码和500万吨材料。所有这些建筑都不是一个周末建成的;它们都是一个繁荣的社会的见证,一个森严的等级和中央化管理的见证。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遇到很多类型的社会,虽然社会结构各异,却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伟业。我们此刻正站在僧侣政治国家的废墟上,但我们已经过了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制度,以

及从迦太基人到阿兹台克人的许多君主制的古老文明。令我感叹的是每种制度中都盛行等级结构。不论制度是由谁组织的，僧侣也好，某个政党领导人、男爵、国王、资本拥有者也好，总有人处于最顶层，也总有人处于最底层。即便我们可以奇迹般地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不管制度如何，用不了一天，那些野心勃勃和那些聪明之辈就会想出获得大一点儿的草棚或甚至两个草棚的计划。既野心勃勃又聪明的家伙将很快给自己搞到十几间草棚，而你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自封为王，他的儿女也被封为王子公主了。

在我看来，这就像社会动力学规律。

我在墨西哥买了一些用浓稠的辣酱烹制的草蜢。塔贝莎不吃，可我觉得比非洲的烤白蚁还好吃。

正如我们预见的那样，政府拥有的派麦克斯加油站垄断了市场，并且服务极差。

这里的人是混血儿，不同于自从我们进入哥斯达黎加以来所看到的上著人。墨西哥人比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所见的人似乎更老练。他们甚至更时髦，生活更富裕。我们在此发现了露天咖啡座和露天音乐会。墨西哥正在像阿根廷一样卖掉国有银行、电视台和其他公司以搞活企业。股市是报纸的重要新闻，所以繁荣景象一定已接近顶峰了——至少暂时如此。

我们跳过了墨西哥城，放弃了领略其污染的机会。我们沿着一条经过塞拉马德拉斯的很棒的公路前往普埃布拉。墨西哥第四大城普埃布拉真迷人，它的很多街道保留了旧殖民时期的建筑，阳台、瓦、精致华丽的装饰、塔楼和教堂。这个城

市又让我想到在16、17和18世纪当美国仍只能看到一片矮树丛时墨西哥和秘鲁已是多么辉煌多么富足了。这里涌现出拥有自己的艺术、文化和宗教的许多文明中心。不幸的是，市民们的钱来得太快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投资，不需要生产并筹划未来。他们的问题在于怎样快速地花钱，他们确实把钱花在纪念物、马车、房屋和教堂上了，而没花在工厂、运河和道路上。消费以及不为将来投资——难怪他们的荣耀如此短命。

这次旅行将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情，现在值此即将结束的时刻，我心中思绪万千。我与自己在心里斗争，说服自己。旅行即将结束了，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太艰难了。我多想它能持续得再长久些，想得心都胀痛，但同时旅行看来即将圆满完成也令我高兴。

坐在宽敞了一些的飞机上，我为我国感到悲哀。在我们所到过的每个国家都在解开遏制了自己几十年甚至几世纪的国家集权的结。大家都在摆脱各种社会经济束缚，可美国却背道而驰，不断地进行控制，制定规则、规定和法律以控制其公民、生意、学校和慈善机构，这是苏联、拉美人和非洲人曾用来扼制自己的主要方法之一。

我们发现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试图把自己发展成他们心目中的我们从前的样子——确实有段时间我们就是那样的。

今天，许多欧洲和日本公司痛恨与我们做生意，因为我们稍有小故障就动辄起诉，而且众多的规章也消除了一切利润。举一个令摩托车手痛心的例子，宝马公司不愿在美国卖它的质量极好的摩托车头盔。规章、保险、潜在债务、可能发生的

抵制以及法律诉讼使其丧失了一切兴趣。法国避孕药丸RU-486的生产厂家极不愿在美国销产品。因为我们有很多规章、规则，这样就给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处理文件的工作，因为公司必须雇人来执行这些规则。我们的博士们都淹死在文件和联邦手续的海洋里了，他们通常每周花20小时处理文件。



我们真能开到那儿吗？我很伤感，因为旅途就要结束了，但也很兴奋，因为我们胜利了。就在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一位"礼让"的得克萨斯司机故意开着车撞倒了我的摩托（路牌上写着：欢迎来得克萨斯。礼让驾驶是得克萨斯的传统）。

我们的中央集权的恶梦无穷无尽。根据洁净空气法案，雇主必须积极帮助雇员寻找开车上班以外的其他方式。根据

伤残法案，雇主必须留下那些工作时神经衰弱的雇员，必须给他们做他们能做的工作。虽然我们如此需要出口以赚取收入，甚至在1994年，还有很多美国城市和州不与同南非有贸易的公司做生意，虽然实际上每个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已经这么做很多年了。南非和越南一段时间以来已发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被邀请参加两国的盛宴。而美国人直到甜点上完之后才出席，还有时间可以吃些残羹剩饭。

美国无法与那些没有这些繁杂要求的国家竞争，这些规矩要求从长远看能对我们有多大好处呢？也许这些要求是值得的，但总得有人对此付出代价。你知道是谁，你和我——最终将是整个国家的繁荣成为代价了。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应该有利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加利福尼亚都能与密西西比互相做免税贸易，为什么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不能呢？我们忘记了自由贸易是大英帝国成功的一个大秘密。英国人给殖民地带去资本、市场、管理和技术知识，而殖民地则提供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商业成功的屡试不爽的秘诀。

很多用心很好的美国人并不这样看。在墨西哥北部的工业区有50万墨西哥人为美国公司工作。杰尼斯付每小时1美元工资，福特付1.25美元，通用汽车和通用电器每周仅付给数百工人30～40美元。

如此低的工资使许多美国工会和工人生气。我们怎么可能竞争得过？美国当然应该保护其公民的工作了。

我不这么看。实际上通用电器卖给墨西哥的价值7.5亿美元的货物比通用电器所有设在墨西哥的厂家卖给美国的价

值5亿美元的货物要多。这一顺差也是我们每年与墨西哥50亿美元贸易顺差总数的一部分。根据商业部的估算,美国每出口10亿美元就能支持2万个工作,通用电器对墨西哥17.5亿美元的出口就支持了1.5万个工作。我们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我们与墨西哥的贸易在国内产生了10万个额外的工作。

随着墨西哥继续发展并消除保护主义,我们将卖给它更多产品,尤其是汽车、电脑、医疗设备和机床这样的高技术产品。墨西哥每16人才有一辆车,而美国每2人就有一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将给我们而不是日本人带来多大的机会啊。

墨西哥在最终摆脱了中央集权的局限之后将会大发展。随着它发展规模的扩大,它将需要发展基础设施。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已预测墨西哥从1989—1999年之间的电力需求将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在这种扩张性的兴旺过程中,它将花费数百亿美元。通用电器墨西哥分公司总裁预测他的公司最近接到的建造萨马拉尤卡二期电站工程的一笔订单价值2亿美元,它将在谢纳克塔迪、纽约、格林维尔、南卡罗来纳产生700多个雇员年的工作。这对美国有什么坏处?

从长远看,北美自由贸易区把三个天然的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我们有一些资金和市场,加拿大有自然资源,墨西哥有充裕的劳动力和正在扩大的市场。

是的,这里的工人将产生思想上的波动,但是我们难道应该为保住数千钢铁工人的工作而剥夺2.6亿美国人享有廉价钢铁带来的益处吗?

是的,我们甚至或许在今后几年内失去25万份工作,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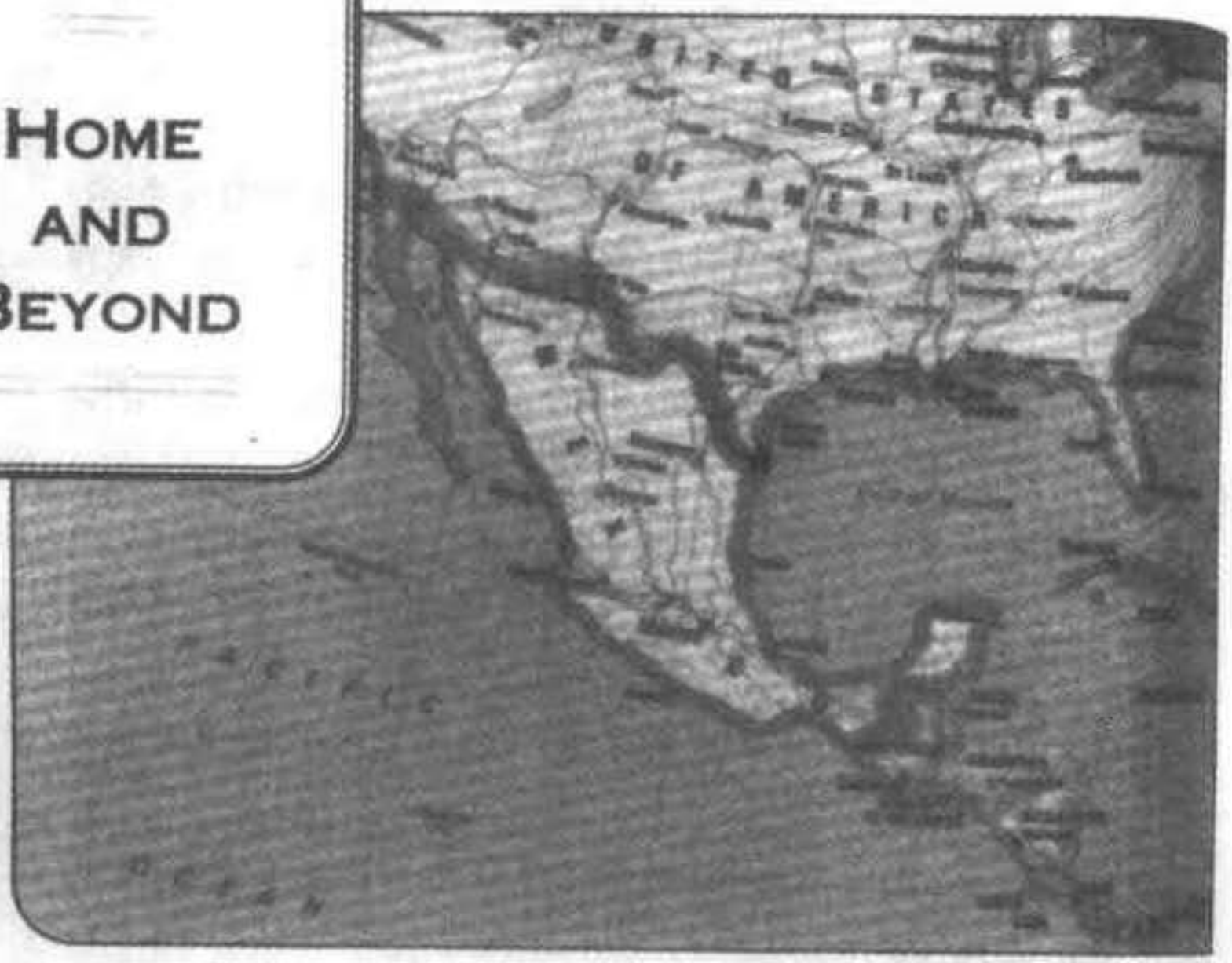
我们却会得到另外 50 万份工作。23 岁的祖·史密斯在两年之后将开始工作，为墨西哥生产空调机，他本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这份新工作，他也没与其他幸运的美国人一道组织起来去争取它，并且也不去游说他的议员。

令我担心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美国由不同的州组合而成。共同市场也是由不同国家组成。美国的州有穷富之分，有财力雄厚与濒临破产之分。共同市场也同样如此。可是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而绑在一起的是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上濒临破产的三个最大债务国。这是个使三国都受益的好计划，但从来没人把三个这么大的破产实体绑在一起过。最终，事情有可能演变为三个醉汉互相倚靠着跌跌撞撞而又徒劳地试图寻找回家的路，但总体而言这一计划将使大家都受益。

风险在于三个精疲力竭的国家也许尝试独自重新结盟并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制造障碍。正如共同市场一样，这将是最糟糕的结果，其中孕育着我们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我们将放弃学习怎样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成功的竞争。

35

HOME AND BEYOND



35. 归家，再次启程

HOME AND BEYOND

我们通过了美国边境到了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我们晚餐用炸鸡和蓝带啤酒作为庆祝。因为喝啤酒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坐在停车场的外边，但谁在乎。我们成功了。

我震惊于得州南部的西班牙化。布朗斯维尔基本上就是一个西班牙式的城市。甚至自从 19 世纪某时就开始存在的布朗斯

维尔报纸现在也以西文印刷。

返回美国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了休斯顿一个朋友乔治·斯塔克的家。这是我们近两年来首次与美国人在一起。我感到文化的巨大冲击，几乎眩晕了。

我朋友的妻子劳艾思对我们的旅行极感兴趣，她不断地问我们："旅行是如何改变了你们？"

我们难以意识到自己已回来了。我们还在担心着过境，找汽油，还在想我们的轮胎是否还能支撑，前面的路铺过没有，以及到哪去找一间体面的房间过夜。她问了一大堆感性问题，但我所能低语的只是"我希望下次见面时我能更好地回答你的问题"。

我变了，但我说不出产生了何种变化。我们向东行进时我开始沉思这个问题。

我知道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彻底放弃旧生活，开始全新的生活。我盼望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如果我能找到合适的路，我就会知道并继续走下去直至到达巅峰。如果我能找到那条合适的路……这次旅行能让我产生一直在孜孜不倦寻求的对事物的顿悟吗？

我们继续前进到了新奥尔良和亚拉巴马，我表兄妹佩特斯和卡西·兰丹为我们设烧烤宴以庆祝回家。

其他人都着意修饰过，但我仍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我把我们颜色丰富多彩的世界地图钉在墙上，追循着我们的足迹，回答着问题。

这一切结束之后，一位晚来者在一角问我，"旅行怎么样？"

“还没结束呢，”我说，“我们计划在几天内到达纽约。”

“我的上帝！”他说，“别跟我说你们要从亚拉巴马一路开摩托车去纽约！”

沿着海岸我们参加了许多晚会，在蒙哥马利、伯明翰、亚特兰大、夏洛特、华盛顿和费城，我们忙于访友和与友人共进晚餐。我们见得太多了，离开得太久了。我太理解马可·波罗试图向 13 世纪的意大利人描述中国的辉煌和经历过的那些困难了。

我一直提醒塔贝莎不要因为快到家了就太得意，但摔下摩托车的人却是我自己。事情出在田纳西。我又在晚上赶得太厉害了，想赶出更多的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安然无恙地环行世界之后，我最终出了事故。我折断了一根肋骨，折断了手上的两根骨头，还割伤了下颌。

我们驶进费城，正遇上高峰时期的交通阻塞。

上帝，我想，世界上的交通阻塞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在 11 月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伴随着肖邦的明快跃动的旋律驶进了纽约。

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离开了 20 个月。我的里程表显示出 57 020 英里，而我们还没去阿拉斯加呢。此外，算上坐船和飞机的 4 万英里，我们一共走过了几乎 10 万英里。

到家了，我们感到虚弱，激动得泪眼婆娑。我迈进家门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希望旅行仍未结束，但我还想知道是否一切无恙。在过去的两年，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成箱的邮件堆在厨房的地板上，我还需要解决所有那些祖德制造出的问题。

我查看整幢房屋，从地库直到屋顶，满意地发现一切仍像我离开时一样。虽然时值11月17日，屋顶花园里竟然盛开了两朵黄玫瑰，我认为这是个带来好运的迹象。

我们打开一瓶珍藏的酒，享用了豆子、米饭，并且两年来第一次尝到了羽衣绿甘蓝。

第二天早晨，我去参加9点的董事会。

“我有一阵儿没见到你了，”一位先生问我，“你一直都在干什么呢？”

“我刚刚骑摩托车环游了世界。”

他笑了，并说那很不错。

要打动纽约人真不容易。



后　记

我于12月把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买的金项链送给塔贝莎，她既惊讶又高兴。

稍事休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这次目的地是阿拉斯加，使我们的总行程增至65067英里。

我们到那之后发现育空和阿拉斯加的人与渥太华和华盛顿特区的人是多么不同。正如我们经过的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一样，这些人不是都市生活的参与者，不善表示过分亲热，他们是一群独来独往、持不同见解的人，是其居住区的恶劣自然条件造就出的粗犷坚强的民族。阿拉斯加离华盛顿相距数千英里，几个时区，它的人口只有50万，面积却有南边48个州的1/6。

阿拉斯加人怎么能允许华盛顿操纵他们的生活？平原地带的鼹鼠又对他们可爱荒凉的国家了解多少呢？阿拉斯加人在华盛顿只有1个众议员和2个参议员，这意味着首都极大地忽视其居民的意愿。

事实上，阿拉斯加人与他们在育空和西伯利亚的邻居之间的相同点比他们与华盛顿、渥太华或莫斯科的官僚的共同

点要多。如果这三个矿产资源极丰富的地区把自己结盟为独立的边疆国家，就可以吸引巨额的发展资金。

塔贝莎在近两年的旅行中开阔了视野，她现在已上研究生院学习国际关系，虽然她也许比那些只懂书本知识的人更适合教这门课。

这世界变化得真快，我在美国以外的几个其他国家都做过交易，包括澳大利亚、意大利、土耳其和爱尔兰，当我们路过这些国家的时候，投资的时机并不合适。土耳其的市场不仅下降了85%，而且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为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非洲国民大会党变得更温和了，至少是出于谈判和选举的目的，于是有段时间我在南非股市投了资。我甚至开始把小额资金注入其他非洲国家，因为这个大陆发生了变化，就像我预期的那样。

祖德的逮捕证已经发出了，但警察告诉我，虽然他承认曾数次伪造我的签字，也不值得他们费那么大力气去引渡他。刑事司法体系太专注于其他罪行而不愿去追捕已承认犯罪的罪犯，这令人悲哀。

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现在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了解了这个世界，这不仅帮助我更好地掌握投资，而且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作为一种物种到底是谁。我们当然比中央集权的那些政客更有活力，更寻求解决所想得到的——真正的也好，想象的也好——每一个问题。

在以这种方式真正地认识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之后，我回来了。人们跑来问我，我认为美国怎么样。我真不愿意说，因为这是我的家，可是，我认为美国显然是个卖空。

后　记

看到这个国家中的我们仍是那么毫无指望地守旧和孤立，真令人痛苦。更令人可怕的是政党既没有也不愿意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

在世界各国，我们亲眼看到中央集权的桎梏给众多国家带来了何种结果，而且我清楚地看到在美国，这种状况在最终好转之前将会变得愈发糟糕。

我相信克林顿将是他的党的最后一位总统。自由党的劳埃德·乔治于1918年成为英国首相。在英国人眼中，他和他的党赢得了一战，他和历史上任何战后英雄一样得人心。

然而，英国经济、体系、社会、货币——你尽管列举——简直乱成一团，就像我们今天的状况一样。虽然劳埃德·乔治是他的党的世界著名领袖，而且这个党已经主宰了英国政局数十年，可是由十乱成一团的局面，他的党再也没有产生过第二位首相，正如克林顿将是他的党选出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一样。在关键的1992—1994年期间，民主党人控制了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因此他们会受到很多的埋怨。民主党人也有严重的支持率问题。几十年以来，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1) 大萧条时期改变党派的人，而现在这个人数也在下降；(2) 不断丧失权力的工会；(3) 正在大群大群弃党的南方白人；(4) 黑人，而他们从黑人那里别想得到超过现在的80%的支持率。民主党人，不仅仅像英国自由党那样消失。实际上，自由党在数十年之后仍然作为少数党而存在着。不，民主党人将消失。

不要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有很多事也该怪共和党人。如果他们不做点努力尽快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那么，在民主党人消失之后，共和党人的分裂或死亡也将降临。我焦虑地听到共和党人说他们将在2002年平衡预算。在我看来，他们

后　记

不懂问题何在。我们的境况太严重了，需要现在就着力扭转。2002年将太迟了。即便假设现在的政客说的是真心话，可我们自1979年以来听到同样庄严的承诺已不下10次了。我们甚至通过了要求平衡预算的法律。如果他们一旦做出了一份"平衡预算"的报告，我们应该都坚持雇用独立的审记员来剔除他们做账时的虚而不实的东西。

共和党的言谈、规章和要求可能比民主党的要好，但我们需要的是更好，愿意看到的是更快的结果。

尽管这看起来令人震惊，但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场景吧。世界上的看似永恒不变的政治结构正在崩溃。谁能想象非自由民主党统治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控制意大利的那些政党已被取代并或消失了。看一看加拿大、比利时、瑞典和墨西哥所发生的事。在冷战时期，全世界的选民接受了许多荒谬的废话，因为他们不敢问太多问题。现状的巨大改变不知将把世界引向何方。

冷战结束了，所以世界人民可以自由地对旧的假设提出疑问了。

我们的体制已腐烂、已腐败，并充斥着债务，有一点再明显不过，也无需掩藏，那就是无论政客怎么努力，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它都将成为一场巨大危机的中心。

我们的政客，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多年来一直奉行降低美元价值和使其贬值的政策。罗马人用了400年，西班牙人用了200年，英国人用了75年降低币值的速度也不及我们在数十年贬值的速度。管理政府的那些人不在乎，而联邦储备宁愿救政客也不愿救货币。我看不到美元有多大希望。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疲软货币带来的后果，据此分析，我认为我们

的境况将继续恶化。我们将更频繁地听到“货币危机”这个术语。世界不会结束，毕竟英国还在，西班牙也还在，但现在它们只是自己以前的影子了。英国是1920年世界上最富、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但早在50年代，它就发明了“人才外流”这一术语，那时人们已开始离开英国了。

我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如果我们在生产性领域投资，就像我们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那么情形还不至于太糟。但我们的投资却用于政府津贴、战争、对马海毛和蔗糖这种作物的农业补贴、利息偿付、坦克和洲际导弹上了，以上没有哪个方面能增加未来的生产力。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我们的军队仍然占领着欧洲和日本，年耗费1500亿美元。虽然大规模的宣传使人们明白这种做法的愚蠢，可是我们仍然给农民发放巨额补贴，而实际上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他们运到西伯利亚或扎伊尔去，那样他们都会发财了！

为什么五角大楼告诉国会它不再想要马海毛已30年了，可我们每年还要为这种东西破费5000万美元？

美国有5000名种糖者。我们大约每年花50亿美元来维持糖价，这样计算下来，每个种糖者大约100万美元。如果我们去对这些种糖者说：“这里是10万美元，1年的生活费，足够买海滩边的一幢公寓，还够买辆宝时捷。我们要你们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再也别去种甘蔗了。”如果这样，我们将省下一大笔钱。而进一步的讽刺却在于，浪费就先不提了，蔗糖支持计划所耗费的大量开销，实际上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由于对糖价的支持，美国的2.7亿消费者要付高于世界糖价2倍或3倍的价格。我们也毁了我们拉美盟友的经济，因为他们无法把自己的天然产品糖卖给我们。

后　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每一计划的背后都有一批支持者——糖生产者、马海毛生产者、国防工业、军方本身——他们在国会大厅里走上走下以保证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

增税以支付这种误导的浪费的计划的例子是如此数不胜数，简直是疯了18岁的年轻人应该上街抗议这种事，因为他们是损失最大、受害最大的一群。我们给他们挣来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

我们政府此时此刻最主要的关注应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以保证预算有稳健的财政基础。智利使其经济走上正轨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个好经验。如果这样一个比我国更糟的、经济上是个空架子的国家都能在15年之内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处境，那么，我们理应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同样的事——如果我们有合适的领导层、有足够的耐力的话。

那么应该减税吗？当然，但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税收的水平而在于税制本身。我们需要彻底改变这种不利于储蓄和投资的税收结构。如你有幸得到一份工作，你挣的钱要交税。如果你把一部分钱存入银行或共同基金并得了利息或红利，你还得交税。如果这种投资为你赢得资本收益，那你还得第三次交税。

其他国家不是这种做法。我们周围的其他国家——日本、德国、新加坡等等——鼓励储蓄和投资，他们不征税。他们征消费税。我们却正相反：我们鼓励消费，并征储蓄税。

我们的储蓄率是4%，日本的储蓄率则高出我们5倍。存款愈多意味着投资的资金也愈多。投资的资金愈多就意味着生产率愈高。生产率愈高就意味着生活水平愈发提高——

正是过去20多年来我们所缺乏的。

这是一条极为简单、浅显易懂的自然经济法则：你对这种东西征税，你得到的这种东西就愈少。

我们需要改变美国的做法。我们必须废除一切储蓄税和投资税。我们应扔掉现在那几千页长的税则，而代之以一种固定税。在这个国家里，大笔的钱和精力都用来与税则和逃税较劲了——当我们辛辛苦苦实现了2%的增长时，至少国为生产总值的1%都花在这方面了。我们可以制定一份5页长的税则，也可以像寄明信片似地把我们的所得税寄交。我们应将消费税列入固定税，使得人们感到花钱比存钱更昂贵。

然后我们应该取消一系列消费性的政府计划。华盛顿用于坦克和导弹上的花销太巨大了，这绝对无益于提高未来的生产率，用于转移支付上的钱也太巨大，也无益于生产率的提高，无益于国家的未来。18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不上街抗议呢？

这也许更为激进，但为什么要允许议员们去华盛顿，在华盛顿，议员们作为一个群体更容易被游说？我们就让他们待在本区，通过视听会议开他们的会，通过电子系统投他们的票。如果这个国家的游说者要奔走于535个区，那么我们的法律将会大有改观。如果让各地银行家、教师和管道工在中学体操馆观看我们的议员们投票而不是让游说者在华盛顿看着他们投票，那我们的日子是不是会更好过一点？此外我们还可以省下来往华盛顿特区的旅费以及国会庞大的人事所引发的浪费呢。

既然我们已说开了，那么何不把选举的日期也改在4月15日。11月并不是随随便便挑的，这一天恰好是我们交税的

后　记

6个月前和6个月后。让我们在交税的同时挑选我们的政客吧——就像我们生活中做一切其他事一样。如果我们知道为一张选票得付出多少代价，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把这张票用得更有分量。

我的一条主要哲学原则就是如果房顶漏水，最好及时修补，否则拖到后来肯定会付出更大代价。不幸的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另一条教训就是除非被逼无奈不得不做，否则改革是不大可能实行的。现在常听到财政改革"政治上不可行"的说法。

那么，美国究竟会有个什么样的前景呢？在现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20年前，我们或许还能奢侈地采取"政治上可行"的措施。然而，我们现在的债务已高达5万亿美元，并以每年数千亿美元的速度增长。采取温和的措施已嫌太迟了。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只有强有力的措施才能止住大出血。即使我们明天通过某种方式平衡了预算，仍然有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要偿还。如果再进一步地削减开支，经济就会垮掉，所以偿还债务并为自己打牢基础的合适的出路就在于私有化，在于卖掉诸如公共土地、机场、海港和邮局这样的政府财产。例如，内华达州基本上是政府拥有的，不妨卖掉。我们可以卖掉的财产清单太长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不能？难道生活在一个没有债务，预算平衡的国度里不是令人光荣的事情吗？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太激进，那么我所能说的就只有等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崩溃吧——那才真叫激进呢。最后，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得不讨论这些主张，因为国家正朝破产的边缘

后　记

滑去。所有把脑袋埋在沙里的社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市场会迫使我们面对它们，到那时将会更痛苦。

简言之，我们不是会遇上通货膨胀的崩溃就是会遇上通货紧缩的崩溃。如果遇上通货膨胀这种情形，政府将印更多钞票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财产做后盾。谁也不想要美元了，那时1美元将不再买1.7德国马克，而只值半个马克了。

或者，政府不去疯狂地印钞票，因为庞大的公债将不再有足够的钱去资助房屋的建造以及生意和工厂，我们将遭遇通货紧缩、随着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价值的大滑坡，90年代初期的美国将会显现通货紧缩的征兆。在通货紧缩的崩溃中，财产价值将会下降，因为不会有任何足够的钱去支撑一切。

每当美国人问我投资哪种货币比较稳定时，我总提到德国马克、荷兰盾、瑞士法郎、奥地利先令、新西兰元和新加坡元。中央银行的政策是极端重要的。欧洲货币被绑在德国联邦银行上，而它的任务就是保持马克坚挺。我们自己的联邦储备看来更感兴趣的是维持短期的平稳而不是对我们的肿胀失控的货币体系进行彻底的大修。

我们的国家会幸存下去吗？肯定。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的财政体系多年来一直陷于混乱，但生活一直在继续，虽然这种生活并不再奢华。1910年的阿根廷曾是美洲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大萧条使它一下跌入贫穷之谷。生活是艰难的，但是，它确实继续了60年。

如果我从这次环球之旅中学到一件事，那么，它就是社会变得富有，于是趾高气扬了几年，数十年或者几个世纪，然而一切便都会结束。我所学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即使所有的财富灰飞烟灭，但生活仍然继续着。

后 记

更重要的一点，我也学会了，那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你必须尝试，你必须走出常规生活去实现它，你将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生活，行动吧。

附 录 I

22个月的摩托车旅行行装准备

吉 姆

5件衬衫(2件正式)
3套内衣
3双袜子
2个蝴蝶领结
1件跑步衬衫
1条跑步短裤
1块跑步者的手表

塔贝莎

4件全棉高领衫
3件可水洗丝衬衫
3双袜子
4套内衣
2双连裤袜
1双高跟鞋
1件可洗黑丝绸裙装
1条在穆斯林国家盖脑袋的丝围巾

1 顶太阳帽

每 人

3 条牛仔裤*
3 件羊毛套头衫
摩托车皮靴*
运动鞋
恶劣风雨天气的用具
皮夹克*和皮护腿套裤
头盔、护目镜和手套
丝绸长内衣和丝绸滑雪面罩

设备及供给

2 辆宝马摩托车(R100RT 和 R80)
零件(轮胎、塞子、垫圈等)
修理手册和工具
1 个手动绞车
盛汽油和水的扁平小金属罐
铲子、桶、粗麻绳、绳子和链条
短波收音机(上帝保佑 BBC)
3 米宽胶带,修理从化油器到风镜的一切东西
野营、净水和做饭用具
备用镜片
卫生用品和防晒油
急救箱、防疟疾药丸、抗生素
消毒液体喷射器、针、医用缝线

附 录 1

避孕药和卫生棉条、3个月的储备

缝纫箱，缝布和皮用

导游书和图(当你需要时很难能弄到)

很多申请签证用的护照像片

伪造文件上记录的橡皮图章箱

4盘磁带——艾恩·克莱恩的夜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莫扎特39#和41#交响曲、威利·尼尔森的“又上路了”，以及范·扬·坎尼拔的“她令我疯狂”、

宝丽来相机和胶卷，为在野外交朋友用的200张1美元票子、买小件物品及送礼做为纪念礼品的50张印有苏珊·B·安东尼头像的美元、烟和酒、用以贿赂边防卫兵及任何需要贿赂之辈

1把最高档瑞士军刀，每天使用

* 是吉姆出入高档宾馆、餐厅和生意聚会的正式服装，需加倍。

附 录 II

旅行日志

阅读这个日志的方式有些复杂。我们每天在清晨出发时记上一笔，因此上面的日期是从该地出发的日期。例如1990年4月5日那一天我们在伦敦，因为已于2日离开了牛津。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爱尔兰	1990.03.28	0	香侬机场
	1990.03.31	123	阿格哈多山饭店
			基拉尔尼
	1990.03.31	183	当昆邮局
	1990.04.01	320	扬海尔，阿盱摩宅邸
	1990.04.01	418	罗斯莱尔渡口
英 国	1990.04.02	631	鲁道夫饭店，牛津
	1990.04.07	731	昆伯兰饭店，伦敦
法 国	1990.04.08	995	希尔顿，巴黎
德 国	1990.04.09	1522	阿瑞拜尔饭店，慕尼黑
奥地利	1990.04.11	1696	潮流饭店，林茨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匈牙利	1990.04.12	1982	论坛饭店,布达佩斯
南斯拉夫	1990.04.13	2238	南斯拉夫饭店,贝尔格莱德
	1990.04.14	2278	南斯拉夫饭店,贝尔格莱德
土耳其	1990.04.16	2835	喀拉西斯饭店,锡利夫里
	1990.04.17	3178	安卡拉 得得曼,安卡拉
	1990.04.19	3357	内夫谢希尔 得得曼饭店,内夫谢希尔
	1990.04.20	3669	土鲁番饭店,萨姆松
	1990.04.21	3890	奥兹格饭店,特拉布宗
	1990.04.21	3999	土苏边境
乔治亚	1990.04.22	4011	旅游饭店,巴土米
	1990.04.24	4254	爱沃瑞亚饭店,第比利斯
阿塞拜疆	1990.04.26	4621	阿塞拜疆饭店,巴库
土库曼斯坦	1990.04.28	4979	阿什哈巴德饭店,阿什哈巴德
	1990.04.30	5203	玛丽饭店,玛丽
乌兹别克斯坦	1990.05.02	5451	布哈拉饭店,布哈拉
	1990.05.04	5617	撒马尔汗饭店,撒马尔汗
	1990.05.06	5803	乌兹别克饭店,塔什干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哈萨克斯坦	1990.05.07	5995	塔伦兹饭店,江布尔
	1990.05.08	6166	阿拉图饭店,伏龙芝
	1990.05.10	6315	奥尔塔饭店,阿尔玛—阿它
	1990.05.10	6537	中苏边境
中 国	1990.05.12	6600	友谊宾馆,伊宁
	1990.05.13	6936	石河子宾馆,石河子
	1990.05.15	7151	绿洲饭店,吐鲁番
	1990.05.16	7409	哈密宾馆,哈密
	1990.05.18	7670	敦煌饭店,敦煌
	1990.05.19	7923	酒泉饭店,酒泉
	1990.05.20	8210	飞马饭店,武威
	1990.05.22	8390	友谊宾馆,兰州
	1990.05.23	8641	平凉饭店,平凉
	1990.05.26	8835	金花饭店,西安
	1990.05.27	9081	友谊宾馆,洛阳
	1990.05.28	9196	河南国际饭店,郑州
	1990.05.29	9452	河北宾馆,石家庄
	1990.05.29	9634	国际饭店,北京
日 本	1990.06.06	9452	福田汽车,新宿,东京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日 本	1990.06.07	9 892	小仓饭店,新潟
	1990.06.08	10 135	福田汽车,新宿,东京
	1990.06.08	10 166	横滨
西伯利亚	1990.06.12	10 169	到达纳霍德卡
	1990.06.17	10 210	纳霍德卡饭店,纳霍德卡
	1990.06.18	10 364	乌苏里斯克饭店
			乌苏里斯克(双城子)
	1990.06.19	10 524	斯巴斯克—达尼饭店 斯巴斯克—达尼
	1990.06.23	10 807	旅游饭店,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1990.06.25	10 929	沃斯托克饭店
			比罗彼得占
	1990.06.26	11 037	贝若斯卡饭店
			乌布罗奇
	1990.06.28	11 289	卓斯巴饭店,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1990.06.29	11 387	兹扎饭店,
			斯沃勃德尼
	1990.06.30	11 550	塔尤雅饭店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 地 备 注
西伯利亚			施马诺维斯克
	1990.07 02	11 551	平板货车，切内斯彻维斯克
	1990.07.05	11 808	扎巴卡耶饭店，赤塔
	1990.07.06	12 106	西伯利亚饭店，彼得罗夫斯克—扎巴卡斯基
	1990.07 07	12 246	奥克布拉斯卡亚饭店，乌兰—乌德
	1990.07.10	12 314	奥克布拉斯卡亚饭店，乌兰—乌德
	1990.07.11	12 531	贝加尔饭店，贝加尔
	1990.07.14	12 649	蒙莱卡饭店，伊尔库次克
	1990.07.15	12 763	卡德尔饭店，凯莱姆科夫
	1990.07.17	12 860	运动村，兹玛
	1990.07.18	13 021	塔戈饭店，下乌金斯克
	1990.07.19	13 227	西伯利亚饭店，堪斯克
	1990.07.20	13 484	陶瓷公司招待所，阿金斯克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 地 备 注
西伯利亚	1990.07 21	13 709	库兹巴斯饭店，克麦罗夫
	1990.07.24	13 872	中央饭店，新西伯利亚
	1990.07.27	13 909	新西伯利亚饭店，新西伯利亚
	1990.07.28	14 183	乡村剧院，新卡拉苏
	1990.07.29	14 418	俄木斯克以南的营地
哈萨克斯坦	1990.07.30	14 628	卡兹扎饭店，彼得维斯克
西伯利亚	1990.07.31	14 960	国营农场营地，车里雅宾斯克
俄罗斯欧洲部分	1990.07.31	15 069	穿过欧亚边界
	1990.08.04	15 265	罗西亚饭店，乌法
	1990.08.10	15 545	奥伦勃格饭店，奥伦堡
	1990.08.12	15 768	布祖鲁克饭店，布祖鲁克
	1990.08.14	15 992	沃尔戈饭店，托尔亚蒂
	1990 08.16	16 232	奔萨饭店，奔萨
	1990.08.17	16 528	洛维奇饭店，梁赞
	1990.08.26	16 691	运动饭店，莫斯科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俄罗斯欧洲部分	1990.08.27	16953	罗西亚饭店,斯摩棱斯克
白俄罗斯	1990.08.29	17179	旅游饭店,明斯克
	1990.08.31	17436	卓兹巴饭店,布列斯特
波 兰	1990.08.31	17446	穿越波苏边境
	1990.09.02	17570	玛瑞托,华沙
	1990.09.03	17572	丽都假日,华沙
	1990.09.04	17759	波兹南饭店,波兹南
	1990.09.04	17878	穿过波德边境
德 国	1990.09.10	17949	加利福尼亚饭店,柏林
	1990.09.16	18204	托尼·弗兰克旅馆
			瓦尔德纳伯
	1990.09.19	18337	莫瑞奥特饭店,慕尼黑
	1990.09.20	18597	H&K 克拉汉默家
			格拉述顿
	1990.09.21	18690	海亚特饭店,科隆
法 国	1990.09.23	19100	公园饭店,尚蒂伊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 地 备 注
英 国	1990.09.24	19 138	龙尚饭店,巴黎
	1990 09.26	19 402	欧文敦广场 28 号,伦敦
	1990 09.27	19 590	海亚特王,伯明翰
	1990.09.29	19 767	伯克利饭店,都柏林
爱尔兰	1990.09.29	19 994	再次到达当昆邮局
	1990.09.30	20 007	白纳斯饭店,丁格尔
	1990.10.01	20 241	希得思饭店,罗斯蕾
英 国	1990.10.14	20 505	约翰和琳达家,伦敦
德 国	1990.10.15	20 800	追思饭店,多特蒙德
	1990.10.16	20 811	WUDO 宝马,多特蒙德
荷 兰	1990.10.18	20 965	丽都假日,阿姆斯特丹
德 国	1990.10.19	21 311	鹏神饭店,杜塞尔多夫
	1990.10.20	21 529	民族饭店,法兰克福
瑞 士	1990.10.21	21 800	汉斯和吉尔家,瑞吉
	1990.10.23	21 836	新公园饭店,苏黎士
	1990.10.24	21 905	斯汀格哈本饭店,巴塞尔
法 国	1990.10.25	22 335	麦吉瑞饭店,马赛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突尼斯	1990.10.26	22 339	从拿破仑渡口乘渡轮穿过地中海
	1990.11.06	22 364	非洲中央旅馆，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1990.11.07	22 377	阿布·纳瓦斯旅馆，迦马式
	1990.11.07	22 586	埃格旅馆，特贝萨
	1990.11.11	22 950	埃尔·奥拉西旅馆，阿尔及尔
	1990.11.12	23 135	塞纳尔巴旅馆，杰勒法
	1990.11.15	23 323	罗斯迷美丝旅馆，加达亚
	1990.11.16	23 743	迷迪凯特旅馆，因萨拉赫
	1990.11.17	23 919	帕米尔瑞营地，阿拉克
	1990.12.05	24 284	塔哈旅馆，塔曼拉塞
	1990.12.06	24 359	宿营撒哈拉
	1990.12.07	24 467	在撒哈拉 125 公里路标处宿营
	1990.12.08	24 543	在因·圭赞姆宿营
尼日尔	1990.12.09	24 562	在阿萨马卡宿营
	1990.12.11	24 770	沙漠旅行队旅馆
	1990.12.12	25 036	阿德比纳的房子
	1990.12.14	25 237	阿马多·科朗达加旅馆，辛德尔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尼日利亚	1990.12.16	25 484	中央旅馆，卡诺
	1990.12.17	25 860	德瑞比旅馆，迈杜古里
	1990.12.18	26 066	边防哨，科拉瓦（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交界）
喀麦隆	1990.12.19	26 080	科罗法塔海关（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交界）
	1990.12.28	26 505	马罗阿皇家旅馆，马罗瓦
	1990.12.29	26 649	拉伯努旅馆，加鲁阿
	1990.12.30	26 932	青年旅馆，梅甘加
中非共和国	1990.12.31	27 004	在中非共和国边境贝罗卡宿营
	1991.01.23	27 710	诺瓦酒店，班吉
	1991.02.04	27 710	桑哈和刚果河（河流）
	1991.02.18	27 990	中部，姆巴牟皇宫，科斯莫旅馆，布拉柴维尔
扎伊尔	1991.02.23	28 152	洲际大酒店，金沙萨
	1991.02.24	28 493	美军后勤宾馆，奇克威
	1991.02.25	28 592	天主教传教堂，伊迪奥法
	1991.02.26	28 631	未完工的妇产科诊所，穆可可
	1991.02.27	28 712	天主教传教堂，玛旁古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扎伊尔	1991.03.07	28 779	棕榈酒店,伊勒玻
	1991.03.15	28 779	平台货车 16535-3,坦科
	1991.03.16	28 940	喜来登-卡拉维亚酒店,路邦巴什
赞比亚	1991.03.17	29 058	爱丁堡酒店,奇特威
	1991.03.20	29 290	洲际大酒店,路萨卡
	1991.03.22	29 594	洲际大酒店,利文斯通
津巴布韦	1991.03.23	29 596	维多利亚瀑布酒店,维多利亚瀑布
	1991.03.25	29 718	象牙木屋,黄格国家公园
	1991.03.26	30 066	卡多玛农场汽车旅馆,卡多玛
	1991.03.29	30 156	喜来登酒店,哈拉雷
	1991.03.30	30 356	大津巴布韦旅馆,玛斯文哥
博茨瓦纳	1991.03.31	30 670	塔帕玛木屋,弗兰西斯镇
	1991.04.02	30 947	喜来登,哈博罗内
南 非	1991.04.06	31 193	亨弗雷·穆拉德的家,约翰内斯堡
	1991.04.07	31 498	金伯利酒店,金伯利
	1991.04.11	32 129	开普领酒店,开普敦
	1991.04.12	32 822	托尼和苏·斯帕格的家,科尼萨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南 非	1991.04.13	32 844	马丁和卡罗琳·肯纳的家，格雷厄姆镇
	1991.04.15	33 473	亨弗雷和塞瑞妮蒂·穆拉德的家，约翰内斯堡（后至内罗比、毛里求斯和新加坡）
澳大利亚	1991.04.29	33 479	珀斯机场
	1991.04.29	33 511	珀斯希尔顿，珀斯
	1991 04.30	33 780	海洋中心旅馆，杰拉尔顿
	1991 05.02	34 124	发信旅馆，卡那封
	1991.05.03	34 749	帕尔多路边旅店，帕尔多
	1991 05.04	35 038	有线海滩俱乐部，布鲁姆
	1991.05.06	35 694	库纳纳拉旅馆，库纳纳拉
	1991.05.08	36 216	博福特旅馆，达尔文
	1991.05.09	36 413	凯瑟琳旅馆，凯瑟琳
	1991.05.10	36 910	威克利夫路边旅店，威克利夫·威尔
	1991.05.11	37 443	艾尔斯岩喜来登，尤拉拉
	1991.05.12	37 720	艾利斯斯普林斯喜来登，艾利斯斯普林斯
	1991.05.13	38 049	三路路边旅店，三路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 地 备 注
澳大利亚	1991.05.14	38 601	甘农汽车旅馆，胡利亚·克里克
	1991.05.17	38 862	赌场喜来登，汤斯维尔
	1991.05.20	39 119	希尔顿国际饭店，凯恩斯
	1991.05.21	39 395	轻松汽车旅馆，霍姆希尔
	1991.05.22	40 058	大东汽车旅馆，金皮
	1991.05.23	40 486	加诺特和萨利梅耶思旅馆，楠布卡海兹
澳大利亚	1991.05.25	40 819	温特沃斯喜来登，悉尼
	1991.05.26	41 133	半路汽车旅馆，塔卡塔
	1991.05.27	41 458	艾里克和苏瓦尔梅耶思旅馆，科里奥
	1991.05.28	41 524	阿贝尔塔思曼渡船上，德文波特
	1991.05.29	41 793	霍巴特喜来登饭店，霍巴特
	1991.05.30	41 918	国际饭店，朗塞斯顿
	1991.05.31	41 985	阿贝尔塔思曼渡船上，墨尔本
	1991.06.01	42 011	帕特里克和凯西摩尔旅馆，霍索恩
	1991.06.02	42 315	热那亚饭店，热那业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澳大利亚	1991.06.03	42652	温特沃斯喜来登,悉尼
新西兰	1991.06.06	42656	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
	1991.06.07	42781	塔卡瀑拉国际汽车旅馆,奥克兰
	1991.06.08	43031	怀奥鲁迎宾馆,怀奥鲁
	1991.06.09	43201	阿尔卉汽车旅馆,皮克顿
	1991.06.10	43439	马那饭店,惠灵顿
	1991.06.11	43865	霍肖特宝马(奥克兰喜来登),奥克兰
阿根廷	1991.06.25	43865	里奥加耶戈斯机场,里奥加耶戈斯
	1991.07.03	43871	里奥哥斯达艾帕特饭店,里奥加耶戈斯
	1991.07.04	44092	萨达旅馆,圣胡利安
	1991.07.05	44354	海军准将饭店,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
	1991.07.07	44629	瓦尔代半岛酒店,马德林港
	1991.07.08	45042	奥斯特拉旅馆,布兰卡港
	1991.07.09	45297	格兰阿苏尔旅馆,阿苏尔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阿根廷	1991.08.03	45491	喜来登和大使馆饭店，布宜诺斯艾利斯
乌拉圭	1991.08.04	45496	艾尔米拉多旅馆，萨克拉门托移民镇
	1991.08.06	45615	维多利亚广场酒店，蒙得维的亚
	1991.08.10	45703	洋尔米拉皮纳刚多，埃斯特角城
	1991.08.11	45911	格兰弗洛瑞思饭店，特立尼达
阿根廷	1991.08.12	46058	努埃沃广场饭店，科隆
	1991.08.13	46319	科麦多旅馆，圣弗朗西斯科
	1991.08.15	46451	克里隆饭店，科尔多瓦
	1991.08.17	46465	萨那托里奥迪哥西托，拉卡莱拉
	1991.08.18	46633	金恩思旅馆，金恩思
	1991.08.21	46885	广场旅馆，门多萨
	1991.08.22	46993	普恩特德尔印加旅馆，普恩特德尔印加
智 利	1991.08.31	47103	皇冠假日饭店，圣地亚哥
	1991.09.01	47269	凯撒饭店，萨帕拉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智利	1991.09.02	47 599	巴耶纳尔饭店,巴列纳尔
	1991.09.03	48 047	安托法加斯塔饭店,安托法加斯塔
	1991.09.05	48 495	圣格里高利旅馆,阿里卡
秘 鲁	1991.09.06	48 636	图瑞思塔思旅馆,莫克瓜
	1991.09.07	48 964	联盟饭店,阿蒂科
	1991.09.08	49 216	拉斯杜马斯伊卡(然后去利马,专程去拉巴斯,的的喀喀湖,库斯科,马丘比丘,库斯科,又回到利马)
	1991.09.17	49 408	喜来登,利马
	1991.09.18	49 587	图瑞思塔思旅馆,瓦尔梅
	1991.09.19	50 024	图瑞思塔思旅馆,皮乌拉
厄瓜多尔	1991.09.20	50 315	奥罗旅馆,纳兰哈尔(然后去瓜亚基尔,专程去加拉帕戈斯)
	1991.09.27	50 373	奥罗维尔德旅馆,瓜亚基尔
	1991.09.30	50 632	阿拉麦达里尔,基多
哥伦比亚	1991.10.01	50 852	摩拉苏科饭店,帕斯托
	1991.10.02	51 087	洲际,卡利
	1991.10.03	51 258	安巴拉旅馆,伊瓦格
	1991.10.04	51 397	台克安达马旅馆,波哥大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巴拿马	1991.10.07	51423	马里奥特,巴拿马城
	1991.10.08	51695	非埃恩塔旅馆,戴维
哥斯达黎加	1991.10.10	51945	奥罗拉假日饭店,圣约瑟
	1991.10.11	52140	卡比纳思桑托里塔,拉克鲁斯
尼加拉瓜	1991.10.12	52240	洲际饭店,马那瓜
洪都拉斯	1991.10.13	52421	米拉马饭店,圣洛伦佐
萨尔瓦多	1991.10.15	52574	卡米诺里尔,圣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1991.10.17	52732	西班牙征服者饭店,危地马拉城
	1991.10.18	52757	安提瓜饭店,安提瓜
墨西哥	1991.10.19	53104	伊克鲁马尔饭店,阿里亚加
	1991.10.20	53373	维多利亚饭店,瓦哈卡
	1991.10.22	53594	阿里斯多恩旅馆,普埃布拉
	1991.10.23	53880	唐卡智尔旅馆,奥祖鲁阿马
	1991.10.24	54233	普拉多饭店,马塔莫罗斯
美 国	1991.10.25	54493	埃德纳汽车旅馆,得克萨斯埃德纳
	1991.10.29	54723	温得海姆沃威克饭店,休斯顿
	1991.10.31	55075	皇家奥尔良,新奥尔良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美 国	1991.11.02	55 367	假日饭店，塔斯卡卢萨，亚拉巴马
	1991.11.07	55 470	父母之家，亚拉巴马，德莫波利斯
	1991.11.08	55 577	拉迪逊旅店，蒙哥马利
	1991.11.09	55 683	汉普顿旅店，伯明翰
	1991.11.10	55 864	大学旅馆，亚特兰大
	1991.11.11	56 094	假日饭店，夏洛特
	1991.11.12	56 306	假日饭店，约翰斯顿城，田纳西
	1991.11.13	56 591	大学骑士酒店，夏洛茨山庄，弗吉尼亚
	1991.11.15	56 714	史蒂夫罗杰客人公寓，费尔法克斯，弗吉尼亚
	1991.11.17	56 899	韦恩城旅馆，韦恩城，宾夕法尼亚
	1991.11.17	57 020	回到家，纽约
	1992.07.31	57 020	离家，纽约
	1992.08.01	57 327	米勒思汽车旅馆，杜波依思，宾夕法尼亚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美国	1992.08.02	57 848	马里奥特奥哈拉，芝加哥
	1992.08.03	58 318	草原风汽车旅馆，杰克逊城，明尼苏达
	1992 08.04	58 796	质量旅店，拉皮德城，南达科他
	1992.08.05	58 846	斯宾塞保罗逊之家，斯特吉斯，南达科他
	1992.08.06	59 204	舒适旅店，科迪，怀俄明
	1992.08.07	59 431	黄石汽车旅馆，利文斯敦，蒙大拿
	1992.08.08	59 804	沙漠山客店，亨格里霍斯，蒙大拿
加拿大	1992.08.09	60 146	登山者旅店，路易斯湖，艾伯塔
	1992.08.10	60 541	北方海岸旅馆，乔治王子城，不列颠哥伦比亚
	1992.08.11	60 931	平克蒙顿汽车旅馆，平克蒙顿，不列颠哥伦比亚
	1992.08.12	61 230	蒙丘河旅店，蒙丘湖，不列颠哥伦比亚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加拿大	1992.08.13	61 566	希尔思代德湖休闲旅店，特斯林，育空
	1992.08.14	61 872	塔尔伯特武装汽车旅店，毁灭湾，育空
美 国	1992.08.15	62 190	奇斯托奇纳交易场，奇斯托奇纳，阿拉斯加
	1992.08.16	62 430	库克船长饭店，安克雷奇
	1992.08.20	62 661	奇斯托奇纳交易场，奇斯托奇纳，阿拉斯加
加拿大	1992.08.22	63 198	马达努埃卡旅店，鲁珀特王子港
	1992.08.24	63 208	先锋旅店，哈迪港
	1992.08 25	63 467	子午线饭店，温哥华
美 国	1992.08.26	63 513	奥林匹克旅店，安吉利斯港，华盛顿
	1992 08.27	63 895	安巴卡代罗，纽波特，俄勒冈
	1992.08.28	64 076	梅德福最佳威斯滕旅店，梅德福，俄勒冈
	1992.08.29	64 222	圣地巴旅舍，奥尔良，加利福尼亚

续 表

国 家	日 期	英里数	当地备注
美国	1992.08.30	64 620	艾尔发旅舍，旧金山
	1992.08 31	64 971	雷和马里亚纳贝克，帕洛阿尔托，加利福尼亚
	1992.08 31	65 067	货运仓库，旧金山，向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巴伯摩托车博物馆发运摩托车

On the Road With Jim Rogers
Investment Biker
©1994 Jim Rogers
©1998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江苏人民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书　　名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
著　　者　[美]吉姆·罗杰斯
译　　者　刘　昕　胡　凝　李　绮
责任编辑　曹蔚林　谢　红　(025—6639664)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沛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75　插页 4
印　　数　1— 10170 册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154—4/F·513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ED-B